

刘禾著 **跨语际实践**

—— 文学，民族文化与
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宋伟杰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ISBN 7-108-01629-X



9 787108 016294 >

ISBN 7-108-01629-X/1-300

定价：26.00元

224495



刘 禾著 跨语际实践

—— 文学，民族文化与
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宋伟杰等译

译海·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语言实践：汉、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 刘... 等著，宋伟杰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6

ISBN 7-108-01629-X

Ⅰ. ①跨... Ⅱ. ①刘... ②宋... Ⅲ. ①汉语—翻译理论—文化交流—语言融合—中国、西方—考察—文集 Ⅳ.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7232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6月北京第1版
200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 数 344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6.00元

序

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譬如,倘若不使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我们还能不能讨论——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跨越东西方界限的“现代性”问题?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由谁确定和操纵的?这些界限是否易于跨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普遍的或者非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信的比较范畴?

我在本书提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观点,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linguistic mediation forms)的可能性。虽然过去20年间,对后殖民性、文化、身份认同(identity)、自我与他者等问题的复杂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研究也充分表明,如果继续将跨文化研究中具体的语言问题仅仅视为一种多余之物,或者仅仅视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果所进行的批判的一部分,将是不可思议的。后殖民理论家的著述令人振奋,而且他

们的研究方法所开启的意味深长的新思路使我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我本人关于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已使我必须直面种种现象与问题,它们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使我感到震惊的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恰恰是在批判西方统治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力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基本问题呢?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精心阐述的混杂性(hybridity)一词,旨在通过消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使后殖民的研究取向摆脱僵化的模式,从而能够把握各种复杂细微的差别。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国之外(diasporic)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欧洲宗主国语言被殖民地本土方言所污染而带有一种混杂性,而这些方言反过来又讽刺了殖民者语言假定的完整性。巴巴酷爱援引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笔下那个口吃的印度人西索迪亚(S. S. Sisodia),便精彩地道出了这一后殖民漫画像:“The troub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 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 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义。Rushdie, p. 343)。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欧洲宗主国语言并不通用,它们既不能与本土语言相匹敌,更无法获得民族语言或是方言的地位。那么,关于历史、能动作用、霸权、现代性以及主体性等问题,那些人民以及那些地区的经验,又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书使我有机会把语言实践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加以考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我们能以新的角度重新开启并追问西方统治与反帝斗争的意义。作为一名长在大陆,从小说写汉语,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中国人,我深深被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所吸引,尤其是汉语和英语、现代日语以及其他外国语言发生接触以来,其书面形式的变化。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通常是以日语为中介)之间广泛的接触/冲撞,特别关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及其早期的经典化过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然而,我对语言和文学的强调,并没有预先假定在表述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形而上的分裂。我要做的就是将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的民族建设及其关于“现代人”想像的/幻想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中介(agents)。

我在本书开篇处将“现代性”一词置于引号当中,并非心血来潮。我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早期的种种引证。这些引证的来源(origins)在数不胜数的重复、复述(evocations)、翻译以及再生产中消失殆尽。诚然,当我们说“modernity”或者“modern”在汉语中的等义词是现代性或者现代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哪一时刻,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这种等值

关系或者翻译才成为有意义的？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述行的/述愿的(performative/constative)叙事(比如说，经由特定情境的写作和言语而对某种观念不断的复述)乃是一些素材，它们构成了思想史家所理解的一个观念的“连续性”。举例说来，翻译行为必然要介入某种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之中，而这种语言限制着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或是为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所限制。对于诸如此类述行的/述愿的言语行为和写作行为(复述、翻译、语境内外的引证，等等)的环境而言，任何高高在上或者超越这些环境而进行的历史化尝试，注定会导致所分析的观念、概念或者理论的僵化，其结果也必定会导致我们对历史实践的理解的贫困化。因此，我对“现代性”的使用或者批判立足于一种引用的/翻译的研究取向。这样一种取向既考虑到现代性观念在较早些时候的复述，也考虑到我本人当下对这个观念的关注；即使我在本书中不再使用引号，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我就是用这个被人们反复引用和翻译的观念、这个可引用的(?)和可以互译的(?)的观念，来讨论中国现代的话语建构。

就这个方面而言，我对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如何想像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状况？以及从这一问题必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当某些类型的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得以合法化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如此，我关注的重心并不是中国现代的地方特性(the local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这一问题。倘若不充分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无法合理地得以探究或争论。当然，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观念是惟一可取的途径，人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提出许多其他的问题。

但就本书而言,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不致陷入以往那种对抗性范式的罗网。这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

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早已聚讼纷纭,广受质疑,而且本当如此。然而,仅仅因为它们它们是虚构的发明或人为的构造,就足以摒弃这一二元对立吗?我的观点是,更有效地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是要准确描述(无论何时存在可能)这样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在那些时刻,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在某种特定的语言中的使用开始具有语境的意义,并获得合法性。我之所以在本书中继续使用 East 与 West,是因为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这两个英文词在现代汉语中作为“东方”与“西方”的翻译表演(performance)。对现代翻译进行这样的研究使我能够质疑常识世界的**不证自明性**(皮埃尔·布迪厄语),而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正是以这种逻辑命名他们自身与任何一种偶然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的,这些身份认同被中国作家理解为在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存在,或是被外界强加于身上。换言之,我所关注的是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合法化过程、喻说(trope)以及叙事模式,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条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本书所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要想轻松自如地谈论中国化,必须充分假设中国自信其文明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具有绝对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在我所考察的这段时间里,由于西方的在场,这种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其程度之深,甚至迫使中国不再能为自身维系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而必须或隐或显地参照世界的其他地

方,后者时常以西方为代表。我也并非特别关注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的和普遍化的规划,诸如外国词语在任何一种语言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domestication),这是历史语言学家经常考虑的问题。我真正的理论兴趣在于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在这些符号意义介入的(mediated)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能动作用的暧昧性。因此,导言一章主要是批判地反思当代有关东方与西方、语言与权力、历史与变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的状况。毋庸赘言,我借助跨语际实践的观念,重新处理了比较文学、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至第九章分为三个部分,它们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分别考察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不同层面。第一部分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中由“民族”与“个人”这两个主导性关怀所描绘的话语疆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种特别突出的话语上:“国民性”理论与“个人主义”,每一种话语都是新的借贷词,来自日语对欧洲概念和理论的翻译。我认为,正是在这些被译介的理论和话语的疆界内,以及在对抗这一疆界的过程中,五四作家提出了他们关于现代性的基本主张。

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误解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式的关键词研究,我愿意强调我的关注点不在于考察词语、概念以及话语的变化含义,据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由于我关注的焦点是汉语文学实践中“现代”的合法化过程,所以我也必然要思考跨语际的表述模式问题。举例说来,我对鲁迅《阿Q正传》的解读旨在理解,这篇小说是如何通过建构一种符号意义介入的叙事主体而挪用国民性

话语的。这一研究取向在第二部分得以进一步强调,因为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figures),如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transpositions)等。虽然大部分此类特征对中国文学来说显然是新颖的,并时常伴随着自封自命的与欧洲语言文学的亲合性,但是,仍旧存在许多其他特征,不能确凿无疑地回溯成外国影响的结果。举例说来,影响的观念所无法解释的那些剩余的意义是什么?有学者提供的似乎可行的诠释是,这些意义乃是转化成现代表达形式的传统感受力(sensibilities)。然而,一个随即产生的困境是,如何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线。

在分析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这一类有符号意义介入的表述形式的时候,我一直抵制着如下一种诱惑,即要么用外国影响要么用本土演进来解释变化,因为选择这一方式会过早地结束对问题的探讨,而实际上我们恰恰应当把它揭示出来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读者将会注意到,影响我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与读解正是受跨文化诠释这一主导性问题意识,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canon)本身。

诚然,经典本身也需要质疑。第三部分“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继续思索能动作用、中介与翻译的知识,但这一部分的探究方式是在经典的形成、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化建设的规划的范围里,着手处理合法化问题的。具体说来,我审视民国

时期现代文学批评的功能,并查考经典形成的环境,譬如1935至1936年间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我特别感兴趣现代汉语文化诠释自身的转折点与展开方式时的形式,以及文学规划被个别作家与批评家相异的政治志向所左右的方式,尽管这些作家与批评家认为他们本身是在群策群力地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状况。也就是说,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矛盾状况促进了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步骤,即把中国文学与文化设想为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化中的一种。本书的最后一章重新思考有关国粹作为一种文化建设话语的论战。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一话语变化的动力引发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叙事与对抗性的话语,而这些叙事和话语将会无疑使我们对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与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之意义的理解变得复杂起来。

刘禾,199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2001年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Magistrett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现任密执根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Helmut F. Stern Professor)。1998-2000年任全美文学理论书奖(韦勒克奖)和文学史书奖(列文奖)两项大奖评委,现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董事。

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

英文学术著作有 *Translingual Practice*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Token of Exchange* (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即将出版有 *Semiotics of Empire* (哈佛大学出版社);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持灯的使者》(编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在人们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书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以期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著

·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吴承明著

·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 泉著

· 乐师与史官

阎步克著

· 圣灵降临的叙事（即出）

刘小枫著

·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即出）

汪 晖著

· 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著

·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刘禾著 宋伟杰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 1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5

翻译差异——一个矛盾形容法？ 14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27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35

变化论，新词与话语史 38

1 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75

国民性神话 76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79

翻译国民性 88

跨际写作的主体性：《阿Q正传》的叙述者 97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109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110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123

II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现实主义问题 143

《骆驼祥子》147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现实与梦想的争辩 182

重新勾画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184

梦幻的心理化 188

现实的万花筒 202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214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216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221

忏悔之音 234

说我是女人 244

III 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263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266

性别与批评 279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 285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308

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文学 309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316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319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323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342
《国粹学报》	345
《学衡》	351
附 录	369
A. 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374
B. 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	388
C. 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	402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404
E. 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431
F. 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440
G. 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461
文献目录	464
编后记	504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

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之间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是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论“信”这一表示夫妻间关系式的喻说与“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某位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她)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这里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相互作用。^[1]我在着手处理本书的主题之前,就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更大的问题,如西方学术界在思考文化差异时表现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式。举例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2]使用谁

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是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人们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毋庸置疑，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本身，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未曾污染”的本土知识的处女地，那么，这里所说的解释方面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就曾经“污染”过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历史力量而言，早在近现代时期它们就已经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穿越界限，即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对西方的翻译以及现代汉语的发明。虽然我不敢擅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但我将不揣冒昧地进入这些多层次的交叉与穿越的地带，描述并展开这一主题的困境。^[3]

也许，把我的总论题（problematic）重新放置在一个略微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它的意义。这里我要简短地介绍一下人类学家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文化翻译之观念的论辩，我相信这场论辩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多年以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为了提出一种解释的观念，已经在其理论阐述的不同阶段使用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他们的理想是，这种观念将能够解释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他们所研究的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譬如埃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是这样描述民族志研究中这个典型的转折点的：

让我扼要重述一遍。我们是从强调“他者”如何如何不同开始的——这不仅使他们显得与我们截然不同，

而且显得非常遥远和无比低下。但是在情感上，我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认为所有人都是相似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特拉布理安德人或者巴洛特斯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与我们的一模一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作用，“他者”仍旧固执地保持为他者。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发觉基本的问题是翻译问题。语言学家早已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都是困难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译通常是天方夜谭。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践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信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还不至于不同到完全无法沟通的地步，从这一态度出发，社会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就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文化语言之翻译的方法论。（黑体字为笔者所加）^[4]

人们大概会愿意像里奇那样信赖文化翻译的力量，可是“实践的目的”一语无意间露出了破绽。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人们以各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是否可能，也不在于“他者”是否是可以了解的，甚至不在于某一晦涩的“文本”是否是可以翻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出于何种实践的目的或者需要（它们维系着一个人一整套的方法论），文化人类学家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的翻译。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我在上文所提出的问题：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是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者思想权威的名义，一个民族志学者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

塔拉尔·阿萨德 (Talal Asad) 在其对于英国民族志传统的尖锐批评中, 将文化翻译的概念置于权力关系当中, 他要求我们在思考跨文化解释这个总论题时要特别关注下述现实历史情境, 即民族志学者及其提供信息的土著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 但并不讲述同一种语言:

粗略来说, 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 (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 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 (在当今世界, 特别是英语) 相比是“弱势”的, 所以, 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其原因在于, 首先, 西方各民族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 更有能力操纵后者。其次, 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有利可图的知识或值得占有的知识。^[5]

阿萨德对于文化翻译概念的批评, 对于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6] 它提醒我们, 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一事业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语言能力并不相干, 就算有关系, 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正视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 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 压抑其他的认知方式。生产关于其他人以及其他文化的知识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方式, 就是在既定的语言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比较性的术语。可是, 这种对等关系的基础本身通常并未受到检验。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

——博尔赫斯

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一思想当然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徒劳无功地试图驱散的一个共同的幻觉。尼采在试图摧毁这个幻觉时指出,使不相等的东西相等,这仅仅是语言(自诩能够把握真理)的一种隐喻功能。“说到底真理究竟是什么?它是一支由隐喻、转喻和拟人修辞共同组成的移动的大军:简而言之,它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被诗意地而且修辞性地强化、变形、装饰,并且经过长期的使用之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们似乎成为一成不变的、经典性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形形色色的真理不过是人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觉的幻觉。”^[7]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尼采认为隐喻的作用就是在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构同一性,正如尼采文章中使用的德文原词 Gleich Machen(使相同)所表明的,它“提醒人们注意德文 Gleichnis 一词的意义——形象、明喻、讽喻、比方、比喻式的故事、寓言,这个词明白无误地指向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实践。”^[8]富于反讽意味的是,通过德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在隐喻意义上的对等关系,这位哲学家本人也未能逃脱被翻译转换成另一种幻觉的命运。双语词典这一繁荣兴旺的行业便依赖

于这种驱之不散的幻觉——即它的权力意志。这一行业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让下述老生常谈永垂不朽：“所有语言都是由对等的同义词构成的”。^[9]跨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试图证明，人们在形成有关其他民族的观点时，或者是为其他文化同时（反过来）也是为自身文化整体的同一性设置各种话语的哲学基础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那种来自双语词典的概念模式——也就是说，A 语言中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 B 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否则的话，一种语言就是有缺陷的。我在这里要对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一文中，欧洲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日本对话者（手冢富雄）之间一段著名的对话略加分析，以此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下文摘自其对话录的后半部分（日指日本人，海指海德格尔）：

日：您细细倾听于我，或者更好地说，您细细倾听着我所作的猜度性的提示，这就唤起了我的信心，令我抛开了那种犹豫，那种前面一直抑制着我，让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的问题的犹豫。

海：您指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语言中用哪个词来表示我们欧洲人称之为“语言”的那个东西？

日：直到此刻，我一直未敢说出这个词语，因为我不得不给出一种翻译，这个翻译使得我们这个表示语言的词语看起来犹如一个地道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使之成为概念性的观念范畴内的东西了；这是由于欧洲科学和哲学只有通过概念来寻求对语言之把握。

海：日语里“语言”怎么说？

日：（进一步的犹豫之后）它叫“言叶”（Koto ba）。

海：这说的是什么？

日：ba 表示叶，也指花瓣，而且特别是指花瓣。请您想一想樱花或者桃花。

海：Koto 说的是什么？

日：这个问题最难回答。但我们已经大胆地解说了“粹” (Iki)——即是召唤着的寂静之纯粹喜悦，这就使我们较容易作一种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成就这种召唤着的喜悦的是寂静，寂静之吹拂是一种让那喜悦降临的运作。但 Koto 始终还表示每每给出喜悦的东西本身，后者独一无二地总是在不可复现的瞬间以其全部优美达乎闪现 (Scheinen)。

海：那么，Koto 就是优美的澄明着的消息之大道发生 (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t der Anmut) 啰。

日：妙口生花！只是“优美”一词太容易把今天的心智引入歧途了。^[10]

这段对话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首先，它戏剧性地同时展现了东西方之间翻译的不可能性和必要性。欧洲探问者无疑意识到了存在着翻译的陷阱，但他仍旧坚持认为在日语里存在着和欧洲的语言概念相对等的词汇。其次，日本对话者被迫回答探问者关于在日语中表示“语言”的是哪个词这一问题——这种典型的句法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倘若不把对等词的不存在解释为某种“欠缺”，那么它就是无法想像的。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手冢还需要解释自己犹豫的原因（这一犹豫在几行文字之后，被置于括号之内加黑体重新引入进来，有效地搅扰了对话的流程）。日本对话者惟恐他的翻译

会使日语与 *Sprache*(语言)的“对等词”看起来像是一个象形文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他接下来用德文对“言叶”(Koto ba)的描摹,恰恰导致了他所担心的结果。第三,在其对话者进行了冗长的描述之后,探问者在总结 Koto 的涵义时,所强调的与这个日本词语的德文翻译有所不同。它作为一种挪用的姿态,被海德格尔用来解说他本人关于道说或者 Sage 的理论,日本对话者在后面把这种理论描述为:“Denn es mußte sich etwas ereignen, wodurch sich dem Botengang jene Weite öffnete und zuleuchtete, in der das Wesen der Sage zum Scheinen Kommt”(“因为必定要有某个东西自行发生,借此为传信开启并照亮道说之本质得以在其中闪现的那个浩瀚境地”)^[11]。虽然“die Sage”(道说),“der Botengang”(传信)和“zuleuchten”(照亮)这些词语似乎和他对于日语词汇“言叶”相当自由的翻译遥相呼应,即“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t der Anmut”(优美的澄明着的消息之大道发生),但是它们更为切题说到这位哲学家在其本人关于 Ereignis(大道发生)、Eigene(n)(居有)、Lichtung(澄明)等问题的沉思中所使用的某些关键喻说。^[12]通过翻译来阐明翻译的困境,海德格尔的语言展示了它所言及的挪用。

海德格尔晚年提出其关于语言的重要观点,即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这位哲学家有关语言的论述中,《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这位哲学家已经学会日语并且用日语进行和转写这次对话,那么这场对话会变成什么样子?最有可能的是,这些问题压根就不会提出来,或者会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予以阐述。这场对话凸显了现代历史上所谓的东西方交流中存在的许多

问题,理论语言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理论语言表达或暗示了一种普遍的关注,但实际上却暴露了欧洲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对我来说,将某种分析性的概念或者范畴不加区别地到处使用,就好像在一个地方可以理解的必然在别的地方也能被理解,这种想法似乎是荒诞不经的。

东西方语言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其意义是多层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穿越不同语言的边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因为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需要各种各样的概念模式,经由这些学者之手,所有词语都能被轻而易举地翻译成分析性的(通常是普遍性的)范畴。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最近欧阳祯称之为“伪普遍性”的学术范畴。为什么中国文学没有史诗?中国有市民社会吗?等等。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偏见,有些比较含蓄有些则不那么含蓄,与其说它们揭示了研究对象的问题,不如说暴露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正如欧阳祯恰切地指出的:“相反的问题即便有,也很少被提出来。为什么西方没有断代史?为什么西方没有创造出《诗经》那样的作品?西方有没有和律诗或者杂剧相对等的文类?如果向西方文化的空白提出这样的挑战,多少给人以荒诞之感,那么我们也必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那些针对中国的问题同样不得要领。”^[13] 欧阳祯将这些伪普造性的问题归因于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方法论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混乱。不过,在语言能够或者不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更为根深蒂固的信念,使得这样的混乱无法避免呢?我们必须正视海德格尔的对话录所提出的翻译问题。分析性范畴与它们在自身的语言中所运用的程度相比较,是否不那么经常地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诸如此

类的翻译实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所得所失到底是什么？也许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分析性范畴由于无法具有普遍意义，就不能全面应用（实际上，翻译的冲动是不可遏制的）；而在于分析性范畴跨越语言边界时，一如任何其他的跨越或者僭越，必定要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抗和互相冲突的权力诉求。诚然，普遍性非真亦非假，但是声称具有普遍性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该就其本身语言的特殊性和权威的来源，予以严格的检验。

让我们考察一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经常使用甚至滥用的若干词语：“the self”（自我）、“person”（人）和“individual”（个人）。“self”一词在汉语、日语和阿拉伯语当中的对等词是什么？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所赖以立足的假设前提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建立意义的对等关系，双语词典的存在不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吗？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哲学传统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自我”这一范畴，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儒家关于“己”等范畴的观念是怎样的？我发现这些问题是相当含混的，因为它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英语“self”和汉语“己”、“我”、“自我”以及其他词语之间的“对等关系的喻说”，只是在近代的翻译过程中才建立起来并且是借助于现代双语词典而得以固定下来的。^[14]因此任何现存的意义关联都来自于历史的巧合，这些巧合的意义则取决于跨语际实践的政治。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某一文本就在翻译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成为“可翻译的”。此处我想强调一个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要点，如果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理论的基础是“自我”或者“个人”等本质性范畴，而这些范畴的语言同一性超越了翻译的历史，并且将自己

的话语优先权强加于不同的文化之上,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问题。^[15]如果我们假定在“己”、“我”、“自我”与“self”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性,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遮蔽了每一个词的历史,以及“self”一词现代汉语中翻译的历史;因为,如果不首先将它本身展示在其得以生成的层面(这里表现引入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那么,差异就无法在本体论的层面被想像出来。^[16]在近期评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自然神学的信函》时,豪恩·骚西(Haun Saussy)指出,语言之间相互的可译性“只有当 is(是)这个系动词已经被剥夺其意义之后”,才能得以保证。“一旦系动词的存在被取消,那么对于本体论者面言也就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争论了。”^[17]

本世纪 80 年代前后,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已经在讨论,面对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自我、人格和个人的观念(无论怎样界定,而且无论怎样不稳定)是否还应该继续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使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西方哲学中自我、认同和语言问题的研究,以及他对能动作用、人的意义以及公共空间等问题的思考,最近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的关注。^[18]特别是其《自我的源泉》一书,通过多层面的、历史性地理解西方的自我,试图向批判西方主体性观念的解构主义提出挑战。泰勒对于现代认同之起源的探讨,以及他宽广的视野、整合性的思路,受到许多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学者们的热烈拥戴。可是,在一个层面上似乎是对于解构主义的大有可为的批判,在另一层面上却转面再次确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价值观。这一点在泰勒的伦理学思考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他允许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排他性地宣称拥有善的理想的时候。尽管泰勒本人从来不曾忽略这些理想本身

的历史涵义,但他更倾向于削弱与这些理想相联系或者是以这些理想的名义实行的历史实践的某些层面。^[19]当泰勒以一个道德的终极目标结束他这本巨著时,读者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福音式的解决办法:他告诉我们,人类道德赎救的希望寄托在“集犹太教和基督教于一身的有神论(无论其信徒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么可怕的记录)之上,寄托在它对于人之神圣肯定的重要承诺中,它比无助无援的人类所能达致的境界要更为完整”(第 521 页)。如果历史的暴力能以加括号的方式来涵纳和压抑,那么人们不禁会怀疑,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不也就一同销声匿迹了吗?^[20]

首先,自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分析性的范畴?“很有可能的是,不必借助任何特定的人格观念,就可能成为人并以人的方式思考。”英国学者斯蒂芬·柯林斯(Steven Collins)对于自我的哲学范畴所做的批判,为把人格和自我观念奠基于现代学术系科之上的可能性打开了新视野。在重新评价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时,他指出,尽管强调经验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的杜克海姆和马赛尔·毛斯谈到了发展与变化的范畴,但是二者都依仗康德的哲学范畴作为出发点。因此,即使当经验科学驱使毛斯去阐述一种非本质主义的人格观念时,他仍旧准许自我的意义凸显成为一个首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这一范畴是必要的而且普遍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验的条件,”柯林斯认为,“那么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能有一种历史。”^[21]

其他许多英法人类学家也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他们参与了对于社会学年鉴学派遗产的重新思考,特别是反思了毛斯 1938 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人类心智的范畴:人格

观念；自我观念》。^[22] 这些学者出于自身的普遍主义要求，批评了毛斯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他在运用哲学范畴时存在的问题，他们还试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尽量克服马丁·哈里斯（Martin Hollis）所说的人格“历史的和分析性的范畴”所具有的双重束缚。这样，他们就有效地强调了自我、人与个人在西方学术界得以确立并且自然化为分析性范畴的某些历史条件。^[23]

出于各种原因，这种自我反思性批评几乎完全未能改变主流学术的学科实践：人们仍旧一如既往地依赖自我、人格、个人等范畴，去获得关于另一种文化（作为他们自身整体化自我意识的对立面）的“本真”认同的知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只能是同义反复的：要么说非西方文化在自我、人格和个人的概念方面是有欠缺的；要么说他们的概念与西方相对应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的问题是，有关这种知识的先决条件是否在这些范畴本身被应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或者这个前提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希望对这一境况予以关注，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比超话语的研究方式更令人向往——没有人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使这个问题变得微不足道——而是因为这一境况关系到知识的条件作用，任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穿越往来都要涉及这些条件。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条件本身加以解释，而不仅仅是假定着这些条件。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诱使西方学者在其他文化中寻找一个笼统的自我概念？除了专业化知识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权力作用之外，我相信这一现象也关系到西方语言哲学话语中关于需译和差异问题的某些由来已久的假设。

翻译差异——一个矛盾形容法？

我们正在掘巴别塔的坑

——卡夫卡

Traduttore, traditore。这句意大利格言长久以来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句陈词滥调：“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翻译者即叛逆者）。然而，如果有谁要拿英语译文太当真，他即刻就会失足落入认识论的陷阱，即向必然会背叛格言原文的英译者表示敬意。关于翻译之难的这一经典例证，罗曼·雅各布森曾在其《论翻译的语言层面》一文中评论道，这句意大利格言的英文翻译“从那句合仄押韵的意大利韵语中，剥夺了其所有的文字游戏的价值。所以一种认知态度会驱使我们这一格言转变为一个更加明确的陈述，并回答下列问题：是什么信息的翻译者？是什么价值的背叛者？”^[24] 此处，雅各布森所关注的仅仅是诗歌的不可译性，音节的类似与差别介入到语义关系中，因而有助于文本总体意义的生成。作为一名对诗歌研究贡献卓著的结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指出 *traduttore, traditore* 这一格言在意大利语言中言之成理，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词以一种相邻的关系，被两相对照着并置到意大利语的音位学符码之内，这在英语中是无法复制出来的。结果是，英文翻译中意义的文字游戏层面或者诗的层面丧失殆尽，给了这句格言一种散文化的解释，即将其转变为一种平白的表达真理的陈述：翻译者即叛逆者。

但是,我结合雅各布森的例子想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涉及背叛或忠实这个隐喻,因为德里达等人在批判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原初性观念以及目的论在场时,已经有效地解构了这一点。^[25]我也并非特别着意于音码的不可译性或者语码的文字游戏层面,对此,雅各布森和其他比较语言学家已经提供了洞见卓识。^[26]在我看来,雅各布森所举的例子,在数百年来主导着西方翻译家、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翻译理论中,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总论题。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表述为:关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除了技术性的语言学理由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假设,促使理论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论题?

翻译理论家不厌其烦地讲述巴别塔的故事,象征性地用它来表达人类交往的混沌状态。巴别塔的故事本身(《创世记》11:6)似乎预示着圣经翻译的漫长历史,它部分出于早期苏美尔人的传说,并经过改写和翻译,进入希伯莱文的《圣经》之中。^[27]巴别塔不但象征着由于语言的多样性而无法克服的翻译的不可能性,而且开创了对于尽善尽美、对于“太初”的逻各斯的渴望。正如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所指出的,一些语言神学家和语言玄学论者力求淡化第二次放逐,即从亚当的普遍语法中被驱逐出来;他们通常相信,“一种单一的原初语言,一种 Ur-Sprache(元语言),就隐藏在我们当前的无序状态的背后,隐藏在宁录的金字塔形神塔坍塌之后随之而来的、突然变得冲突对抗的各种语言的背后。”^[28]然而,当人们翻要把《圣经》翻译或各种世俗语言时,对于太初之言(original Word)的信念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在共同语言方面陷人的困

境。《圣经》翻译的历史以及基督教的政治充斥着模棱两可的实践。这恰如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所指出的,“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神圣的观点,它坚信语言增熵的过程,即语言之间的任何穿越必然意味着浪费、混乱和重大的损耗。可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历久弥新的道德说教式的、弥赛亚式的需求,要将上帝的词语传播给潜在的皈依者,《圣经》的翻译便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29]

在古代关于翻译的神秘理解和现代关于语言的理性理论或语言学研究这二者之间,斯泰纳觉察到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因为后者持续不断地争辩着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在其学识渊博的专著《巴别塔之后》中,斯泰纳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以直接的翻译经验为焦点,从西塞罗公元前46年的《论演说术》以及20年后贺拉斯的《诗艺》一书对于西塞罗“不必逐字翻译”的论点的重申,一直到荷尔德林1804年对他本人翻译的索福科勒斯的作品所作的评论。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理论研究和解释学研究,它由施莱尔马赫的重要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所倡导,并被施莱格尔、洪堡、哥德、叔本华、爱兹拉·庞德、瓦尔特·本雅明等人所采纳。经过这个哲学—诗歌的理论阶段之后,苏联与捷克的学者,即形式主义运动的传人,带来了翻译理论的第三个阶段,他们将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应用到语际间交往的讨论。安德列·费多罗夫的《翻译理论导论》(莫斯科,1953)便是这一协力完成的科学成果的代表作。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第四个阶段与科学化阶段有些重叠,这也是斯泰纳的分期理论无法避免的矛盾。本雅明最初发表于1923年的文章《翻译者的任务》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发现,再加上海德格尔与

伽达默尔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一种转向,即把解释学研究引进到翻译和诠释之中。^[30]虽然斯泰纳的分期值得商榷,但他的批判性的考察对各种翻译理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不少洞见卓识。^[31]譬如他认为:

所有的翻译理论——无论是形式的,应用的,还是编年的——都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不可规避的问题的变体。怎样才能或者说才应该做到忠实?在本源语中的 A 文本与译体语中的 B 文本之间,最理想的关联是什么?这一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圣杰罗姆曾经提出两种不同的要求:对于经典作品来说,只能逐词翻译,对于其他作品来说,则按意思翻译。此外,我们还有什么重要的话可说呢?(第 261—262 页)

斯泰纳的论述所承担的风险是,它对翻译理论状况的描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值得冒这个险,因为他的论述提出的许多问题足以补偿这种简单化的探讨。通过关注可译性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在翻译理论中被提出的方式,斯泰纳历史性地批判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特别是这个传统的普遍主义语言观。他的批判使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假设成为问题,即,

语言潜在的基本结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普遍的和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本质上是一个表面现象。翻译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遗传方面、历史方面以及社会方面这些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是存在的,所

有从这个基本结构中派生的语法都能够被有效地放置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之中并被人们所理解,而无论其表面的形式何等独特或者怪异。从事翻译就是要穿透两种语言表面的分歧,把它们之间相似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共同的存在根源揭示并发挥出来。(第73页)

斯泰纳是否有些夸大其词?读者也许会反驳道,萨皮尔(Sapir)和沃尔弗(Whorf)的文化相对主义就和这种整体化图景格格不入;实际上,萨皮尔和沃尔弗就是在致力于削弱对语言和现实的普遍主义理解。按照他们已为人所熟识的观点,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充分相似到可以表述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地步,而且各个不同的社会分别生活在各有其特色的、由语言所决定的世界中,它们决不是碰巧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思想世界”或者文化相对主义的这种元语言学(以其自己的方式渴望着某种普遍状况),已经在经验的和哲学的诸多思想阵线上受到了民族志学者和语言学家的抨击与批判。此处使我感到饶有趣味的,不是萨皮尔—沃尔弗对于特定共同体的语言世界观的假设是否有效,而是普遍主义者和文化相对主义者都继承了一种未经质疑的思维方式,亦即在表面上质疑翻译的可能性的同时,实际上却又依托翻译建立了某种知识模式。这种矛盾状况不过是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个古老的问题又从后门带回来了,沃尔弗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翻译成英语,霍皮人会说这些处于因果关系中的实物“will come”(会来)或者他们——霍皮族人——

“will come to”（会走向）这些实物。可是在霍皮人自己的语言里，没有与我们表示简单而抽象的运动，即我们纯粹的运动学概念“come”（来）或“go”（去）相对应的动词。此处被翻译成“come”的这几个霍皮语词汇指的是发生的过程，而没有将此过程叫做运动——这些词是“发生在这里”（pew'i）或者“因为它而发生”（an-ggo）或者“到达”（pitu，复数为 oki），最后这个词仅仅表示最终的表现形式，即真正到达某一个特定的点，而非表示之前的任何运动。^[32]

通过对英语和霍皮语关于地点的词语进行逐字逐句的直译，沃尔弗恰恰在无意之间削弱了他本人关于界限明晰确定的种族—语言共同体的理论构想。人们也许会跟着斯泰纳发问：“如果语言仅仅是一些就其本质而言只能不和谐地描摹现实的单子，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进行语际之间的交流？我们又怎样才能掌握另一种语言或者通过翻译而进入另一个语言世界？”^[33]为了沿着语际间相互作用的政治这一方向把这些问题推进一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沃尔弗赖以得出其结论（霍皮语是无法理解的，除非使用它自己的术语）的理论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他有权利将这种“异族”语言自由地翻译给英语世界的受众。

在此之际，我们来看一看本雅明的论文《翻译者的任务》，也许是不无裨益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本雅明对自己作为翻译者的角色时时刻刻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反思意识，而且还因为他对于跨语言交流的论述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会走出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老套

套。我们将要讨论的这篇文章(是本雅明为翻译波德莱尔《巴黎风光》所作的导言)试图超越原文和译文的框架,重新思考可译性问题。“一部作品是否可译,这个问题有两层涵义,”本雅明指出,“其一是:在该作品的读者整体中,可能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吗?其二则更进一步:是否这部作品的性质便是适合翻译的,并且因而由于(翻译)这一形式的重要性,它也要求翻译?”^[34]他不再把读者接受的因素,或者“理想的”接受者视为研究翻译理论的一个有效途径。按照本雅明的观点,本源语中的原文和接受语言中的译文必须服从于第三种概念, *die reine Sprache*, 或者说纯语言,它“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就像那不可表达的、创生性的太初之言,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35]这一概念取代了忠实、原初性、在场以及本真性等概念,预示着法国解构主义理论的登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雅明会在我们时代的后结构主义者中间深得人心。^[36]但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种种张力,它们似乎偏离了解构主义者的关注的问题而转向了某种别的东西。例如,本雅明曾经说过翻译的终极目标在于上帝的弥赛亚式回归的可能性。^[37]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贯穿于本雅明全文的弥赛亚喻说,因为它表现了本雅明的思想与斯泰纳所描述的早期的理论/神学命题这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什么是纯语言?纯语言将原文和译文同《圣经》那至尊的箴言联系在一起,纯语言属于上帝的记忆王国,原文和译文在那里以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着(德里达后来发掘了互补性这一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考虑语言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即使可以证明人没有能力翻译它们。”^[38]不足为奇,圣经的翻译可以作为“所有翻译的原型或者理想”。^[39]当本雅明试图使翻译免除

其对原文的依赖性时,无论是否有意,他毕竟揭示了他本人从巴别塔故事中所承受的深恩厚泽。

然而,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巴别塔的故事本身提出质疑吗?这个故事难道没有被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吗?人们难道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来阅读这个故事吗?巴别塔的故事不是和起源的神话彻头彻尾地互相矛盾吗?德里达在其论文《巴别塔》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德里达用“互补性”的方式重新解读本雅明文章的法文译本(甘迪拉克译),为翻译理论提供了一种解构主义构架。他提醒我们注意,关于巴别塔故事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人们对下述事实几乎视而不见:我们恰恰是在翻译中最经常地读到这个故事”,但人们还是重申翻译的不可能性。^[40]我们从雅各布森关于翻译者即叛逆者的例子开始,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只不过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结构语言学对于原文及其不可译性的关注,现在被对于原文的形而上学地位的质疑所取代。

本雅明的互补性观念,在德里达重新思考翻译过程所包含的起源、意图的概念,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时,获得新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翻译不再是“某一绝对纯粹的、透明和明确的可译性的视野内”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41]原文和译文互相补充,从而创造出比单纯的翻版或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这些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翻译中相互关联。它们相互补足,”本雅明说道,“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完整性能够代替这样一种完整性,或者说这样象征性的互补性。”^[42]就此意义而言,早期的理论家与结构语言学家所揭出的可译性/不可译性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最而未决的问题。各种语言不可化约的多样性,除了其自身之外,不能化约

为任何东西。但是就像专有名称一样,这些语言必然要求诠释、翻译和互补。巴别塔和上帝就是这样的名称,它们要求翻译但同时又制止人们去翻译。

德里达对于本雅明的解读,其结果是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思考翻译理论的总论题,斯泰纳会把这种做法称为当代西方的哲学—诗学研究方式。在这里,翻译成为一个矛盾的形容法: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化约成为它自身以外的东西,而且由于翻译只能通过一种事物解说另一种事物,这样一来认识论的暴力就成为无可回避的了——它成为制约着认知理解本身的条件,因此必须在适当的语境中加以理解。经由本雅明,德里达得以在对西方形而上学进行强有力的批判的同时,为一个古老的论题提供了新的洞见卓识。然而恰恰因为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西方形而上学之上,他的批评就无法摆脱批评对象所具有的控制力,也就无法提出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问题:人们通常所设想的对等关系在具体的语言之间是如何建立并保持的?在历史上让不同的语言互相对等的行为究竟服务于什么需要?这并不只是人们有望在逐个个案研究中予以解决的技术性的或语言方面的问题;毋宁说,它们直接指向跨文化和跨语际研究中值得给以首要关注的实践与权力的各种形式。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也许就是超越那个试图证明对等词并不存在的解构主义阶段,转而直接考察这些对等词是如何从无到有地生产出来的。因为翻译的一贯方法以及翻译的政治之所以成为可能,靠的就是在不同语言之间建立人们假定其存在的对等关系。例如,在历史上的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对等词或者等值关系的喻说得以在不同语言之间建立起

来？某些对等词在实践的某些层面上是否有可能不再仅仅是幻觉？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差异性可以用“其他词语”来翻译？因为差异性铭写不同意义的对等关系的基础。当我们面对与印欧语系截然不同的语言如古代汉语和现代白话文的时候，为了理解翻译以及跨语际实践，应当如何从概念上把握这种差异呢？

举例来说，为了证明非欧洲语言和欧洲语言有着天壤之别，斯泰纳对中国语言（一种他并不通晓的语言）作了一番饶有趣味的描述：“汉语主要是由单音节的单位组成的，每个单位都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汉语的语法没有明显的时态特征，汉字是方块字，许多汉字可以看得出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痕迹。汉语注重意合，不注重形合，标点符号虽然也用来表示句子的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用来表示停顿以调整呼吸。”^[43]我对斯泰纳此处使用的资料的来源有些好奇，就去核实了他引用的文章，那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的汉学家埃奇尔斯·方（Achilles Fang）所撰写的。我匆匆比较了一下方氏和斯泰纳两人的文本，发现方氏是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文翻译之难，斯泰纳把它从具体的语境中抽取出来，以便概括汉语的一般特征。当然，方氏很可能从来不曾用过“缺少”这一动词，来说明古代汉语是如何地与欧洲语言截然不同，他也不会把汉语说成由单音节的单位组成的，就像他不会认为印欧语言充满了过多的语法单位一样。在他题为《关于翻译之难的几点思考》这篇旧文的语境中，方氏强调中国古文的翻译者应该关注修辞、典故和句读、情、抑扬顿挫、意念连接结构、虚词、上下文等要素。他批评一些汉学家“仍旧认为汉语（古汉语）是一种约定俗成意义上的语言”，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

语法问题。^[44]有趣的是,斯泰纳恰恰忽视了方氏的文章当中隐含着的对于西方“语言”观的批判,而这一点本来可能会有助于加强斯泰纳本人对于西方语言哲学的批判。当然,为了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人们不但需要掌握这些语言的第一手知识,而且必须小心不要轻易地假定在任何一对词语、惯用语或者语言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

然而,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用英语来谈论“未受污染”的中国的语言观念?尤其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用中文来谈论这个问题?语言变化着,汉语也不例外。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汉语、日语和欧洲现代语言之间大量的(单向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发生。如果说汉语仍旧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那么可能的情况是,这种难度恰恰在于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假设的对等词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不在于缺少这种对等。现代汉语以及来自古代汉语(越来越多地以现代汉语为中介)的词语和概念,即便在表面上似乎是相对透明的,却也时常露出潜藏的陷阱。耿德华(Edward Gunn)的近著《重写汉语》通过描述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现代散文风格的一些重要的创新,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少洞见卓识。他通过详尽的文体学分析发现44种主要的创新类型(这是他根据语法、修辞以及句子的标准归类总结出来的),其中有21种之多是从欧洲语言和日语中翻译过来的。^[45]

在外来词研究领域,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和刘正谈确认了1266个新词语(或者说它们一度是新词语,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主要词汇的一部分),其中459个复合词借自日语对于欧洲词语(主要是英语)的kanji(汉字)翻译。^[46]这

开创性的著作付梓于 1958 年；语言学家王立达独自统计出 588 个从日语“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47] 基于这些语言学家的发现，日本中国学家实藤惠秀确定了 830 个从“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其中 98% 为名词（可是请注意，一个中文词通常可以属于两个以上的词类，许多实藤归类于名词的词语，也可作为动词）。^[48] 谭汝谦对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出版物的研究又在实藤的名单上增加了 233 个，使得借自日语“汉字”翻译的外来词总计达到 1063 个之多。^[49] 正如谭汝谦提醒我们的，即便如此，这个名单远远没有穷尽现代汉语里的外来词，但它有助于阐明 19 世纪以降改变中国语言的外来语新词汇融入汉语的程度。此外，这些词汇中有许多也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朝鲜语和越南语（长期以来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这些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意大利语言学家马斯尼（Federico Masini）最近的研究成果又将这一图景进一步复杂化了。他指出，曾经一度被视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其总数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是在中国本土由 19 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的合作者在翻译通俗文本（主要是英语的）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而且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日本人才开始在他们自己对于同一文本的二手翻译过程中采用这些新词语，并且造成他们自己的仿译词和语义外来词。^[50]

毋庸赘言，词汇借用或者仿译词，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整个现代时期，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日语早在 19 世纪与汉语之间双向的和相反的被借用的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长期从古汉语中借用词汇。^[51] 来自中亚、阿拉伯和北亚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的借用，早在汉代就已经以各自的方式进入汉语，而六朝时代佛经的翻译，更为汉语带来了相当丰富的梵语

词汇。^[52]但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二三十年新词语的大量融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在影响的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在语言经验的所有层面上都根本改变了汉语,使古代汉语几乎成为过时之物。这一境况不禁令人想起巴赫金对于16世纪欧洲白话文翻译的描述:“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便发生在这个阶段。两种语言直率地、热烈地凝视着对方的面孔,每一种语言都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53]也许与16世纪的欧洲作这样一番类比显得不是非常恰当,因为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其说是相互的,不如说绝大多数是单向的。^[54]为了解释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原因和方式,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巴赫金对于欧洲语境中混杂的语言交流的研究,尽管非常出色,却也无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方法。

在本章前面部分,我曾经对某些当代学术领域中非历史地使用个人和自我概念提出批评。现在我想做的,是要探索跨文化研究和跨语际研究的另外一条途径,因为抛弃语言学基础上的普遍范畴,并不能排除仍旧在同样的基础上谈论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让我再一次提出这个典型的问题,英语单词X或Y的中文对等词是什么?如果类似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无法回避的(这些问题在比较研究中的确是如此),那么,我们能否以一种有助于阐明不同语言之间假设的意义对等关系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假定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所有的双语词典都小心谨慎地捍卫这个假设)?我在上文已经说明,非历史和非话语地使用分析性的范畴,是不可能真正地富有成效的。但我也并不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在我们这个迅速缩小的世界上,提供

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地缘政治的边界常常被重新划分和跨越,对于那些以往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人来说,翻译已经成为一种日益迫切的需要。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非历史/非话语的研究方式,同时又能避免文化相对主义,那就必须考察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与翻译,以及词语和思想的旅行。

试举一例,姑且选用现代汉语中“个人主义”一词。它是英语“individualism”经由日语的“汉字”译法“个人主义”(kojin shuji),在汉语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语对等词。在中国,“个人主义”话语演变的轨迹(我将在第三章里详尽论述),有力地证明了思想是通过翻译以及跨语际的实践,以复杂的方式运作的。在这里,人们能够在历史的/跨语际的语境中有意义地谈论“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而无需将其中的任何一个当作绝对的分析范畴。我本人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跨文化研究必须考察其本身的可能条件。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跨语际的行为,其本身便进入了词语、概念、范畴和话语关系的动态历史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要想弄清楚这些关系,就必须在常识、词典的定义甚至历史语言学的范围之外,严格对待这些词语、概念、范畴和话语。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19世纪的殖民话语和帝国主义话语中,从欧洲向其他世界旅行的思想和理论,通常

唤起了扩张、启蒙、进步和目的论历史等观念。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学术系科中将知识予以历史化和解殖民化的倾向,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去细察这些观念。“旅行”一词不再被视为纯真无邪的,而是常常被打上问号。爱德华·赛义德“旅行理论”的观念在80年代流传甚广,并值得在此处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一观念倾向于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一步,从而超越生产、消费之类的主导模式到达一个更富于流动性的文学实践的意义层面。借助于他所命名的“批判意识”——一个不是界定得很明确的概念,但是它能够让我们勇敢地超越于(不是外在于)理论之上开辟一处空间——赛义德引入了文学实践的概念,它强调创造性地借用、挪用以及在国际环境中从此处向彼处的运动。^[55]关于理论和思想旅行的方式,赛义德发现了四个主要阶段:

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接受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56]

介绍过他的一般性框架之后,赛义德随即考察了三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戈德曼和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发展,他在结尾处还顺带提到福柯,并对照着每一个批评家各自的历史背景,评价了他们的生平。但是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赛义德的讨论并没有超出一种通常的论点,即理论总是回应着变化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这样一来,他理论的旅行层面就被抛弃了。当我试图解释这一状况时,我发现也许正是这个观念本身缺乏一种思想严密性,也就难以实现其本身的功德圆满。的确,是谁在旅行?理论旅行吗?如果是,它怎样旅行?赋予理论这样一种主体性,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交通工具是什么?是飞机、汽车、人力车、火车、军舰、还是太空船?克利福德在评论赛义德的疏忽失察时,认为“他行文中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乘着移民船旅行;而当今的理论则乘着飞机旅行,有时候还带着双程往返机票。”^[57]我将就这一点再推进一步:旅行理论的问题在于,它赋予理论(或者是赛义德此书上下文中的西方理论)以羽翼丰满、来去自由的主体性,这样就过分肯定了理论的首要性,并且它未能成功地解释何为翻译的工具。通过压抑翻译的工具,旅行成为一种抽象的思想,以致于理论在哪个方向旅行(从西方向东方,还是相反),出于什么目的(是文化交流、帝国主义,还是殖民化?)旅行,或者使用哪一种语言、为了哪些受众旅行,这些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似乎并不能说赛义德本人在别的地方也很少关注翻译的问题。实际上,他影响深远的《东方主义》以及后期的写作,全都触及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文本传统里面关于文化差异的表述与翻译,而且赛义德本人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史、帝国主义史以

及种族中心主义历史等问题的首屈一指的当代批评家。^[58]因此富于反讽意味的是,赛义德旅行理论的观念通常被解释为,理论(可视为西方的理论)仿佛是欧洲流浪汉故事中的一名主人公,他开始旅行,途中遇到障碍,而结局往往是以或此或彼的方式受到东道国的接纳。^[59]鉴于语言的相互作用常常是民族斗争与国际斗争中你争我夺的一块领地,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把思想和理论的迁徙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翻译以及相关的实践在建构所谓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时,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而且在东西方相互遭遇的过程中,当各种语言碰到一起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无一例外化约为统治与抵抗的模式?文化批评家很少承认这些相互作用里面非西方语言的能动作用,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太冒险了吗?

后结构主义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中的近期著述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反思。这类学术研究所使用的历史性的思想,与大写的目的论的历史(History)相对抗。它强调的是“效果史”,这是从尼采(Wirkliche Historie)和伽达默尔(Wirkungsgeschichte)那里借来的思想,它所指的是当下仍旧在发挥作用并有意义的那一部分过去。^[60]这样理解历史性使后殖民批评家提出了文本的“效果史”问题:“谁使用/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又为了什么?”^[61]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这些批评家并不想把历史简化为文本,而是强调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其他事实一样),可以为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运用。正如普莱特(Mary Louise Platt)近期研究旅行写作和欧洲殖民主义时

指出的：

在欧洲扩张主义发展的各个特定时期，旅行写作和探险写作究竟是怎样为欧洲的读者制造出“其他世界”的？在关系到它可以称之为“其他世界”的那部分事物时，这种写作究竟是如何制造出各种不同的有关欧洲的自我概念的？诸如此类的表意实践是以何种方式把经济扩张与帝国统治的强烈愿望加以编码并合法化的？这些实践又是如何背叛它们的？^[62]

对语言的研究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紧迫性。词语、文本、话语和词汇作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描述本身，而不仅仅是作为关系着比它们自身更为重要的那些事物的历史信息的来源，进入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之内。显然，福柯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研究亚洲、美洲和非洲等欧洲昔日殖民地问题的学者的思维方式。譬如，在研究殖民控制与斯瓦希里语（比利时昔日殖民地刚果所使用的语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人类学家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用福柯话语观念的相关性来阐述自己的著作：

此处话语的观念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其基本假设是：表这并渗透殖民实践的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是在关于文明行为（*oeuvre civilisatrice*）的谈论与写作的方式中得以阐述和持续存在的。把这样的论述作为话语来看待，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陈述的真理价值，譬如人们不太关心某一作者是否真的表达了他的信仰，是否真的对事实进

行了精确的报道等问题。人们在这里是试图发现关键性的概念及将其与用于立论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的种种规则,来理解一种“文体”的文献记录价值。简而言之,人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些要素,它们决定着与个人意图无关的殖民思想的形式与内容。^[63]

费边对于斯瓦希里语的语言手册以及与加丹加省有关的殖民文献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倡导这种语言,是倡导殖民统治的象征权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64]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关于服务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目的的语言,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65]然而费边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将语言实践置于殖民史的核心,并且将那一“效果史”联结到帝国主义一系列的扩张谱系,联结到作为科学学科的现代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发展历程。^[66]譬如他提醒我们,在欧洲,为了把非洲语言和亚洲语言纳入比较研究而最早开展的语言学事业之一,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词汇收集计划,名为《世界语言词汇比较研究》(*Linguarum totius orbis vocabularia comparativa*)。这一规划由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构想并发动,由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完成(莫斯科,1787和1789年)。词汇表被送往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总督手里,以便转交给官方的解释者和翻译家,而且通过俄罗斯驻马德里、伦敦以及海牙的外交使节,到达西班牙、英国以及荷兰所属的殖民地,甚至到达中国。乔治·华盛顿对此表现出一种个人的兴趣,他敦促美国各联邦州州长参与材料的汇集。^[67]因此,“翻译被视为官方事业,词语表则成为国家的文献,盖着印章,署着签名。”^[68]

妮兰雅娜(Tejaswini Niranjana)在最近研究印度殖民地和

后殖民性时,对于翻译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将翻译视为“东方主义殖民话语的一部分”以及“英国为获得东印度公司商人治下的庶民之信息所作的努力。”她将殖民主义话语界定为“知识实体、表述模式、权力策略、法律、规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用于殖民主体的建构与统治。”基于对本雅明、德曼和德里达的饶有趣味的解读,她提出了一种后殖民的翻译和历史观,并在其“重新翻译”和“重写历史”的渴望中强调翻译和历史的关联。“在阅读现存的翻译时采取一种反其意而行之的方法,”她写道,“也就是要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殖民主义的编史学,一个批评家如果对于殖民话语之诡计有所警觉,他就能呈现本雅明所说的第二个传统,即抵抗的历史。”^[69]妮兰雅娜对于殖民话语的再解读,通过她所命名的“后殖民视角”而成为可能。可是在这样操作的过程中,她无意识间让欧洲语言作为主方语言(或者客方语言),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如果这位后殖民批评家继续在其有关东而方语言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强调欧洲语言的重要性,并且使那一历史/故事的没有说出的部分仍旧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那么在她本人许诺的重写历史的道路上,她究竟能走多远呢?富于反讽意味的是,人们时常记忆着却是为了遗忘。通过刷新我们对帝国主义过去的罪恶所保有的记忆,后殖民批评家无意间抹平了以往反帝斗争史的印迹,而他或她本该是属于那个历史的一分子。^[70]为什么当德里达或者本雅明被描绘为与西方霸权相对抗的声音时,毛泽东和甘地却常被遗忘?如果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驱动力,为当代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新的刺激与新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具有其自身的谱系,而且长

久以来它已经成为非西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遗产的一部分。

当一个欧洲文本被翻译成一种非欧洲语言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能否在这一个案中被重新发明(如果不是予以反转的话)?如果能够,那么是通过什么方式?这是拉费尔(Vicente Rafael)在对西班牙人在国外宣讲福音、皈依上帝的活动以及菲律宾他加禄殖民社会的出现进行研究时,试图处理的一些问题。他比较了他加禄语和卡斯蒂利亚语中间不同的翻译模式,并指出这一差异使菲律宾本土皈依基督的过程变得极其复杂,而且还常常挫败了传教士的期待。当两种语言在这种转型时期被带人对抗的状态时,一些饶有趣味的事情发生了:

在语言开始运转的时候,翻译往往让意图随风飘散,时而奠定,时而颠覆着殖民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传播上帝的词语时不得不使用土著的世俗语言,这样就限制了一种殖民—基督教的普遍化假设和整体化冲动。我们在他加禄人皈依基督的历史里所看到的正是由于翻译而急速引发的这种矛盾的展现。^[71]

拉费尔的洞见卓识是举足轻重的。他对于东西方语言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的敏锐理解,和我在此处所讨论的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并非没有关系。^[72]然而,贯穿拉氏全书并在后殖民理论总体里而盛行的抵抗与颠覆的思想,却需要一种批判性再思考。后殖民批评家希望对过去数百年间主宰着世界的那些知识加以非殖民化,就此而言,抵抗描述了他或她本身存在

的状况,也描述了他/她所描述的殖民世界的存在状况。但是,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的,这同一个思想也存在着如下的风险:即把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化为本土抵抗与西方统治的关系。^[73] 不管抵抗与统治的描述怎样复杂,把东方/西方的划分绝对化,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危险,因为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常常是可以渗透的,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丽萨·罗薇(Lisa Lowe)在她对于西方与东方的观念所做的批评中恰切指出的,“当我们坚持一种静态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二元论思想,而且高举二元论的逻辑来解释一种话语是如何表现统治与臣服的时候,我们就未能解释内在于每一个术语中的差异。”^[74] 在我本人对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我认为非欧洲的语言并不自动构成一个抵抗欧洲语言的场所。相反,我认为人们极大地忽视了非欧洲语言所经历的统治、抵抗和挪用的复杂过程,我们可以在那一语言的语境之内,也可以在它与其他语言环境的关联中,来观察和解释这些过程。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我将在下文提出跨语际实践的观念,为我研究近代历史上中西语言的互动实践设置一个基础。由于中国现代的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研究会以翻译作为其出发点。严复诠释性地翻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1898)以及西方的其他文本,对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有助于改变整整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75] 在文学方面,林纾风靡一时地将一百

多部外国作品转写成典雅优美的文言文,要比鲁迅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出版(1918)早许多年。^[76]据文学史家阿英的估计,晚清最后十年间至少出版了一千五百余种小说作品,其中三分之二是外国文学的翻译,而且大多是英国和法国的作品。^[77](“翻译”一词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改写、挪用以及其他相关的跨语际实践的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正如几位论者指出的,现代新闻行业以及主要的出版业务的兴起,譬如中国大都市中心地带的商务印书馆,与翻译文学的逐渐流行有直接的关联。^[78]中国大部分现代作家一开始都是在翻译方面初试身手,然后再转向其他的文学写作。^[79]鲁迅曾经将大量的俄国和日本作品翻译成中文,他的第一部作品,即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合作的产物,便是名为《域外小说集》(1909)的译文集。^[80]在鲁迅的一生里他亲自翻译,即使在他不再从事小说写作之后,他也一直鼓励翻译外国作品。在五四文学其他的著名人物中间,郁达夫之译卢梭,郭沫若之译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们的现代白话文译本都迅即成为城市青年中的畅销作品。

然而,我必须补充几句,跨语际实践的关键并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尽管当我们涉及这两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时,都能够有所助益。^[81]我所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理论问题,它们可以导致对翻译条件以及不同语言之间最初的语际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如果进行宽泛的界定,那么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或尽管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

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着的利益无关的中立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在那里客方语言被迫遭遇主方语言，而且二者之间无法化约的差异将一决雌雄，权威被吁求或是遭到挑战，歧义得以解决或是被创造出来，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地表。我希望跨语际实践的观念使我们最终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词汇表，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改写、翻译、引进的过程，还有驯化这些词语、范畴、话语的过程，以及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述的模式。这个理论词汇表还应当有助于解释在主方语言的权力结构中传播、操纵、部署以及统治的模式。我的目标是在一组新的关系中重新提出“语言”这一总论题的概念，而这一组关系并非取决于当代语言理论——它们总是倾向于把宗主国的欧洲语言视为出发点——那些耳熟能详的假设。

我解释一下此处我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如果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互动，总是由主方语言的翻译者或者其他实践者从客方语言中邀请、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各种词语和文本而开始的，而且除此之外，如果主方语言的翻译者与他/她的接受者的共同需要决定着并且协商着从客方语言中抽取的文本的意义（即效用），那么，传统的翻译理论家用以命名与翻译直接相关的语言时所采用的术语，例如“本源语”以及“译体语/接受者”等，就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会有误导作用。本源语的思想往往依赖于本真性、本原、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其弊端在于它把可译性/不可译性这一由来已久的总论题重新引入到讨论当中。另一方面，译体语的观念暗含着一个目的

论式的目标,一个有待于跨越的距离,以便达致意义的完足;因此它歪曲了等义关系的喻说在主方语言中得以构想的方式,并且将其能动作用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我不愿再介入这种关于本源语和译体语的形而上学思考,我将采用本书所使用的 *host language* 和 *guest language* (中文的对等词为“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甚至更彻底地改变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这样,我就赋予主方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本章开头引用的塔拉尔·阿萨德以如此明晰的文字描述的知识/权力的二元组合,就应该予以重新考察,因为他的描述忽略了下述可能性,即一种非欧洲的主方语言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客方语言所改变,或与之达成共谋关系,也可以侵犯、取代和篡夺客方语言的权威性。中西之间历史往来的过程中这些错综复杂的传介方式,是本书各个章节的主要关注点。

变化论,新词与话语史

我的论点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中,这个如此‘现代’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李欧梵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五四一代及其前辈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来界定他们与过去之间的差别,并且清晰表达出他们视之为‘现代’的那些全新的感受来?”^[82]的确,李欧梵所强调的“现代”一词用引号括起来的状态,使我们意识到中西之间跨语际实践的历史中“翻译过来的”现代性

问题。如果不再把争辩作为基本范畴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20 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如何命名他们的存在状态？他们使用何种语言来谈论各种同一性（认同）之间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是现代同一性与过去的同一性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中国同一性与外部力量强加的同一性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样的修辞策略、话语组成、命名实践、喻说以及叙事模式冲击着中国人感受现代时的那些历史条件？

在过去数十年间，人们对这个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不是没有作任何考察。例如，柯文（Paul Cohen）便批评了自费正清和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的历史著述，他促使历史学家们重新思考他们在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时首先要解决的事项。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里集中考察了三种主要的思想范式，并提出了他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替代模式。如果以相对简约的方式来概括他的深刻批评，那么，冲击—反应理论是他所讨论的三种范式中的第一种。这个范式强调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且时常“促使历史学家将那些与西方的在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层面，界定为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层面有助于阐明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时，才是重要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是传统—现代的模式，它深深地植根于 19 世纪种族中心主义，并且把一种外在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强加于中国历史，按照这种观点来界定什么是变化以及何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第三种，或者说是帝国主义研究，落入了“非历史的陷阱，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个‘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83]作为对上述范式的修正，柯文关注那些开始

进行中国中心式研究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按照柯文的观点,这种研究的益处在于,它是从中国语境中存在的中国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由西方造成的,还是与西方毫无关系)开始,而不拘泥于那些外在的标准。

这种新的研究取向有效地挑战了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些既定的范式,而且对于文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不再去做传统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所谓影响研究,转而强调主方语言(在此处是现代汉语)在翻译过程中产生意义的能动作用,这样,客方语言要在新的语境中获得的意义,就用不着总是强调原文本意的权威性了。而在另一方面,至少在汉学研究中,研究者尽可以是中国中心式的,但在学术研究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上,却依然奉行西方中心的观点。这使我不禁想起不久以前周蕾所作的批评:“在历来强调‘遗产’的汉学以及中国研究里,对于西方的敬意,长久以来似乎是用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理想主义地维护一种独立的、自足的‘中国传统’,以对抗西方的传统,因为中国的传统如果不是更伟大些,至少也是和西方传统同样伟大的。像这样的‘摒弃’西方,的确令人肃然起敬:通过高举‘中国’的大旗,它重复了它所摒弃的霸权色彩。”^[84]

诚然,在20世纪后半叶,在本土中国的与外来西方的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分界线,在认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为英语读者撰写有关中国的事情,这一事实使上述境况变得更加复杂化。有趣的是,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冲动并不是产生在中国本土,而是从当代西方客观主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述中获得灵感和源泉。这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区域研究”比他们已使其名声扫地的其他研究要更为有效。

正如布迪厄恰当指出的，“此处的关键是这样一种权力，它通过各种划分(di-*vision*)原则推行一种社会化世界的幻象(*vision*)。当这些原则被强加给一个整体的时候，它们就确立了意义以及关于意义的共识、尤其是关于这个群体的认同和统一性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最后创造出这个群体统一性与同一性的现实。”^[85]换言之，区域主义话语是一种述行(*performative*)的话语，它试图把对于边陲(*frontiers*)的新界定加以合法化，这样一来，被命名为“区域”的现实就不再是“现实”本身，而是成为界定现实的斗争的场所。不难看出，在这里理论边陲再一次被当代西方的学术话语所设立并构造。^[86]

另一方面，请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状况：人们用中文完全是为中国的学术受众从事历史研究。人们使用的语言难道不是已经被新词语和新理论（这自然是拜中西百年碰撞之赐）彻底污染了吗？富于悖论意味的是，中国本土的当代学者甚至当他们讲述并且书写一种欧化的汉语时，也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假定一种“中国中心性”。^[87]此处与彼处相差无几的是，“本土中国”不再能够轻而易举地同“外来而方的”分离开来。考虑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困难与限制，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方面不赋予西方、现代性、进步或者其他启蒙之后的观念以特权，另一方面也不执着于一个本土中国的物化观念，那么，我们是否还能谈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东西方之间的变化与相互作用。

恰如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最近指出的，自从列文森1969年去世以来，关于“西方的到来向中国展现的创伤性选择这一问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而且十分明显的沉默。这种沉默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上认为自身

的发生肇始于这样一场运动,即抛弃本土的文学语言,转而青睐明显基于西方模式的文学语言。”^[88]诚然,列文森关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整体化陈述已经行不通了,可是如何解释中国人与西方帝国主义发生暴力性遭遇之后所作出的“创伤性选择”,却没有轻飘飘地随风而去。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挑战。斯皮瓦克最近注意到当代南亚的历史学家发展了一种变化的理论,我也觉得它饶有趣味,而且与我在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并非没有关系。

庶民研究群体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关于变化的理论。印度卷入到殖民主义中来,这通常被界定为从半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奴役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按照生产方式的宏伟叙事来定义的,而且通过令人不安的暗示,是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叙事中定义的。与此同时,这一变化还被视为被殖民者获得政治意义的开端。殖民主体是从一批本土精英那里浮现出来的,他们通常被松散地描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庶民研究小组似乎正在修正这一普遍化的定义和理论。他们提出以下两点:其一,变化的契机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必须被看成对抗而不是过渡(因此我们只能把它们与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不是在生产方式的大叙事中看它们),其二,这样一些变化是以符号系统中的功能变化为其信号或标志的。^[89]

南亚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论模式是发人深思的,因为他们避开了“过渡”的思想,至少在斯皮瓦克对这种模式的解释中是这

样,无论是从东方过渡到西方,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还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现在他们转而关注“对抗”的观念。这个观念为我们理解自从东西方相互遭遇就已经开始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的研究使传统与现代这一陈旧的框架变得索然无味,从而为解释现代历史打开了替代的途径。^[90]

有人会反对说,这种理论不能运用到中国的情况,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不是。但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种理论是否能够在“经验”的层面上适用于中国。这种反对意见自有其明显的真实性,但其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焦虑或者思想偏见,倾向于把欧洲理论视为意义与价值的普遍载体?然而,很少有人依据同样的理由来反对把欧洲理论应用到中国研究的领域,很少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理论不能应用到中国,是因为西方理论与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相关联,而中国则有完全不同的“经验”,即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与之相反的是,有关差异的那些术语,几乎总是以“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这样的模式被构造出来的。^[91]就此意义而言,庶民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富于启发性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西方理论与其他人的现实之间假定出一种霸权式的划分。对他们来说,西方、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现实同样需要在相互牵连相互竞争的历史当中给予理论的批评和质问。毋庸讳言,这样一种批评所使用的术语有必要在这些不同的地点(localities)之间进行不断的协商。

我所强调的是这些地点之间历史的关联,而不是它们共同的特征,鲁迅在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时就已体察出了这种关联。他在论及中国同胞如何对待那些被帝国主义强权

所殖民化的命运多舛的邻居或民族的时候,这样写道:

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盖中国今日,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92]

鲁迅这里提到的是据说由改革者张之洞谱曲的两首颇为流行的歌曲《学堂歌》和《军歌》。第一首包含这样的词句:“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第二首则有:“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93]鲁迅在更为广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语境中,对中国人的自欺所作的批评,可以有效地提醒我们夸大中国的独一无二性所具有的危险,这种夸大代价是消除了中国与其他地点和历史发生牵连(以及共谋)的印迹。因此问题不在于谁是被殖民者以及谁不是,而是如何解释那些试图征服世界的人,与那些力图在这样的沉重压力下救亡图存的人,他们之间相关的对抗关系。

强调重心的转移,不可避免地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或过渡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转移到各个民族以及不同的人群之间每一个对抗的关头所存在的各种事件的偶然性、斗争以及意外的扭曲和转折。在我对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在翻译的场地或者不同语言碰巧遭遇在一起的那些地点所发生的“对抗”得以产生的条件,因为这正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一决雌雄的地方,是权威被吁求或遭到挑战的领域,也是歧义得以化解或是被创造出来的场所。简而言之,这些对

抗记录了一种意义生成的历史,后者影响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历史。

在跨语际实践的语境中,有关变化的喻说是新词语或者新词语的建构。各种语言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我们细察了现代的新词语,特别是中—日—欧的新词语的旅行并且最终在现代汉语里落地生根的实际旅程之后,将会更容易理解。^[94]按照高名凯和刘正谈的说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外来词汇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之中。这些借用词主要表现为三个类目:(1)只见于古代日语,而没有出现在古汉语中的由汉字组成的两个字的复合词,如人力车(rickshaw; jinrikisha),场合(occasion; baii),宗教(religion; shukyo)。^[95](2)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变了,如革命(revolution; kakumei),文化(culture; bunka),经济(economy; keizai),科学(science; kagaku)。^[96](3)与古汉语没有对等词的日语复合词,如种族(race; shuzoku),美术(art; bijutsu),美学(aesthetics; bigaku),国际(international; kokusai)。^[97]本书第二章即着重考察一个特殊的外来词翻译的发展轨迹:national character一词的日语“汉字”译法是kokuminsei,而通过这一外来词的翻译,该词成为汉语中的“国民性”一词。这个词语属于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感受力的为数不多的话语事件之一。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在保尔·德曼曾经运用的意义上使用的。德曼是在讨论本雅明论翻译那篇文章时使用这个词的:“当路德翻译,翻译《圣经》时,某些事发生了——在那一时

刻,某些事发生了,并不是说从那以后发生了宗教战争,然后历史的进程被改变了,这些只不过是副产品。真正发生的是翻译。”^[98]正如第二章所表明的,national character 一词通过外来词而翻译成汉语,恰恰是这样一个事件的范例。正是这个事件催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按照鲁迅的看法,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诞生。

在高名凯和刘正谈鉴别出的三种类型的外来词当中,第二种最具有透明性的假象,因为这些“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容易被误解为是直接从古代汉语中派生出来的。^[99]高名凯和刘正谈提醒读者应当谨慎从事,不要把外来词简单地等同于它们在古汉语中的对应词。例如,“文化”(culture)的现代涵义源出于日语的“汉字”复合词 bunka,汉语的“文化”与英语的 culture(法语的 culture; 德语的 die Kultur)之间的对等关系是通过借用的方式才确立起来的。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指的是与武力或军事征服相对的“文治与教化”,它完全没有今天通常与两个“汉字”组成的复合词用法相关的“文化”的民族志内涵。^[100]本书第九章旨在探讨“文化”或 culture 的跨语际观念是怎样逐步发展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知识话语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意义与差异的重要载体的。

大量流人的语义翻译以及“重通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深刻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和地位方式,打断了这些词的古代涵义。由于这种历史性的阻隔,我们无法绕过日语的 bunka 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涵义,我们不能认为字形完全一样的古汉语词汇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释其在现代汉语中对应词的涵义。当然,这些中一日一英的语义翻译和外来词的翻译所走过的词源学路程,正如高名凯和刘正谈所指出的,决不仅仅限于这

三种语言之内。马斯尼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表明,日语在 19 世纪从汉语借用了一些新词汇、仿译词以及语义翻译,这比汉语从日语借用词汇要早若干年。这些新术语的发明,得力于新教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在 19 世纪初期和中叶,同心协力翻译西方的世俗文本时的工作。日本人在他们的“汉字”翻译中采用了这些词语中的一部分,并且开始以类似的方式,用中国文字创造他们自己的新词汇。使这一图景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汉语对欧洲术语的早期翻译的很大一部分在中国本土只有相对有限的影响;相形之下,日语的借用倒时常有助于这些词语在中华故土的广泛影响。事实上,日语在“双程”播散这些中华本土的新词语的过程中,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于这些词语的一部分竟被中国人自己视为来自日语的外来词。^[101]

中国本土新词语的这种双程播散通常与来自日本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所走的词形变化的途径难以分别,所以语言学家们很难确定现代汉语词库中有些词语的起源。试举一例,高名凯和刘正谈以来的学者一向认为,复合词“文学”的现代用法是来自日语 *bungaku*, 即英语 *literature* 的“汉字”翻译的一个“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102]然而,按照马斯尼的观点,具有这种新涵义的“文学”一词至少早在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的《美利各国志略》(*Short History of America*, 1831)一书里即已出现。这是一部用汉语撰写的美国史,其中包括文学(*literature*), 贸易(*trade*), 法律(*law*), 火轮船(*paddle boat powered by steam*), 火轮车(*steam-powered train*), 火车(*train*), 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等新词语。^[103]这些词语以及其他一些汉语新词语在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旅行

到日本,日本人这个时候正开始翻译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这是一部多卷本文集,其中收录了裨治文和其他传教士的作品的一部分章节。“如果不是《海国图志》收录了这些文本,那么这些作品和新词汇可能会仍旧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因此,它们的命运与先是在中国、随后是在日本流传的魏源的著作紧密联系着。”^[104]诚然,对于这些新词语的词源说明,与这些词语在中国、日本以及再回到中国的流传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反思这些词汇的历史过程中不能仅仅依赖某个单一的起源点作为词义的惟一所在地,而是必须考虑到词源的流动性。换言之,流传的方式有时候恰恰与发明的时间同样重要。如果严复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发明了他的新词汇并且被翻译成日文,那么他的发明就有可能通过日语这个中介保存下来一部分并且重新返回到汉语词库来。

“文学”,这个由一名美国传教士发明的英文术语 *literature* 的直接的新译名,也许不能归类为从日语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而应该说,通过一个经由日本的双程流传过程,这一术语广为传播,并逐步发展为 *literature* 在中国的标准译法。^[105]鉴于没有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双程新词语,以强调它与日语 *bungaku* 之间这种有趣的联系。本书第八章着重讨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现代经典的编辑过程中,这种跨语际的文学概念的作用。这部出版于1935—36年的著名选集把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视为“纯”文学,而将所有其他写作形式降到非“文学”的地位。这当然与古典的“文学”概念大相径庭,尽管在今天甚至古典文学也无法避免受到这种跨语际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

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和选集接连不断地出现,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在较弱的意义上)被命名为“文学”,与此同时,其他古典文类则被重新分配到“历史”、“宗教”、“哲学”以及其他的知识领域,而这些知识领域本身也是在西方概念的新译名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文学”被迫按照现代文学的观点,被全新地创造出来,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

在现代汉语中安营扎寨的欧洲—日本的外来词,初来乍到时往往要与直译(音译)进行竞争。附录 F 和 G 足以表明,有些新词语最开始是外文词语的汉语直译,或者至少是和欧洲—日本对同一词语的意译或外来词译法同时存在。不久以后,翻译占了上风,取代了直译。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汉语书写系统的表意性,因为这种特性使汉语更适合于意译或借译,而不是根据音节的直译。^[106] Democracy 一词的翻译就是一个合适的例证。曾几何时,直译“德谟克拉西”和借译“民主”两种译法并行不悖,但借译很快就取代了使用不便的音译,成为当今使用的惟一一个被接受的 democracy 的对等词。借译词“民主”恰好与古代汉语中一个最为古老的语汇相吻合(参见附录),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可是如果根据它们相同的书写形式,就把古代意义上的“民主”与借译词等同起来,那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古代的“民主”具有一种所有格结构(大意为“民之主”),这与现代复合词的主谓式语义结构(“人民作主”)可谓有天壤之别。^[107]

毋庸赘言,并非所有的新词语都是音译或借译的。实际上,这个时期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就是书而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这个词与日本无关,是直接在欧洲

语言和汉语之间发明的。^[108] 汉字表示代词“他”的最初形式包含着一个没有性别区分的“亻”字旁(指人种),对这个代词的性别区分来自翻译的环境。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他”字没有性别区分的形式中,以及其他没有性别区分的指示形式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突然间,他们发现汉语没有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109] 有些中国人认为没有这个对等词是汉语本身的一个严重缺陷,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设计新词来弥补这一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焦虑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它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 *elles* 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 *they* 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经过几年地方形式的实验,如吴方言里的“伊”,中国作家和语言学家最终选定了带“女”字旁的“她”。^[110] 举例来说,鲁迅小说中第三人称的使用,便反映了这一有趣的实验阶段。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鲁迅在早期的小说里交替使用通常不区分性别的“他”和吴方言的“伊”,来指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如《明天》(1920)。^[111] 直到1924年发表的《祝福》,鲁迅才开始使用“女”字旁的阴性代词。一年以后,鲁迅在《伤逝》(1925)中开始采用另一个新词,“牛”字旁的“他”来指动物。

阴性代词以及动物/中性代词的出现,成功地将原本无性别区分的“他”转化为一个阳性代词,尽管其不区分性别的书写形式没有任何形态变化。换言之,由于发明了区分性别的新词,迫使原来的“他”成为阳性代词,而这与其不区分性别的部首“亻”是相矛盾的。这个现象完美地体现了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即只有在语言要素进到类似与差异的关系中,才有可

能产生意义。就“她”字以及相关的新词语而言,用来区分意义的,与其说是语音,不如说是书面汉语的形态。就发音而言,阴性的“她”和动物/中性的“它”以及阳性的“他”是无法区分的。

刘半农,阴性“她”的发明者,曾经试图在音节层面也引入一个区分的要素。^[112]他在1920年发表的《她字问题》里论述道:

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符号应当读作什么音?周作人先生不用“她”而用“伊”,也是因为“她”与“伊”,只能在眼中显出分别,不能在耳中显出分别,正和寒冰君的见解一样。我想,“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中,不甚调匀。我想,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他”字在普通区域中,本有两读:一为fa,用于口语;一为fuo,用于读书。我们不妨定“他”为fa,定“她”为fuo。^[113]

出于刘半农提及的原因,“伊”作为阴性第三人称代词很快就退出书面白话文,而被广为接受的阴性代词“她”所取代,尽管刘半农建议的另一种发音从来没有被人接受。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刘半农所说的“国语”或“普通语”是怎样获得凌驾于区域方言之上的霸权地位的。^[114]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时刻记住汉语书而语的表意性:即现代汉语的书而语和口语虽然有所重叠,但二者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它并不像罗曼

语系的字母仅仅是用来表示发音的。例如，“女”字旁的“她”字，现在已经被说普通话和说其他方言的人共同视为汉语书面语的阴性第三人称代词，但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能够创造出一种不同的发音，把“她”字与其阳性和动物/中性的对应词区分开来。

书面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的跨语际表述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不区分性别的汉字“他”分裂为阴性与阳性的形式，引入了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维度，而这一点在汉语书面语中是从来不曾存在的。这并不是说 20 世纪以前的男男女女的性别差异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没有被归入“阴”/“阳”的范畴，而是说在代词的象征性层面上的这样一种裂解所导致的这一指示关系——表现为男人对女人说或者谈论女人，或是女人向男人说或者谈论男人——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举例来说，我在第六章解读的沈从文的小说就包含一种阶级叙事，这个叙事的展开始终使用性别和欲望的指示结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隐去一个绅士之女的姓名，只用“她”这样的称呼。同时叙述者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谈论三个爱慕“她”的出身低贱的男子，在故事中他们被特意建构为男性的和下等阶级的。三个男子不敢奢望进入“她的”世界，因为横亘在“她的”阶级与“我们的”阶级之间的指示性鸿沟是不可逾越的。^[115]或者考虑一下鲁迅的《祝福》，在这篇小说里，关于阶级和性别的指示性叙事呈现出一个相反的情境：出身上层阶级的叙事者“我”与一个下层妇女“她”说话并谈论到“她”。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指示性的性别建构，反映并参与了 20 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人、女人和国家分别地同时也是通过对方发现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116]本书的第五、六、七章将详细论述文学批评所建构的各种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代汉语的新词语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亲身经历历史的变化。我不禁想起阿多诺在不同的语境里所说的一段话:“每一个外文词都包含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素,在它有节制的运用中包含这样一种知识,即那些直接的东西不能以无中介的形式言说,只能通过反思与中介作用才得以表达。”^[117]在与外文词语的跨语际交流中,新词语和新词语的建构猛然出现了,它们占据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中介性位置,要求对历史变化进行不同的解读。首先,变化不可能是从未经触动的过去直接过渡到现在,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介,这就使我们不可能自称拥有一个物化的过去。^[118]其次,本土语言的转型不能如列文森所辩称的那样,仅仅用外来冲击予以解释,因为外国词语和通过翻译传介的中国古代语言一样,都得服从同样的跨语际解读的逻辑。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坚称,“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做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119]虽然这种看法准确地捕捉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但列文森关于何谓变化以及变化如何发生等的假设前提,妨碍了他去严肃地或实实在在地(因为他用“语言”和“词汇”来作隐喻)对待语言传介的过程,也妨碍了他重新思考中国的能动作用。现代汉语中的双程词语和其他新词语包含着一种关于变化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可以不

再讨论中国如何现代化(可以解读为西化),或者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这些问题是不同流派的学者频繁论述的两种对立的立场。^[120]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思想资源究竟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的,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我认为这种变化既不同于中国自身的过去,也不同于西方,但又与二者有着深刻的联系。

德里克(Arif Dirlik)在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对这一有关变化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洞见卓识。^[121]他指出,中国现代知识话语中的民族主义指向“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当中国被迫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重新组织社会时,这种普遍主义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在这里关键问题并不是列文森意义上的儒家秩序的崩溃,而是出现了一种关于民族与全球社会的新的辩证观点,从而有可能“把中国重新界定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民族”,与此同时也引出了“其辩证对立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所有的民族将再一次消失,而人类将发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乌托邦目标所表述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中国知识分子书写未来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名词)理想。说得确切一点,正如德里克在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出色地描述的: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代表了一种经过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后人类进程的最后阶段。虽然这种乌托邦的名称和特征来自中国本土的乌托邦传统,但它真正的灵感的源泉是得自未来的图景——而且它是这样一种来来,它超越了中国本身的世界,具有全球社会的视野,中国则是

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完整的部分。^[122]

的确，康有为重新解释和运用儒家思想，旨在解决中国如何在现代世界定位这一危机。他的弟子谭嗣同也是这样做的，他似乎是在“《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与贝拉美的(Edward Bellamy)《回望》(*Looking Backward*)”(第56—57页)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等关系。这些把中国经典中的思想与从西方移植的概念等同起来的行为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们引入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既非此又非彼的现实或变化的层面，而这一层面只有在等同行为实际作出后才会出现。

新词语和新词语的建构是有关变化的一个极好的喻说，因为创造新词语旨在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而且由此确立了自己在语言张力场中兼具中外于一身的身份。我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为新词语的想像占据着的这个假设对等关系的中间地带，成为变化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变化是不能被化约为按照本质主义理解的现代性的，原因在于非传统的并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所谓现代的也并不必然是非中国的。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解释那些完全土生土长、未被新词语的外来词接触过的词语和象征性的建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重提我在本章前面提出的阳性代词“他”的性别化过程。从形态学的意义上说，这个字可谓毫无变化，可是由于阴性代词“她”和动物/中性代词“它”在整个现代汉语系统中所起的区别作用，这个词就失去其原有的广泛的涵义，而只是用来表示阳性第三人称单数。在我看来，表面上毫无

变化的建构背后发生的这种关系的变化，也可以运用到现代书面白话文的其他方面。新词语的出现指向一个基础更为宽广而且更深层的革命过程，这个革命过程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景观。

言语一行为理论的一个老生常谈是，词语的存在不仅是反映外在的现实，而且促使事物发生。我本人对于跨语际实践的强调，决不是要把历史事件化约为语言实践；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扩展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123]为了给以上讨论作一个总结，我提前对第三章的论点（即词语构造现实的权力）作一扼要的评论。这一章讨论的是“个人主义”的跨语际观念在民国初年现代民族国家的讨论中，其意义的变化过程。我在这里简略提及分析的要点。1949年以后，围绕着个人主义的意义所展开的话语斗争，在中国重新发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开始发挥引人瞩目的作用。国家向人民宣传个人主义不是中国的思想，乃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结果是这一思想成为反面化的西方的代表。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中国反西方辞藻的最大功效却是在使其反对者以可以预料的亲西方的反抗姿态团结在个人主义的周围。在这些无休止的拥护西方和反对西方的争辩里，容易被忽视、遗忘或者压抑的，恰恰是在中国内部围绕个人主义话语的那段重大的历史，那长达一个世纪充满紧迫政治课题的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批评家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争以多种方式延续着早期

个人主义论战的一些耳熟能详的调子,但是它还具有一种文革式的暴力性质。^[124]然而,另一种暴力虽然不那么容易觉察,却更具有破坏性,那就是记忆缺失症,即对过去的话语史的遗忘。我本人和那一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不仅因为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有一种抵抗遗忘的乌托邦渴望。那么就让这本书成为这种渴望的化身吧。

注 释

- [1] 翻译理论中这些传统概念在我阐述跨语际实践时,将会被“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和“主力语言”(host language)所替代。
- [2]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已经就此层面讨论了文化的政治,而且就知识、权力、学术成果、学术规则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譬如请参见布迪厄(Bourdieu)的《区分》(*Distinction*)以及《学术人》(*Homo Academicus*)。
- [3] 简要交待一下我在本书中的个人立场。由于我同时以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所以我发现自身占据着一个移动的立场: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左右摇摆,并且学着协调那些不可化约的差异。因此,跨语际实践的概念,恰恰就像适用于我所探索的中国早期与西方的历史遭遇一样,也适用于作为一个分析者的我本人的境遇。诚然,本书如果是用中文写就,将会有另一副样子。可是为汉语读者而写作,正如我时时刻刻亲历的,并不会自动解决思想权威以及特定境况下个人的立场这一问题,它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而且必须在那一语境中予以处理。
- [4] 埃德蒙·里奇,《我们自己与他者》一文;引文见于塔拉尔·阿萨德《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翻译的概念》一文,收入 *Clifford and Marcus*, 第 142 页。
- [5] 阿萨德,收入 *Clifford and Marcus*, 第 157—158 页。
- [6] 虽然阿萨德批评的主要目标是 Ernest Gellner,但这篇文章也受到该领域其他的人类学家,包括 Godfrey Lienhart, John Beattie, Edmund Leach, Max Glukman and Rodney Needham。
- [7] 尼采,《论超越道德意义上的真与伪》,收入《尼采全集》第一卷,第 180 页。
- [8] 斯皮瓦克,《译者前言》,见德里达,《论语法学》,第 xxii 页。
- [9] 博尔赫斯,第 51 页。
- [10] 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Unterwegs zur Sprache*),第 141—143 页;参见英译本 *On the Way to Language*, 第 45 页;参见孙周兴的中译本,收入《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 1049—1050 页。
- [11] 同上,第 153 页;英译本,第 53 页;中译本,第 1058 页。
- [12] 有关海德格尔对于亚洲哲学的兴趣的讨论,参见 Park。
- [13] 欧阳楨,第 238 页。
- [14] 关于“对等关系喻说”这一概念,参见罗宾森(Robinson)。罗氏用这个概念批评

传统的翻译理论和语言理论中盛行不衰的实质性对等关系(substantial equivalence)的思想。

- [15] 试举几个例子。在何谷理(Robert E. Hegel)和 Richard C. Hessney 共同编辑的《中国文学中自我的表达》一书里,自我的概念是一个大标题,意在统辖讨论许多不同问题的文章:作者的心理、身份、个人、女性形象、文学性人物塑造,等等。饶有趣味的是,该论文集似乎没有任何两篇文章共享着一种同质性的自我观,而且若干论点甚至相去甚远。这不但说明自我的概念是非常难以表述的——这是一种几乎无法用更好的定义予以补救的境况,因为意义固定——而且表明当人们把这观念当作一个非历史的范畴使用时,他们也许是踏在一个不甚牢固的基础上。Anthony J. Marsella 等人所编的《文化与自我》试图通过将自我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理论之内,并且把它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比较的基础,从而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这本论文集的所有文章都表现出试图理解文化差异(西方、中国、日本、印度,等等)的真诚愿望,但又不假思索地把自我当成一个普遍的范畴加以运用,这一点正如编者所言:“所有的文章都出于这一前提:自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建构,被用来解释那些出自人一语境关系的人类行为显露出来的特征”(ix)。然而,我们时常发现在比较研究中所运用的自我范畴只是近些时候才在西方的学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 [16] 美国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杜维明阐述了新儒家的“己”与西方自我观念之间的差异,他假定了这两个词语之间存在互译的可能性。实际上,他的人文主义式“己”的观念依据于这样一种思想:前者不必经过现代翻译史的斡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成英语的“self”。在他丰富的著述里,如《人性与自我培养:儒家思想论文集》和《儒家思想: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杜维明似乎是作同义反复:虽然新儒家的“己”不同于(他指的是优越于)西方的自我观念,但它仍旧保留了一种“自我”的观念。对于新儒家在国际语境中的重新合法化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该书第九章《批判性反思》这一部分。

- [17] Saussy, 第 185 页。

- [18] 早些时候,泰勒在一篇题为《人格》的文章里,将 agent 界定为这样一种人,他(她)包含各种目的,而且各种事物对他(她)具有意义(即人的意义),而且一个公开的和开放性的公共空间的观念是与泰勒视语言为社会交往这一语言观联系在一起。

- [19] 泰勒,《自我的源泉》,特别是《道德空间中的自我》,第 2 章,第一部分,第 2—5

页；以及《关于历史解释的题外话》，第 2 章，第二部分，第 199—207 页。在第 12 章里，泰勒先发制人，阻止别人对他的哲学的宗教的研究方式进行批评。他解释道，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它突出强调了 *ideesforces*（思想力量）的问题。还原式的马克思主义尚未就此问题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然而并不清楚的是，泰勒为什么拒绝考志阿尔都塞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已经超越了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的范式。虽然泰勒似乎具有一种充分展开的“实践”观（第 204—205 页），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观念与他对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互相整合起来。

[20] 泰勒的极权主义冲动有时导致了人的观念和人种观念之间的一种滑移，这种滑移引人瞩目地表现在泰勒本人的这一倾向上：即强调人与非人（与其说是 *non-person*，不如说是 *non-human*）的范畴之间的区别，就好像关怀所在同启蒙哲学是一样的，后者痴迷于人兽之分及其间的等级秩序。这一点在泰勒早期的论文《人格》中也是如此。在那篇文章里，他重新引入了一种虽然现代但却普遍的、能够解释一切人类状态的人格概念。

[21] 柯林斯，《范畴、概念还是困境？论毛斯对哲学术语的使用》，收入 Carrithers et al., pp. 68—69。

[22] 参见 Marcel Mauss,《人类心智的范畴：人格观念；自我的观念》，第 1—25 页；J. S. La Fontaine,《人格与个人：若干人类学的反思》，第 123—140 页；Mark Elvin,《天地之间：中国的自我概念》，第 156—189 页；Martin Hollis,《论面具与人》，第 217—233 页；以及 Michael Carrithers,《自我的另一种社会史》，第 234—256 页；均收入 Carrithers et al.

[23] 参见 Martin Hollis,《论面具与人》，第 217 页，收入 Carrithers et al.

[24] 罗曼·雅各布森，《论翻译的语言层面》，收入同前，第 435 页。雅各布森（第 423 页）将“文字游戏”界定为“音位相似的词语所具有的语义对抗，不考虑任何词源上的关联”。

[25] 德里达，《论书写学》，参见 Barbara Johnson 第 142—148 页，以及 Niranjana 第 57—58 页。Antoine Berman（第 35 页）在研究现代翻译理论和德国浪漫主义时指出，Breitinger, Voss 和赫尔德在 18 世纪下半叶曾经赋予 *Treue*（忠实）以明确的夫妻关系色彩。几乎与此同时，法国翻译家却以某种多少有些自由的倾向持续着他们的美化和诗化的传统。同样，双重忠实的思想亦可追溯到 Rosenzweig 那里，他认为翻译要“服侍多位主人”：外国作品和外国语言是其一，本土的公众和本

上语言是其。正是,双重的忠诚持续不断地受到双重背叛的威胁,这一点自不待言。

- [26] 追随着雅各布森,当代比较语言学家已经作了许多类似雅氏在论文中就翻译过程所作的那种形式分析,包括可译性的技术问题。参见 Catford, Popovic 和 Mounin。
- [27] 关于巴别塔故事的史前史及其对于翻译理论的意义,参见 Barnstone 第 135—152 页。
- [28] 斯泰纳,第 58 页。
- [29] Barnstone, 第 43 页。而且,围绕《圣经》翻译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利害。众所周知的是,马丁·路德革命性地将《圣经》翻译成现代德语,成为德国新教改革运动的基石,他也被赫尔德和克劳普斯托克誉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文学性德语的缔造者。
- [30] 斯泰纳,第 236—238 页。
- [31] 对于斯泰纳分期的批评,参见 Berman 第 2 页。
- [32] 沃尔弗,第 60 页;转引自斯泰纳,第 90—91 页。
- [33] 斯泰纳,第 94 页。
- [34] 本雅明,第 70 页。
- [35] 同上,第 80 页。
- [36] 参见德里达,《巴别塔》,下文会有所讨论。还可参见德曼,《对理论的抵抗》,第 73—105 页。
- [37] 马丁·杰伊(特别是第 12 章,《翻译的政治:西格弗里特·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论布伯—罗森茨威格的圣经译本》第 198—216 页)将本雅明的语言放置在所谓的德国犹太复兴运动的语境之中,特别是放置在马丁·布伯和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 20 世纪重要的《旧约》译本之内。
- [38] 本雅明,第 70、82 页。
- [39] 同上,他心中所想的是路德等人,正是这些人通过翻译“扩展了德语的边界”(第 80 页)。
- [40] 德里达,《巴别塔》,第 171 页。
- [41] 德里达,《立场》,第 20 页。
- [42] 德里达,《巴别塔》,第 201 页。
- [43] 斯泰纳,第 257 页。

- [44] 方,第 130 页。
- [45] 我指的是耿德华的附录中从 3.1 到 4.12 的数目,第 217—270 页。
- [46] 参见高名凯和刘正谈。刘宇宁和 Zdenka Novotna 提到并引用了高刘二人的部分研究。在高刘所引证的年代(大约从本世纪初到 50 年代)直接借自印欧语言的词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借自日语“汉字”的外来词。参见其附录。
- [47] 参见 F 立达,第 90—94 页。
- [48] 参见实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话》,第 311—327 页。
- [49] 参见谭汝谦,《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第 317—349 页,及其《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中国晚清的教育改革和语言改革》,第 71。如果我们所包括的外来词的来源不仅仅限于日语的“汉字”,那么这些学者所统计的总数将有 1600 个左右。本书的附录包含了大约 1800 个外来词和新词语,这主要是因为我也收入了新词语的同级的采样。
- [50] 参见马斯尼,第 157—223 页。
- [51] 有关日语中的外来语词典和外来词研究,参见荒川物兵卫,《口语化的英语》以及他的《外来语词典》,并可参见史群、陈山龙的研究。在早期对于日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中,米勒(第 235—268 页)提出一个奇怪的理论,“汉语,就其所有的历史形式以及现代汉语而言,通常是以这种极端保守的方式回应着外国语言的刺激,她乐于翻译那些由于同外部世界交往而变得必不可少的新词汇,而不愿意把它们作为外来词拿过来”(第 236 页)。就现代汉语而言,米勒的结论可以用语言学家及其他学者(如高名凯、刘正谈、实藤惠秀、耿德华、谭汝谦以及马斯尼)的研究很容易地给予反驳。
- [52] 参见高名凯和刘正谈,特别是第二章对汉语早期从波斯语、索格底语、梵语、蒙古语、满语和其他亚洲语言吸收的外来词的描述及词汇表。有关进一步的谈论,参见罗常培;Chmielewski;以及 Mair,《佛教》。
- [53] 巴赫金,《拉伯雷及其世界》,第 465 页。
- [54] 虽然爱兹拉·庞德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当英语动摇了汉语的基础时,庞德的所作所为却并未动摇英语的基本原则。
- [55] 对于“批判意识”这一观念的批评,参见 Dhareshwar。
- [56] 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 226—227 页。
- [57] 克利福德,第 185 页。

[58] 参见赛义德的近著,《文化与帝国主义》。

[59] 《铭写》杂志在1989年出版一期题为《旅行理论和旅行理论家》的专号,我相信这是应用和修正赛义德理论的一次重要的集体性努力。这期专号中几乎所有八篇论文以及三篇评论,都集中于定位问题。拉塔·玛尼的文章《多元传介:多民族接受时代的女性主义研究》通过比较美国、英国和印度对她本人所作的殉夫自焚的历史的不同接受情况,阐明了定位的政治。玛尼遵循的是莫汉蒂关于定位政治的界定:“为政治界定和自我界定提供基础的历史的、地理学的、文化的、心理的与想像的边界”,她强调“定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斗争的时间性”,定位政治具有“文化、语言以及意义和权力的复杂型构之间”的运动过程的特点(第5页)。通过聚焦于后殖民语境中理论家自我定位的复杂性,这一行为有助于修正赛义德那新颖的旅行理论。可是与此同时,旅行理论却又被这位后殖民旅行理论家当作不同定位的多元传介里面一个有特权的主体而替换了。虽然定位这个吹毛求疵的观念有助于为后殖民理论以及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的“家园之外者”开辟一个话语空间,就此而言它或许行之有效,但是对我来说它不甚明晰的地方恰恰是,后殖民理论家除了旅行进出“第三世界”,并指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差异,她(他)又怎么能联系到“第三世界”呢?

David Scott 在同一专号中的文章《为人类学主体定位:其他地方的后殖民人类学家》分析了后殖民的状况,他认为后殖民者旅行的方向恰恰与她(他)离开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时定位的差异一样重要:

用 Derek Walcott 贴切的反讽之词来说,后殖民者现在是一个“走运的旅行家”。然而,就在我们承认对于后殖民版图(对于这一版图,Luise Bennett 在其诗作《相反的殖民化》中已经无与伦比地进行了讽刺)的这一不可逆转的重新分配时,我们也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运动是朝着一个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殖民者和后殖民者过去和现在都在走向西方。(第75页)

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当移民者大量到达西方的时候,理论也在同时渗透东方。Mary E. John 在其论文《西方思想领地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人类学家与本土的消息提供者?》中指出,“这一术语的选择本身就颇具意味——它不是移出的,而是移入的。”(第57页)

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我们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就此意义而言,我

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后殖民状况与殖民时代的状况是否真的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我想把移民文化的主题留给那些家国之外的学者,他们出色的研究工作已经在美国越来越引人瞩目,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东西方之间旅行理论的课题。我的问题如下:当一种语言生产的理论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 [60] 参见 Niranjana, 第 37 页。关于 wirkliche 与 Wirkungsgeschichte 的概念,参见尼采的《对历史的使用与滥用》,以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
- [61] Niranjana, 第 35 页。
- [62] Pratt, 第 5 页。
- [63] 费边,《语言和殖民权力》,第 79 页。
- [64] 同上,第 137 页。有关非洲殖民主义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Chinweizu et al., vol 1; 以及 JanMohamed。
- [65] 关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各种语言发展,参见 Certeau et al; Mazrui; B. Anderson; Cooper; Burke and Porter; 与 Bourdieu,《语言和象征权力》;以及 Pratt。
- [66] 费边,《语言和殖民权力》,第 73 页。还可参见费边的另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创造它的对象》。
- [67] 参见费边,《语言和殖民权力》,第 1—2 页。
- [68] Fodor; 转引自费边,《语言和殖民权力》,第 1 页。
- [69] 妮兰雅娜,第 11、7、172 页。在印度殖民地研究中,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合流在 1980 年代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有关殖民时期对于英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功用的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参见 Viswanathan。
- [70] Eric Cheyfitz 的《帝国主义的诗学》强有力地批判了欧洲现代文学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动,该书也反映了我在这里所提及的一些问题。
- [71] Rafael, 第 21 页。
- [72] 亦请参见 Homi Bhabha 在触及英属印度的问题时,就这一问题所撰写的文章,“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hi, May 1817”,收入 Gates,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163—184。
- [73] 在研究后殖民历史的学者中,Partha Chatterjee 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在其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一书中解决它。
- [74] Lowe, p. 7.

- [75] 参见史华慈,《寻求富强》。
- [76] 参见李欧梵,《浪漫的一代》,第44页。
- [77] 钱杏邨(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页。林培瑞(Perry Link,第135页注27)比较了阿英之研究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台湾人人文库版(1968)和香港版(1973)——他发现二者在估计的数目上有所差别。前者给出大约1500本书,而后者提到的是1000部。林氏令人信服地指出,台湾版更言之成理:“钱杏邨说,据《寒风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共有大约400种翻译的小说以及大概120部创作的小说。他随即指出,他本人的估计大约三倍于《寒风楼》索引中的数目。”在近期的研究中,陈平原(第20页)提出1898至1911年间出版的小说为1145种。其中647部为翻译小说,498部为本土的创作。在陈平原这里,翻译小说与本土创作之间的比率大约是三比二。
- [78] 有关晚清和民国时期现代出版机构的兴起,参见林培瑞,特别是第三章;Lee和Nathan; Barnett, “Silent Evangelism”; 钱杏邨(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作者同前,《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1—4卷;作者同前,《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以及林语堂。
- [79] 文学史家倾向于强调《小说月报》(1910—1932)这一杂志在现代小说兴起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一说法一部分是有关现代文学之兴起的一种官方表述——并且时常顺带提及该杂志对译介外国文学的用心尽力。实际上,这一迹象还需要一种不同的解释。《小说月报》从一个鸳鸯蝴蝶派杂志,被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改变为一个“严肃的”现代文学期刊,直到1932年1月停刊,在这期间该杂志开辟了各种栏目和为数众多的计划,力图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中国本土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当时只占整个篇幅的一部分。该杂志处于显著位置的几个固定栏目即有“翻译系列”、“域外文学”专题,还有一个“批评”栏目。最后这个栏目有一多半文章是关于外国文学的讨论。此外,也有外国文学的系列研究,包括俄国文学(增补号,1921)和法国文学(增补号,1924);以及“受压迫民族文学专号”(1921),包括波兰、芬兰、希腊等欧洲边缘民族的文学作品的译作。有关俄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早期作家之影响的详实研究,参见 Ng。
- [80] 虽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我所强调的是,当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将为数众多的译本以及大量炮制出来的外来词和新词语带回到汉语之中时,现代日语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81] 有关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的中译本以及相关的出版物方面的研究,参见马祖义,《中国翻译简史》。
- [82] 李欧梵,《寻求现代性》,第110页。
- [8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3,4页。(中译本参见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 [84] 周蕾,第xv页。
- [85] 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第221页。
- [86] 对于冷战时期中国学领域的社会科学以及区域研究方面的一种突出的批评,参见巴娄的(Tani Barlow)《战后中国研究》。
- [87] 中国现代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精英阶层,记住这一点是全关重要的。虽然精英阶层的确是新词语的介绍者和发明者,而且对他们来说,东西方的问题一直是他们全神贯注的问题(这也恰恰是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批判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说法时,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词语并不就是呆在它们的发明者那里,而是同样也在其他的社会话语领域旅行和流通。与其他语言符号相类似的是,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语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大众和底层当中。
- [88] 胡志德,《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第149页。
- [89] 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第197页。亦请参见古哈(Guha)和斯皮瓦克。古哈为该文集所作的序言总结了这种编史学的发生。
- [90] 这并不是要轻描淡写这个小组的历史写作中存在的某些疑难领域,例如他们对各阶级的形成所作的论述,O'Hanlon, Hershatter 以及陈小眉对此有所批评。
- [91] 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9期(1993)上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观念的讨论。
- [92]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6页。科瓦利斯(Jon Kowallis)的译文,我感谢他允许我使用他未经发表的鲁迅早期论文的翻译。
- [93]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16页注释8。转引自科瓦利斯,第4页。
- [94] 王力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日本人从19世纪传教士的词典,特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汉语词典》(1815)中借用了英文词语的现代“汉字”的翻译,这远远发生在相反的过程发生之前。他(第281页)指出,这种单向的词汇借用让位于汉语大量输入日文的“汉字”复合词,大概是在1875年(?)左右;而且日文的翻译者很早就已经订购在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卫三畏(Williams)

和麦都思(Medhurst)所编纂的双语词典,并在他们的翻译之中对之大加依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第一本英日词典的出现。虽然王力卫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中日之间新词语的流行的看法复杂起来,但是他也往往夸大了这一状况,认为早期传教士的这些词典在现代日语“汉字”复合词的兴起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而这已经超过了文本的证据所能充分证实的程度。我本人只能核实马礼逊的词典中数量有限的一部分早期复合词,是与高名凯、刘正谈等人所指出的中—日—欧外来词完全符合的。有关这些特定的复合词,参见本书附录的注释。日语从传教士的著述借用词汇的一个更为可靠的来源是他们对于魏源《海国图志》的翻译。参见下文的讨论。

- [95] 高名凯和刘正谈(第82—83页)就这个范畴列表统计的结果总共是91条。母语是汉语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这些词语中有一部分在20世纪以前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另外的例子还有不景气(recession; fukeiki),场所(site; basho),派出所(police station; haashutsujo),服务(service; fukumu),个别(individual; kobetsu),距离(distance; kyori),内容(content; naiyo),支部(party branch; shibu)。在附录C,我根据我本人以及其他学者的发现修正并更改了这个词语表。
- [96] “革命”一词(现在的意思是 revolution)在外来词出现之前的意思是“顺乎天命”;“文学”(现在的意思是 literature)的古意是“文章博学”;“经济”(现在的意思是 economy)古意为“经世济民”。“科学”的古意为“科举之学”,高名凯、刘正谈和马斯尼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返汉语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但我把它重新归入这一范畴(参见附录)。Science在明朝被翻译成“格致”,后来它被日语的“汉字”kagaku和现代汉语的“科学”所代替。对于这个过程的一个有趣的解释,参见注释。高名凯和刘正谈(第83—88页)在这个类别中共列举67个词条。另外的例子还有文学(literature; bungaku),文明(civilization; bunmei),分析(analysis; bunseki),封建(feudal; hoken),法律(law; horitsu),自由(freedom; jiyu),阶级(class; kaikyū),劳动(labor; rodo),政治(politics; seiji),思想(thought; shiso),运动(movement; undō),惟(唯)一(only/sole; yuuitsu)。马斯尼已经对一些词语(如文学)提出质疑。参见下文的讨论,以及附录,特别是A和D。
- [97] 这是三组外来词中数量最丰富的一组。高名凯和刘正谈(第88—89页)在这一组罗列了100个复合词;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词都是英语词汇的汉字翻译。其他例子还有议会(parliament; gikai),物质(matter/substance; busshitsu),反对(oppose/opposition; hantai),现实(reality; genjitsu),哲学(philosophy; tetsugaku)。参见附录B。

[98] 德曼,《对理论的抵抗》,第104页。

[99] “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是马斯尼的命名。另一种命名“双程词语”(round-trip words)是由边尔(Victor Mair)提出的(“Anthologizing and Anthropologizing”, p. 3)。这两个术语都有助于明确说明高名凯和刘正谈所划分的三个范畴的中—日—欧新词语。

[100] 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即“文化”的古汉语涵义和英语的 culture 一词在它们各自独立存在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后者当然有所变化(参见威廉斯《关键词》,第76—82页)。我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提请读者注意,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一相对有限的时段里存在的——种独特的历史状态。在这一时段中,既非其前亦非其后,经由日语对欧洲词语的“汉字”翻译这样一种中介,很多汉语复合词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发明出来。

[101] 众所周知,严复在上个世纪之交开始翻译约翰·穆勒、赫胥黎、斯宾塞、亚当·斯密等西人的著述时,不得不捍卫汉语的词库以抵制日语外来词的流入。他喜欢使用古语,或者自创新词,但拒绝采用当时作品中那些现存的术语。例如,他用“母财”来翻译 capital,而没有采用重返的外来词“资本”(shihon),他还把 bank 翻译成“钞店”、“钞商”,或者“版克”(一种音译),取代当时已经流行的日语外来词“银行”(ginko)。有趣的是,尽管严复的翻译对他那一代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新词语却由于日语外来词译法的逐渐风行,而迅速落伍和过时(史华慈,《寻求富强》,第95—96页)。弗格尔(Joshua Fogel)在《近期翻译理论》一文里试图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联系当时的日语外来词看待严复本人特有的新词语?严复造出了声名遐迩的“天演论”一词来译 theory of evolution,但这一译法在汉语新词库却很快就被日语词汇 shikaron(进化论)所替代,弗格尔在思考个中缘由时说道,

这些术语之所以在中国不能“奏效”,并不是因为它们太文学化了,或者是因为它们要求过于深奥的中国古典知识而被排除。在严复写作时,还没有广泛流传和使用的白话文,而且能够阅读其译作的大多数读者毫无疑问都能理解他使用的典故(尽管这些典故背后的西方思想仍然半遮半掩)。严复是否知道他孜孜不倦地翻译的那些文本也有中村上民的日译本?是否曾经有人比较过中村和严复为了翻译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概念而分别设计的词汇呢?

马斯尼最近对汉语词库中晚清新词语和外来词的研究间接阐明了这些问

题——所谓间接是指他没有按照弗格尔提示的方向直接处理比较的问题。他(第115页)指出,即使严复本人也发现,在自己的翻译中完全排除与日语相关的新词语,是困难重重的。他给出的例证是“议院”(parliament; giin)、自由(freedom; jiyu)、文学(literature; bungaku)等。(这里有必要指出,现代词语“文学”与“自由”不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然而它通过日语bungaku这一中介所完成的双程播散,却与现代汉语中“文学”一词新的跨语际涵义的确立,关系十分密切。参见下文的讨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尼关于英语economy和sociology等词在严复那里的译法所表明的重要观点,恰恰证实了弗格尔的论点。严复的译法“计学”和“群学”很快被来自日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取代,而且后者最终成为标准的译法。严复反对过日语外来词吗?抑或他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就严复来说,结果可能仍是一样的。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严复选择那些译法的复杂情境。马斯尼指出,在他所考察的西方文本的早期汉语翻译中,即在严复1898年发明“计学”和“群学”之前,没有发现日语外来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任何迹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将证明严复“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创新者,而不仅仅是日语外来词的对抗者”(马斯尼,第115页)。

[102] 参见迈尔,第3页。

[103] 马斯尼,第24—25页。关于“公司”一词意义变化过程的一种有趣的解释,参见马斯尼,第174页。

[104] 同上,第25页。

[105] “文学”最初的涵义可以回溯到《论语》(11.2),意为“文章博学”。马斯尼(第204页)认为,现代意义的“文学”一词应该进一步回溯到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著作《职方外记》(1623)。他援引“欧罗巴诸国尚文学”一语为证,这个句子的英文翻译是all Western countries highly esteem literature。我认为这种译法犯了年代颠倒的错误,因为在17世纪,literature或意大利语的任何一对对应词,都比启蒙之后我们所指的literature一词覆盖着一个有所不同而且范围更广的语义范畴。

[106] 但是仍然有一些直译的译名保留下来,没有被外来词的翻译所取代。参见附录F和G。

[107] 在“民主”成为democracy的标准译法之前,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即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

tional Lau)的中译本),就已经用民主一词的现代意义“人民作主”来翻译 republic (现在译为“共和”)。通过翻译 republic 重新评估“民主”,对于颠倒这个词的古典意义是有间接的贡献的。马斯尼(第 189—190 页)推测日本人可能是在 1865 年翻译《万国公法》时,从中汲取了“民主”,并随后用它来翻译 democracy。

- [108] 这可能是因为指示词比其他词类,如名词和动词,更为紧密地联系到中国本土词语结构的逻辑。
- [109] 1920 年围绕阴性单数第三人称的发明所展开的有趣的讨论,参见《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的下面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发表在《新人》杂志上:孙祖基,《她字的研究》;寒冰,《驳“她字的研究”》;孙祖基,《非“驳她字的研究”》;梦沈、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以及刘复,《她字问题》。关于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参见王力,2:第 1—60 页;高名凯;吕叔湘和黄盛璋。
- [110] 阴性代词的发明不能和同一个以“女”字旁书写的汉字相混淆,后者过去常常是一个名词,而且与“亻”字旁的“他”这个汉语最早的代词之间没有什么词源上的联系。
- [111] 参见山石。在发明阴性代词的同时,中性形式的“它”也被考虑到了。参见刘复,《她字问题》。
- [112] 耿德华认为周作人对刘复发明阴性代词“她”有一定的影响(第 305 页注 24)。此外,鲁迅在《忆刘半农》一文里也提到这个事实,《鲁迅全集》,6:55。王力(2:351 注 22)引证了另外两个来源:胡适在刘半农的葬礼上致悼词时称他是这个新词的发明者,林语堂在《开明英文文法》一书里也指出,1917 年是这个汉字诞生的确切年份。
- [113] 参见刘复,《她字问题》。
- [114] 有趣的是,刘复在任北京女子学院校长期间,曾明令禁止女学生在交谈中使用英语 miss 的时髦音译“密斯”一词,他坚持采用中国本土的词语,如“姑娘”、“小姐”和“女士”。参见《世界日报》记者对他的访谈,1931 年 4 月 1 日。
- [115] 添加在名词和代词后面的复数后缀“们”,是语言改革期间的辩论中另一个热门话题。参见耿德华,第 266—268 页。
- [116] 从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现代国家主义的性别建构,参见巴娄,“Theorizing Women”。
- [117] 阿多诺,2:190。
- [118] 关于现代民族历史中的传统的发明,参见霍布斯鲍姆和兰格。

[119] 列文森,第 157 页。

[120] 虽然梅茨格(Thomas Metzger)的连续性模式旨在批判列文森的冲击理论,但他和列文森运用了同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梅茨格认为(第 17 页),“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那力图从形而上学的、心理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本上的、强烈的、持续数世纪之久的欲望,引导为数众多的中国人激情澎湃地将他们的一生奉献出来,以求推翻久被尊崇的传统制度,而采用奇异的外国方式。”然而偏爱一个无需解释的中国本土的过去,而削弱了一个传介过来的西方的存在,这种尝试是无法解释“现代”和“西方”在中国 20 世纪的思想话语中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过程的。

[121] anarchism 有两种中文译法:汉语的音译是“安那其主义”,日语的“汉字”翻译是 *anuseifushugi*。“汉字”的译法在中文里的发音是“无政府主义”,后者最终取代了音译。参见附录 F。

[122] 德里克,《无政府主义》,第 50,55 页。

[123] 我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秩序,这种秩序有时候和国家对于书面和口头词语的极暴控制和操纵相合拍,但决不应该被拉平到这一层面。对于中国后一种状况的讨论,参见 Schoenhals。

[124] 参见刘再复。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1985 年第 6 期,1986 年第 1 期)。刘再复的文章受到官方批评家陈涌的攻击。

I 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呐喊·自序》

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本质”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其中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的透明材料。^[1]这种认识上的“本质论”事实上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成，使人们看不到“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神话的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绝大多数学者不是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民性定调子、下结论上，就是在它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之间争论不休，可是，一个比它们更有意义（且属于前提性）的问题，却被彻底地排除在视野之外：“国民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范畴？它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论中负载了怎样的历史意义？

五四以来，西方传统“思想史”的写作模式对历史研究影

响甚大。人们经常热衷于大思潮、大体系和大结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而忽略对具体的话语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对国民性神话的研究一方面着眼于这个话语本身的历史面貌(以及批评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想尝试一种与传统“思想史”完全不同的历史写作,去探讨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性”理论的意义。

国民性神话

“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 national character 或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的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

有关国民性的概念最初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中国时,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在《新民议》和《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中,梁启超明确地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批评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缺乏独立自由意志以及公共精神,认为这些缺点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过

渡的一大障碍。1889年和1903年之间,梁氏写了大量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一点。仅举其中一小部分就有:《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国民十大元气论》等。《新民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篇。^[2]孙中山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使用了相似的语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他们的奴性、无知、自私和缺乏自由理想是国民性的一大缺陷。^[3]值得玩味的是,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人都曾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然而,他们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本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的理论。这是他们当时的困境,也是后来许多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困境。

1911年前后出现的主要报章杂志,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都程度不同地被卷入了有关国民性的讨论。比如,《东方杂志》在1905年和1919年之间登载了大量文章,专门议论或部分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对国民性的说法有褒有贬,但立论是基本一致的。其主要观点见于以下诸文:《论中国人民之依赖性之起源》(1905)、《论中国之国民性》(1908)、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钱修智的《惰性之国民》(1916)等。归纳起来看,这些文章大致都与梁启超的观点相呼应,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经改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生存需要。虽然不同文章的作者对国民性的定义有所出入,有关优势或劣势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但没有一人对国民性理论的前提发出质疑。他们似乎认为,国民性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历史包袱。可见,此话语在当时已获得何等的透明度和知识权威。

1917年初,《新青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性及其

弱点》的文章,作者署名光升。这是一篇颇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因为它对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国民性研究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作者在这里把国民性界定为“种性”、“国性”和“宗教性”的集合体,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和其他的民族进行了一番比较。他从欧洲人和中国人对异国文化及宗教的不同态度入手,概括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欧洲民族排外,憎恶异类;中国人则多含容忍精神。在作者看来,正是这种容忍性使中国人丧失了个性和独立自由的精神,造成了极其薄弱的法制和民主观念。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误入迷津的中国国民性已不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方式,应加以彻底改造。^[4]

有趣的是,国民性之孰优孰劣在上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光升的眼里,欧洲民族的国民性未必在本质上比中国人优越,所谓改造国民性,不过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生存条件所必须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段。然而,到了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后来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国民性的话语开始向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本质论”过渡。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我之爱国主义》文中将国民性的问题和传统文化相提并论,把国民性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环境,赋予了新的内容。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性”理论把国民性视为中国传统的能指,前者负担后者的一切罪名。“批判国民劣根性”于是上升为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5]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国民性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于是,唤醒和教育国民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肩头上。例如,蔡元培在为《国民》杂志写的序中指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启蒙教育唤醒他们。^[6]不难看出,知识与

权力、西化与传统、精英与民众等关系在这个时期的国民性话语中得到了生动和具体的显现。与此同时,文学,随着“改造国民性”的这一主题的凸现,也开始受到中国“现代性”理论的青睐,被当作实现国民改造之宏图的最佳手段。相比之下,梁启超原先倡导的政治小说倒显得气魄不足了。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五四文学恰恰把国民性的话语转化成一种超越自身历史的话语,而且做得极其成功。事到如今,说起五四文学和改造国民性,谁都看成是老生常谈。可是,在“自然”的表象下,现代文学与国家建设的历史姻缘究竟是如何缔结的,这个问题始终无人问津。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中国国民性的毛病在哪里?谁为它的缺陷负责?该如何改善?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继承晚清知识传统的五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于中国积弱原因种种解释失去信心者。鲁迅青年时学医,后来对医学失去信心后,抓住了“国民性”,认为它是中国病弱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在五四文学的雏形期,国民性的理论为鲁迅那一代作家提供了一套有力的自我批判语言,同时将儒家思想视作批判对象。新文学因此肩负重任,“解剖”一国的病弱心灵以拯救其躯体。对鲁迅而言,新文学成为“了解国人的途径——了解他们的国民性是什么,有哪些缺陷——因为在他看来身体已不是病根所在。”⁷医学及解剖术语充斥在有关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将文学和医学并举,医学的治疗力量被转移于文学,而且基于心物对立,文

学的地位被抬高在医学之上。

鲁迅最初是在梁启超和其他晚清改革家的著作中接触到国民性理论的。但是他在留学日本期间,看了亚瑟·斯密思的《中国人气质》日译本文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8]在他的影响下,将近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种集体情结。他们定义、寻找、批评和改造中国国民性,却往往不考量此话语本身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1980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再度提出一世纪以来的老问题:“中国国民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像真的有答案存在。^[9]如果我们不去分析这问句本身,就很难对中国现代史和文学提出新的看法。

中国启蒙思想家用国民性理论来提倡现代文学之前,国民性理论已经由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传入中国。鲁迅通过斯密思的著作接触此理论,这个情况特别能说明20世纪初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背景。Arthur Smith(中文名也称明恩溥)是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北美传教士。^[10]他在中国农村传教期间,写了几本有关中国人的书。《中国人气质》最初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North-China Daily News),时为1889年。跟很多其他的传教士游记一样,书出版后极受在亚洲的西方人欢迎,在英、美、加等国也有众多教徒及非教徒的读者。当时此书是研究中国的美国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直到了1920年,它都还是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最常阅读的五本关于中国的书之一。即使到现在,此书还在持续影响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一个晚近研究斯密思的批评家就说:“斯密思为我们建立了对中国人基本气质的复

杂看法。虽然现在看起来,他的观点有点陈腔滥调,但我们应该记得在他以前的作者,从马可·波罗一直到威廉士(S. Wells Williams),都把许多我们认为最有趣的事略去不谈。”^[11]

虽然斯密思的书只是国民性理论在中国人中传播的众多渠道之一,这恰巧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1896年,日人涩江保将1894年版的英文《中国人气质》日译出版。根据张梦阳的推测,鲁迅是在留日期间(1902~1909年)看到这个译本的,当时日本的民族国家主义者正热烈地讨论国民性。鲁迅曾不只一次地在信函、日记和杂文中提到原著及这个日译本。例如,在1926年7月2日的《马上支日记》,他提及在北京买了一本日文书,书名他译为《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他指出该书的作者安冈秀夫受到了亚瑟·斯密思著作的深刻影响:“他似乎很相信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20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留心它。”^[12]显然鲁迅指的日译本就是江涩保1896年的翻译。一方面,鲁迅不同意安冈秀夫许多具体的看法,甚至讽刺他。例如,在1926年7月4日的《马上支日记》,他嘲笑安冈认定中国菜反映出中国人淫风炽盛。可是另一方面,鲁迅又极力表明,虽然他跟安冈在具体看法上有出人,这并不表示中国人不必批判自己的国民性。鲁迅在同一篇日记中说:“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13]

7年以后,1933年10月27日,鲁迅在致陶亢德的信中再次提到这本书:

日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

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思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40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14]

直到去世前,鲁迅一直希望见到斯密思的书译成中文。他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三)》有如下文字:“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司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儿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5]80年代的学者如张梦阳,说鲁迅的遗愿多年来始终没有实现。^[16]其实,早已有两种中文翻译。第一种是《支那人之气质》,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出版,是据1896年涩江保的日译本用文言译出,并包括日译者的注解。^[17]鲁迅没见到这个译本,因为出版的时间正是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留学的第二年。第二种则是直接根据英文原著编译的,于鲁迅死后一年,1937年出版。译者是美国留学回国的优生学者、著名精神分析批评家潘光旦。他用白话译了斯密思书中的15章,收入他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该书属于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优生、文化、生物系列书籍之一。^[18]不过,鲁迅和潘光旦似乎都不知道有1903年作新社的译本。

《中国人气质》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研究斯密思的海佛(Charles W. Hayford)说这本书的重大缺点是“理论不成熟,斯密思没有反省、了解自己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相对性”。虽然我同意海佛所指出的斯密思的局限,但不同意他的论说前提,即只要能自我反省,或有良好的人类学研究训练,就能避免文

化本位主义的问题。^[19]在我看来,不是理论不成熟,而是19世纪欧洲国民性理论的深刻影响,使得斯密思采取其特定立场。^[20]斯密思用26章的篇幅提出了26个范畴来定义中国国民性:爱面子、经济、勤劳、礼貌、不守时、不精确、善于误解、迂回、表面上有弹性其实固执、思想混乱、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无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方便、身体富活力、有耐性毅力、知足常乐、孝顺、仁爱、无同情心、社会台风、讲信用重法、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泛神无神。^[21]斯密思在每一章中,或用小事例,或对中华民族作笼统描述(时时与其他种族比较),来说明他的范畴。

让我们以《神经麻木》一章为例。斯密思认为中国人感觉不到疼痛、噪音或西方人所不能忍受的其他生活不便处。他说中国式的睡眠习惯是这样的:

在睡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与我已经提到过的中西基本大分歧吻合。一般而言,中国人哪儿都可以睡。使我们觉得难堪的干扰并不能打扰他。以砖作枕,以稻草或泥砖作床,他就可以好梦不惊。房间不必暗下来,别人也不用安静。“夜里哭泣的婴孩”可以尽管继续啼哭,因为并不会影响到他。某些地区,有时似乎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好像狗熊冬眠一样。大家规律地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不拘地点,依本能睡着。在这季节,午后两点的静寂可比午夜两点。对于劳工阶级和很多其他的人而言,睡觉的姿势无关紧要。设想在中国找一百万、一千万的人来作下列考试,是毫无问题的:试验他们躺在三轮推车上,像蜘蛛一样头朝下,张大了嘴含着苍

蝇,是否睡得着。^[22]

这个段落很能代表斯密思的笔调,他在语法上使用现在时态和“中国人”这个全称来表达“真理”,描述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本质差异。睡眠,一个人们共同的生理状态,在这儿被用来描述文化差异,而其意义早已被西方人优越的前提决定。这儿要紧的,不是描写错误的问题,而是语言所包含的权力问题。作者透过修辞和比喻将他人矮化成非人的动物,使用一些自以为幽默的轻蔑比喻,如“冬眠的狗熊”和“蜘蛛”,不由得令人怵目惊心,这种轻蔑显然反映了他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但也同时肇因于他与中国佣仆之间的阶级差异。在当时,中国乡绅对传教士公开敌视,于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最紧密关系只有主仆关系,因此在讲述事例时,斯密思从他自己或他人与中国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快经验取材,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种外国人与当地仆人之间的阶级差异总是被利用来建立“中国国民性”的理论,而与此同时,理论背后的主仆关系却被掩盖和忽视。

当这种关系表现在国际政治上,斯密思在尾章中提出的问题可谓意料中事:“中国能自己趋策改革吗?”^[23]他的回答是,中国需要外国的干涉,基督教文明的宗教信息必须传布以改进中国人民的性格。“为了改革中国,性格的本源必须被深入和净化,良心必须登上宝座,不能像日本的天皇一样,被幽禁在宫殿里。”^[24]面对这种传教语言,中国人作何反应?小说家老舍年轻时与传教士有不少来往,他在《二马》中对传教士作了无情的讽刺。以下小说片段可以点明斯密思隐藏的真意: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士，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25]

或许伊牧师只是老舍凭不羁的想像力肆意挥洒的人物，然而斯密思笔下的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伊牧师与斯密思出奇地相似，只不过在斯密思的书中，不存在一个超然的叙述者来指出他使用的动词隐含的暴力。事实上，他的动词可以轻易翻译成帝国主义行动：伸入即侵入，净化即征服，登上宝座即夺取主权。^[26]

正如詹姆士·何维亚（James Hevia）最近在一篇研究中所说：“传教士话语的目的不仅在反映现实，而且在塑造现实，它也的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27]他分析八国联军为报复义和团之乱所逞的暴行，指出早期的描述——例如将现实与圣经中事件比附，将死去的传教士描写为殉难者，对中国人性格作全体概论——都对历史上的“真实”和后来人们的理解起了重大塑造作用。^[28]传教士话语和八强帝国主义行动之间的依存，早已超过修辞比喻的层次（巧合的是，老舍的父亲，一名守卫皇城的护军，就是在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牺牲的）。^[29]

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西方传教士话语，我们不应该只看成是一种歪曲，而应理解为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因它曾经

塑造中西间的现代历史和关系。斯密思的书属于一个特定文类,它改变了西方的自我概念和对中国的想法,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在它之前已有各国传教士的类似著作,如美国人威廉姆斯(S. W. Williams)的《中国》(*Middle Kingdom*, 1848),英国人亨利·查尔斯·萨(Henry Charles Serr)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9),法国人埃法利思特-莱基·虞克(Evariste-Regis Huc)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 1854),托马斯·泰勒·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的《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1856)。麦多士曾为斯密思在《中国人气质》中引用。此外还有以《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Far Cathay*, 1872)著名的华尔特·亨利·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以及伦敦时报 1857 至 1858 年间驻华记者乔治·温格鲁夫·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斯密思曾引用库克的《中国通信集》序作为《中国人气质》的前言。他的引文特别能帮助我们看清 19 世纪的国民性神话的本质。这种互文关系显示,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知识受当时的理论决定,而与现实少有关联。库克这段文字是极佳说明:

我在书信集里有意地回避了在中国国民性的题目上大作文章。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空白。天底下没有比这个题目更诱人、或者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叫人肆意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了。它可以让人乘机讲一些深奥的大道理,得出一些充满自信的教条式的结论。每个世俗的批评家都会嘲笑我,说我不该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其实,我并非不想尝试对中国人的种性作某种整体的素描。这种东

西我曾写过几稿,而且还写得还算坏。不幸的是,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总是用他们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我预想的结论。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只好忍痛割爱,将那些美好的文字付之一炬。此外,我还想补充一句,为这事我曾多次请教过当今最有名望和最坦诚的汉学家。他们也都支持我的看法,认为任何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笼统概念都是不可靠的。这种困难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懂得。世上有些孤陋寡闻但又自命不凡的人,他们编出一些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来,好像那就是真理。

我不否认,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获得比较完备的知识,帮助人们了解支那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困惑不已。但至少在目前,我不得不避开武断的定义,仅就中国人的一些最显著的特点做一描述。^[30]

斯密思引用库克序言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反嘲语调,而误以为库克在对自己没能描述中国国民性一事认真道歉。斯密思利用库克模棱两可的言辞,说西方人在经过数百年与中国的接触后,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中国人作综合了解了,过程就像了解其他复杂的自然现象一样。他的书就是发展这项知识的开路先锋。^[31]

斯密思笔下的中国,是不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批评的那种东方主义所构筑出的神话?的确,斯密思的著作与赛义德讨论的情形极为类似。但是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国民性的理论被翻译而流传在中国境内的情形。传教士话语被翻译成当地文字且被利用,

这种翻译创造了什么样的现实？在考虑中文的跨语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时，这些问题必须提出，因为只要考虑(也必须考虑)到当地文字，情况就显然比东西方文化批评家通常设定的“观照主体与被观照的客体”要复杂。斯密思不同于早期书写远东的东方哲学和语言学者，因为他(以及前面提过的亨利·萨等传教士)的著述被选译成中文。这些翻译大都经过日本的媒介，改译自日译本，或因日本人先行引介而被择取中译。^[32]由于这些理论被中国人翻译阅读，并且进入中文有关国民性的论战，其中牵涉到的问题就与赛义德讨论的东方主义有所区别。

翻译国民性

知识从本源语言进入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往往只剩下隐喻层面的对应，其余的意义则服从于译体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在跨语实践的过程中，斯密思传递的意义被他意想不到的读者(先是日文读者，然后是中文读者)中途拦截，在译体语言中被重新诠释和利用。鲁迅即属于第一代这样的读者，而且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读者。他根据斯密思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

从一开始，鲁迅就对国民性理论充满复杂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国民性理论吸引他，因为它似乎帮助他解释中国自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的惨痛经验。但另一方面，西方传

教士观点对中国人的轻蔑又使作为中国人的鲁迅无法认同。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描述道：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 三 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定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33]

许寿裳这项观察可从鲁迅著名的《呐喊》自序得到印证。鲁迅回忆那段著名的弃医从文的经过如下：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

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4]

向来，批评家们总想在鲁迅的生平和小说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学者们努力地寻找那张关键的幻灯片，可是徒劳无获。于是有学者猜测整件事可能只是鲁迅根据目睹或听说的事编出来的。^[35]但是时至1983年，日本学者太田进发表了一张他发现的1905年的照片，照片边上写着：“处决俄国间谍。观看的群众中有笑着的士兵（1905年3月20日摄于满洲国开原城外）”。这个日期和鲁迅叙述中日俄战争的日期重合，照片的内容也与鲁迅声称见到的幻灯片相似。尽管如此，学者们一直未能确切地建立起二者间的关系。^[36]

我认为，即使找到了该幻灯片，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也不见得就能说明鲁迅这段文字描述的震撼力。我们仍然可能只不过将鲁迅的启蒙思想以学术论文的语气转述一遍。^[37]有关他对暴力场景的叙述，我的读法着重思考下列问题：谁是叙事者？谁被描述？谁阅读这些描述？

叙事者鲁迅，在这件事中是一个无意间被迫看幻灯的现众，这个身份十分重要。如果要充分了解鲁迅讲述的这个复

杂恐怖的故事,则不仅幻灯画面,而且画面内外的观众,还有无意间加入观看而后来又成为文字记叙者的观众鲁迅,都应该被考虑进去。鲁迅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尝试分析他当时矛盾的心情。1926年,他在怀念日本仙台医学院教授的《藤野先生》一文中重新叙述道:

第二年添教微生物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38]

这一变化就是放弃学医。此段叙述与先前《呐喊》自序很不同,在此鲁迅强调他与日本同学之间的差异,他无法如他们一样拍手叫好,同时,也无法与中国旁观者认同。他既与看客又和被观看者重合(因为都是中国人),但又拒绝与他们任何一者认同。这种重合与拒绝,一再重复出现在他描写暴力场景的短篇小说中,例如《药》、《示众》、《阿Q正传》,以及《野草》中的部分诗作,这些作品描绘了兴致勃勃地看自己同胞被处决的无情群众。小说在上演中国国民性的同时,也将读者牵连进场景中,读者成为另一名旁观暴力的看客。这种读者、

叙事者、暴行旁观者之间的交叠与差异,正可以让我们了解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时的两难处境。

《阿 Q 正传》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遗产的代表。诚如李陀所言:“汉语里原本没有‘阿 Q’这么个词,它是鲁迅先生造出来的,但是,这个词一离开鲁迅的笔下,就在千百万人的口说和书写中被千百万次引用和使用,并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词语和话题——这让人联想起由一颗冰砾的滚动而引起的一场雪崩。”^[39]然而,国民性理论,牢牢箝制住大多数中国读者和批评家。批评家根据鲁迅要改变中国国民性的愿望,称《阿 Q 正传》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并从鲁迅文集中拿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证明阿 Q 的确是国民性的具象。^[40]但很少有人注意,这样的文学批评恰恰巩固了国民性理论,使学者一再重蹈鲁迅当时的文化困境。鲁迅观看幻灯镜头的恶梦在文学批评中重演:批评家一次又一次地充当鲁迅的小说中的国民劣根性的看客。由于鲁迅如此有力地描绘了分裂的主体,所以幻灯镜头以各种不同的暴力形式一再萦绕批评家的心神。

比如,批评家将阿 Q 对体面的重视当作鲁迅有关中国国民性的中心理论,故事中几个最有趣的段落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41]这段描写当然表现了阿 Q 主义的精髓,但同时,它又如何说明了中国国民性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方传教士话语来到之前,“重体面”在文化比较中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更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中国人气质》的第一章即专门讨论“体面”。文中说:“‘爱面子’是了解中国人的许多最重要特质的关键。

对我们而言,失去性命而保留面子并不很吸引人,然而我听说,曾有中国县官被砍头时被允许身着官服保住体面,而视此为特别恩赐的!”斯密思将中国人的重体面归因于戏剧本能:“不需要太大的刺激,任何中国人就能把自己当成戏子。他摆出戏中的身段,鞠躬、屈膝、在地上磕头,在西方人看来,这般举动既多余又可笑。然而中国人的思想是戏剧式的。”^[42]

詹姆士·何维亚讨论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时,对斯密思描述“体面”的文字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斯密思描述这项“中国人的特质”时,以为自己正确地呈现了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他这种态度向来很少受到质疑。其实,关键不在体面是否为一项统筹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原则,而在它在西方仪式化的实行暴力和教训别人中所占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思考,在联军破坏城墙、宝塔和庙宇的过程中,面子所扮演的角色。布朗和斯密思等人的中国见闻录将“爱面子”写成殖民地人民独具的特质,而否认联军的代表们对自身外表的重视,他们的话语因此制造了“体面”说。西方人这样解释中国人的结果(即让他们研究的对象自己对创造体面的假象负责),这就使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人崇信的象征物是迷信,混淆了外表与真实,因此,摧毁其城墙不足为惜。^[43]

不过,传教士讲述的中国人爱面子故事出乎意料地被中国人拿去运用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话语的流传在跨语实践中的情形格外复杂。在斯密思断言中国文化重体面的 30

年之后,阿 Q 几乎一字不改地戏剧化地演出了这一剧本。阿 Q 在被处决之前,被抬上车游街示众。当他省悟自己正赴法场时,他羞愧自己竟没有唱几句戏而搜索枯肠:“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44] 虚荣、可怜、可笑,加上最糟的,夸张和戏剧化,阿 Q 的举手投足似乎吻合斯密思对中国人爱面子的描述。然而,其中有些重要细节出人甚大。首先,鲁迅构思阿 Q 的故事是在他熟稔斯密思的理论之后,因此他的写作可能不单单在证实斯密思所言,而是有他意的。第二,斯密思笔下的县官身着官服,而阿 Q 穿的是一件“洋布的白背心”。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穿着洋布白背心的阿 Q 代表的是中国国民性,还是别的什么?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是否也如白背心一样,是洋布编织出来的?

1926年,也就是《阿 Q 正传》发表五年以后,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斯密思讲体面的一章。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 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45]

鲁迅此处的讽刺有更深的含义。他准确地指出,上层中国人和帝国主义之间存有某种利益交易,他们对“体面”的研究出于其共同利益者多,为合理解释中国种族者少。此外鲁迅在理解中国国民性时已经明显考虑到了阶级因素,由此引发的问题必然是:阿 Q 在这张图景上扮演何种角色?像阿 Q 这样居无定所的赤贫文盲是否能使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失去可信度?鲁迅是否自相矛盾?他对斯密思的态度究竟为何?

韩南(Patrick Hanan)曾研究阿 Q 在文学上的原型,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周作人指出过,鲁迅在《阿 Q 正传》中的反讽技巧系模仿果戈里(Gogol),波兰小说家先珂维茨(Henryk Sienkiewicz),和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韩南据此,进一步去发掘《阿 Q 正传》和鲁迅最欣赏的小说家先珂维茨的两篇故事之间的联系。他发现《阿 Q 正传》和先珂维茨的《胜利者巴泰克》(Bartek the Victor)以及《炭笔素描》(Charcoal Sketches)惊人地相似。在后两篇中,“叙事者以高度的反讽语气描述村中最卑下的角色”。^[46]《胜利者巴泰克》的主角是一个最富自我欺骗天分的波兰农民,可说是阿 Q 讲精神胜利法的先驱。巴泰克在人生的竞赛中是常败军,而左占克(Zolzik),另一个故事的可笑主角,对农民惹巴(Repa)妻子的欲望则预告了阿 Q 荒谬的罗曼史。韩南指出,《阿 Q 正传》和先珂维茨两篇短篇小说之间,尚有更广泛的相似点。例如,有关阿 Q 名字的讨论与《胜利者巴泰克》开头的段落有所呼应,又如,虽然鲁迅的叙述者根据阿 Q 的情况解释了采用“正传”一词的始末,这词的灵感可能是由《炭笔素描》中“正当的传记”(proper biographies)而来。^[47]韩南的发现并不在简单表示鲁迅的故事脱胎于先珂维茨,重点在于:阿 Q 这个角色是跨

国际的、他所包含的阶级因素可能与波兰小说的原型有密切关联。

当然,有关阶级性的诠释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钱杏邨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诠释阿Q的故事。^[48]他们强调,《阿Q正传》的故事并没有刻画中国国民性,而反映了中国下层社会农民历经辛亥革命动乱时期的困苦悲惨。这些批评家坚持,鲁迅谈论中国国民性时,区分了“上等人”和“下等人”两种阶级,^[49]主要证据是鲁迅的《灯下漫笔》。在文中,鲁迅讨论罗素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见解,批评罗素将中国苦力脸上的微笑当作纯粹的中国美德。罗素说:

记得有一天我们坐着轿子翻山,路崎岖陡峭,苦力非常辛苦。在途中最高点,我们停下来十分钟让轿夫休息。他们马上一排坐下,拿出烟管,无忧地相互关怀谈笑起来。若是在习于前瞻的国家,他们大概会利用这段时间抱怨天气炎热,以便取得更高的小费。^[50]

鲁迅讥讽地说:“轿夫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早也不是现在的中国了。”^[51]

马克思主义批评有某些可取之处,它指出了鲁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思考。可是,它往往单纯地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观点视为他早期思想的局限,说鲁迅一直到后期关心阶级问题时才克服此局限。^[52]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因为它将话语斗争,特别是鲁迅的思想,简化为单线演变。鲁迅思想极端复杂,若是我们先设定一个终点而评断鲁迅某时期的历史局限,必然会将其大大简化。如果我们要更深刻地批

评国民性概念,我认为不该简单着眼于鲁迅思想对从西方引进的这一理论的接受或拒绝,而应探讨两者之间的张力,即便是在鲁迅似乎毫无保留地赞同时也不例外。我对《阿 Q 正传》的诠释即探讨这种张力,从分析故事中叙述者的主体出发,探讨它替西方国民性理论制造出来的裂痕。

跨际写作的主体性： 《阿 Q 正传》的叙述者

鲁迅曾不只一次说他写《阿 Q 正传》的目的是描写中华民族的灵魂。例如,他在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53]这句话一再被意图对这篇小说作单一诠释的批评家引用。我认为,另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在《再谈保留》中,鲁迅以第三人称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 Q 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 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54]此话一方面讥讽有人将《阿 Q 正传》当作影射真人真事,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作者、文本、读者的复杂关系和诠释的问题。我感兴趣的,不在于鲁迅的批评对象包不包括他自己,或他自己是否能免于阿 Q 和未庄村民的国民性缺陷。鲁迅曾多次在作品中明确表示批评家跟其他人一样值得批评。例如,他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55]在《狂人日记》中,叙事者也承认说他可能和别人一样犯了吃人

的罪行。

那么,在《再谈保留》中,鲁迅是怎样理解文本与诠释活动的关系呢?我认为这里突出的是《阿Q正传》中叙事人的中介角色。如果谁是阿Q,谁跟阿Q同类(作者还是读者?)等问题不足以指导我们的阅读,问题就变成:叙事中的什么声音使得阿Q和国民性向批判敞开?批判者的意识从哪里来?诠释的中心问题于是成为叙事者的中介角色和他的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这里的情况有点类似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忆在课堂上看幻灯一事。他无意间看见血腥画面和在场景中注视血腥行为的群众,后来在回忆中成为此事件的叙事人。《阿Q正传》的文本、预设读者和叙事人之间也正有如此复杂的关系。

在《阿Q正传》中,鲁迅有意安排读者在故事结尾加入观看“悲剧英雄”阿Q被处决的观众行列。这是鲁迅的一石二鸟之计。他似乎从操纵读者和取笑他笔下的虚构人物中达到同等的效果。这个看似简单的叙述如何达到这种复杂的效果?

我们不妨用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戏拟风格”(parodic stylization)一概念加以了解。巴赫金认为在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或多层次的言语构成中,常见“在同一个句子里,作者同时达成显示自己和显示别人说话的两项过程。”巴赫金以果戈里(鲁迅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为例,指出他作品的叙事观点是假客观叙事文体的最佳范例,即叙事人假装别人的话,或“公众意见”是自己的意见,从而造成“众声喧哗”的效果。^[56]我认为这样分析叙事人的中介性很有启发。就诠释《阿Q正传》而言,叙事人在揭示别人的国民性时即扮演了这样的中介

角色。换言之,叙事人是构成此故事多层意义的关键,这些意义包藏在连结叙事人(戏剧化的作者)、阿 Q、未庄居民和读者的关系结构中。

叙事人和阿 Q 一样,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可是,跟“写实”的农民人物不同的是,叙事人同时存在于两个虚构的文体的世界(或者,用惹内〔Genette〕的话说,两个剧情世界),以全知叙事人的隐身术在两者间来回穿梭。故事的第一章,叙事人以第一人称介绍自己是拟题为《阿 Q 正传》故事的作者。叙事人谈论自己计划写一篇(从读者的观点来看是)已经写好的故事,这就在超剧情层次(extradiegetic level,叙事人从剧情世界以外发言)和剧情世界自身(autodiegetic level,叙事人同时是叙述的对象)中间画了一道界线。^[57]这两个层次在故事进展时很快合而为一,使得我们阅读时要捕捉隐藏在两个层次之间的意义十分困难。然而,这些不同的层次对于我们了解叙事人与他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有绝对的重要性。

第二个虚构世界更容易了解,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一个“好故事”的期待:有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等。简单地说,时间是辛亥革命前后,地点是中国南方一个小村叫未庄,在那儿发生一连串事件,而以阿 Q 丧命作结。这个虚构世界的形式界限是第二章,叙事人停止使用第一人称,而开始用第三人称全知观点发言。但由于第一章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将后来的第三人称叙述框住,它必定影响后来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阿 Q 的故事时,必须全面考虑叙事人消弭后的存在。

第一章中,叙事人,也就是被虚拟化的作者,表现得像一个新旧交替时代中的文人。他数次提到《新青年》,提醒我们

写作时间是五四时期，与故事发生的时间相距将近十年。叙事人显然娴熟于旧派学问，他可以大谈各种传统传记文类的优缺点。同时，他对西学也略有所知。可是，他对新旧学都不满意。例如，他夸张地深究阿 Q 不详的姓名宗谱，这等于在嘲弄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他也运用西文字母，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新文化运动一派人物。关于阿 Q 的姓名，他说：“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 Quei，略作阿 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58]阿 Q 的名字本身就是跨语书写的产品！小说的生成牵涉到四国语言：英语（斯密思）、日语（涩江保等人）、波兰语（先珂维茨）和白话现代汉语。主角阿 Q 即便看不起假洋鬼子，名字却是一个寻常中国名字的英语标音。在上述引文中，叙事人和鲁迅有明显差距。鲁迅本人时常向《新青年》供稿，并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叙事人则若即若离地趋随一个姓赵的国粹派意见。叙事人的文体声音暧昧地游移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制造反讽效果。这个游移的声音，后来导向第三人称叙事，成为我们诠释这篇故事需掌握的关键。

在这里我想提问的不是阿 Q 是否象征国民性，也不是他是否是下层农民的代表，而是：叙事人和阿 Q，以及和未庄居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民族国家身份与此有何关连？即使后来叙事人变成第三人称全知，这些问题仍然重要，因为叙事人的观点明显地限制在未庄的范围内。连阿 Q 因为调戏女人、偷窃和被赵家殴打而被迫离开未庄时，隐身的叙事人也没有离开过未庄。这在一个宣称要为某人作传的作者来说不太寻常，他理应亦步亦趋地跟着传记的主角跑。鲁迅的叙事人

不是普通的作传者，他跳过阿 Q 不在未庄的那段时间，而从阿 Q 回到未庄后的事接下去说。第六章的开头是：“在未庄再看见阿 Q 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 Q 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哪里去了呢？”93 页整章中，叙事人以未庄村民全体的眼睛来观察，虽然他跟村民保留距离，也对村民不无嘲讽，但对阿 Q 去向所知一直不比村民多。例如，当阿 Q 对自己在城里的作为撒谎，叙事人只是冷静地说：“据阿 Q 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页 95）

在其他段落，叙事观点并不总是与村民重合。在这大部分章节里，叙事人无疑地出入阿 Q 的心灵。用心理叙述 (psycho-narration)，内心语言 (thought language) 和自由间接引语 (free indirect style) 建立起现实与阿 Q 的错觉之间的对比。不过，叙事总是围绕在未庄内部阿 Q 和村民的来往上。未庄是否是中国缩影？果真如此，则村民代表中国国民性，如鲁迅在俄文译本序中指出的那样。可是，叙事人呢？他也列身于未庄社会中。要是他完全属于那个社会，他又为何能够同时置身事外，嘲讽阿 Q 的愚蠢以及村民的残忍呢？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书写符号上来。写作使叙事人获得权势，不识字使阿 Q 丧失地位。小说以叙事人讨论历史写作和为阿 Q 的命名开始，以阿 Q 不认字不会书写的惨况作结。最后，阿 Q 不但不会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名画押，而且连圆圈也画不圆。那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枝笔送到阿 Q 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 Q 这时很吃惊，几乎“魂

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 Q 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 Q 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 Q 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111 页）

假如阿 Q 把圈画圆了，看起来会像英文字母 O，离 Q 不远。但既然书写的权力掌握在叙事者手里，阿 Q 画不圆并不奇怪。他只能跪伏在文字面前，在书写符号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巨大象征权威面前颤抖。相对而言，叙事人的文化地位则使他避免作出阿 Q 的某些劣行，并且占有阿 Q 所不能触及的某些主体位置。叙事人处处与阿 Q 相反，使我们省悟到横亘在他们各自代表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鸿沟。叙事人无论批评、宽容或同情阿 Q，前提都是他自己高高在上的作者和知识地位。^[59] 他的知识不限于中国历史或西方文学，而且还包括全知叙事观点所附带的自由出入阿 Q 和未庄村民内心世界的的能力。

《阿 Q 正传》呈现的叙述人的主体位置出人意料地颠覆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那个尤其是斯密思的一网打尽的理论。这并不是说国民性神话不存在于这篇小说里，毕竟斯密思讨论的面子问题是鲁迅与阿 Q 所共同关心的。我想强

调的是,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理由是,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在我看来,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注 释：

※ 本章由作者两篇文章改写而成，一篇为桑梓兰据《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的中译。另一篇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文学史》第一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38—156页）。

[1] 孙玉石的文章《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是少数的几个例外之一。见《鲁迅研究集刊》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86—117页）。

[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和《饮冰室合集·专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3] 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民族主义》等文章，《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81）。

[4] 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2卷6号，465—505页。

[5] “国民性”的意义向国民劣根性滑动，成为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功劳。这一点从反面也可以得到证明。到了1922年，《学衡》派的梅光迪和胡先骕等人又出来提倡国粹时，国民性也是贬义词。有趣的是，它在这里第一次被人用来批判同儒家传统价值相对立的现代社会。见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1922，第2期，1—9页；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同上，1922，第4期，1—10页。

[6] 《国民》杂志，1919，第1期，1页。

[7] Lee, Leo Ou-fan 李欧梵。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页。

[8] 鲁迅第一次用“国民性”一词是在《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213, 221。此文写于1907年，发表在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刊物《河南》第2、3期（1908年2月、3月）。

[9] 见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 李景汉为潘光旦《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所作的序，以及潘光旦自序1—25页、1—9页，都讨论了斯密思著作。

[11] 见 Hayford, Charles. “Chinese and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Arthur Smith and His China Book.” In Susan Barnett and John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5页。

[12] 鲁迅，《马上支日记》（1926，7月2日），《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3.240。这份文学性的日记发表于1926。

- [13] 同上, 245 页。
- [14] 鲁迅,《鲁迅书信集》, 1. 425。
- [15] 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6), 509 页。
- [16] 张梦阳,《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鲁迅研究年刊》2(1980), 208—217, 216—217。张梦阳赞同史密斯对中国国民性的见解, 强调在 80 年代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下, 史密斯的批评很有用。可见不出一个世纪我们已绕回到原点。
- [17] 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珍本书库发现这本 1903 年的翻译, 完全是意外。出版商作新社自称是翻译者, 但未注明是哪些人。
- [18] 斯密思经由潘光旦仍在持续发生影响。沙莲香 1989 年所编的《中国民族性》选入了潘光旦翻译斯密思的部分章节。
- [19] Hayford, p. 173 页。
- [20] 最近的人类学理论已指出现代人类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 参见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21] 这种分类法可上溯到欧洲 18 世纪中叶自然研究的分类学,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林奈(Linnaeus) 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1735)。又, 参见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5—85 页。
- [22] Arthur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 [23] Ibid., 322 页。
- [24] Ibid., 329 页。
- [25] 老舍,《二马》,《老舍文集》, 407 页。
- [26] 参见 Feuerwerker, Albert,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佛尔维克 (Albert Feuerwerker) (P. 57) 警告说, 基督教传教士不应和“与中国强订不平等条约的八强混为一谈。可是, 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轻松地一笔带过是站不住脚的。毕竟, 1842、1844、1858 年的不平等条约都明文规定了传教士的特权。佛氏自己也指出: “治外法权——再小的教堂也能在中国内部升起母国的国旗、干涉诉讼案件、使用武力、沾沾自喜于道德上的优越——使得不仅是反基督教的国粹派, 就连中国基督徒, 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产生反感。”

- [27] James Hevia. "Leaving a Brand i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3 (July 1992): 306 页。
- [28] 过去二三十年来, Michel Foucault, Richard Rorty, Jacques Derrida, Paul de Man 分别增进了我们有关文艺表象(Representation)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了解。
- [29] 老舍在《〈神拳〉后记》里生动地描写了儿时丧父和对“洋鬼子”的恐惧的记忆。
- [30] Cooke, P. vii. 可与斯密思《中国人气质》引用部分作比较。
- [31] Arthur Smith, 11 页。
- [32] 1935 年, 日人大谷孝太郎编译了一册谈中国国民性的集子, 其中收列了前述西方传教士和记者的文章和 19 世纪日本学者的撰述。此集在二次大战和日本侵华前夕出版, 可说是意料中事。此集后来由袁方译写成中文出版, 叫《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 成为新近一本中国国民性论文集的主要资料来源。见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有趣的是, 新文集的编者在“国民性”和“民族性”之间划上等号, 企图抹去前者的贬义。
- [33] 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版, 19 页。
- [34] 鲁迅, 《自序》, 《鲁迅全集》(1), 5 页。
- [35] 见李欧梵, Lee, P. 203n61。
- [36] 见太田进, 《资料·一束》, 《野草》31 (June 1983): 61—62 页。
- [37] 有关学术写作中的间接转述见 Dan. Sperber. *O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48 页。
- [38] 鲁迅, 《藤野先生》, 《鲁迅全集》(2), 275—276 页。
- [39] 李陀, 《雪崩何处》(序), 见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台北: 远流, 1990, 5 页。
- [40] 最常被引用的是鲁迅《呐喊》自序, 以及《鲁迅全集》中下列文章: 《论睁了眼看》(1: 328—332), 《随感录三十八》(1: 387—390), 《两地书》第八号信(9: 25—28), 《忽然想到(一至四)》(3: 10—15), 《这个与那个》(3: 102—109), 《宣传与做戏》(4: 266—267), 《再谈保留》(5: 114—115), 和《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7: 77—82)。
- [41] 《阿 Q 正传》, 《鲁迅全集》(1), 111 页。
- [42] Arthur Smith, 18 页。
- [43] Hevia, 316 页。
- [44] 《阿 Q 正传》。
- [45] 《马上支日记》, 3: 240。“支那”和“支那人”是日本自明治时代至 1945 年最常用

来指称“中国”和“中国人”的名词。

- [46] Hanan, Patrick. "The Technique of Lu Hsün's Fi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4 (1974): 53—96 页。
- [47] Ibid., p. 70.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的《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有一类似的开场白。
- [48] 1928 年太阳社攻击鲁迅,开了马克思主义批评《阿 Q 正传》传统之先河。见钱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及其他论文,钱杏邨(阿英),《现代中国文学作家》,1—53 页。
- [49]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最常引用《鲁迅全集》下列文章:《春末闲谈》(1:304—308),《灯下漫笔》(1:309—316),《学界的三魂》(3:150—152),《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7:632—633),《答〈戏〉周刊编者信》(6:112—116),《说面子》(6:98—100),和《南人与北人》(5:354—355)。有趣的是,鲁迅的“上等人”与“下等人”概念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主要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教育等级来定义。详见我对《阿 Q 正传》的分析。
- [50]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1992; 212 页。
- [51] 《鲁迅全集》,1:316。历来中国作家描写轿夫时的观察角度对鲁迅而言并不陌生,对罗素则可能很费解。以 18 世纪的袁枚诗《舆夫叹》为例,袁枚跟轿夫之间的巨大差距,正能支持鲁迅基于对社会阶级差异的认识,并以此批评罗素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本质概括:

舆夫负重行,上山复下谷。
历尽诸险艰,垂暮方息足。
我意获弛担,自当速睡熟。
谁知重张灯,彻夜作筋搏!
此哄彼复哄,甲逃乙更逐。
所得几何钱,未足供饘粥。
胡乃大鸨张,抛撒如星落?
明朝重竿肩,勇气盛贲育。
至夜又复然,如有鬼捉缚。
母乃象与卢,竟是医劳药?
物性果不齐,熊鱼各有欲。
上智与下愚,不可常理度。

且勿忧人忧，姑且乐吾乐。

身为自由派思想家的罗素不会用轻蔑加体恤的语气谈下层阶级。然而令人玩味地，他使用了国民性话语。

- [52] 这类研究非常多。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发表的谈话“论十大关系”中，对阿 Q 也持相同看法。
- [53]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7)，77 页。
- [54] 《再谈保留》，《鲁迅全集》(5)，114 页。
- [55] 《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362 页。
- [56]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Michael Holquist and Caryl Emers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304, 305.
- [57] 纪德 (André Gide) 小说《伪币制造者》(*Les Faux monnayeurs*) 是这种高度自觉 (self-reflexive) 叙事的有名范例。法国批评家称为 *mise en abyme*，见 Dallenbach, Lucien. *Le Récit spéculaire: essai sur la mise en abyme*. Paris: Seuil, 1977。
- [58] 《阿 Q 正传》，《鲁迅全集》，1—74。以下引文以括弧标示页数。
- [59] 在小说《孔乙己》中，鲁迅探索了上等和下等阶级之间另一种紧张关系。贫穷的孔乙己，是个旧式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叙事者用白话文记述了儿时当伙计时常见的孔乙己，语带反讽。这个故事中的阶级区分，与其说在识字与不识字的差别，不如说在古文与白话文的高下等级。见《鲁迅全集》(1)，20—24 页。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概念,经过近百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即本质化了。提到它,人们自然会想到“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救亡”等与之对立的一些其他概念,这种隐含的二元对立造成我们解读历史的一个死结。因为“个人”和“群体”的二元思维很难对自身的思维逻辑和研究对象提出质疑,同时做出历史分析。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摆脱这个死结?为此,我想提出以下问题:“个人主义”在本世纪初进入汉语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它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

我的论点是,“个人主义”的话语自人中土以来,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稳定的意义。它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内部所扮演的角色极其关键,但同时又十分暧昧。因此这里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汉语的译名“个人主义”对英文 individualism 之本义究竟有多少“偏离”,而在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跨越彼此语境时——即在建构语言之间“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意义是如何给定的?被谁给定的?这个译名与

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现代性的范畴,如民族、社会、国家之间都有哪些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跨语际实践”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怎样的历史想像?它对我们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变和中西理论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哪些新的思路?

本章将以一个跨越东西方不同语言的实践活动为背景来探讨关于个人主义的话语问题,主要着眼于分析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的。我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的这种“操纵”活动,目的也是为了把人们目前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概念批判的重心转移到另外的一个语境中来。在此语境中,词语的意义不是由欧洲传统哲学规定的(虽说欧洲传统哲学是这些概念的发源地),而是在不同文化场合中“游走”(travel),并在历史的发展起落中得到重新创造。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是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今天,若是不充分考虑到不同语言之间发生的历史性交换活动的复杂性,就无法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我希望能够从这一角度进一步探索下去,并以此参与当代理论界有关主体、差异、文化以及民族等问题的争论。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怎样描述和概括某一语言中的词汇、范畴或话语“游走”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19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经常用诸如“扩展”、“启蒙”、“进步”、“合目的性”等等字眼来

描述欧洲的观念和理论向世界其他地域的游动。然而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立场来看,这类的“游走”远不是那么纯洁无辜,通常都有几分可疑之处。由于各人的视野不同,所选择的理论角度有异,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可谓大相径庭。

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世界,本文,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一书中提出所谓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说,正是为了探讨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空中游动的问题。他也是在这个观点上与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分道扬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作为对文学生产进行批评的模式,强调的是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而赛义德所引进的另一种文学实践观念强调的则是在国际环境中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影响,创造性借用和挪用范畴,以及观念和理论从一处向另一处的传送。赛义德列举了理论和观念之旅行的四个阶段性的形态:

首先有个起点,或看上去像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或标志某个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其次,有一段距离,一段旅程,一段概念从此至彼地移动时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那里的各种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之为接受条件,也可称为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人可以引进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第四,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过来的(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

及它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1]

赛义德在陈述了他的总体思路之后,接着考察了三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戈德曼(Lucien Goldman)、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思想发展轨迹,力求根据每个人物的历史环境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最后添上福柯作了收束。不过出于某种原因,萨义德对这些批评家的讨论并没有越出一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即理论永远是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一种反应。^[2]他的理论中有关理论之旅行的内容不知怎么在他具体的讨论中被弃置一旁了。萨义德的理论之旅行说何以被如此轻易地一笔带过,没能展示它原本旨在发挥的内容?在试着解释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也许是旅行这个概念本身缺少完善它自身所必需的思想力度。确实,谁在旅行?理论真的旅行吗?如果是,怎样旅行?若是暂且承认理论具有旅行者的主体性质,接踵而来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什么是理论旅行所借助的交通工具?飞机、汽车、人力车、火车、军舰、航天飞机?詹姆斯·克里福特(James Clifford)评论萨义德在这方面的疏忽说,“在他笔下,卢卡契一路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乘移民船旅行的,现在的理论则乘飞机,时而还要订往返票。”^[3]不过我还想就这个批评再向前走一步,因为理论旅行的说法不仅通过赋予理论以充分的主体能动性而强调了理论(在他笔下也就是西方理论)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完全忽略了翻译活动这个为理论旅行所必须依赖的交通工具本身。由于隐去了翻译这个重要媒体,理论的旅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观念,以至于理论向哪儿旅行(从西方向东方旅行或相反),为什么旅行(出于文化交流,帝国主义

扩张,抑或殖民化),以及用什么语言翻译,翻译给哪些读者看,都似乎毫无不同。^[4]

语言之间的交易总是民族和国际斗争的一个交锋场所。萨义德在构想他的理论旅行说时,对这个事实的忽视不免有些奇怪,这个奇怪的疏忽甚至导致了一种对理论(西方理论)的很流行的看法,打个比方,就好像理论是欧洲流浪汉小说中远走异乡的主人公,沿途遭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最终不外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适应了异乡的生活。这种看法对我来说非常成问题,因为它把理论特权化,同时抹煞了翻译的作用,或把翻译轻描淡写成一个必要而不重要的媒介物。尽管人们早已知道,许多语言交换活动的发起人恰恰是把外语翻译到本国来的人,他们发起这种交换活动的形式是借取、选择、合并和重组别一语言里的字眼、范畴及话语,将它们重新创造成本国语言。人们也知道,从别一语言拿来的理论的意义(即用法)必须是由译者和读者共同决定的。但直到不久前,翻译似乎还算不上一个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甚至也不是什么值得后殖民主义学者去研究的有意义的历史实践。

Tejaswini Niranjana 的著作《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以及殖民主义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也许称得上是力求把翻译问题置回殖民主义历史中心的仅有的几个尝试之一。写到殖民地印度的经验时,作者将翻译称为殖民者“东方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或是英国用来掌握处于东印度公司商人统驭下的人们的各种情况的一个渠道。^[5]在指出翻译是实行殖民控制的重要场所方面,作者是批判最为犀利的一个。然而,她对这些语言交换活动的讨论以及她本人的研究(书中的三

个章节分别写的是保罗·德曼、本雅明和德里达)都侧重选择了那些以欧洲语言作为翻译所使用之语言的案例。于是这本书就略去了一半故事没有讲:当欧洲语言翻译成非欧洲语言时情形又如何?东西方之间的权利关系会不会因此在这种翻译中被重新缔造?倘若如此,又是怎样缔造的?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应该尽力注意避免的是以新的二项对立取代老的二项对立,不论这些对立是取“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说法,还是表现为一种更讲究的形式,即宰制与对抗的话语。理论/现实之分野重新引进了以往理论/实践的二项对立,因此非但没有卸去其中的历史积淀,反而加重了这份积淀带给人的负荷。^[6]对于研究上述课题更有意义的也许是去探讨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历史性关系,而不是问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沾不沾边。至于在当代后殖民主义学术中相当流行的“宰制与对抗”的说法,尽管它的关注点远比理论/现实的二项对立要有意思,但仍然会带来另一方面的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宰制与对抗”说令我难以接受的一点在于,它易于把环绕东西方权利关系的复杂问题简单化成“西方主导”对“本土抵抗”这样一个模式。^[7]把抵抗与主导的模式实体化到东/西分野上来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东西两者之间经常是界限混淆,互相渗透,依条件的变化而修改关系的。因此在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我的理论出发点是:非欧洲语言并不自然而然构成对欧洲语言的抵抗基础。值得重视的倒是非欧洲语言作为一个权利关系实践场所存在的意义,在这片场地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主导与抵抗的复杂过程,以及本土语言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

我提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概念是为了

将我对中国与西方在本世纪初的历史性交往的研究落实在语言实践的领域里。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采纳、盗用,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众所周知,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造就了当时的整整一代知识人。在文学上,早在鲁迅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1918年发表前若干年,林纾已因用古文译写了百部以上的外国作品而名盛文坛。^[8]然而我必须赶紧补充一点,即我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与撞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我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生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的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利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9]

一旦我们开始问的“self”的中文同义词是什么，一个常见的假设就已经被当成了前提，即我们永远可以在不同语言中找到意义等同的词语。现有的双语字典不就是个绝好的例子么？常常还有人讲，中国哲学传统中不是自很早起就存在“自我”(self)的概念了吗？比如孔子不就讲“己”的概念？如此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它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英文中的 self 和中文里的“己”等同的等同关系只是在近世的翻译过程中才确立的，而后来翻译时选择的词义又是现代中英字典给定的。^[10]因此，这两个词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历史机缘的产物，其意义依跨语际实践的特定因素而定。这类关系一旦建立，文本就变成“可译的”。然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在两种语言间进行比较研究，能否以超越翻译历史的、绝对的范畴(如“self = 己”)作为理论基础？在此我要举杜维明有关儒学的英文著作作为例子，因为美国那些致力于阐述新儒学的“己”与西方的“self”之间关系的理论家中，杜维明可谓举足轻重。杜维明关于“己”的人道主义概念有一种先人的假定，就是认为“己”这个概念与英文中的“self”完全可以对应，不必过多考虑现代翻译的历史对词义的影响。在《人性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儒家思想：作为创造性转化力的自我》等著作中，他提出了有些自我循环的观点：儒家的“己”现不同于西方的自我观(儒家的“己”较西方的 self 更优越)，但“己”仍然还是一种“自我”观。^[11]换句话说，只有在本体层面才有区别可讲，而在涉及语际交换活动的概念构成层面上，差异则可以略去不计。在“己”与 self 之间假想的等一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人为地要抹去两个词各自的发展渊源以及 self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历史。杜维明的著作旁

征博引,资料丰富。但由于完全肯定翻译的透明性,他的比较研究仍不免隔靴搔痒,回避了对范畴构成本身的深入分析。

为了不受英汉辞典的限制来讨论不同语种之间的同义关系问题,我们应至少走出字典的范围,引进词语以及有关的概念、范畴、话语的发展变化史。就是说,承认英文中的 self 可以翻成自我,我、己是一回事,而承认这些翻译创造了一个有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是另一回事。现代汉语言中的“自我”很可能是由日本传入的一个旧词新用法——明治时期的日本曾大量使用汉字翻译欧洲语中的概念,它的新词义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12] self 的其他译法源自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理学,尽管在意思上有重大变动。从更复杂的角度看,现代汉语对西语中的 individual 还有一组译词,如个人、个位、个体。这组词时常与自我等词交换使用。^[13]可以说,自我、我、个人、个位、个体、己等概念间的混杂不仅延续了英语里 self 与 individual 间的意义间的滑动,而且反映了跨语际实践及其政治运作在中国环境里的复杂情景。

的确,自我、我、个人、个体、己等范畴对我们敞开了部分中国现代史的丰富收藏。^[14]怎样解释和理解这部分历史遗产?除去通常所说的西化、反传统主义,以及反偶像崇拜之外,这套话语还揭示着什么?能否将它视为中国现代性背景中的一个尚待解决的理论疑点,而不是作为既成事实或超时间的主题?

在新文化运动高峰期,由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主办的期刊《新潮》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陈家菡的议论文,题为《新》。这篇文章的一系列的形容词展示了一种典型的现代修辞方式:“‘旧’是‘众数’的,‘新’是‘单数’的。……旧的‘众’众到

无限,新的‘单’单到无偶。”^[15]为什么呢?作者以家族关系作核心比喻,用了一连串排比句来阐释他的新旧观:“夫妻两个,在一时间,只能产生出儿子一个。倒转来说,这个儿子虽由父母二人产出,他的父母又有父母,由此一级一级推上,那些父母多至无限……但儿子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这‘新’也只有一个”(同上)。文中的亲子关系与孝悌毫不相干,倒是为了说明“旧”的概念,就像“老-辈”人一样,注定要由“新”观念和新人取代。而“新”在文中是一个单数的,独特无双的,现代的,因而也是更优越的观念。

新与旧的修辞法在新文化运动中奠定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观,而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又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观互相交迭:“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这两个对立观的交迭显示了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历史体验与西方体验的不同。如同西方一样,中国人的现代体验的确产生了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古今之争)的观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当欧洲各国以进步的名义扩张各自的版图时,中国却是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受害者,并不得不在这临暴的体验中接受“现代性”(“西方现代文明”)。^[16]不难看到,这种军事和经济上的暴力在上述短文的作者那里,被内化到语言中:他笔下的新及独特的概念是用印欧语系中的语法词来隐喻的:“新”相对于“旧”如同单数(*the singular*)相对于众数(*the plural*)。这样的语法数词在汉语中根本没有。根据这段论述使用印欧语法数词的方式,我们可以对整篇短文的意图作这样一个寓言式的读解:作者赋予现代、西方以及个人等概念以同等的价值,由单数的“子”来象征;而传统、中国以及家庭等等反价值,由“老-辈”来象征。此类修

辞法通用于“五四”时代大多数关于自我、民族及现代性的激进话语,强化了它们的煽动力。

由于现代自我观及其语法最初就是在一个各种意义交锋的历史中形成的,并与民族性的观念同源而生,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把“自我”想像成某种自成一体的、个人独有的内心场地。我这样讲倒不是出于本体层面或心理层面的理由(如拉康的理论),也不是由于解构主义语言学已经否认了主体的一元性,也不是想重振中国大一统文化观。真正的理由是中国和中国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卷入的那段特殊的历史经历。换言之,中国与西方的暴烈撞击将民族观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嵌进了民族意识。但现代自我观却不能简约为民族身份。相反,两者之间长久存在着互斥、争斗以及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张力。正是这种互斥与互渗表达了作为一段历史体验的中国现代性。

“个人主义”本是用来帮助解决现代的自我观和民族观的冲突的概念之一。但我下面马上要阐明,它实际上反倒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像许多其他新创的词语一样,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是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理论意义上的 individualism 的。在19、20世纪之交介绍到中国来后,这个词很快变成了现代中国有关自我的话语领域的特定标志。为了理清个人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我想先比较一下在个人主义及其中国化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看法。1916年载于《东方杂志》上一篇题为《个位主义》的文章可以代表第一种看法。文章的作者家义写道:“我国人惟不知个人本位主义。故其于社会也,惟现一片笼统。只见有家族,有地方,有国家,有其他社会,而不见有个

人。”^[17]另一种看法正巧相反。1921年罗素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一书中提出,“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死亡了,但在中国却存活着,不论这存活的结果是好还是坏”。^[18]尽管个人主义对两位作者意味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但他们却同时又对各自民族的现状抱有同样深刻的危机感。令家义感到危机的是中国的日益贫困化,而令罗素感到危机的是战后的欧洲局势。他们因而对于东方文明也都怀有同样重大的期望(尽管两者的期望似乎都受到西方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的规定)。对我来讲重要的是,两位作者的不同观点是有重要的方法论内涵的。这种不同揭示出,任何寻找某种本质主义的、固定的“个人”及“个人主义”意义的努力都是徒然的。真正有意义的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围绕“个人”、“自我”、“个人主义”等一些范畴展开的那些话语性实践,以及这些实践中的政治运作。

不过要明确这点又谈何容易。现在有许多研究新文化运动及中国思想启蒙的历史专著都把个人主义当作具有给定的价值和意义的概念来使用。比如李泽厚和维拉·施沃尔兹就认为,把新文化运动引向一个时代谬误,并因此使以个人主义为内在要素的启蒙运动遭受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首先是“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19]两位学者似乎都把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叙事当作一个固定的、毋庸置疑的意义所在,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中国启蒙的程度及成败的根据,而不是把中国启蒙当做一个可以产生它自身意义及解释术语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其结果,他们只是根据一套权威性的典则来读解历史,却忽略了在历史进程中意义与意义间的微妙差别,事件与事件间复杂错综的关联,以及偶然性。^[20]

近来,在致力于重新反思历史的许多学者中有一种普遍倾向,即将“五四”时代的个人观冠诸“伪”字,理由是这种个人观与源自西方的个人观不相符。根据这种观点,李泽厚称新文化先驱是个人自由思想的传播者,从根本上就没弄对。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心目中最高的价值标准是社会、民族、人民及国家,而不是个人。^[21]我同意这种论述的半个看法,即“五四”式的个人观总是与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但我很难赞同说“正宗”的西方个人观就与外在的国家社会毫无关联,更不认为中国的个人观是对西方观念的一个歪曲。安东尼·J·卡萨尔第(Anthony J. Cascardi)在《现代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Modernity*)一书中曾指出,西方启蒙时期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现代性理论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之一,“现代的文化是分解了的整体,只有抽象的主体,或其政治上的类同物,独立的国家,才能将其整合为一。实际上可以说,正因为能够给分解了的现代性的主体提供整合的途径,国家才获得自身的权能和范围”。^[22]卡萨尔第在书中对霍布斯、黑格尔、海德格尔、韦伯等人的政治理论所做的分析很有启发性,说明我们除非执意去信奉某种西方神话,不然就很难对个人做出本质性的、非历史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批评中国的个人观不够正宗本身就复制了“中国群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简单化的说法,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个人观或个人主义会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这个前提性的历史问题。

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学《文化偏至论》(1907)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解释,至少他的解释是把个人和个人主义的问题放在晚清改革的历史环境中来看的。“个人一语,在中国未三四

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垢，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23] 为了保留个人和个人主义的原始意义，鲁迅引鉴了欧洲 18 和 19 世纪以来不同的知识传统。卢梭，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叔本华及易卜生在鲁迅的叙述中代表了个人的尊严之声，同时这些思想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和差异却被多少忽视了。以这种方式处理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思想家无疑是极其简单化的，但对这种简单化需作某种历史的解释。在《文化偏至论》及《摩罗诗力说》(1907)和其他文章中，鲁迅是在操纵“个人主义 = 真西方”这一语式来批评那些崇尚财富和军事强权的政治体制。这使他能够利用知识权威的本身(即西方知识)向把持知识权威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个性主义成了他对付自己周遭所见的猖獗蔓延的物质主义的一副解毒剂。比如他指出，有些热衷权利名誉及财富的中国人一直藉进步之名歪曲地表现西方文明。他认为真正的西方精神潜在于它 19 世纪物质繁荣的表象之下，其精华乃是法国大革命所推出的那些高尚的思想如社会平等、自由以及个人的政治权利等等。为了获得这样一种精神，必须“非物质，尊个人”(同上，185 页)。这是一种有意思的个人观，它不仅提早若干年预见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且为研究个人主义话语，特别是研究其后来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本环境。

确实，意义的历史偶然性要求我们把个人这个范畴作为历史的范畴来研究，而不是把它当做某种超越的优越的价值水准。因此本文要做的不是从一个地域化了的、有关发展进步的叙事出发评价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试图把个人主义的宣言，比如中国“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口号，置回它所处

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中,使它成为批评考察的对象。我的论点是,个人主义的话语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与民国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之间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像当时流行的其他话语一样,它以自身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权利重组的重要进程。这种参与方式不能冠之以任何简单的结论(如真/伪个人主义的结论)。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对立话语,启蒙运动也并非民族救亡的反面。这两种话语中间的张力产生于各自历史性内涵的不稳定性,同时也源于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盘结。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本节的中心是考察民国早期最引人注目的几场关于个人主义的论争。这些论争出现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以及《新潮》等几个刊物上。我集中考察的是从1915年到20年代上半期的这段时间。如我们所知,这段时间虽短,却十分重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都在此刻出现。我选择这些刊物作为考察,依据不仅是由于这些杂志保留了较好的原始性资料,而且也是为了避免把个人主义作为意义自明的关键词(keywords)来对待。^[24]我的讨论对象不只是文章内容,更主要的是杂志文体及修辞方面的实践。我希望借此把自己对跨语际实践的探讨与一般所说的思想(观念)史研究区分开来。无疑,把个人及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带进公众意识领域的不仅是上述几家杂志,但这些杂志上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最有力的几种呼声。我力图通过对其修辞方式的解

析,阐明个人主义话语在早期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一开始便是一个讨论政治、国家经济、外交政策、教育及其他公众生活主题的论坛。1911年杜亚泉接任杂志主编后,实行了一次从栏日到内容的大改革,有关自我、性别及心理等方面的论题开始占据更多的篇幅。在《东方杂志》问世前,个人主义的问题曾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构想的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25]但杜亚泉发表于《东方杂志》1914年6月号的一篇题为《个人之改革》的文章却是以杂志文体呼吁新生的共和国注意人之改造问题的初试之作。^[26]他在文中指出,过去几十年里进行的数种社会改革仅仅关涉在宏观层次的政治体系,教育制度及商业经济方面,而没能对个人或个性的改造给予适当的注意(个人及个性的改造是对梁启超“新民”概念的一个微妙改动——笔者)。其结果,即便新共和国取代了旧帝制,原有的官僚体系和官僚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不仅旧官僚们依然一如既往地做头办,而且改革者也已同化成了打着共和国旗号的新官僚。“……回顾吾侪之自身,则所持之以改革社会者,亦仅此茫无世纪之希望与志愿也。吾侪之身体,则孱弱而不能自强也。吾侪之精神,则委顿而勿能自振也。吾侪之思想,则剽窃而浮泛,吾侪之经验,则凌乱而暧昧”。^[27]因此,他强调,真正的改革必须由个人始,其中包括那些自诩的新人物。有意思的是,杜亚泉重视个人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他全盘接受了启蒙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观念。相反,他提出的恰恰是启蒙主义所无视的个人的局限性。

这时期的个人主义观念并不包容几年后新文化运动里涌现的意识形态及情感内涵。对杜亚泉而言,个人主义的意义是模糊的,需要重新界定。“吾侪非个人主义者,”他说,“但吾侪之社会主义当以个人主义发明之。孔子所谓学者为己,孟子所谓独善其身,亦此义也”(同上,3页)。而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对于他又是完全兼容的,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最有启示的一种用法。这里有两个关键性要点:首先,杜亚泉的修辞法对个人主义的观念做了一个语义上的重构,可以读做对梁启超的民族国家理论及个人观的一个矫正。梁启超在《新民说》和《自由书》两文中曾提出国家对个人的绝对优先权,在他那里,国家和个人在概念上的对立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这两个目的之间的冲突。^[28]与此相反,杜亚泉这篇文章所做的是将两者重新整合起来。其次,杜的个人主义在这个历史瞬间尚未被激进化,它既非儒家思想的死敌,又非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与儒学相对立的个人主义观念则出现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并延续到“五四”时期,成为声讨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性力量。而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观出现于20年代中后期,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蒙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面色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头(这两点我稍后再详细讨论)。然而根据杜亚泉的看法,个人主义不过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改造。同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也相去不远,它预言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应享有自己的权利。杜亚泉对儒家思想、社会主义及个人主义的这一独特阐述有助我们了解,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改革已经有了新的中心命题。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他对这些个人主义观念的理解是真是伪,因为从知识的产生条件和

生产机制看,人们对某一观念的理解和误读总是参与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创造。正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称某文为某文的误读,或把这种误读看成一种通常的理解性错误,无异于“无视历史和具体事件发生的环境”。^[29]更令人感兴趣的倒是作者为什么运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些观念,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新的意义。

《个人之改革》可以说是民国成立后首先把个人的概念引入公共讨论的杂志体文章之一。但杜亚泉所作的仍不外是把个人改造作为社会改革首当其冲的出发点,这使他与梁启超又很相近。不过在发表于1916年第1期的一篇署名民质的文章中,“我”即个人开始显示了某种绝对的价值。作者以一种敏锐的现代历史感倡导人的自立性,虽说这种历史感是由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来表述的。^[30]民质的理论出发点是古代世界的倾塌。他指出,当国家处于一个四分五裂,饱受贫穷、动荡和灾变侵袭的关头,个人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旧帝制下,人可以在理解民间疾苦并将其传达给皇帝的愿望中得到安慰,而如今,人则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人所能做的乃是回到人的自我中去寻求力量。于是,依靠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人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的必要方式。为了论证他关于自我是生存的理由的说法,民质划分了“私我”和“公我”两个范畴,并用一个人所熟知的隐喻来阐明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对自我利益的追寻可以像烛光照明一样惠及他人。公我和私我是互相关联,互为表里,互相增进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公我是一种不断争取实现个人权利的道德使命感。但是,当他断言公我需“自张其权利,与障我者战”,投身生存“竞争”时,这个“公我”看上去是更近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

惠及他人的“无尽灯”了。^[31]

接下来一期的《东方杂志》(1916年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个位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前面所提的家义。他在文中明确提倡一种西方启蒙式的个人观,并认为个人主义是治疗中国痼疾的特效药。^[32]他提出,中国软弱的根源在于中国思想的笼统性,而现代世界是容不得笼统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需按照科学法则分类、分解和分析。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主宰性范畴是“分”：“今日之世界,何谓文明?曰科学之分科,曰社会之分业,曰个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独立。重伦理论,重界线,重分化,重独立自主”(同上,第7页)。不仅如此,他认为个人主义本身乃是随着现代知识学科的建立而出现的,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及伦理学等。这些现代学科在他看来本是为个人的发展和自我的实现而设计的(同上,8页)。这里,现代的个人被写成一个与社会群体对立的形象,理想的国家、社会、社群与家庭应该为个人的成长提供条件,而不是阻碍个人的意愿。这种以个人发展衡量国家及群体之价值和功用的修辞方式很快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释放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但这篇文字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作者在把以“分”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奉为中国的救世良方时,自始至终对他自己的笼统意识毫无觉察。

1917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个人与国家之界说》,具体讨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33]他认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小心划分一条界线,以便双方都不致侵害对方的利益。我们在家义文章中看到的那种修辞方式如今在杜亚泉笔下以一种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形式得到重现。“论者每谓国家为整体,个人为分子,分子当消纳于全

体之中,个人当从属于国家之内”,但“个人虽为国家分子,其个人地位依然存在,未尝消减”。^[34]作者接下来批评了个人对国家的屈从。事实上,这篇文字里始终回荡着一种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于是强调必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分界。不然,国家的作用就会是“牺牲多数个人,以殉主持国事之少数人之意旨”(同上,4页)。在一段比较平和的文字中,他又提出,国家的大厦是以个人为基石建立的,若是没有国家对个人的尊重,也就没有个人对国家的支持。杜亚泉的文章令我感觉最有深意的地方是,所有这些隐喻和辩证式的叙述都呈现了一点,即,现代性所做的事情之一乃是在平常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毫无中介可言的关系。文章作者可以从维护个人的角度批评国家的绝对权威,但他的批评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这种个人/国家的概念性黏结。他对个人与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本身就是对这种概念黏结的一次再生产。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正如周策纵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指出的那样,旧伦理的解体或许多多少少把个人从家庭与宗族的纽带中分离了出来,但同时也为国家、党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清扫了道路。^[35]对此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话语所做的可能远不止把个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交给国家:它导生了一个为实现解放和民族革命而创造个人的工程。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个人主义话语在表面上与民族国家势不两立,它与民族主义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个人与民族国家的黏结关系,作为现代性的一

个话语构成物,总是会寻求某种自圆其说的方式平复它带来的冲突。这解释了为什么对民族国家凌驾个人意志的批判本身会如此轻易地被批判的对象所利用。

高一涵 1915 年发表于《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从一种类似的角度批判了民族国家思想。与杜亚泉不同的是,他同时还提到由个人构成的群体——“人民”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对国家的潜在挑战者。像当时许多报刊文章一样,这篇文字旁征博引了许多西方哲学和政治学著作,有的引文出自日本学者的翻译。由于作者的批评用语借自西方启蒙理论,他始终不曾注意“人民”与“个人”一样,也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物。不过我觉得他论点中很特别的一点倒不是“人民”这个概念,而是他对个人 individual 一词的译法——“小己”。“小己”采自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语汇,不似个人那样中性。有“小己”意味着有“大己”,“大己”属于对某种公家身份的称谓,偶尔也用来称谓某种社会身份。^[36]作者借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来阐明小己和国家的关系道:“小己之发达为国家薪求之一部,若小己而不发达,则国家断无能自发达之道。”(同上,7页)这一论点与我们前面考察过的有些论点是相呼应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意义和范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转移。对个人范畴的思考被“小”与其潜在的高量级对应词“大”引入一个形而上的领域,其中词语的等级关系可以造成语义的替换、类同和取代。也就是说,“小”并不仅是“大”的对立而,而且是“大”的等级中的一阶,是两者之间较次要的一个。由于当时的《新青年》是这种“小己”/“大己”的现代概念的一个主要传播者,“小”与“大”这一语言机制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个人与国家概念的形成过程有多重启示。^[37]

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

随着《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个人主义的话语开始转向一个新的方向。李亦氏在《人生惟一之目的》中谴责传统中国哲学以个人幸福和个人利益作为礼法和社会道德的牺牲品。相比之下,他激赏盎格鲁萨克逊人所表现的个人美德,并崇尚他认为最终带来了权利和财富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这无疑与杜亚泉那种通过儒家思想来诠释个人主义的看法相去天壤。这篇早在1915年就出现于《新青年》上的文章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广为流行的一种两极对立观:个人主义对儒家思想——前者是西方特有的文化标志,而后者是中国传统的代称。对作者而言,儒学鼓励的是一种奴性心态,因为它把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依赖仪式化。儒家教化使子妇们“依草附木,附于奴隶牛马不能独立之惨境,尚有何向上发展之可言。”在他看来,“向上发展”首先须明确一个前提,即“‘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38]接着,他引用西方19世纪有关科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来阐明他的自我扩展说。虽然他这一说法的基础和所引证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这里表现的个人主义不仅与民族主义(盎格鲁萨克逊)完全一致,甚至还预制、培养了种族主义。这样说并不仅仅是为了批评作者缺乏

深度,当然与高一涵的文章比,这篇文章确实有失浮浅。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的话语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这篇文章标志了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经历的又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与前几次相比,这次转变的结果是新的话语权利形态的产生。

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两者共同的反传统倾向才能够得到解释。1916年,李大钊在发表于《晨钟》的《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提出,只有那些敢于以新思想向传统挑战,敢于高扬自我的权利并致力于唤醒自我意识的思想者,才能承担创造新文化的任务。^[39]同样,胡适在他两篇倡导文学改良主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呼唤以能够表现个人真性的形式来取代以古典书写为主的文体范式。^[40]周作人那篇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也提出,现代文学的主导原则应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他看来是重主观的个人主义。^[41]中国古典文学没能追随这种人道主义目标,因此必须被抛弃。实际上,从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讲,我们可以说,这场运动成功地把中国传统及其经典构造成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面,而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对立面民族国家反倒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成为个人主义话语的一个合法部分。

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讨论远远不限于理论上的论争,它也是文学形式问题的中心。“五四”时期在小说文体上发生的大事之一是中国作家开始翻译并借鉴欧洲小说的文体特点,如心理分析描写、自由间接文体、长篇内心独白等。这一风格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还有待于通过对具体文本的

精读和分析比较才能充分阐述。这里我仅想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新的文体风格使小说家把自己的主人公放到一个新的象征性语境中；主人公们不再是父系宗族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也不再像许多中国旧小说的主人公那样，生存在一个与超越性的、非现世的框架互动的文本中。相反，主人公成了拥有心理和道德“真理”的意义载体，成了读者可以在其中寻找这种真理的场所。毫不奇怪，“五四”时期也是一个“西方”式的第一人称及自传体叙事大量涌现的时代。^[42]正是在个人与传统构成对立的两极的一瞬，现代自传性的叙述主体——一个自我意识强烈、公开叛离传统社会，具有一个通过叙事来表达的内心世界的主体——进入了中国文学。^[43]对于现代作家而言，这个个人的自我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张的，因为这一自我可以使作者创造一种对秩序内的身份具有杀伤力的对话性语言。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做的事情。但同时，这个自我的范畴又十分不稳定，因为个人常常发现自己最终在社会秩序的迅速崩溃中失去了归属。因此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便发生了某种呼应。个人在此体现了现代意识的两难处境。

然而，我这里不是要论证个人主义和主体领域的扩张代表“五四”文学的总体特征。本文只是想指出，个人主义话语的出现使“五四”知识分子有可能开辟一个新的论战前沿来替现代意识正名。在这个空间，个人主义似乎不必与社会和民族相冲突，虽说中国传统遭受到全面攻击，民族主义及社会群体性却又没有因此而被放弃。相反，像个人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和“群”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中也占有自己针插不进的地盘。我们只消提到比如郁达夫的《沉沦》就会清楚

这一点：在《沉沦》里，现代意识的危机既是自我的体验，同时又是人性的和民族的体验。胡适于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不朽》提供了“五四”时期关于个人、民族、国家观念的又一个证据。胡适在此文中将每个人称为“小我”，将“小我”们社会性的聚集和增生称为“大我”。^[44]相比之下，“小我”是短暂的、速朽的、不完整的，而“大我”则是不朽的、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胡适的“小我”“大我”之分显然近似于高一涵提出的“小己”“大己”之别。不过，在“五四”时代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民族国家不再被视为个人的对立面。因而“大我”在胡适这里指的是有机的现代社会，在这种有机社会中，个人必须依据民族国家来定位。然而，应当在此指出的是，胡适将“小我”置于“大我”的利益之下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一个新文化倡导者背离了个人主义和启蒙事业。我认为，他的观点实际上倒是对现代性理论的符合逻辑的引申。现代性的理论并不旨在解放个人，而在于把个人组合成民族国家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成员。

果然，《新潮》创刊号(1919)的第一篇文章就把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提了出来。文章作者傅斯年一上来便宣布了西方科学和人文知识对于几大中国知识传统——儒、道、佛——的优越性，因为这三者没有一个体现人类生活的真理。照他看来，人应到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中去寻求真理，因为现代科学知识是以主体为中心，并具有人道主义的关怀的。最后，傅斯年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下了他最心爱的口号：“为公众的福利发展个人(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45]他在注释里解释说古老的汉语文字抵触并损害他的现代思想，所以不得不使用

英文。这听上去就像是对“五四”以后所发生的语言改革的一个漫画式的表达。但傅斯年最终是否也会发现,无条件地发展个人到头来有损于民族的公共福利?这一点实际上正是左翼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所提出并要解决的问题。

傅斯年的自由派加入道主义的理念,很快就被一种左翼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个人主义遭到了深刻质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也被强化了。1921年,《新潮》发表了王星拱的《物和我》一文,力图向个人的自主性发出挑战。作者在文中反对使用“物理之我”与“精神之我”的概念,并提出,我们称之为个人独立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若有一人……假使他20岁的‘我’和他40岁的‘我’有一天在街上相遇,他俩必定不能认识自己,即令旁人也必定不认识他俩本是一个人。一个‘我’,在不同时候,竟直不能被人认识是同一的,还能说是永久存在的吗?”^[46]他的结论是,自我只是经验的一种形式,因时因事而变换不定,其意义纯然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因此,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常常会弄得本末倒置。有趣的是,作者将儒家思想视为导致这种本末倒置的替罪羊。他认为,儒家学说所提倡的自我修养就是要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个人完善上,并旨在通过个人的完善实现社会的完善,而这乃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在他看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关键,因而在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之间,前者有着绝对的重要性。究竟儒家思想或社会主义思想,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的问题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我所考察的乃是文章中的辩论的方式以及对理论的法。在“五四”反传统思潮的背景下,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个人主义等于加罪于个人主义,将

它变成一个负面观念。至此,个人主义和儒家观念之间的交道已经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人弯:我们记得,杜亚泉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他曾经以儒家思想作为个人主义的开脱者。

陈独秀对个人主义的批评走得更远。在《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的一篇随感中,他攻击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概念。陈独秀没有像王星拱那样把个人主义读做消极的儒家思想,而是读出了其中的道家根源。他认为在中国阻碍文化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势力可以追溯到老庄的虚无主义和无为思想。^[47]无疑,这个指责是毫无历史根据的。但我要做的不是替道家哲学辩护,而是指出在1920—1921年间个人主义话语内容的变化。“五四”时期的理论家们将个人主义与某种传统中国文化挂钩,儒家也好(如王星拱)道家也好(如陈独秀),实际上是一种命名。这一回,个人主义被命名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对头。显然,问题的关键已经不仅是个人主义话语受到了压抑,而在于个人主义话语得到了创造或重造,以便在新的历史语境里服务了新的政治目标。

最早将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评的较有分量的文章之一是邓飞黄的《个人主义的由来及其影响》,发表于1922年的《东方杂志》上。^{48]}在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作者追溯了个人主义随着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而发展的过程。他在结论中说,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了,应该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这种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中,似乎具有了陈独秀文章中所缺乏的对个人主义的历史性的尊重。但是,由于知识与权力之间互相不

可分割的联系,某种话语的历史角色不仅取决于其概念,也取决于概念的行为。在20年代早期的民族国家政治背景上,马克思主义加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作用,是开创了某种新的政治舞台,共产党、国民党、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将是这一舞台上新的政治角色,并以各自的方式参与日见激烈的本土斗争。^[49]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批评的结果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修辞方式的产生,这种修辞可以用来发挥左翼政治思想,其方式与早期个人主义自由派建造个人与国家的辩证关系的话语的过程并无二致。

注 释：

※ 本章由孟悦译自作者在 1993 年 *Positions* 上发表过的一篇英文文章。

- [1]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世界, 本文, 批评家》(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227 页。
- [2] 此外, 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欧洲。同《东方主义》一样, 这本书的参考书目所列举的著作清一色是用欧洲大都市的语言, 如英语和法语写成的。
- [3] 见 James Clifford, “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 (有关旅行及理论的笔记), 或 *Inscriptions* 1989 年第 5 期, 185 页。
- [4] 萨义德的理论在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文学批评家中引起的反响可以由 *Inscriptions* 杂志 1989 年的专号 “Traveling Theories and Traveling Theorists (旅行之理论与旅行之理论家)” 窥见一斑。这期专号可以说是对萨义德理论的一个集体性的讨论和修正。其中后殖民理论家强调地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提出旅行之理论在多重地域关系中的特权化位置。我认为以地域作为模糊的思想框架固然对开辟后殖民话语空间有暂时的策略性用途, 但容易使人忽略一点, 即这些后殖民理论和理论者们自己也是“旅行”的, 否则很难与他们强调的“第三世界”的地域有任何关联。
- [5] Tam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为翻译定位: 历史, 后结构主义, 及殖民主义语境》(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1 页。
- [6] 比如张隆溪发表于 1992 年秋季号 *Critical Inquiry* 上的文章《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Reality (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张文借鲁迅广为引用的“拿来主义”来说明中国人如何懂得利用西方观念为自己服务。我同意对理论的用法最终决定这则理论的意义。但把“拿来主义”作为解决东西方之间文化和历史纠葛的大团圆结局未免就太天真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本身没有提供任何余地容人想像一种倒过来的东西关系, 比如中国理论被西方迫不及待地“拿去”。我以为对历史研究而言, 更重要的是解释当时产生了鲁迅“拿来主义”的各种条件, 而不是单纯肯定这一口号, 并由此思考今天东西方关系的现实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
- [7] 在后殖民学者中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是 Partha Chatterjee (P. 查特尔基)。如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民族主义思想

与殖民地世界:衍生性话语?》(东京:Zed Books, Ltd. 1986)。

- [8] 见李欧梵,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浪漫的一代中国作家》),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3 年英文版, 44 页。此外, 许多早期作家都以从事翻译开始步入文坛。
- [9] 由于我是用两种语言工作的, 同样从事着一种跨语际的实践。这篇文章可能既是对早期实践的反思, 也是其延续。
- [10] 我觉得 Douglas Robinson 有关“等值隐喻”(trope of equivalence) 的概念有助于思考在翻译和创造意义时语言发生的变化, 可参见 D. Robinson, *The Translator's Tur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1] 见 Tu Wei-ming (杜维明),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on Confucian Thought*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及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 [12] 明治时期, 日本的新用旧词“自个”和“个人”被用来分别翻译 self 和 individual。
- [13] 早期中国作家讲究把原文给出, 在“个人”或“自我”后面常跟有 individual 或 self 字样。
- [14] 无疑, “己”的传统意义保留在有关理学的学术研究中。但我在此要谈的不是“己”的传统意义, 而是“己”和英文词 self 或其他有关的外文词之间在近世以来通过翻译建立的关系。这里的复杂性对我们这些作比较研究的人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一涵在 1916 年 5 期《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自治与自由》中, 以“小己”和“大己”分别翻译 Bernard Bosanquet 的“individual”和“greater self”两个范畴(见后者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第六章)。在这篇文章中, 高把中文翻译与英文原文放在一起(1 页)。
- [15] 陈家骥, 《新》, 载《新潮》1919 年 1 期, 6 页。
- [16] 我想强调这一历史区别, 因为如果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尺度来衡量中国的现代经验就会抹去一段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历史。
- [17] 家义, 《个位主义》, 载《东方杂志》1916 年 2 期, 9 页。
- [18] Bertrand Russell (罗素), *The Problem of China* (中国问题)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2), 215 页。
- [19] 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7—49 页, 以及 Vara Schwarcz (维拉·施沃尔兹),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中国启蒙运动》)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20] 欧洲启蒙主义传统本身就充满各不相同的因素乃至互相冲突的话语。比如对现代性的批判实是启蒙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见于浪漫主义、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阿多诺、福柯、德里达，乃至哈贝马斯。
- [21] 甘阳《自由的理念》，载《历史的反响》，香港三联 1990 年版，70 页。
- [22] Anthony J. Cascardi(卡萨尔第)，*The Subject of Modernity* (《现代性的主体》)(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79 页。其书第二章颇值一读。
- [23] 《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卷一，186、187 页。
- [24] 我指的是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历史研究法。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 [25] 关于早期个人主义的研究可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本雅明·舒尔茨《严复与西方》)。
- [26] 关于影响杜对辛亥革命看法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可参见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周策纵著《五四运动：中国思想革命》)，以及 Benjamin Schwartz 编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本雅明·舒尔茨编《反思五四运动：研讨会》)。
- [27] 杜亚泉《个人之改革》，载《东方杂志》1914 年 12 期，2 页。
- [28] 见《新民说》，收于《饮冰室合集·专集》，上海 1936 年版，3 卷 4 册，1—162 页。又见《自由书》，同上，2 卷 2 册，1—123 页。另可参见 Hao Chang,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 - 190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转变，1890 - 1907》)。
- [29] E. Said, 同注[4]，237 页。
- [30] 《我》，载《东方杂志》1916 年 1 期，13—16 页。
- [31] 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在民质的论述中清楚可见。
- [32] 《个位主义》，载《东方杂志》1916 年 2 期，6—10 页。此文作者将 individualism 译为“个位主义”可能是为了呼应“个人本位主义”——一个充满社会学(科学)味道的字眼(见 7 页)。
- [33] 高劳和仓父为杜之笔名。

- [34]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载《东方杂志》1917年3期，2页。
- [35] 周策纵，“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收于 Arthur F. Wright 编 *The Confusio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12页。
- [36] 作者在此文中单用了“小己”，意为“大己”的对立面。又见《国家非个人之归宿论》，《新青年》1915年4期，及注[16]。
- [37] 胡适在《不朽》一文中谈到“小我”与“大我”的问题。不过他将“大我”等同于“社会”而不是国家。他对两者关系的看法与高一涵相近。见《不朽》，《新青年》1919年2期，96—105页。
- [38] 李亦氏《人生惟一之目的》，载《新青年》1915年2期，5页。
- [39] 李大钊(守常)《青春中华之创造》，载《晨钟》，1916年8月15日。
- [40] 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收于《中国新文学大系》一卷，34—43、127—140页。
- [41] 周作人，《人的文学》，同上，195页。
- [42] 笔者博士论文 *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现代中国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90) 对这方面有较详细的讨论。
- [43] 这里“自传性主体”一词是在叙事学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本文中的自叙者，而不是真实作者。有关概念可参见 Gérard Genette 著 *Narrative Discourse* (《叙事话语》)。
- [44] 《不朽》，载《新青年》1919年2期，101页。
- [45] 《人生问题发端》，载《新潮》1919年1期，4页。
- [46] 《物和我》，载《新潮》1921年1期，2—3页。
- [47]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载《新青年》1920年4期(总第8卷)，3—4页。
- [48] 《个人主义的由来以及影响》，载《东方杂志》1922年7期(总第19卷)，35—46页。
- [49] 英文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和 Arif Dirlik《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II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现实主义问题

在第二部分的三章里,我关注的是构成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范围的那些跨语际表述模式。所谓文体学,在这里是指叙事形式和修辞性写作 (*figurative writing*),它们包括小说现实主义 (*novelistic realism*) 的各个层面、对于内心世界的叙事重描 (*remapping*)、第一人称语态、自由间接引语、指别成分 (*deixis*) 以及性别化 (*gendered*) 文本策略等等,但并不局限于此。面对小说现实主义以及外来的叙事文体形式,人们最初的冲动是将它们视为欧洲的影响,甚至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明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语文本的内部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就会明白,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不证自明。而且影响的观念也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偏爱某些舶来的表述模式,而冷落其他一些模式。为了理解与中国现代小说有关的跨语际表述模式的复杂性,我在解读文本时非常重视“生产性的扭曲” (*productive distortion*) 的痕迹,并且把它们看作是滑稽模仿 (*parodic imitation*) 的实例,这种滑稽模仿意味深长地证明了中国现代性的矛盾状况。

这些章节所讨论的个别作家,通常因其自觉地从事实验

“拿来的”文学模式而著称,其涉猎的范围从叙事技巧的创新式运用,直到更为宽泛的表述模式和诠释模式的问题。我本人的分析,并不希望面面俱到地触及中国现代文学文体革新的每一个实例。毋宁说,我试图考察(interrogate)中国的文体革新与舶来的文学模式之间存在的历史关联。鉴于这种研究的基本宗旨乃是提出中国文学“现代”的合法性问题,我的文体学探究就不可能采用比较研究中严格界定为“平行比较”的那种方法论(即,从每一种文学现象中抽取两个或更多的文本,凸显它们的相似与不同)。总的说来,我发现,历史关联的概念(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linkage)要比平行比较或者影响研究的模式更为有效。

为阐明文学体裁与表述模式中历史关联的涵义,请允许我从当代中英文学翻译的一个实例入手。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翻译18世纪中国小说《石头记》时,在曹雪芹的小说中添加了许多有趣的文体学介入(incursions)。譬如,他偏爱用自由间接引语(*style indirect libre*)来翻译叙事者笔下人物的内心语言,这种叙事手法对于18世纪中国叙事作品而言纯属外来的。^[1]以曹雪芹笔下的叙事者描述黛玉和宝玉初次相逢的段落为例。霍克斯的翻译是这样的:“Dai-yu look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 *How strange! How very strange! It was as though she had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 he was so extraordinarily familiar*”(黑体为笔者所加)。^[2]对现代英语文学读者的鉴赏力(sensibility)而言,经过霍克斯润色后的翻译无疑是更完美的现代英语,因为全知叙事者的观察流畅地滑动到人物的内心语言,而未留下丝毫文体转变的明显印迹。这一成效,归功于英译者对自由间接引语(斜体部分)的运用,其功能是,它在

叙事者对他/她所观察内容的报道(全知全能)与人物的内心独白之间斡旋。自由间接引语使叙事者不必受被引用之言语的词语标记的干扰,譬如“she thought”(她想),或者其他相关的手法,例如从“she”(她)或“he”(他)到“I”(我)的词语转换等等,就能够间接地援引人物未经道出的想法。^[3]这样的文体学特征在曹雪芹的原著中是找不到的;小说作者通常是利用直接引语来描写黛玉的内心世界。与库恩(Franz Kuhn)的较早的译本作一番粗略的比较,便可说明霍克斯的译本对原文进行的文体上的修改意义何在。

Blaujuwel war von seinem Anblick aufs höchste betroffen.
“Seltsam, wie bekannt mir seine Züge vorkommen. Als müßte ich ihm schon einmal begegnet sein” *ging es ihr durch den Sinne.* (Black Jade was taken completely by surprise at his appearance. “It is strange how familiar his features seem to me, just as if I had met him before,” *she thought to herself.*)^[4]

霍克斯的英译本所省略的斜体句,“心下想到”,是一种程式化的词句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用来提示所引述的想法,在现代叙事技巧和标点符号兴起之前,是表现人物内心语言时最常用的叙事手法之一。^[5]库恩的译文忠实地复制了汉语原文的叙事模式,而霍克斯的译文则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改写了那一模式,创造出新的文体效果,这种效果比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要更加流畅,也更为接近现代英语读者的品味。这样,他就必然在现代英语传统的文体范围(purview)中,“重写”了18世纪的中国小说。

然而,所有的翻译不都是对原文的重写吗?我这段有关霍克斯的开场白并非有意批评他的译文(实际上我对之深表敬佩),而是要借助这个实例,提出这一章的核心论点。简而言之,霍克斯以现代英语对《石头记》所作的文体转变,可用来象征性地表达 20 世纪初中国小说文体学方面的变异。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小说传统里面各种文学惯用手法之间的跨语际表述模式。20 世纪第一个十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始利用舶来的(被译介的)叙事模式,而且似乎是用霍克斯那种“欧化”汉语的中文版来写作。然而,一旦有人做出这样的一般化描述,也就必须面对如下的问题:这些作家是否仅仅是在模仿外国作品?如果不是,那么这种跨语际表述模式在何种程度上界定作家自身的经验?什么是汉语?什么是非汉语?

将自由间接引语引入中国现代的小说写作,不过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文体学革新的实例之一。本章以及后继两章将要讨论的这一种以及其他种类的现代叙事模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书面汉语白话文。对于这些变化所具有的广泛性,以及它们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粗浅的。就此意义而言,我在上文做的与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的类比,就必须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霍克斯的译本固然可以使英语读者和中国学研究者有机会了解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但除此之外,它对英语语言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改变,而相形之下,自从近代以来与英语文学和其他语种的外国文学发生接触以后,中国的语言及其文学惯用手法却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转型。^[6]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大量的欧洲文学被译介到中国本

士,从而彻底改变了书面白话文的性质,以致于后来现代汉语同英语之间的翻译,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作家慷慨地“拿来”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波兰语以及其他语种的文学,希望这种种“拿来之举”将恢复自己语言的元气,并发明新的汉语白话文,以期实行一举替代古代汉语的宏图大志。这些作家的努力究竟有几许胜绩?当他们试图借助汉语和其他语言间的跨界写作,为自身摸索到一个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详细分析个别文本中跨语际表述模式的做法(modus operandi)。我的讨论将从《骆驼祥子》开始,而关注的焦点则是这部小说在小说现实主义的跨语际模式中,有关“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表述。

《骆驼祥子》

将《骆驼祥子》翻译成英文,几乎完全不需要“更新”老舍小说的文体风格,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用跨语际的叙事模式写作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适合于翻译的。这里选取詹姆斯(Jean M. James)的译本中一个典型的片断。下文援引的段落,描述主人公祥子逃离绑架他的兵匪之后发生的事情:
“He stopped worrying and walked on slowly. *He had nothing to fear as long as Heaven protected him. Where was he going? He didn't think to ask any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were already coming out to the fields. Keep going. It didn't seem to matter much if he didn't sell the camels right away. Get to the city first and then take care of*

it . He longed to see the city again”(黑体为笔者所加)。[7]

如果说霍克斯必须得发明汉语原文中所没有的自由间接引语,那么,詹姆斯所翻译的文本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文体特征(加黑体的句子)。第三人称叙事是老舍小说语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广泛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舶来的”叙事技巧。这种跨语际叙事模式的使用,意味着《骆驼祥子》的译者所处理的小说文本,要比《红楼梦》那样的 18 世纪小说更容易精确地翻译成英语,因为现代文本已经假定了英文小说与中文小说之间存在着假设的等值关系。

老舍大量使用了心理叙事、自由间接引语以及其他小说技巧,数十年来,由于欧洲小说被译介到汉语白话文当中,这些技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变化着的文体学所包含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小说技巧而已,它也为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人称(person)注入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在作为现实之中心的虚构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和道德的“真理”。也就是说,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必须由读者参照主要人物的命运予以看待和评判。这便是老舍的叙事者将其“经济的人”样子引入其中的那个认识论的空间。

《骆驼祥子》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宽广背景上,展现了一名孤独主人公的沉浮。它付梓于 1936—37 年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许是惟一一部以如此详瞻的细节处理个人主义问题的长篇小说。[8]主人公祥子同阿 Q 一样,皆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与阿 Q 不同的是,老舍笔下的下层阶级主人公,却由作者以细腻关怀与强烈的情感描摹出来,这在中国小说可谓独树一帜。《骆驼祥子》正面触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它与我们在前一章讨论的早些时候关于普罗文学的论战,有着明显的关联。但与此同时,老舍对左翼作家关注焦点的模棱两可的回应,却引领我们超越了作家身处时代的政治话语,达致了一种形式上的解决。作为现代主人公的一个缩影(epitome),祥子在这部小说里被描述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那独善其身的梦想最终却毁灭了他自己。然而小说随即指出,相反的结论也是同样真实的:一旦祥子消蚀了自己的野心、独立性以及个人主义,他就会蜕化到可鄙的众生的层次上。在小说结尾,叙事者诊断了祥子的身体与道德的状况:“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页 308,249)

从某一角度出发,大概会有论者以耳熟能详的自然主义术语,诠释这段引文,将主人公堕落的原因归之于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他走向独立而诚实之生活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9]然而正如王德威指出的,批评家倘若仅仅关注老舍对于社会受害者的博爱襟怀,以及他对受压迫者的自然主义描摹,就往往会错失小说形式层面的很多东西。王德威在其对于中国小说现实主义的研究中,强调了情节剧以及闹剧的成分,从而相当清晰地阐明了老舍小说的形式层面。^[10]我本人的解读试图将这种形式层面的探究推进一步,即提出下述问题:这部小说是如何建构主人公与其物质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的?是什么界定祥子为“经济人”或者经济个人主义者?小说对于身体、金钱、洋车、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商业交易的表述,究竟是仅仅补充了故事的内容,还是如我在下文将要

指出的,构成了老舍小说世界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精心设计的形式策略之一部分?最后,叙事者语言的修辞状态(status)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到对小说的诠释的?

即以我们刚才援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叙事者用了好几个相互抵牾的形容词分句(伟大的,堕落的,等等),似乎使我们无法作出单一决定论的诠释,如自然主义的诠释,因为一些分句显然削弱了另一些分句的意义。^[1]因此,这部小说的语言揭示了其自身的修辞状态乃是一种矛盾形容法,一处相互冲撞的场所,但却创造出丰富的意义。我本人对这部小说“经济人”之表述的解读,乃是以这种张力关系为线索,试图将该表述本身定位于叙事者的语言所开启的修辞空间中。

祥子曾历经一系列险情,特别是他偷到三匹骆驼,并卖了三十五块大洋这一高潮性事件,从此以后,他获得了“骆驼祥子”的绰号。他率真的野心是要拥有一辆洋车,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为此他需要这一笔钱,买一辆新车来代替他遇兵匪绑架而被掠走的那辆车。因此,“骆驼”命名了祥子与金钱、资本、投资以及所有权的象征性关系。这一象征性关系在北平找到了臻于完美的象征性场所。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它以个人成功的无限许诺诱惑着小说的主人公。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无名、独立、机遇、钱财、富裕、感官享受,使祥子冲昏了头脑,他发自内心地渴望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分子。

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黑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惟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

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页 39,31)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段引文维妙维肖地捕捉到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在其《北京人力车》(*Rickshaw Beijing*)一书中所描绘的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经济关系。穷困潦倒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谋生,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住户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祥子是全然独立的,身无分文,无依无靠,无朋无友,也没有家庭纽带。他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典型,二三十年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并且往往被描绘成受压迫者的象征。然而,老舍小说中的祥子真的是受压迫者的象征吗?

戴维·斯特兰德在其研究北京车夫的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充分地利用了老舍的小说,他对民国时期对于社会受害者的种种文学表述提出批评:“人力车代表贫穷与社会的混乱,这些性质的最好表达,是将车夫描摹成牺牲品。然而,这一形象折射出的仅仅是车夫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将车夫刻板地描摹成贫民或者役畜,则忽略了他们公开表演自己的工作时所展示的戏剧性才能。”^[12]为数众多的现代作家(鲁迅,胡适,郁达夫等)利用人力车夫的形象,抗议社会的不公,或者批判性地反思自身的道德立场。有鉴于这一事实,斯特兰德的论点便容易理解了。然而,文学文本的存在,并非仅仅为了反映社会现实,无论人们要求的现实是部分真实的,还是全部真实的。它有自身复杂的存在条件,而这些条件至少“述行式”(performative)地表述了对于象征性现实的多方面诠释。远在后结构

主义出现之前,文学批评家们就认为,小说不经中介地(unmediated)反映现实这一思想是一种模仿的谬误(mimetic fallacy),那些在自己的研究中用文学文本作论据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会发现文学批评家的洞见是不无裨益的。^[13]斯特兰德的诠释策略在论述老舍小说对人力车夫的现实主义描写时,未能形成一个解释框架,它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研究者本人作为劳动力史家的特权地位,因为他强调组织化的劳动力,集体的行动,公开的表演,等等。

尽管学者在其历史研究中选择某些方面作为一个重点,这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斯特兰德的研究取向所包含的理论假设,却应当使读者警醒到一些典型的盲区。此处我不愿介入由于他把市民社会的观念应用于中国研究而引起的争论,其他学者对此已有批评。对我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科学中作为一种主导性诠释实践的现实主义正统(realist orthodoxy)。所谓“现实主义正统”,并非仅仅指关注于现实领域(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公共领域);毋宁说,按照加斯丁·罗森伯格(Justine Rosenberg)的说法,它是“政治现实的一种决定性建构,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潜藏的命题和症候式的沉寂”。^[14]现实主义执行其意识形态计划最为有效的方式,正是通过诉诸于“真实”而将某些东西合法化,同时又将它称之为“不真实的”东西斥为非法的。毋庸赘言,现实主义这一述行功能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它可以维系共识性和模仿性地理解语言和文学的运作方式;即,语言和文学反映现实,而不是构造现实或者大肆影响现实。

批评家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坚持认为自身与现实有特别的联系,因而赋予自身以权威性。然而这一主张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先验的假设,它同样也是一个形式上的决定因素,我们在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都是可以辨别出这一决定因素的作用。每一部新的作品,必须亲身复制这一主张,由此肯定它对现实独一无二的控制。因而,在悬置棘手的认识论问题的同时,可以检验这样一种表述行为,它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或者按照语言学的术语,作为一种有理据的(motivated)言语行为],其特有的痕迹可以在文本中发现。“真实”至少暂时可以被视为小说的一种效果。^[15]

如果超越对“真实”的质疑,那么文学史家一定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老舍这样的小说家,因为他/她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的迹象,而那一迹象常常被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materiality)所证实。老舍小说的物质性包括一个饶有趣味的不同版本的历史,这些版本不断地修正、重写、重新构想小说中关于“真实”的问题。^[16] 此处我关注的是老舍本人在《骆驼祥子》修订本的前言中一段引人注目的自我批评;这些环境因素有助于发人深思地比较斯特兰德的批评。老舍为1951年开明书店版的《老舍选集》撰文时,以一种修正的语调论及他早期这部小说。在谈到上文引用的那句话时,老舍写道,“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17] 不

难理解为什么 1949 年后,老舍对其小说的结尾采取一种修正的立场。毕竟,当老舍撤回早期对祥子个人命运的凸显,转而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赞同一种更为乐观的前景时,这部小说在 50 年代已历经几次修订。有学者称 1955 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的几个修订本为“新版”,而将以往的本子称作旧版。^[18]新版对原来的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更改,最明显的是第二十三章的大部分以及整个第二十四章被作者删去了。^[19]

被删去的章节和段落以非常消极的眼光,描摹了主人公道德与身体堕落的惨状,从而喻示着一定程度的自戕。这一部分刻画了祥子出卖阮明组织洋车夫一事,作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以及阮明被枪毙的场景,老舍通过删掉这一部分对此表明了看法。因此修订本强调了旧社会的破坏力,并呼唤集体的行动。^[20]通过删除这些章节,老舍以及部分学者显然相信,他们正在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更为现实的陈述”。^[21]但这一所谓的现实不得不先被逆反着(*retroactively*)“修正”,然后才能证明假设的(*imputed*)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22]斯特兰德对老舍的解读虽然来自相反的方向,却仍旧在类似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上运作,它要求文学文本提供现实的故事,而文本必须逆反着修正,以提供这种现实的故事。于是,它既掩盖了小说本身的述行层面(我在下文称之为“修辞性解读”的策略),也遮蔽了他本人诠释姿态的述行层面。^[23]

我们与其继续争辩小说对于北京车夫经验之表述精确与否,不如集中关注这部作品本身所引发的表述与诠释的问题。祥子的形象究竟代表了什么?诚然,由于他的野心、自恋以及有尊严的劳动感,这个年轻人远远不止是受压迫者的象征。祥子的梦想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将人力车夫的拉车劳作转变

成一出非同寻常的人间戏剧,其意义显然超出了祥子选择的职业的维度。因此叙事者在小说开始处如是说道:

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睛就可以有饭吃。(页4,4;黑体为笔者所加)

这一段落抓住了祥子内心生活的显著特征,倘若叙事者未能富于新意地使用心理叙事以及自由间接引语,那么就无法有这样的建树。事实上我相信,这个故事所包含的许多怜悯与反讽,需要叙事者在详细描述祥子的生活时,必须熟练地使用这些叙事模式,特别是自由间接引语(即,前面引文中加黑体的句子)。老舍改写了这一来自欧洲小说的技巧,并用带有北京方言色彩的现代汉语重新发明了它,这种方言不必真正以他或她本人的声音来说话,便可模仿人物的语言。在上文援引的段落,叙事者以描述祥子的心理状态开篇,就仿佛从外面进行着观察(心理叙事)。在第三次提到“车”的时候,叙事者转而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以贴近模仿人物的语言。^[24]转折的标志是“车”这一词语的几次重复,以及“自己”这一强调性的口头语,就好像反映出祥子内心语言的口语节奏。虽然实际上这些词语由叙事者以第三人称道出,但视角仅仅是祥子本人的(正如后文将会看到的,叙事者对样子的观点持批评态度)。在以自己的声音(第三人称)说话的同时,叙事者好像是暂时脱离了他的视角,转而采用作品人物的视角。^[25]

心理叙事专从叙事者的视角描述人物的精神状态,而被

引述的独白(自言自语)采用的则是人物自己的声音。与之不同的是,自由间接引语打破了叙事的声音与人物内心独白之间的界限。这一叙事文体冲决了僵硬报道叙事者看见什么(全知)以及人物说或想什么(以引号或其他手法为标志,如从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语气的转变,或者两种人称皆变)这一窠臼,将小说话语从中解放出来。在印欧语言中,这些转折点通常伴有指示性指涉(*deictic reference*)的变化,以及时态、人称、语气等语法现象的变化,非常类似于直接引语转化成间接引语的方式,只不过自由间接引语常常省略文体转变的动词标志,譬如“他想”或者“他相信”。

中国现代白话文由于缺少时态、人称以及其他相关的语法标记,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变叙事模式,除了指示性指涉之外,完全没有印欧语言中那些必不可少的语法转化。因此在汉语中,自由间接引语与全知心理叙事以及被引用的内心独白的关系,要比它在其他语言中更为暧昧。其文体效果是一种未被打断的叙事流的效果,有点像自由间接语段(*free indirect discourse*),创造出一种透明精神状态的完美幻觉。假如把上文引用的段落改写成一种简单的叙事和直接引语,而不用自由间接引语,那么前面的引文大致是这样的:

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祥子自言自语道,“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我就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我睁开眼睛就可以有饭吃。”

用司空见惯的独白引语取代自由间接引语,这一段落的文体

效果就大大减弱了。借助这种以及其他种类的叙事模式,老舍的叙事者能够非常深入地探索祥子的内心世界。祥子之有别于其他的车夫恰恰是这一内心世界的呈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独特内心的世界,使一名车夫卑贱的生活具有了更大的悲剧式象征意义。^[26]

这名洋车夫的内心世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抓住这么多读者的心?祥子梦想拥有一辆洋车的想法,与幸运的企业家想像的未来图景相比,真可谓谦卑有加;不过,这是一个“经济人”的梦想,他想像着通过艰苦的劳动与私有财产权,可以获得他本人的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的尊严与生计。既然缺少其他可以投入的物质手段,他必须出卖体力,并将他的肌肉(“自己的手脚”)转变成资本,结果一种矛盾油然而生于如下二者之间,其一是他对自己身体的自恋式爱慕,其二是他由自己的身体而亲历的深刻的异化感。洋车不仅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他第二个我,或者是纯属天方夜谭的自我充分实现时的幻象。祥子22岁时买到第一辆洋车,他把车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以一种明显的自恋的方式,“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页11,10)。他随即决定将这一天命名为他自己以及他的镜像的生日,来庆祝这个“双寿”。自由间接引语穿透了祥子的内心思想,叙事者说道:“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页12,10)

如果祥子把这辆车视为自己的另一个,那么二者之间的亲和力,就远比“心血”一词所喻示的情感纽带更为深厚。引文最后一句,老舍使用的动词的英文译法“separate”是“分开

算”，英文字面的译法是“to calculate /count separately”。“算”字尤为重要。叙事者贯穿整部小说，一直关注着祥子怎样算计自己生活的方式。就像一名节俭的“经济人”，他计算着自己的大洋和所有物，算计着该花多少在衣食上，该把多少放在一边，作为积蓄。^[27]举例说来，祥子丢了第一辆车，卖骆驼换得三十五块大洋之后，他寻路回城，盘算着：“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近似塘布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页 38, 30；黑体为笔者所加）

为避免有些读者会把上面一段引文看成对于祥子穷愁潦倒状况的一种简单的、现实的描述，本书第七、八两章集中考察了老舍笔下人物形象这个重要的层面。祥子不幸被虎妞诱引之后，有机会“拉包月”，作曹先生的私人车夫，这将大大改善祥子的生存状况。当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芽时，祥子再一次梦想拥有自己的一辆车：

（祥子）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的嘟囔，像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多少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像是充实一些，真像有一本账似的。（页 87, 68）^[28]

虽然祥子从未停止过盘算或者算计，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经济人”。究竟是他的误算，还是他过多的梦想，妨碍他保持平衡？就仿佛一颗灾星永远笼

罩着他的生活,祥子盘算的技术似乎无法弥补他多舛的命运早就被算好的苦痛(叙事者的情节设置忤逆着他),也就在此处,祥子境遇的反讽意味一览无余。相形之下,曹家女仆高妈,却是一个更好的资本家。作为“经济人”无师自通的女性版本,这名寡妇把每月问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赚取利息。小说中讲到,她以“银行经理”的手段控制着自己的资金,她甚至劝告祥子怎样攒钱买车。故事展开时,叙事者的语言越来越从加、数、罗列、盘算以及投机当中,获得巨大的快感。这种语言生动地捕捉到祥子的守财奴状态:“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页 90, 70)这段描写的官能性颇为动人,它把祥子对钱的迷恋审美化了,赋予它一副人性的面孔,一种超过投资所得的意义,以及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感受力,与高妈管理钱财的理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高妈劝祥子用积蓄在银行立个折子,赚点利钱,而祥子终于拒绝了她的爱心,因为在他眼里,这是个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页 90, 71)

对现代契约关系的怀疑,暴露了祥子选择的生活方式具有的基本矛盾:农村经济的象征性世界对抗着城市资本主义的理性。在祥子眼中,大洋标志着他本人与其劳动之间未被异化的关系,从而代表真实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与金钱的物质性(physical)接触(藏在葫芦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似乎可以保证他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感。祥子最终的目标不正是自制与自主吗?然而,这一幻觉迅即被孙侦探精打细算的恶行所摧毁,这个恶梦的制造者抢走了祥子所有的积蓄。

自兵匪的劫掠之后,这是第二次一场“偶然的”灾难陡然破坏了祥子的计划。

祥子的前资本主义心智结构开始与他的生活环境发生冲撞,城市的生产方式不再与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相类同,而价值、所有权与独立的意义正在全新地界定着。在这部小说中,现代银行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喻示着契约关系(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先决条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祥子虽然抛弃了这些契约关系,但仍旧坚持利用着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独立与个人自由的许诺。正如我在下文论述的,这一内在的矛盾,极为清晰地阐明了祥子作为“经济人”的身份是大有疑问的。

为什么老舍如此煞费苦心地详述金钱交易与簿记?这一小说形式究竟与经济个人主义有什么关系?祥子与曾经一度主导着英国和欧洲小说的“经济人”的人物形象之间,除开表面的类似,是否有什么根本的联系?巴赫金极富洞见地指出,商业生活、巨额融资以及金钱,作为“生活中的新国王所具有的超级权力”,在那些重要的法国小说所构造的世界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9]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便是明显的例证。同样地,伊安·瓦特在研究笛福作品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时,也指出:“笛福所有的主人公都追求金钱,金钱被他独特地称为‘世界通用的徽章’;他们采用记录收益损耗的账簿很有条理地追求金钱,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账簿是现代资本主义与众不同的技术特征。”^[30]譬如在《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中,有很多亚麻、黄金、珠宝需要清点计算。鲁滨逊·克鲁梭因其在小岛上一丝不苟的簿记而知名,在那个小岛上,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布匹和金属器物。若要列举更多的实例,那么狄更斯的小说也充斥着对于钞票、合同、契约、遗嘱以及其他财

产文件的描述,而这些文件在构造小说的情节以及其他象征性的现实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老舍熟知这些作者,是否喻示着《骆驼祥子》与欧洲文学,特别是与英国小说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互文关系?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出发,中国语境中的“经济人”与其欧洲对应物相比,其意义究竟是什么?

老舍不断提及他本人通过阅读英国以及欧洲的小说,学习写作的技巧。他的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便是受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和《尼考拉斯·尼柯尔贝》(*Nicholas Nickelby*)的启发,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书桌上写毕的。他在伦敦五年,曾开列一个野心勃勃的阅读书目,并随便翻阅大量的作品,从古希腊的经典直到现代英国和欧洲的小说,现代作品尤为老舍所喜爱。^[31]在一篇回忆录中,老舍承认他曾一度对英文圣经、莎士比亚、狄更斯、斯威夫特、康拉德、笛福深表钦佩。1941年他回忆道,“乃至我读了些英文文艺名著之后,我更明白了文艺风格的劲美,正是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而不必要花枝招展,华丽辉煌。英文圣经,与笛福、斯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简劲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32]

研究文学原型、素材和互文性,其本身并不能解释文本中发生的一切;诚如第二章讨论的阿Q的情形,文学表述的问题,要比通常假定的文本与现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包含更为复杂的中介因素。除了作者本人指出的文体的简劲,我们对于老舍受惠于英国文学一事,还能再推断些什么?有人会说,《骆驼祥子》前所未有地强调金钱、经济个人主义、独立以及劳动的尊严等,这一点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有人走得更远,认为老舍的主人公以莎士比亚

的哈姆雷特为原型,那位丹麦王子意味深长地消除了笛福主人翁的功利主义形象。我在此处提及《哈姆雷特》,绝非一种自由随意的联想。老舍在其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恰如王德威所说的,是他的“哈姆雷特综合症”。^[33]就《骆驼祥子》而言,读者可以援引一条证据,即,叙事者刻意凸显一位特立独行的主人公高大的身材,其他人相形之下不禁黯然失色。祥子拥有漂亮的肢体,健美的身材,高贵的性格,并因一种在每一个生活的转换点击败祥子的悲剧性缺点(过度诚实),而达成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叙事者以逐步升高的戏剧化风格,用“独白”的方式表述祥子在虎妞难产死后的悲惨命运:“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像个鬼形,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有,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英文译文是:“A rickshaw, a rickshaw, a rickshaw that was his rice bowl. Bought, lost; bought again, sold. Two rises and two falls. It was like the shadow of a ghost; you can never catch it. He'd suffered all those hardships and wrongs in vain. Gone, everything was gone, even his old woman was gone!” 页 245, 196) 读者会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叙事者所使用的自由间接引语,这一文体将祥子的内心独白翻译成叙事者的语词。^[34]然而,这一段落也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式的独白——包括此处使用的关于鬼魂的奇特明喻——在那里人类的生活被理解为沉浮相继,在那里主人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在那里偶然的灾难随处可见,在那里主人公的悲剧从风格化(stylized)的独白中获得动人的力量……当然,老舍的小说则将风格化的悲剧独白转化为北京方言写就的自由间接言语。^[35]

虽然老舍受惠于英国文学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诠释必

须超越试图确立互文关系的初级阶段,以免仅仅成为有关文学影响的无可争辩的(uncontested)叙事。祥子,一名中国的“经济人”,既非哈姆雷特,亦非鲁滨逊·克鲁梭。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主人公与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个人主义几无共通之处一样,因为后者的功利主义理性、乐观的冒险精神以及加尔文主义的得救感排除了悲剧结果的可能性,所以祥子也必须在他自身的基础上予以诠释。但怎样诠释?在回忆这部小说的环境因素时,老舍曾亲手撰写一篇评论,或许可以阐明这一问题。

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36]

老舍的同时代人李景汉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把车夫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老舍回避了这种取向,他想要提供的是一个小说家对于车夫生活(内心状态)的诠释。^[37]与其说这种诠释是要声称对社会事实进行透明的表述,不如说它将注意力集中在该诠释本身的认识论构造,以及它本身作为一种诠释行为的文本策略。因此,“rickshaw”一词不断以“洋车”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它作为另一个新词(coinage)替代了源自日语的借贷词“人力车”(jinrikisha)。“人力车”一词在表述其对象时,假定了一种中立性,而“洋”字(字面义为来自大洋或者海外)却带有情感评价——可以说是诠释的剩余价

值——它公开宣布了一名中国发言者对于贴上此类标签的舶来品所表明主体姿态(从敌意到钦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反帝斗争促成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新词——foreigner 被称作“洋人”(现在则是“老外”),取代了“外国人”的叫法,进口的布匹称作“洋布”,手枪称作“洋枪”,火炮称作“洋炮”,等等等等。

从日本舶来的洋车,1886年首次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并几乎马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实物。正如戴维·斯特兰德指出的,一方面,拉车超越了抬轿,代表了技术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这一景观也成为落后与剥削的象征。”^[38]人向动物层次的退化,迅即被同行业的竞争者骡马大车的车夫所发现,他们“把这些使人降级为动物的讨厌的洋玩艺,扔进了运河”。^[39]这一描述为理解老舍的小说,开辟了一条有趣的途径,但不是在斯特兰德主张的精确刻画北京洋车的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即涉及到文学的表述、意义和诠释等问题的方面。

“洋车”以何种方式,将祥子生活的意义界定为中国的“经济人”?洋车是舶来品,与现代的都市文化、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同被带到中国。当祥子梦想通过占有一辆洋车来掌握自身的命运时,作为奴役和剥削的舶来之象征的洋车,便与祥子赋予它的地方的/农民的象征主义相冲突。这一冲突摧毁了祥子试图超越自己身处的贫困、不安全、无家可归、依赖性 etc. 等不利环境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而他的结局要比开始的时候更为悲惨。小说戏剧性的展开,以祥子把奴役的象征完全误认为自由的许诺为转移。资本主义,同一切有效的意识形态一样,恰恰依赖于这一类误认,即让他/她的个体错误地以为

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能够选择自己的从属(bondage)形式。当叙事者描述与高妈的资本主义行为相关的钱财管理的理论时,这样说道:

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页 89,69)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祥子生活的悖论(paradox)讲得一清二楚。作为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一名农民,他只能得到最少的收益,这是从极大的资本主义的筛子漏下来的一点点;可是他的野心,因追求经济独立的欲望而膨胀,却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强烈。这一悖论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祥子永远无法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像鲁滨逊·克鲁梭那样的成功的“经济人”。祥子是命中注定要辛苦劳作并出售自己的体力劳动,而克鲁梭却依仗着自己的冒险精神,拓展着资本主义的疆界,并征服其他世界,其做法乃是肯定他本人凌驾于土著之上的文化权威性(包括他将他者命名为“星期五”的权力)。^[40]

诚然,《骆驼祥子》在讲述拉车生活的同时,也讲述着一名年轻男子在变化着的生产关系中,身体的使用和滥用,而这些变化是由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侵入引起的。命中注定以拉车为生的祥子,除了自己的身体(他发现这是转换成资本的必要途径),实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手段。因此具有转换能力的身体,便从所有者那里异化出来,它被投资出去,以购买一种生

产工具,却只能更深地屈从于剥削。

祥子开始时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乡间小伙子,对自己的身体有无尽的信赖。叙事者以一种反讽的语调说道,“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页5,5)无论何时,他看到那高等的车夫展示健美的身躯,就想着怎样显出他自己“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叙事者结合使用直接的第三人称叙事以及自由间接引语(下文加黑体的部分),维妙维肖地捕捉到祥子的骄傲和自恋:

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页6,5;黑体为笔者所加)

“经济人”祥子知道怎样照看自己的身体,也晓得如何把身体投资到自己的梦想中。他拒绝沉溺酒色,以免葬送身体。与洋车不同,这个身体自打生下来,就是属于自己的,而且不可剥夺。祥子起初深信不疑他能够绝对控制自己。然而小说很快证明,他想错了。

他本人的性行为首当其冲,动摇了这一信心,尽管他厌恶车主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可仍旧被她引诱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性事件,与其说由于虎妞的自作多情、自行其是,不如说因为它把祥子的身体转变成他自己无法再深信不疑的东西,从而意味深长地改变了祥子的自我欺骗。这一引诱之举,迫使祥子直面他身体里面不可知而且无法控制的东西。

不但身上好象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的讨厌她,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的从他心中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像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碎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二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得拒绝。(页 69—70,54)

将女性的性征(sex)与污点和破烂等同起来,这大概是老舍写过的作品中最具厌女症倾向的部分。然而读者不该忽视下面一个事实,即,这一段也让我们瞥见祥子对待自己的性行为时,一种极度的无常感与暧昧感。他无法确认自己究竟是受虎妞赤裸身体的吸引还是排斥,也不能告诉自己的身体去做什么,或是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指导自己的思想。面对自己内在的性驱力,祥子只是无能为力:“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页 71,55)

祥子的失贞,致使他在试图一如既往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心智、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与完整健全的状态时,遭遇到连续的挫败。起初,他被骗与虎妞成婚,因为她假装怀上了祥子的孩子,而且虎妞在结婚之后,禁止祥子重操旧业的欲望。当他试图与她理论时,她说道:“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看吧,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页 189,149)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金钱和性欲是按照男性气质界定的,

而虎妞对金钱和性欲的占有,既使她失去了女性气质,也使祥子失去了阳刚之气。他们关于金钱、权力、控制等的家庭纠纷所具有的性别特征,使祥子不能不担忧自己的男性气质。叙事者这样援引他的内心独白:

赶到别人给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地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页 188, 149)

非性别化的鸟与鸟笼的隐喻,应和着第六章将要讨论的鲁迅《伤逝》一篇所使用的类似的隐喻,在鲁迅的小说里,叙事者涓生同样在与子君结婚后丧失自由而感到后悔。饶有趣味的是,这两个例子中,都是男主人公认为自己身陷婚姻关系的网罗,尽管是女性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经过虎妞一手操办的婚事之后,祥子在金钱和女人的双重压迫下,痛惜自己阳刚之气的丧失,并且凭直觉发现,一个人的性别身份是怎样紧密地联系着权力与经济地位。此处,虎妞的雌雄同体(*androgyny*)一点也不神秘,因为她与父亲的关系(刘四爷为了自私的目的,剥削女儿的劳动),以及她精明地领会到在这个社会里金钱的重要性以及她作为女人的不利处境,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解释虎妞性格的成因。作为这个社会的产物,她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操纵、撒谎、策划、骚扰、威胁等等无所不作,以获得否则的话她无法得到的欲望对象。虽然这个女人在某些场

合使祥子这样的男人都黯然失色,但就本质而言,她是男性气质(金钱,地位,性欲)被扭曲的镜像,这一镜像正是由谴责她偏离女性气质理想的同一股力量造就的。她难产而死——一种非常女性化的死法——也许是对她的反讽式惩罚,因为她违背了这个社会的性别规范(code)。

当然,祥子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虎妞死后,他卖掉洋车,开始酗酒、抽烟、赌博、欺骗、嫖娼,并摧残自己的身体。最终使祥子彻底幻灭的是,他的心上人小福子被卖到“白房子”(妓院)后,在绝望中悬梁自尽。令人惊诧或者不足为怪的是,祥子寻找小福子,恰恰是在妓院当中,在这里他被迫面对面地遭遇他自身作为“经济人”可怕的现实生活,这体现在外号“白面口袋”的蓬头垢面的劣等妓女的恐怖形象上。如果说祥子以出卖自己的肌肉为骄傲,那么这个女人则与他相似,她自愿出卖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以自己的方式谋生。“白面口袋”自愿以妓女为职业,她在“白房子”中被视为惟一个自由的个人,当祥子发现她时,她正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与肮脏之中,屋子里什么摆设也没有,只有一铺小炕,炕上一条旧被子。这是否意味着祥子,这名自由的个人,历经几年的希望、奋斗与苦干之后,会以类似的穷困潦倒面告终?祥子在与这个女人怪诞遭遇的期间,开始严肃怀疑他本人拼搏的意义,这使祥子迅速而完全地弃绝了以前他视为生命的一切。叙事者此际似乎也愿意放弃他了:“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的车也不讲究了。”(页 291, 234)

如果说这部小说精心策划着摧毁这名诚实无欺、野心勃勃而且辛苦劳作的“经济人”,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解释它呢?

为什么老舍拒绝让祥子像他的原型鲁滨逊·克鲁梭那样，变成一名成功的英雄？此处到底是什么搞错了？尽管读者不会以为他/她是最先发问的人，但这些问题似乎仍旧无可规避。贯穿整部小说，主人公本人在试图理解自身的境况时，也尽力对付着类似的问题。如果说哈姆雷特从不行动，只是诠释，那么祥子与之类似，当他将自身的角色表演成一个“经济人”的时候，总是被一种生存的渴望驱使着问为什么，尽管他的诠释几乎总是由叙事者使用的心理分析和自由间接引语来转达。

然而这部小说所内含的诠释行为是怎样影响读者的诠释的？我并不寻求对老舍小说进行确定的解读，而是力主认为这部小说将**诠释**呈现为一个文学表述的问题。此处我关注的是小说当中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里如何解释祥子的不幸遭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曹先生与祥子最后一次见而时，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祥子实际上把这一要求，看作是要他以词语的形式重建自身生活的一次邀请：

祥子的泪要落下来。他不会和别人谈心，因为他的话都是血作的，窝在心的深处。镇静了半天，他想要把那片血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想起来，他得慢慢的把它们排列好，整理好。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是那一串委屈是真切的，清楚的。（页 275，221；黑体为笔者所加）

在我看来，这一段，以及下文我将简短引用的段落，构成了整

部小说的关键。它在再现(evoking)词语复合构词法(composition)的隐喻时(此处以黑体来凸显),批判性地反思了小说本身的语言,其批判的方式乃是集中关注言语和叙事的模式,藉此,祥子与他本人故事之间的关系必须被领会,而且藉此,叙事者的语言与其诠释的权威性必然遭受质疑。我先关注祥子的诠释,然后讨论叙事者语态的状况。

曹先生鼓励祥子谈谈自己的生活,祥子一生中难得遇到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而对他的生活产生兴趣,并且愿意侧耳倾听他的故事。^[41]陡然间,这位年轻人似乎在自身当中发现了言语的力量,开始像疯子一样讲着,希望把以往静寂无声的体验转化成一种连贯的述说,一种自传体叙事。那么,祥子本人的叙事究竟讲述了什么?它与叙事者的述说吻合吗?一种叙事是怎样和另一种叙事关联起来的?

正如叙事者在此处为我们总结的那样,祥子的叙事从他进城的事开始,他怎样开始了拉车的生活,怎样攒钱买上车,又怎样丢了,……按照历时的顺序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形。表面看来,这似乎证实了叙事者本人所提供的故事主线,但叙事者继续说道:

连他自己也觉着奇怪,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而且说得这么畅快。事情,一件挨着一件,全像由心中跳出来。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一句挨着一句,每一句都是实在的,可爱的,可悲的。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往外走,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没有一点迟疑混乱讨厌,好像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越说越痛快,忘

了自己,因为自己已包在那些话中,每句话中都有他,那要强的,委屈的,辛苦的,堕落的,他。说完,他头上见了汗,心中空了,空的舒服,像晕倒过去而出了凉汗那么空虚舒服。(页 276,222;黑体为笔者所加)

如果祥子讲述自己故事的自传式冲动被拿来向第三人称叙事的权威性(它声称凭借着心理叙事与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无限制地接近祥子的内心世界)挑战,那么,这一段落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一名自传性的叙事者会专心致志于他自己的故事,因此对它应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的确,祥子的自我叙事总是已经受到叙事者的心理叙事和自由间接引语的调解,而另一种看待祥子生活境遇的方式,则包括叙事者本人从一种身在高处的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所进行的批判性评价,这两种方式之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祥子认为自己的不幸完全是不该受的:他被社会以及他无法命名的东西,也许最好说是命运所欺骗、虐待和厌恶。但与此同时,小说却又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深刻地削弱了这种看法。我指的是第二十三章开头祥子与小马儿的祖父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后者是一名退休的车夫,现在则沦为街头的乞丐。这位老人听完祥子心中的委屈,用自己的 一生评断着祥子的境遇:

“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

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页 284—285, 228—229)

这位老人接着用蚂蚱的比喻告诉祥子,像他自己只能算独自一个儿的蚂蚱,没法蹦多高,飞多远,可是,如果结成群,打成阵,动作起来就远远不同了。

小马儿祖父的智慧非常接近叙事者本人在第二十三章结尾对祥子的评价。叙事者以自己的声音来总结祥子的一生,“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页 295, 237)叙事者的评断,以及那位老人的观点,通常被引为作者本人的结论,即对个人主义“末路鬼”的看法,以及对阶级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的需要。这一貌似无疑的诠释,因小说中叙事声音的权威地位而加强——毕竟是叙事者统辖着(commands)整个小说空间——而且由于叙事者对祥子有限的内心世界的全知姿态而进一步强化。

但小说是否真的在支持叙事者的观点,即祥子被自身的个人主义所摧毁,而且正如那位老人所言,祥子所有不幸的根源在于他缺少阶级意识,并对集体的事业漠不关心?这部小说就像在有意阻挠这种诠释一样,它还包含着另一些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以极端消极的态度,看待个人主义的对立物——集体行动,这尤其体现在围绕阮明这个人物所展开的一系列事件。阮明这个年轻人因在考试中被曹先生给了不及

格,而向官方机构诋毁自己的老师,而他本人后来则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组织车夫参加革命斗争。他拥戴左翼集体行动的事业,并且懂得怎样靠告发他人,从各种思想中捞取既得利益。祥子也被拉人阮明组织的示威活动,成为在这些场合摇旗呐喊的老行家。然而,正如叙事者冷嘲热讽地指出的,“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页 304, 246)倘若这还不足以挫杀与集体行动相关的宏伟形象的傲气,那么,枪毙阮明那一天北京街头的群众场面,则为发动群众究竟意味着什么,投下了最负面的一缕光芒。这一暴力性场景显然回应着鲁迅小说处斩阿 Q 的场面,叙事者这样说道:“人声就像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阮明)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页 301, 243)

一部这样的小说,既不赞同个人主义,也未首肯集体基础上的政治行动,我们又当怎样对待这一矛盾的迹象呢?叙事者视祥子为一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因追求“经济人”的唯我论梦想而毁灭了自身。然而,一旦祥子放弃了他的野心、独立与个人主义,他就退化到同类相食的人群当中。如果读者不落人小说本身精心设置的复杂的诠释之网,那么他/她大概也不会过度拘泥于字而地理解叙事者的评断。难道读者没有被激励着去问为什么以及非此/即彼(Either/Or)这样巨大的存在问题吗?也许小说的要旨恰恰是在诠释行为本身当中,要求诠释并也抵制着诠释,而且表述着相互批牾的诠释,作为真理假说而相互对抗。简而言之,整部小说的文学表述问题最终

与诠释问题不可分离。

虽然《骆驼祥子》所表述的多元化诠释的可能性,似可令人想起巴赫金在其小说文体学中所命名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但是我发现一个比众声喧哗的概念所能解释的要远为有趣的境况。一般说来,巴赫金的概念指的是语言的混杂建构,它被分层到“社会的方言,有特性的群体行为,职业行话,类属语言,不同的代与年龄组的语言,倾向性语言,权威的语言,各种圈子以及短暂时尚的语言,为某一天甚至某一小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服务的语言”当中。在小说话语中,众声喧哗在某种言谈的混杂建构中体现自身,而这种混杂建构“按照其语法的(句法的)以及构成法的标记,虽然属于某一个单独的讲话者,但它实际上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两种混杂的言谈,两种言说的方式,两种文体,两种‘语言’,两种语义的和价值论的信仰系统”。^[42]在众声喧哗的第一种意义里面,巴赫金描述的是一种普通的语言状况,适用于社会学式地界定小说理论,而在此处援引的第二种意义里面,他所言及的是类似于“间接引语”或者“自由间接引语”(正如叙事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命名的那样)这样的叙事模式。尽管众声喧哗的思想有助于阐明老舍的小说,但这部小说本身却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便是我所说的修辞性解读,一种符码化(coded)的解读,体现在文本本身之外或者表述于文本本身之中。通过紧密结合叙事者所提供的相互抵牾的修辞性解读,通过祥子本人,也还通过小说的文本经济学内部的其他人物形象,读者必定将他/她本人插入到(也许不止于此)永无止境的诠释过程中去。

后 记

1992年冬天我造访北京,这是八年半内我第一次重返大陆。北京城变化之大,几乎难以辨认,特别是海淀区,那曾是祥子冒着生命危险拉一位客人到清华大学而遭兵匪抢劫之地。1992年12月我在海淀时,最引人注目的景象是北京街头熙来攘往、川流不息的亮黄色“面的”(这是北京俚语称呼小型面包车的说法,“taxi”一词的直译,见附录F)。友人告诉我,负不起普通(regular)出租车车费的人觉得这些“面的”最有吸引力,因为“面的”的收费标准是十公里以内只要十元钱,十公里以上每一公里再收一元钱。于是我成为“面的”的常客,而且喜欢与司机聊天。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里,一名司机向我抱怨,他原来工作的国营工厂倒闭后,他失了业,而开“面的”工作时间太长,他一家又没有医疗保险。他说他本人的梦想是买一辆出租车,自己作老板,这样他就不用向出租车公司交付每月的高额租金了。就好像这样的说法还不足以从我脑子里唤出车夫的形象似的,他转头问我:“你知道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吧?我们是新一代的祥子。一点不假。”^[43]虽然对我来说抓住这种相似性并不困难,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他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方式。这位出租车司机是一名出色的读者,因为他把祥子读成一个比喻(trope),读成代表其他事物的一种事物,其意义并不局限在小说原来的语境,而是能被运用到理解一个全然不同的情境。

注 释

- [1] 关于前现代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惯用手法的讨论,见普安迪。
- [2] 曹雪芹, *Story of the Stone*, 1:101。汉语原文(曹雪芹,《红楼梦》,1:30)如下:
黛玉一见,便大吃一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 [3] 关于自由间接引语的讨论,见 Ullman; Lips; Spitzer; Michale; 以及 Cohn。
- [4] 曹雪芹, *Traum der Roten Kammer*, p.45。
- [5] 采用现代标点体系的各种 20 世纪《红楼梦》版本,都试图强调这一文体特征,其方法是将直接引语放在引号之内。
- [6] 也许某种程度上更为贴切的类比,是爱兹拉·庞德对于李白的自由翻译,庞德的译文有助于使现代英语的诗歌语言发生了一场革命性变化。
- [7] 老舍,《骆驼祥子》(*Camel Xiangzi*), 页 31, James 英译本, p.25。中文原文如下:
他放了心,缓缓地走着,自要老天保佑他,什么也不怕。走到什么地方了? 不想问了,虽然田间已有男女来作工。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望看见城市,……
这部小说最初于 1936 年 9 月至 1937 年 5 月连载于《手宙风》。此处我使用的版本是 1949 年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付梓的第八版。我采用了 Jean M. James 的英文译法“Rickshaw”,以取代韦氏拼音。在下面的引文中,中文原文页码在先,英译本页码以斜体形式在后。
- [8] 丁玲的小说《阿毛姑娘》是这种有关欲望的叙事的一个较早的例证,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发现自己身陷城市文化与乡村生活方式之间而不能自拔(丁玲,《丁玲小说选》,1:83—123)。茅盾、沈从文以及其他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戏剧化表现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坚持不懈地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暧昧含义。然而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没有一部像老舍的小说那样,以如此巨大的篇幅触及到个人主义的问题。
- [9] 参见刘绍铭(Joseph Lau),《中国小说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in Chinese Fiction*), 收录《东西文学》(*Literature East and West*)1970 年第 2 期,页 150; 转引自王德威(David Wang), 页 144。
- [10] 参见王德威, 页 144—156。
- [11] 顺便说一句,中文原文有 12 个定语分句,这些分句的引入,靠的是 再出现的

助词“的”，或者是耿德华(页 89)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中的“欧—日句法”。

[12] Strand, p. 38.

[13] 试举几例，在卢卡契的早期研究(1920)中，小说被理解成这样一种文类，它试图赋予现代时期以形式，从而与史诗时代形成对比，“在现代时期，生活广阔的整体性不再是被直接赋予的，”而且“在现代时期，生活中意义的无所不在已然成为一个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仍旧是以整体性的词语思考着”。(页 56)后来的理论著述，如奥尔巴赫(Auerbach)的《模仿》(*Mimesis*)，伊安·瓦特(Ian Watt)的《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Rhetoric of Fiction*)，热奈特(Genette)的《叙事话语》(*Narrature Discourse*)，科恩(Cohen)的《透明的心智》(*Transparent Minds*)，巴特(Barthes)的《S/Z》，以及巴赫金的《对话式想像》(*Dialogic Imagination*)，此处仅列举一些熟悉的题目，它们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小说当中文学表述问题的理解。巴赫金对于小说文类文体学的研究已经教导我们，并非“人的形象本身，而恰恰是作为语言形象的人，才是小说表述的对象”。(《对话式想像》，页 336)

[14] 罗森伯格，页 30。

[15] 安敏成，《现实主义的局限》(*Limits of Realism*)，页 7。彭小妍近期研究现代小说时(页 4)，重新思考了现实主义问题，它涉及到中国人在整个 20 世纪对于乌托邦的追求。

[16] 《骆驼样子》最初连载于《宇宙风》之后，其手稿保留在该刊前编辑陶亢德之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没收。1982 年，丁景唐在上海图书馆“没收物品”之中发现了这份手稿。对该手稿的论述以及对该小说种种版本和修订本的研究，见丁景唐的《老舍〈骆驼样子〉原稿》。

[17] 参见老舍，《〈老舍选集〉自序》，收录曾广灿、吴怀斌编，上卷，页 630—631。

[18] 参见史承均；以及徐麟。

[19] 史承均相信，新版胜过旧版。

[20] Jean M. James 的英译本借用香港重印的 1955 年之前的版本之一，复原了那些缺失的章节。James 和斯特兰德都说把“Ruan”(阮)译作“Yuan”。

[21] 王德威，页 156。

[22] 并非每一个人都关注老舍小说的现实主义。譬如 Evan King 1945 年的英译本名为 *Rickshaw Boy*，已不仅仅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这一译本比中国 50 年代的修订本更为大胆的是，它自行发明角色，砍掉并重写这部小说，甚至提供了一个人团

圆的结局,让祥子与小福子逃离残酷的现实,最终获得自由。对此结局的批评,见樊骏。

- [23] 举例说来,斯特兰德(页 282)批评老舍苛刻地对待从事政治的人,譬如阮明这样的民族主义劳工组织者。出于更正这部小说可能存在的有意的偏见这样一种渴望,他说道:

老舍对于阮明和四爷这样的从事政治者所进行的机敏(deft)刻画,类似于 20 年代的论战者为其对手所构造的形象,就此而言,我们能够既欣赏城市政治中甚嚣尘上的机会主义,也能领悟行动主义者和普通市民间呈现的对于一个道德中心的潜在渴求。然而,老舍对现代政治的厌憎,虽然是许多同时代的人所共享的一种情感,却遮蔽了大众的灵感、传统的政治母题以及现代的意识形态在中国 20 年代的都市共同的适应点。

早在斯特兰德的批评之前,“新版”也删去了以消极态度刻画阮明之革命行为的段落,并意味深长地改变了每次阮明的名字被提起来时原有的措辞。对于这些段落以及“新版”删砍部分的详细讨论,见史承均。

- [24] 第二次提到“车”时,仍旧是叙事者自己的词汇,因为使用“自由”和“独立”这样抽象的政治术语,不是车夫的特征。
- [25] 叙事语态(voice)与叙事视角的区别,见热奈特。
- [26] Erich Kahler 的《叙事的内转》(*Inward Turn of Narrative*)出色地梳理了欧洲小说在近几个世纪怎样经历了这种内在化的过程。虽然同样的过程在 20 世纪的转型期“拥挤不堪地”涌入中国现代小说,但它对老舍这样的小说家书写一名劳动者的内在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尚待以后见出分晓。
- [27] 譬如祥子到了曹先生家后,叙事者描述了祥子是怎样盘算自己在曹宅的境遇的:“况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自己掏钱吃饭,他决不会吃得这么样好,现在既有现成的菜饭,而且吃了不会由脊梁骨下去,他为什么不往饱里吃呢;饭也是钱买来的,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页 65, 59)类似这样的段落,小说中俯拾即是。
- [28] James 对最后一句的翻译是一次误译。“有一本账”并非指“to have a bill due”,而是指“to have an account balance”。
- [29] 参见巴赫金,《对话式想像》,页 247。
- [30] 瓦特,页 63。(中译本见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第 65 页。——译老注)

- [31] 关于作者自述其 1924 年秋天到 1929 年夏天在伦敦大学的生活,见老舍,《东方学院》,收录曾广灿、吴怀斌,1:135—140;《我的几个房东》,同上,页 129—134;《写与读》,收录胡絮青,页 377—386;《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同上,页 3—9;《我怎样写〈二马〉》,同上,页 15—21;《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同上,页 22—30。
- [32] 老舍,《我的“话”》,收录曾广灿、吴怀斌编,页 583。
- [33] 参见王德威,页 126—127,189—190。事实上,老舍在撰写《骆驼祥子》期间,曾写下题为《新哈姆雷特》(1936)的短篇小说。1942 年,他写了一出戏剧,名为《归去来兮》,该剧原名即《新哈姆雷特》。他决定改换题目,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将 Hamlet 名字的汉语音译词误认为西方的神药,譬如阿司匹林(在汉语中没有仿译词)之类的东西。参见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收录胡絮青,页 118—119。
- [34] 中文原文要比英文译文更口语化,因此更接近样子本人的语言。
- [35]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讨论了“北平口语”的用法,收录胡絮青,页 70。对于他本人使用这种方言的更详细的讨论,见《我怎样学习语言》,同上,页 139—147。
- [36]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收录胡絮青,页 68—69。
- [37] 有关李景汉著作的讨论,见斯特兰德,页 21,30。
- [38] 斯特兰德,页 36。
- [39] 《19 世纪 80 年代的北京》,收录 Werner,页 167;转引自斯特兰德,页 24。
- [40] 在《二马》这部以伦敦为场景的早期小说中,老舍的叙事者在描述李子荣,一位多年生活在伦敦的学生企业家,与马威,刚从中国来到伦敦的主人公,二者之间的第一次相遇时,便奇特地影射到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的亲热关系。亦见老舍,《老舍文集》,1:466。
- [41] 在小说前面部分,曹先生被描绘成一名自居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他很受了威廉·莫利司(William Morris)的一点影响。按照叙事者的说法,这名大学教授“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伪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

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这有时使他自愧,有时也使他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页 66—67, 60—61)叙事者对曹先生掺杂着钦羨与讥笑的语调,能否是老舍对其本人 30 年代作为小说家和大学讲师的自画像?曹先生以左翼知识分子屈尊俯就的方式同情祥子,老舍与之有很多相通之处,于是他为下层阶级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矛盾的空间,以在读者所关心之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主张。

⁴² 巴赫金,《对话式想像》,页 262—263。

⁴³ 我不能肯定这名司机究竟是读过老舍的小说,还是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读与看的差异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应当贴切地表达,但我想强调的是,精英文学、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概念在应用到中国的情境之前,值得深细的反思,譬如,《骆驼祥子》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的阅读,读者既有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工人,也有城市下层阶级的劳动者。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 现实与梦想的争辩

老舍小说的叙述者对祥子内心意识的透视昭示的挑战和变革远远超越了现代中国小说所取得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度或方式。其实，中国文学与欧洲大陆以及日本小说杂交的首要成果之一便是讲述行为带来的内心世界客观化。还有什么比曾经流行一时的解剖比方，即我们在第二章中简要提到的那个借喻更能说明问题呢？以解剖人体服务于科学研究的手术刀，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群中，转化成了对写作功能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郁达夫曾列举许多欧洲自传体写作实例（特别是 Henri Amiel 的日记）论证道，第一人称叙述最适宜于完成“剖析自我”的任务。^[1]科学解剖的借喻形象地道出了叙述内转对开掘人类深层心理的有益贡献。正如埃里希·科勒（Erich Kahler）在他对现代欧洲早期的叙述内在化以及个体心理学兴起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人的随从及其自身的内心生活成了有意观察的对象。就是说，它们被客观化了。”^[2]这一客观化进程将指向连结科学、社会与文学的一种重要关系的历史性显现，而后者则直接推动着以表现内心世界为目的的一套独特叙事模式的创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正在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毫无保留地汇入科学与文学共融的有机体当中。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即开创性的《狂人日记》通过俄国作家果戈理之手把一种极度分裂的内省之声引入了中国文学。但几乎就在同时，它向试图以医学名义来涵盖狂人写作的叙述框架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人们时常道及的一段用庄重文言写成的框架性叙述里，小说编者向我们透露：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3]

这种传统叙述框架的作用在于，它把狂人的写作放进了一个向我们开放着的视角当中。但是，怎么样一种视角呢？^[4]如果编者按语后面的那些荒唐之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某种心理疾病的病理学症候，那么我们或许会相信编者果真采取了“规范”的视角。然而，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囿于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阅读和写作的这一象征功能与科学解剖的借喻所表露出的实证主义乐观之间产生了隔阂，结果前者推翻了后者。在此，我们目睹了发生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初期的一桩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彼此展开思想竞争的有趣个案，在这场角逐中，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关于人类心灵的真实与虚幻的知识。

重新勾画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我对老舍小说风格学的探讨集中在老舍是如何借鉴欧洲叙事技巧建构笔下那个沉默寡言的主人公祥子的内心世界的。本章将从一个约略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多种形态的欲望叙事将被纳入到一个由(伪科学)心理和精神分析话语日益合法化及其对20世纪初期汉语写作与文学批评之含义构成的较大语境中加以考察。与弗洛伊德、哈维洛克·葛理斯(Havelock Ellis)或者说精神分析一般理论的接受史相比,我在这里尤为关注的是中国小说中作为跨语际表述模式(translingual mode of representation)的欲望叙事问题。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1907年就被译介到了中国,并在相当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中间引起了注意。^[5]一些学者就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以及他在《野草》和《故事新编》中尝试使用某些弗洛伊德观念的情况发表了评论。^[6]其他如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潘光旦对冯小青个案的著名研究,张竞生颇受欢迎的生物学与性学写作,以及施蛰存以《将军的头》和《石秀》为代表的心理小说。^[7]这些事例精彩地讲述了中国作家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精神分析语汇的情况,然而,以下我对施蛰存作品的讨论将表明,弗洛伊德主义的借用仅仅是造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欲望文学写作地位发生动摇的多种不定因素中的一个。为了把“欲望”的含义恰如其分地融汇到这个现代语境当中,我们不得不尽量廓大我们的探索视野,以便使它既要

涵盖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容易混淆的术语,又要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质疑。这就是说,欲望(desire)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性(sexuality)。在这里,一条有益的探索路径应该至少包含对20世纪语境下真实和虚幻界限的重新勾画,西方参照的盈缺的新鲜感受,以及从多种跨语际讲述模式(translingual modes of storytelling)之中浮现出来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感性和经验形式的细致研究。

1922年,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残春》。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爱牟的留学日本的中国医学生。一天,爱牟乘火车去附近小镇上看望一位因失去父母企图自杀而后住进医院的老朋友。在那里,他意外地邂逅了一位名为S的日本女护士,并深为她的美色所倾倒。这天夜里,他悄然入梦,梦见自己正与那位日本姑娘偷偷地在山顶上幽会。卿卿我我一阵丝语之后,女孩儿告诉爱牟,她正在经受肺结核的折磨,并央求他为她诊治。她随之宽衣解带,将自己的酥胸展露在他那充满渴羨的目光中。恰在此时,一位叫白羊的朋友突然出现在眼前,带来了爱牟妻子杀死了他们两个儿子的噩耗。爱牟匆匆起身返回恐怖的现场,目睹了幼子被砍去的四肢横躺在鲜血淋漓的地板上的惨景,而妻子站在一旁发疯似地挥舞着手中的短刀威胁着他。于是,他没有进行丝毫的反抗,让妻子手中的利刃穿透了悲愁郁积的心胸,怀抱着孩子们的遗骨倒在了地上。夜梦到这里嘎然而止,爱牟从梦中醒来,十分惊异于梦中无所不在的征兆。^[8]

在小说发表后的一年,郭沫若在同一刊物(第二卷第三期)上推出了《批评与梦》一文,告诫读者应该如何去理解小说中的梦境象征。面对某些人指责它平庸的酷评,^[9]郭沫若指

出,把这个故事读作由开始、高潮和结局构成的直白叙事是错误的,因为他想借助于梦境象征的形式着力展现人的利必多(Libido)、性冲动、压抑以及无意识。他的阅读接近于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依托的现代阐释理论。因为小说主人公是已婚男子,他不能对别的女人心存非份之想,小说暗示我们,他无意间压抑了自己的欲望,直到有一天梦想以象征的替代形式将无意识诱发了出来。郭氏进一步解释道:

梦中爱车与 S 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及到爱车将去打诊,便是两人的肉体将接触时,而白羊匆匆走来报难。这是爱车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的障碍,故入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中所感受到的最大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10]

作家直接站出来维护他或她的作品的情形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但郭沫若为何要花费这般力气拿弗洛伊德来使他的小说合法化呢?(这则故事可以解释为一位中国男人对一位日本女人的渴望,一种超越单纯性爱的民族亲善的渴望。)是什么原因促使郭沫若如此不假思索地将“欲”和“情”(相当于西语 desire/lust, feeling/passion/emotion 的本土思想观念)嵌入了文章新造出来的一套词汇之中?这套词汇所指代的意思被想当然地设定了外文对应词:“欲望”(desire),“潜意识”(the subconscious),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乍一看来,围绕《残春》展开的批评挑起的好像只是创作界和文学圈对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甚或象征主义与中国文学相关性的

论争,然而,在中国文学界,郭沫若对弗洛伊德的援引似乎使争论超出了表面的问题指向了日趋动摇着的阐释权威地位,在那里,文本、阅读与批评的关系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变。例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当郭沫若把精神分析方法拓展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以及传统戏剧《西厢记》那里时,他的阅读不可避免地使传统文本的意义“现代化”了,而梦境象征主题的阐释也发生了逆转。在此,人们觉察到了思想话语深刻的时代变化,在这个时代里,阐释行为变成了各种不同理论和话语竞相登场争夺各自合法性与权威的场所。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言缺乏表现内心世界的资质。事实上,五四早期的作家们深受旧学浸染,他们常常用古典诗词来表现自己。但是,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把20世纪对人类心灵的心理学理解投射到过早的时期里。在已经逝去的百年里,我们对什么构成了人类内心世界的感受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准确地说,这些变化来源于早期以现代心理学名义对传统的激进改造——以致我们从这里人手无法找到中国古今文学的比较依据。比如说,我们是怎么知道“情”和“emotion”或“feeling”是一回事的?我们怎么才能证明文言词“欲”与新兴的用法“欲望”,或者说文言词“心”与双向的外来词“心理”(psyche)等同呢?我这里想要强调的与其说是比较的因素,不如说是历史的因素。当我说五四文学自觉地服务于专门探测人类深层心理的知识时,我所指的仅此而已。当“心理”和“欲望”能够被翻译,而多种跨语际叙事模式(translingual modes of narration)开始重新组合人类内心的真实与虚幻之时,心灵就可以进行分析了。

我对郭沫若的审视期望有助于将心理现实主义问题纳入

到诸多跨语际表现模式的框架中去,通过上述诸模式,理论、批评与创作相互决定着现代文学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的问题。鉴于文学文本不可避免地阐释行为结合在一起,如果缺少对给定文本当中的表现与试图激发并维持读者“理智”(可接受?)阅读渴望的文本内外的阐释机制间关系的洞察,我们将无从谈论内心世界的表现。这是我在前一章里针对老舍小说采取的阅读策略,在本章中,我对施蛰存和郁达夫的分析仍然依赖同一策略,以期揭示出心理叙事中真实与虚幻成分的多重意义。

梦幻的心理化

严家炎注意到了施蛰存早年对弗洛伊德的迷恋,并把这种迷恋部分地归因于像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这样的欧洲作家以及日本新感觉派精神分析创作的影响。^[11]李欧梵也指出了施蛰存对坡,巴尔贝·多尔维里(Barbey d'Aurevilly),詹姆士·法拉策(James Frazer),安德鲁·郎格(Andrew Lang),Fiona Meleod,勒法努(le Fanu)的兴趣以及他对弗洛伊德的明显偏爱,后者指向为自我所无法控制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力量。^[12]其实,施蛰存小说表现出一种耽于幻觉、梦境、暴力、魔法、巫术、占卜、妖术等等诸如此类主题的鲜明倾向,它们几乎都能诱发精神分析式阅读。就分裂的身份(split identity)、移置(displacement)、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以及性压抑(sexual repression)这些概念在施蛰存二三十年代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中得心应手的程度来看,精神分析方法确已非

常成熟,另外几位现代作家对它的运用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之所以如此,原因并非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灵的阐释是能够揭示内心真实、解释古往今来一切梦幻的普适密钥——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提供的许许多多反例会使弗洛伊德的语汇变得并不必要——而是因为这是一批有意尝试在中国小说和弗洛伊德主义之间建立一种跨语际关系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在此意义上,他们用弗洛伊德术语来重组欲望的做法有力地拉动了精神分析式阅读。郭沫若对《残春》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作家如何借助弗洛伊德主义重思欲望本质及如何用现代文学语言表现它的绝好例证。

当自以为启蒙了的思想家们纷纷斥责早期宇宙论的和臆想式的解梦为迷信愚昧时,梦境象征这种曾为过去的中国志怪小说增色不少的艺术手段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化过程。例如,撰写一度成为早期现代文学主要灵感源泉的《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就曾列举了在他看来应从语言中排斥出去的十类“非人”文学。其中为首的便是“色情狂的淫书类”,“迷信的鬼神书类”以及“神仙和妖怪书类”。原因是“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13]这样,梦境阐释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开始承担起用科学术语解释人类内在生活的任务,并使得自身因此能够被划归为心理现实。

施蛰存的精神分析小说正是那个日趋变化的环境的产物。然而,就在精神分析好像被完全接受了下来,在弗洛伊德的影响显得无可争议的地方,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它期待着解释,而这番解释又势必会使我们对这种影响的理解复杂化起来。我自己的阅读则试图直面隐藏在施蛰存那种对异常与梦

幻的特殊偏好之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笔下的弗洛伊德式象征无疑应属于心理现实主义范畴,但另一方面,这种象征的运用又被认为是使可以说已为五四文学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的志怪及其他的古典文学主题(topoi)返回了中国文学,结果带来了作为象征资源出现的志怪小说的再度合法化。^[14]

作为《现代》杂志的主编,30年代的施蛰存一直致力于提高包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吉尧姆·阿波里耐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安德列·布勒东(André Breton)、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以及日本新感觉派在内的现代文学的声望。^[15]而施蛰存是经由哪条思想道路才来到了他那独特的弗洛伊德式的梦幻解释呢?人们经常忽略掉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他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短暂迷恋。作为上海法国天主教震旦大学法文班的毕业生,施蛰存非常熟悉安德列·布勒东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作,后者为他的梦幻文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甚至把“超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塞进了他的一篇小说当中。^[16]

布勒东曾经以弗洛伊德的语言毫不妥协地宣告了自己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理性化倾向的不满。正如他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表白那样:

事实上,众所周知,那些狂人把他们的镣铐入狱归咎于为数不多的受法律诅咒的行为,如果不是这些行为之故,他们的自由(或者我们视为他们的自由的东西)就不会遭到威胁。我则甘愿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自己的想像的牺牲品,因为是想像诱使他们疏于关注某些为

我们所熟知和尊重的规则，离开了这些规则人类就会感到受到了威胁。但是，他们对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置若罔闻态度，使我们猜想到，他们从自己的想像中获得了极大的舒适和安慰，他们充分地享受着疯狂，从而抵御住了自身之外疯狂不再会有的思想的煎熬。其实，幻觉、迷影等等并非只是些一时之快的根源。^[17]

布勒东陶醉于人类的心智及其僭越和发狂的潜力。例如，小说《娜佳》(*Nadja*) 中的那个桀骜不驯的女主人公，就是因被社会目为疯人关进了精神病院。布勒东控诉现代文明把幻觉和迷信从人心中抹除的罪恶，并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力恢复内心生活里被压抑的一面。死亡、利必多、神秘、疯狂、潜意识、幻象、浮想等等主题充斥在他以及追随他的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之中。我们了解到布勒东曾经想当一名医生，为此他曾与巴宾斯基(Babinsky) 共同研习此道，战争期间，他还在一家精神病院做过几个月的实习医生。众所周知，《娜佳》对疯人院和法国精神病医生大加挞伐，但苏珊·苏雷曼(Susan Suleiman) 在《颠覆的意向》(*Subversive Intention*) 一书中的分析则表明，精神病医生与病人会面的模式贯穿了布勒东创作中的内在化过程，以致置身其中的作家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病人的观察、诊断及与之进行的交谈构成的这个模式，来源于布勒东与娜佳面对面的会晤以及他对这次会面前因后果的详尽记录。布勒东以此能用一个疯女人来“‘操纵医生’，设身处地地对她进行了解，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忘却各自的身份('qui je suis')”。没有与她产生瓜葛，没有‘丧失自我’，也没

有去‘追求’她”。^[18]

可以说,施蛰存的作品展现出了与布勒东的写作类似的主题和动机,尤其是在《石秀》、《夜叉》及下面将要讨论的《魔道》里,女人成了幻觉、诱惑、神秘与死亡现象中的永恒人物。享誉一时的小说《石秀》便是用精神分析方法对《水浒》一个片段的改编。石秀对结拜兄弟之妻潘巧云实施的恐怖犯罪是从性压抑的角度加以叙述的,而这压抑以男主人公屠杀和肢解欲望对象的方式得到了发泄。原故事的暴力色彩就这样得到了心理化改造并被赋予了精神分析的解释。^[19]

用汉语写作的施蛰存以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必然不同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了精神分析方法。其重要的革新之处在于他引进了超现实主义的怪诞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之间的象征性关系。我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为施蛰存提供了一套语汇,使得他把古代志怪小说转化为了一种中国形态的超现实主义小说。^[20]

弗洛伊德自己曾经列举过翻译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功用。在《梦的释义》中,他写道:“梦的隐意(dream-thoughts)和梦的显意(dream-content)就如同同一事物以不同语言写成的两个版本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准确地说,显意好比是将隐意转换为另一表达方式的翻译,而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原文和翻译的对比来发现这种表达方式的字汇和句法。”(黑体为引者所加)^[21]弗洛伊德坚信梦境象征是一个拥有自身句法、逻辑和应遵循一致性的表现和阐释问题。为了从内心的无意识混杂中抽取出一致的意义,完成他对梦境象征的阐释系统,弗洛伊德不得不先验地设定无意识具有语法和句法,以至于经过职业释梦训练的精神分析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揭示它的面目。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在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灵的思索中,

无意识语言及其可表现性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在《梦的释义》及其他著作中,弗洛伊德苦心孤诣地致力于创造一套象征性语言,以便使精神分析学家能够借此讲述一个有关人类心灵的“理智、连贯和完整的”故事。^[22]

人们对叙述连贯性的神话并非没有异议。斯蒂芬·马尔库斯(Steven Marcus)就曾对弗洛伊德的讲述方式提出了批评:“对曾经孕育出自己的主潮之一即19世纪资产阶级小说的那种文化来说,再没有比弗洛伊德对连贯性讲述(coherent storytelling)具有的治疗效果的崇信更应向它支付酬劳了。”^[23]问题的确如此,除了按照人类的叙述冲动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之外,弗洛伊德何曾做过其他的事情呢?也许理论家更应属于那种讲故事的职业,而不是医生。或许两者在弗洛伊德洞察到的某些基本方式上本是彼此不可分隔的罢。^[24]

施蛰存的小说《魔道》(1932)把梦幻制成了表现那种无法表现的内心无意识的象征性语言,就这一点来说,它的运作仍然受了类似的叙述冲动的驱使。但必须注意到在这一语言转换过程中,弗洛伊德主义的含义正在发生着变化:施蛰存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语言把恐怖、欲望、命运与迷信的古典文学主题重新带回了中国现代小说,他使梦幻文学变得日趋心理化从而挽救了古代志怪小说。至此,我上文就鲁迅小说提出的科学与文学话语之争变成了一种悬置的叙事(a narrative of suspense),其间真正的现实观念在心理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摇摆不定。

然而,说施蛰存通过他的小说使梦幻文学日趋心理化,并不意味着早期志怪小说缺乏心理深度。我在此所关心的与文学表现和内心现实的对等(adequatio)绝少关系,后者的

概括只能依赖于对语言如何行事的形而上学理解。我的方法毋宁是要将表述语言 (the language of representation) 列为有待探讨的问题从而达到对施蛰存文学话语的变动状况的历史性理解。梦幻文学没有必要宣称心理深度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但假如情况果真如此, 就像在下面讨论的事例中即将看到的那样, 那它或许更能深刻地揭示对梦幻文学构成因素的灵活领会, 以及之所以驱使作者从事此类创作的原因。

《魔道》采纳了一个程式化的故事线索——艳遇 (a erotic adventure)——沿袭了传统志怪小说的写法。典型地说, 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往往为一介聪慧书生, 在云游四方或晋京赶考的途中无意间邂逅了一位绝色佳人。才子与佳人彼此顿生爱慕之情。于是, 佳人遂邀书生彻夜畅谈诗书, 同床共眠。最后, 书生恋恋不舍地与佳人作别, 继续踏上了旅程。然而故事的点题之笔往往姗姗来迟, 书生终于发现与自己苟欢的原来竟是只狐狸精 (或是一位病魔缠身的女魂), 而卧榻之所只是她在庭院中施展魔法变化出来的亭台屋宇。^[25] 自从志怪小说发端以来, 在这一原型叙事的基础之上还衍生出了许多变种。^[26]

施蛰存《魔道》的背景虽然在 20 世纪, 但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主人公卷人的同样是一场类似的艳遇。小说叙述者生活上海这座大都会里, 他阅读外国书籍, 出没于咖啡馆和电影院之间, 兴之所致, 便乘车出游。故事讲述的正是他的一次周末旅行, 目的是到坐落在上海郊外的一处西式别墅中同朋友们聚会。就在乘火车途中, 他陷入了由对面老妇引起的幻觉当中。这个面目狰狞的老妇是谁呢?

我开始动了我的疑惑。我觉得这个老妇人多少有点神秘。她是独自个，她拒绝了侍役送上的茶，她要喝白水，她老是偏坐在椅位的角隅里，这些都是怪诞的。不错，妖怪的老妇人是不喝茶的，因为喝了茶，她的魔法就破了。这是我从一本什么旧书中看见过的呢？同时，西洋的妖怪的老妇人骑着笤帚飞行在空中捕捉人家的小孩子，和《聊斋志异》中的隔着窗棂在月下喷水的黄脸老妇人底幻象，又浮上了我的记忆。我肯定了这对座的老妇人一定就是这一类的魔鬼。（页 88）

文中对蒲松龄的鬼怪小说以及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巫婆形象的提及是别有意味的。它们从两种不同传统里归纳出了一套共同的文学谱系，而且两者都宣称要努力使梦幻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里再度赢得合法地位。小说中的妖妇形象所指代的正是这个词汇准确的字面含义，因为小说通过题目对以往文学文本的征引以及对自身文本间地位(intertextual status)的反思，使妖妇形象同过去的文学文本联系起来。书名所指涉的东西，应该受到读者的重视，因为它对文本中的象征性阅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figural reading)起着文字索引的功能。^[27]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评论者的阅读必须介入，或者至少在某程度上对文本之内出现或进行的阅读行为作出回应。叙述者随身放在小皮箱里来消磨单调乏味的旅途时光的是些什么书呢？他首先提到的是 *The Romance of Sorcery*。还有一张外国作品中译本的书单，包括勒法努(Le Fanu)的怪异小说《波斯宗教诗歌》(*Persian Religious Poetry*)，《性欲犯罪档案》

(*Cases of Sex Crime*)和《英诗残珍》(*Treasures of English Poetry*),除了以上五本之外,另有一卷《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y*)。就这样,妖妇、诗歌、性以及心理学像一个个清晰的路标一样矗立在施蛰存跨越它重塑志怪小说的意义地带(the territory of meaning)。

小说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场景表明了幻想与心理在故事里相互穿透的状况。叙述者在朋友家中刚刚落座,就应邀共进晚餐。席间,女主人恰好身穿一件低领轻绸外衣,这使她看上去非常富于肉感。叙述者对这位性感女人的反应以鲜明的弗洛伊德的升华和移置语言被描绘了出来:

我觉得纳在嘴里的红红的番茄就是陈夫人底朱唇了。我咀嚼着,发现了一种秘密恋爱的心酸的味道。我半闭着双眼。我有开着的一半眼睛看真实的陈夫人底颦笑和动作,而把闭着的一半眼睛耽于幻想的陈夫人之享受。我看见她曳着那白的长裾从餐桌底横头移步过来,手扶着桌子的边缘。我看见陈君退出室外去了。我觉得她将右手抚按着我的前额了——是的,其实她这时正在抚按她自己底前额。我放下了刀叉,我偷偷地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擦了一下嘴。我看见很大的一张陈夫人底脸在凑近来。没有这样白的!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日本女人也不会有这样惨白的脸。她微笑了,这是一种挑诱!她竟然闭了眼睛!怎么?我们已经在接吻了吗?我犯了罪呢。陈君最好此刻不要进来,……也不要谴责我。(页 61—63)

叙述者感觉陈夫人的朱唇就像是一片鲜红的西红柿,他的欲望因此升华为含纳它的动作。西红柿片转化为了富于肉感的对象,而咀嚼则变成了性表演。在此,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移置过程(a multiple process of displacement),其中女人的性被升华为嘴唇,嘴唇随后又被替换为西红柿片。弗洛伊德在梦境思想分析中所概括的梦的运作过程(a process of dream-work)在这一描述中得到了回应,后者采用了升华、移置、倒错(reversal)等等精神分析的象征。^[28]

第二天清晨,当他瞥见陈夫人怀揣一只黑猫之时,同一个女人在叙述者的眼里顿时化作了--名妖妇。恐怖的谜底就像超现实主义笔下的圣人显灵一样闪现在眼前:原来陈夫人正是那个到处尾随他的老妖妇。惊恐之余,叙述者匆匆离开主人逃往上海。到了城里,他又急忙去找一位做咖啡馆侍女的旧相识,两人相约来到酒吧。然而她那古怪的穿着又让他想起了陈夫人,就在他亲吻她的一刹那,她也立即变成了一个妖妇。20分钟过后,他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份电报,告诉他三岁的女儿已经死去了。从自家公寓的阳台上望下去,他的目光与一个身着玄衣的老妖妇的恐怖眼神撞在了一起,就是那个到处窜来窜去的人,此刻她正一瘸一拐地缓慢地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去。

与古代志怪小说不同,施蛰存的小说始终也没有向主人公交待妖妇的真实身份,尽管作家越来越相信她的现实性是故事的谜底所在。另一方面,读者却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阐释上的谜团:这妖妇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抑或仅仅是一种幻象?如果她只是由叙述者的妄想症(paranoia)引起的幻觉,那为什么故事还像许许多多的传统志怪小说那样包含着一个

“无法避免的”死亡呢？既然妖妇被指认为一个幻想的生灵，那叙述者又为何频频提及他由于过多地阅读文学作品而引起的幻觉经验和神经崩溃呢？梦幻与心理之间的模棱两可使那种将两者截然分开的作法本身成了问题。正如精神分析语言谋求用怪诞的象征术语来解释人类的无意识一样，施蛰存小说中的梦幻成分将自身制成一种试图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的超现实主义语言，不可言说，是指它超出了“现实主义”经验解释的有效范围。二者在超现实主义表现层面上形成了彼此相互穿透的态势。

我建议读者不必以叙述者与梦幻之间的纠结为出发点。虽然叙述者要求读者了解那个无处不在的妖妇的身份，但读者可以将阐释问题自由地放置在与叙述者世界的异源叙述关系(heterodiegetic relation)当中。^[29]也就是说，他或她可以置叙述者的象征性阅读于不顾，转而把梦幻的疑问放在谜团的根源即叙述者本人身上。

叙述者对妖妇的恐惧与其对女人们的纠缠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小说提到的女人有八个之多，还不包括他在旅途阅读中所碰到的那些。有趣的是，多数女人变形为妖以及叙述者对这些变形的表述为如何把梦幻把握为阐释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下面是叙述者对陈夫人变形的描述：

已经被忘却了的恐怖重又爬入我的心里。我昨晚怎么会幻想着她与我接吻的呢？她是个妖妇，她或许就是昨天那个老妇人的化身。——所以她会把她的身影变作玻璃窗上的黑污渍指给我看。我起先的确看见玻璃窗上并没有什么污点斑点的。啊，可怕，……(页 65)

与前一天夜里叙述者因想像中的接吻而背负的罪感以及他对被压抑欲望的体验形成对比,他现在把陈夫人视为一种真正的恐怖,肆无忌惮而不可理喻。这一逆转导致了显著的心理移置:这使他变成了骚扰的受害者,而不是潜在的罪犯。早些时候在火车上出现的那个老妖妇形象现在附在了陈夫人身上。这种幻觉变形好似魔道或巫术一样贯穿了小说始终,把年轻貌美变成了苍老丑陋,把渴望中的佳人变成了令人生厌的生灵。

在故事结尾处,女儿的死讯传来,叙述者的妄想症发展到了确确实实的受害状态。事态的逆转在整部小说的构架中显得有些近情理,因为故事前面并没有提到他还有个女儿。另一方面,噩耗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被预示出来,一种不祥之兆从头到尾一直笼罩着叙述者,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令他神魂颠倒、惊奇不已。叙述者几乎是以一种超现实主义语调来描述女儿的死讯的:

侍役送上一个电报来:

我的三岁的女孩子死了。

我把电报往地下一丢,站起身来走向露台上去,街上冷冷清清地显得已经是半夜里了。我听见一个辘辘的声音,很迟慢地在底下响着。我俯伏在栏杆上,在那对街的碧色的煤气灯下,使我毛发直竖的,我看见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趑进小巷里去。(页72)

叙述者对女儿猝死的反应被压缩成聊聊几句话,作家也

没有刻意去形容他的感受。相反，笔锋转到了他此后所看到的一切，故事硬是把两件事放在了一起。我们在妖妇与女儿暴亡之间领会到的那种联系使得小说在超现实主义象征的较高层次上将梦幻与心理内容融为了一体。幻影得到了奇遇的印证：妖妇原来是死亡的使者。

但是，这个悲剧事件和叙述者的伴随着妖妇形象频频露面的被压抑着的性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下面这段由王妃的木乃伊触发的一番想像，或许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叙述者向火车窗外放眼望去：

那边一定是个大土阜，隆起着。如果这在中原的话，一定就有人会考据出来，说是某一朝代某王妃底陵墓的。那么，一定就有人会去发掘了。哦，以后呢？他们会发现一个大大的石室，中间有一只很大的石供桌，上面点着人脂煎熬的油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棺材，朱红漆的，当然，并且还用黄金的链吊起着。还有呢？他们就把那棺材劈开来，是的。实演大劈棺了。但是并没有庄周跳起来，里面躺着一个紧裹着白绸的木乃伊。古代的美貌王妃底木乃伊，曳着她底白绸拖地的长衣，倘若行到我们的都会里来，一定是怎样的惊人啊！……惊人？还不止是惊人，一定会使人恋爱的。人一定会比恋爱一个活的现代女人更热烈地恋爱她的。如果能够吻一下她那放散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怎样？我相信人一定会有不再与别个生物接触的愿望的。哦！我已经看见了：横陈的白，四围着的红，垂直的金黄，这真是个璀璨的魔网！

但是，为什么这样妄想呢？也许石室里是乌沉沉的。

也许他们会凿破七重石门,而从里面走出一个神秘的容貌奇丑的怪老妇人来的。是的,妖怪的老妇人是常常寄居在古代的 *catacomb* 里的。于是,他们会得乱纷纷地抛弃了鸦锄和鹰嘴凿逃走出来,而她便会得从窟丛里吐出一重黑雾来把洞口封没了的。但是,如果那个美丽的王妃的木乃伊是这妖妇的化身呢?……那可就危险了。凡是吻着了她的嘴唇的人,一定会立刻中了妖法,变鸡,鸭,或纯白的鹅的。变作鹅,我说这倒也不错。我想起了那个雕刻来了。那天鹅不是把两翼掩着丽达底膝而把头伸在她底两腿中间吗?啊,超现实主义的色情!(页 47—49)

在黑与白、生与死、妖怪与美人构成的辩证关系得到充分展现的浓重的象征中,恋尸的幻想记录了叙述者的利必多欲望。黑色、垂死与妖妇对应着白色、生气和美人。双方能够彼此相互转换,就像美艳的陈夫人在叙述者的想像中变形为妖妇一样,她修长的白裙时常令人想起远古时代王妃的打扮。也许在他的所有想像中,真正的欲望对象是那位可望不可及的陈夫人,面对她丈夫的深深负疚感使他感到痛苦异常。^[30]宙斯化作天鹅强暴丽达的故事的引入,则表示叙述者的欲望是同样的侵占或曰私通。但对世俗中人来说,犯罪就要受到死的处罚。就像宙斯恶行的果实特洛伊的海伦捣毁了整个城邦一样,女人与死亡,或者说罪过与死亡结成了永恒的对子。与如此神秘的女人观相应,死亡对叙述者显得非同寻常。在他那里,女人是一个悖论:她既给予生命又毁弃生命;她既是纯洁的,又是污浊的,污浊乃是因为她的性征。

性爱想像使叙述者对死亡的看法大大地复杂化了。死亡是恐怖,是欲望,它与对女性身体的恐怖和欲望平行、交错在一起。无论是与陈夫人想像的接吻,还是与上海妓女真实的接吻都被描写得好像他吻到的是木乃伊的嘴唇,在接触它的一刹那,一阵“冰冷”,“刺骨”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页66,71)。字里行间反复闪现的“陵墓”、“王妃的木乃伊”勾画出了一幅有关死亡的色情图画,它即刻变得危险、神秘和肉感起来。死亡与女人。死亡是女人。在这一男性欲望的叙事中,真正的怪诞之笔出现为以大写的“女”字写成的妇女,对于男性叙述者来说,它代表着某种不可知之物的极限。当她在超现实主义变形环节上将梦幻与心理内容融为一体时,她的身体顿时僵化了,就在这里,男性写作具有的那种色情格调上演了它的恋尸仪式。如果施蛰存由于使古代志怪小说合法化而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席特殊之地的话,那么同样必须归功于他的是,他揭示了传统梦幻小说与精神分析话语之间某些隐喻性的契合。的确,当狐狸精形象以被压抑的无意识的面目再次来到小说中时,读者应该警醒地注意到,这是被建构出来的、正在进行梦幻化、色情化和心理化写作的男性的声音。它把我们带到了郁达夫的创作当中,作为一位书写男性性欲望的作家,他的声誉值得进一步探讨。

现实的万花筒

郁达夫对心灵的心理运作的热衷是人所共知的。他的第一篇小说《沉沦》由于对手淫、偷窥、阳痿以及种种“垂死”之感

的暴露描述受到了广泛的批评。^[31]在这里,我将分析一篇与其他作品相比由于文类模糊而较少受到批评界注意的小说。《还乡记》是一种跳跃式的叙述,由十个短小章节组成,附带了五章后记。它到底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篇散文作品?^[32]这种模棱两可的文体使人们对写作行为本身产生了有趣的疑问,尽管读者不必深入到作者的意向里去思索此种行为的意义。像其他作品一样,小说情节非常简单,它至多是对叙述者在由上海去往故乡富阳探亲途中一段时断时续的思想流程的记录——一串又一串思绪通过写作行为被充分心理化和性别化(gendered)之后呈现了出来,这种写作方式竭力在叙述者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将真实与虚幻两者渗透为一体。与施蛰存笔下那个每每遭逢凶险妖妇的旅行者不同,郁达夫的叙述者似乎只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至少,梦幻没有像在施蛰存那里出现在叙述者的意识当中。假如施蛰存把心理叙事成功地转换成了现代志怪小说,那么郁达夫则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吸取了对人类心灵的外来的心理学理解。我以为,小说把真正现代的和现实的情境变成了一个幻想故事,并且使批评家们妄图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建立文体区别特征的肤浅尝试归于失败。

如果在叙述者平淡无奇的旅途中,心理内容被标记为真实的东西,那么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又在哪里呢?第一人称叙述是否就应等同于叙述者的自我意识经验?一旦我们停下来观察一下郁达夫的叙述者是如何处理象征语言的,上述问题就会立刻浮现出来。下面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在叙述者到达杭州火车站时,眼前这座他所衷爱的城市的熟悉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娓娓诉说的自我努力想抓取过去的某一时刻,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它。

这种幻灭的心理,若硬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只好用一个譬喻。譬如当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绝世的佳人,她对我本是初恋,我对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题儿。两人相携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过了几十个良宵。后来我的金钱用尽,女人也另外有了心爱的人儿,我就学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独,贫困恼羞,结成伴侣。几年在各地流浪之余,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褴的衣服,仍复回到我两人并肩携手的故地来。山川草木,星月云霓,仍不改其美观。我独坐湖滨,正在临流自吊的时候,忽在水面看见了那弃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几年前一样娇柔,衣服同几年前一样的华丽,项下挂着的一串珍珠,比以前更添加了一层光彩,额上戴着的一圈玛瑙,比曩时更红艳得多了。且更有难堪者,回头来一看,看见了一位文秀闲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后,用了两手在那里摸弄她腰背。³³

“作者——叙述者”有意用浪漫爱情的新奇象征性叙述来描绘他对离别多年的杭州城的眷恋之情。城市好比是一位美丽女子,而叙述者自己则是她曾经离弃的恋人。这样的向壁虚构(幻想)必然指代着另一个文本,一个叙述者难以生产出来的文本。然而一个文本从来就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另一个。插入进来的叙述不能包容在所指代之物的羽翼下面,相反,它暴露出了一段浸染着被压抑欲望的情爱想像,以及叙述者无意公开的自我焦虑感(他可能对此无从知晓)。当思乡的叙述着上了额外的情欲叙述色彩之际,刻意的虚构就不只是

叙述者杭州之恋的一个寓言而已。人们并不把叙述者的性爱想像与幻化了的激情看作是他对杭州的归依感的单纯象征性替代,而是在这里发现了一种被移置了的欲望,它通过多余的指涉复活了自身。^[34]

象征性的语言引入了一种仅仅作为文学幻想而存在的现实性,这样,想像的写作对郁达夫的叙述者的作用正如妖妇对施蛰存笔下心理失常的主人公的作用一样。这里,真实与虚幻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人们发现语言既不等于活生生的经验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后者又离不开前者。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自我幻化将大大有助于推动作者的自我理解,叙述者甚至通过超常的想像有意制造出种种身陷苦海的情形,扮演着种种自我怜悯的感伤角色。然而很奇怪,上述自我幻化往往同一个情欲的次文本(subtext)连接着,其中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中心的能指(signifier),不断展示着欲望的意义。《还乡后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叙述者无奈正要去一家毫无生气的菜馆里进餐,但眼前的好天气似乎与内心的苦楚格格不入,他为此而闷闷不乐,甚至于愿老天能突降大雨好与他忧郁的心境相符。“若希望再嗜一点”,叙述者说道,“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材在我的旁边。”^[35]于是,他编造了一出他曾挚爱过的恋人死去的故事,为的是在自家造就的泪海里漂浮那么一会儿。

我怨恨了一阵,痴想了一阵,就把我的心愿,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来。我一边在那里焚化纸帛,一边却对棺里的人说:“JEANNE! 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开船了! 怕有野鬼来麻烦,你就拿这一点纸帛送给他们罢! 你可要

饭吃？你可要安稳？你可是伤心？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我只在你的边上。……”我幽幽的讲到最后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两手，把头伏了下去，两面额上，只感着了一道热气。我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那个在炉灶上的妇人，以为我在催她的饭，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声气说：“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请再等一会儿！”（页，5—6）

叙述者面对恋人的灵枢心中涌起的缕缕遐思不禁使人回想起施蛰存和下一章将讨论到的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恋尸场景。他那具有反讽意味的自恋在母性形象出场的那一刻，顿时消失了，刹那间变得可望不可及的“母亲”的相反的身份帮助我们理清了叙述者忧伤自我的利必多欲望的根源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幻想中的少女拥有一个西方人名（以英文拼出的）“Jeanne”。她是西方人还是起了西方名的中国女人？从上下文来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为五四时期的那批作家为追逐时髦常常以西方人的名字来命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如丁玲小说中的莎菲、玛丽和温迪）。^[36]如果现代的状况意味着妇女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成熟，那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清晰地显露了其中隐藏的矛盾，因为现代性尽管赋予了女性主体莎菲展现欲望的机遇，但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名叫凌吉士的男性形象抵消了这种欲望，而后者正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卓越代表。郁达夫的小说集中描写男性的主体意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与

性别之间有趣的关系。由女性/西方人名“Jeanne”触发的幻想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性别化和跨语际的状况。

叙述者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探望家中的妻子，一位传统的妇女，她的清白正是他产生负罪感的原因。就问题涉及的内容来看，罪恶感代表着五四时期把妇女们塑造成现代与传统相互排斥的能指符号（the opposing signifiers）的那种话语。在现代妇女与传统主妇之间，怀揣欲望的男性知识分子徘徊游荡，浮想联翩，自我抉择，试图藉此摆脱自身的认同危机。毋庸赘言，这一选择行为是以男性权威地位为前提的。五四青年倾向于把现代性想像为恋爱自主的实现，希望通过它创造出一种现代的自我。郁达夫早期的小说《沉沦》便是上述愿望的体现，男主人公感到现代性的危机即男人与民族的危机。软弱、阳痿以及民族尊严的丧失全都意味着挫败，就像失魂落魄的主人公把他的欲望投射到日本女人身上所得到的结果一样。然而，正如我在第六章里对鲁迅一篇小说展开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男性主体永远不可能以性的简化（a sexual economy）形式无限期地拖延面对自己或者提前跨越认同危机。浪荡公子的罪感和迷惑似乎总是处处与他为难。

《还乡后记》由于对叙述者欲望的突出映照捕捉到了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就在叙述行为把妇女的现代或传统的建构推向前台的同时，它也暴露了叙述者自身主体立场的虚幻性。下面截取的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女性身体是如何被编织进男性幻想情节中去的过成。

看看四边没有人影，我心里忽然来了一种恶魔的诱惑。

破窗进去罢，去撮取几个钱来罢！

我用了心里的手，把那半掩的窗门轻轻地推开，把窗门外援铁杆，细心地拆去了三二枝，从墙上一踏，我就进了那间屋子。我的心眼，看见床前白帐子下摆着一双白花缎的女鞋，衣架上挂着一件纤巧的白华衫，和一条黑纱裙。我把洗面台的抽斗轻轻抽开，里边在一个小小儿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折扇的旁边，横躺着一个沿口有光亮的钻珠绽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几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里起了一种怜悯羞愧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回原处。站了一忽，看看那狭长的女鞋，心里忽又起了一种异想，就伏倒去把一只鞋子拿在手里。我把这女鞋闻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后又起了一种惨忍的决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起拿了，跳出窗来。我幻到了这里，忽而回复了我的意识，面上就立刻变得绯红，额上也钻出了许多汗珠。我眼睛眩晕了一阵，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馆来了。（页 31）

当窃贼开始出神地摩娑女人绣鞋的时候，叙述者想像中虚构的盗窃行为突然停了下来。这种对女鞋的顶礼膜拜是否标志着他毕竟是位传统文人呢？也许如此。这样就可以解开追求现代的敏感的叙述者为什么要压抑内心的残酷、为什么他会感到羞愧难当的疑问。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怪异的时刻，性幻想的浸入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欲望表现方式：偷窥，为此叙述者把作案的场所想像在城市女人的闺房里。叙述者好像是站立在旅馆一扇窗户边上的一名偷窥者一样目睹了从破门而入到盗窃女人钱包和绣鞋的全过程。站在远处的偷窥者避免

了行动的危险和由此带来的麻烦,在想像中尽情享受着犯罪的快感。这一场景中的犯罪联系着想像中的偷盗和色情行为,以及伴随它而来的罪感和歉疚之情。这位有窥视癖的叙述者身上的特别有趣之处在于他幻想了一个虚构的自我来担当罪犯的角色,而自己得以扮演了一个想像的偷窥者。

这部小说中的偷窥情节并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仅仅是对性禁忌的反抗或者是道德颓废和性怪僻的单纯展示。^[37]在郁达夫的创作中,它还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渴望行动而又不能的焦虑。缺乏行动能力的意识软化了行动的意志。偷窥者形象表达了这种孤独和溃败的状态。同样,作者卷入的想像文学体现了对他耽于窥视、拖延行动的反讽(the irony),正如虚构的犯罪场面构成了对他的真实情境的反讽一样。在一处颇能揭示主题的地方,叙述者从远处向农民们唱起了赞歌:“正直的农夫吓!你们是世界的养育者,是世界的主人。我情愿为你们作牛作马,代你们的劳,你们能分一杯麦饭给我吗?”(页12—13)这段话似乎在恭维劳动阶级,但由于叙述者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出的——他透过火车车窗向田野远远望去——因此这番颂扬就像是知识分子付出的空头支票一样随风而去,他们想要与劳动阶级联合的欲望仅仅停留在了一个比方(“作牛作马”)之上。

除了他的丰富幻想,关于他内心的意识状况,叙述者的象征语言还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施蛰存的小说里,梦幻主题的再度复归使心理叙事变成了一种现代志怪小说。而郁达夫的叙述者,正如我上文所说,将真正现代的和现实的情境变成了一个幻想故事。幻想的目标可望而又有些不可及,因此写作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意义的联系。在这个

意义上,心理小说依然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态的梦幻故事,一种冒险突入内心的不可知并从中带回曾与它依稀照面的令人惊噓不已的消息。正如李欧梵在不同的语境下指出的那样,郁达夫作品的“现代”品格在于他突出表现了那些“破碎的、无目的以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旅程。”^[38]在迈克尔·埃根(Michael Egan)看来,这些非确定性正是体现郁达夫“发掘主人公的伤感看法”,“展示他自我形象的彻底荒诞性”的写作倾向的核心手法。^[39]徘徊在女人和男人、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郁达夫笔下的旅人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这种漂离意义故土的流浪状态在结尾处出现的夜行者那里得到了最为恰当的描绘:“我下城来在路上的乱石上钩了几脚,心里倒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车上谋自杀的心思,和此时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觉微笑了起来,啊啊,自负为灵长的两足动物哟,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连续呀!说什么理性?讲什么哲学?”(页22)。

上面这段话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表现了一个自我反思的时刻,同时它还通过谈论和幻化自我见证了自我的现实性。借用保罗·德曼的话来说,这种叙述模式“清楚地表明任何由象征性替代因素构成的文本系统的自我封闭及整体化的不可能性(即最终完成的不可能性)。”^[40]在下一章里,我将把第一人称叙述当作一种指代式的写作方式来分析,这种写作通过在说话的主体、言说的对象、接受者以及写作本身之间树立起一种时间的、空间的和社会的关系的方式,同时使叙述内容既相互间离又相互连接在一起。

注 释

- [1] 郁达夫,《日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四卷:页115。
- [2] Kahler, p. 21.
- [3]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页422。
- [4] 对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比照运用文言和白话的详细分析,参见梅盼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文本、间文本与创作自我的再现》(*Text, Intertex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riting Self*),页167—17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页54。也可参看我的博士论文,《第一人称叙述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页42—46。
- [5] 详细的研究参看张京媛,《心理分析在中国》。也可参看同一作者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早期中文翻译》以及 Lan jicheng。
- [6] 有关鲁迅翻译厨川白村对《苦闷的象征》的讨论,参看张京媛,《心理分析在中国》,页59—68。亦可参看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页33,92;以及 Marston Anderson,《鲁迅的幽默才能》(*Lu Xu's Facetious Muse*)。
- [7] 关于鲁迅作品中弗洛伊德式梦境想像的讨论,参看 Carolyn T. Brown,《鲁迅对梦的解释》(*Lu Xu's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Brown, 67—79; Marston Anderson,《鲁迅的幽默才能》,特别是页260—268。潘光旦对冯小青的精神分析式阅读,参看《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最近,潘光旦的这项研究被冠以敏感的题目《冯小青心理变态揭秘》重新编辑出版。明代诗人冯小青的生平与创作研究,参看 Widmer; 对张竞生的全面研究,参看 Leary。
- [8] 郭沫若,第五卷,页13—28。
- [9] 这包括成仿吾发表于同一刊物(《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页6—11)上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位笔名为“摄生”的人在1922年10月2日的《学灯》上撰写的批评文章。
- [10] 《批评与梦》,郭沫若,第十卷,页116。
- [11] 参看严家炎为《新感觉派小说选》一书撰写的导论,页33—36;以及同一作者,《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页134。
- [12] 李欧梵,《追求现代性》(*In Search of Modernity*),页130,131。
- [13] 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页197。
- [14] 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在这里采用的术语“fantastic”。托多罗人对“怪诞(mean-

ny)、“奇妙(fantastic)”与“惊异(marvelous)”的区分非常有意义,但却无助于我对弗洛伊德主义与梦幻文学之关系的讨论,因为这些术语的界定取决于叙述者在建构情节时对读者期待的操控。“fantastic”在我这里只是汉语“志怪”的大致翻译。英语世界中有关志怪及其他文类的讨论,参看普安迪(Plaks)。

[15] 近期,施蛰存的小说家声誉在严家炎的肯定下得到了恢复,后者主要是把施氏的作品放在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一批上海作家中加以讨论的,这批作家包括刘纳欧、穆时英、杜衡、戴望舒等人。参看严家炎为《新感觉派小说选》一书撰写的导论,页1—38。按严家炎的说法,所谓“新感觉派”是指崛起于20年代的 一批日本作家,他们主动靠近德国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英美现代主义,决心在自己的创作中强调内在化与无意识,从而开创出一条可与西方比肩的现代主义传统。英语方面最近的对施蛰存作品的讨论,参看李欧梵,《追求现代性》,尤其是此书的129—131页。

[16] 参看,施蛰存,《魔道》,《梅雨之夕》,页49。以下所引均出自该本。

[17] 布勒东,页5。

[18] Susan Suleiman,《颠覆的意图》(*Subversive Intention*),页107。

[19] 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参看 Jones。

[20] “怪诞”的精神分析概念,参看弗洛伊德,“怪诞”(The Uncanny)。

[21] 弗洛伊德,《梦的释义》(*Interpretation of Dream*),页277。

[22] 弗洛伊德,《杜拉的故事》(*Dora*),页32。

[23] Marcus,页278;转引自 Suleiman,页128。

[24] 有关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方面的学术和批评研究为数甚巨。参看比如 Marcus,《德鲁兹与瓜塔利》(*Deuze and Guattari*); Certeau,《异源性》(*Heterologies*); Derrida,《明信片》(*Postcard*)。

[25] 唐传奇把志怪传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顶点。我们可以联想到著名的《任氏传》和《游仙窟》,但并非所有的传奇都含有迷信的成分。《李娃传》便是其中一例。要恰当地理解汉语中的“奇”和“怪”,就必须将幻想的含义扩大化,直到它涵盖从惊奇到大致可称为奇怪和异常的若干类似经验在内的全部意义。普安迪(Andrew Plaks)指出,“在汉语语境里,奇这个词拥有一个语义范围,它除了专指惊奇(marvelous)之外,还有‘怪异(odd)’的含义。”

[26] 有关志怪的发端,参看 Kenneth J. DeWoskin,《六朝志怪与小说的诞生》,引自普安迪,页21—25。有关志怪的后期发展,参看 Judith Zeitlin 对蒲松龄的研究。

- [27] 在对这篇小说稍早一些的讨论中,李欧梵(《新感觉派小说述》,页5。)也强调了这部文学文本的象征性在场(symbolic presence)。
- [28] 参阅,弗洛伊德,第六章《梦的运作》,《梦的释义》。
- [29] 我在此借用热奈特《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中的术语来描述这种阐释情境。“异源叙事(Heterodiegesis)”是指叙述者从他/她描绘的小说世界的外部发言时的相关立场;同源叙述的叙述者则从小说世界的内部发言,而他/她的发言被视为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 [30] 性爱与友谊是作家偏爱的主题之一。施贇存在此之前所写的小说《石秀》运用弗洛伊德观念改编了《水浒》的一个故事,它描写的就是男主人公对结拜兄弟之妻的狂热爱恋。
- [31] 近期有关弗洛伊德和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写作的影响,参看许子东。英语方面对日本私小说的论述,参看 Miyoshi。
- [32] 在收入《还乡记》的一本选集的前言里,郁达夫把他的写作描述为散文与小说的混合。但《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书的编者却武断地把《还乡记》及其后记划归散文,而把郁达夫同一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划为了小说。
- [33] 郁达夫,《还乡记》,收入《郁达夫全集》,第二卷,页19。下文所引均出自该本。
- [34] 这种情爱想像偶尔也在《沉沦》主人公的爱国热情中反映出来,他对女人们和祖国的那种令人忧虑的爱恋就暴露出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移置。有关这篇小說的讨论,参看周蕾(Rey Chow),页138—145。
- [35] 郁达夫,《还乡后记》,《郁达夫全集》,第二卷,页5;下文所引均出自该本。
- [36] 参看,Barlow 为丁玲《我是女人》(*I Myself Am a Woman*)一书所做的导论,页26。
- [37] 招致批评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的早期作品《沉沦》,小说的主人公曾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后来又偶尔听到了-对夫妇在田野里做爱的声音。
- [38] 李欧梵,《孤独的旅行者: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自我形象》(*The Solitary Traveler: Images of the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见 *Hegel and Hessney*,页290。
- [39] Egan,页212。
- [40] De Man,《浪漫主义的修辞学》(*Rhetoric of Romanticism*),页71。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人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才将自身建构成一个主体。

——爱米尔·本维尼斯特

人称,特别是第一人称的语法范畴,最近在当代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当中,都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虽然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以及拉康等人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主体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下述论点,即,主体的构成乃与语言和话语密切相关,却并无疑义。恰如法国语言学家爱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确切指出的:“人是在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才将自身建构成一个主体,因为只有语言能够在现实当中,在语言的现实当中,建立‘自我’的概念。”^[1]如果说在当代学者对主体性的批评中,语言占据了中心位置,那么,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此处指的究竟是什么语言。我不由想起卡加·西沃曼(Kaja Silverman)就笛卡尔《方法谈》一书第四部分的一段典型文字所做的颇富启发的论述。西沃曼指出,在笛卡尔的写作中,第一人称代词俯拾即是,不过这位哲学家以为,“他讲述,却没有同时被讲述”,并且相信,“他本人存在于话语之外”。^[2]后结构主义提请人们

注意,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的多因素决定(over-determination)作用,特别是语言和话语的关键作用,从而成功地推翻了笛卡尔有关自治自我的观念。然而,恰恰是在揭露笛卡尔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依赖性的时候,当代批评家却没有考虑到他们自身的语言观得以成立的语法基础。将语言学上的“我”与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理解等同起来,这是否与某些语言的屈折语语法有关?而且当代学者对笛卡尔的批评得益于屈折语形态的第一人称代词,这与笛卡尔当初假定有关自我的幻想时对“我”的倚赖,有什么两样?要想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解答,还需要整整一本书的篇幅。但首先,我想集中讨论一下与本章主题直接相关的问题,即,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下文我所探讨的是,怎样才能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而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跨语际表述模式中,人称的指示性喻说是在现代汉语中,并在汉语与屈折语形态之间,得以发挥其作用的。通过强调人称代词的指示功能,我试图将第一人称问题从一些人们熟悉的关注中抽取出来,这样的关注包括,在西方自我意识观念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是否导致了一个新的自我含义?或者,自我意识是否只是从中国自传式写作的久远传统中逐步发展而来的?^[3]我将就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称叙事的意义,提出一系列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一种非屈折语的语言和写作当中借来的叙事形式以及人称理论等。我首先讨论屈折语形态中人称代词的指示功能,以便将我的问题放在当代理论的语境之中。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本维尼斯特将主体视为一个指示范畴,这一思想在这里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为有意无意间,它为当代理论阐述至关重要的主体性观念奠定了语言学基础。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本维尼斯特专辟数章,讨论屈折语形态,主要是法语当中的人称代词以及其他的指示范畴。对于语言学家来说,人称代词这一语言学范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 *la deixis* (指示功能)的主要特征引入到普通话语的情景中。像 *je* (我) 或者 *tu* (你) 这样的代词一直是自我指涉的,而且相互暗示着,它们决不会指涉语言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和个人,因为 *je* 并不与说话的人同义,而是指示着说话人他/她相对于同时被等同于 *tu* 这一对话人的位置。换言之,“语言的组织方式使得它允许每一个说话人将自身指称为我,这样,说话人便把整个语言挪用到自己身上。”(p.226)此外,每一次这样的挪用都附着着指示性的关联词,如这里、那里、现在、过去、今天、昨天,以及其他的关联词,如副词、形容词和指示词等,这便有助于围绕“言说主体”来组织词语的时空关系。

对我来说,本维尼斯特理论明显的长处在于,它在文体学方面重新研究了话语,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问题,他关注的是指示关系,而不是在自我和语言之间未加考察的关系当中提出含混的自我问题。换言之,他所关注的不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个别的言说者如何借助一些空洞的场合标志,即,人称代词,来占据语言本身提供的主体位置。这

些人称代词反过来又与动词以及其他的句法要素相配合,以在特定的话语情境中构成有意义的言语。就屈折语形态而言,这些论点毫无问题;然而,人称代词并不是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具有这样特殊的地位,并不是在所有语言中都是首要的指示范畴。举例说来,那些并不诉诸配合,而且并非总是强调人称代词之重要性的非屈折语形态中,情形又是怎样的?本维尼斯特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尝试解决的办法是求助于外国语言专家以及提供资料的讲本国话者(informants)的知识,譬如他使用了拉姆施泰德(G. J. Ramstedt)对朝鲜语的研究以及李龙则(Li-Long-Tseu)的资料(页 226)。本维尼斯特著述中一个典型的段落令我想起第一章讨论的乔治·斯泰纳对汉语的阐述,他说:

没有人称表达的语言是无法想像的。这只能在某些语言中,在某些环境下,才能发生,而这些代词是有意省略的;这主要发生在远东的语系当中,在那里,出于约定俗成的礼貌,对某些人要以旁敲侧击的方式(特定形式的改写或隐讳),来称谓此人,以便替代直接的人称指示。但这些用法仅仅用来强调那些被有意避开的形式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恰恰是这些代词潜伏的存在状态,赋予这些由阶级关系所强加的替代以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

如果说欧洲语言被视为普遍化的语言理论的圭臬,那么对此圭臬的任何偏离,譬如本维尼斯特自认为从非屈折语形态中识别出来的那些语言现象,就必须被解释为省略与压抑的实例。然而,如果这些现象不是省略或压抑的实例,而是别的东

西,那又会是什么呢?除开说这些现象是具有不同阶级背景的人们之间礼貌的言语形式,是否还有更为切实可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语言当中指示性建构的差异呢?本维尼斯特是否将语言学与文体学混为一谈了?就文体而言,关于省略某些表达形式的辩论,只有假定被替代的最初的词语符号一开始便在那里,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境况绝不仅限于远东语言,因为我们发现在讲法语和英语的人当中,为数不少的礼貌的表达方式可能并不是对某些“最初的”表达形式的精确替代,而是在回应社会的一文体学的(socio-stylistic)需要当中产生出来的。

然而,作为一个语言学问题,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境况。倘若非屈折语形态的指示范畴判然有别于印欧语言中发现的范畴,那么,在不把后者当作判断语言行为是否恰当的解释性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阐明那一差异呢?某一类语言在代词的基础上变位,而另一类语言却不把屈折语语法视为言语和写作中句法结合的原则,那么在这两类语言之间,就几乎不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就此层面讨论相似与差异的问题。举例说来,在汉语中遣词造句,特别是构造书面语时,本来不必用人称代词来传达指示的情景,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以至于若把汉语转换成屈折语形态,通常不得不“补充”多余的信息。人称代词在这些句子里缺席——从翻译者的视角来看是“缺席的”——并非像本维尼斯特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尊重社会的成规,不得不用其他的词语符号来取代人称代词,而是因为主谓结构等等本来就不是汉语的规范,而只是众多的句法选择中之一种。汉语这种语言在构成一个陈述时,享有一种自由,它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语法上的主语,无论这主

语是代词的形式还是名词的形式。^[4]当然,对那些不熟悉非屈折语形态之特征的人来说,没有语法主语而又可以表辞达意,这一可能性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甚至是荒诞无稽的。^[5]

然而,在强调汉语同印欧语言的差异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自近代与屈折语形态接触以来,汉语书面语和口头语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及的,恰恰是“屈折变化”的概念,以喻说的形式,找到了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契机。对五四文学作品而言,言说的主体以及他(她)借之得以言说的叙事模式,几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欧洲文学进行着对话。解读鲁迅、郁达夫、丁玲等五四作家,通常意味着跨越一个文本以及这同一个文本的语言疆界,并向跨语际的表述模式敞开。但是,如果这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对人称(或者本维尼斯特所理解的 *la personne*)的关注越来越明显,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它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语言中所产生的后果呢?

诚如我在上文指出的,本维尼斯特对 *la personne* 的强调,其局限性是在屈折语语法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现象普遍化了。但是我们在不放弃以理论术语谈论这些问题之需要的情况下,又该怎样克服这一局限性呢?是否存在一种选择的余地,使得我们能在中国现代叙事(与屈折语形态达成有意义的关联,而又不是其语法的衍生物)中识别出人称代词的指示方式和用法?在第一章中我认为,以往非性别化的汉语“他”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分化成阴性、阳性以及其他的性别化形式,这便为汉语书面语引入了新的象征性现实的一维。我并不认为女性和男性在以前没有作为性的存在或者阴阳的范畴得以言说,而是要说,书面白话文形式层面的这种分化所引发的指

示关系——男人对女人说话或是谈论女人,女人对男人说话或是谈论男人,或是相互交谈——使得性别在语言中影响了社会的权力关系,而这在早些时候是无法想像的。

我们能否察觉发生在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关系中的一个类似的过程?以自传风格书写的文学作品早在现代第一人称叙事出现之前,便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可以永无止息地争辩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第一人称叙事的相似与不同。举例说来,一种可能的探究途径是将两个不同时代的第-一人称代词不同的词形变化予以历史化:诸如古汉语的代词“余”以及现代白话文常用的“我”。然而本章的目的是,我将把自己框定在现代白话文第一人称叙事中围绕“我”所建构起来的几种指示关系。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第一人称代词的指示状态究竟是什么?在不至于过度泛化(*generalization*)的前提下,请让我简短回忆一下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郭沫若、施蛰存以及郁达夫的文本,在这些作品里,第-一人称叙事者常常发现自己身陷一组连锁的象征性关联中:如我/她(性别),真/幻(心理学),此时/彼时(时间),此处/彼处(空间),生/死(形而上学),中国/外国(民族/语言),现代/传统(历史),等等,而每一组关联都是围绕着男性叙事者“我”的欲望加以组织的。重要的是应当记住,这些指示性建构不再反映本维尼斯特在屈折语形态中识别出来的一种纯粹的语言现实,而是使其本身成为跨越语言疆界的文学喻说。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关性别、主体性、时间与空间的喻说,它们被建构出来以表述现代的汉语体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将非汉语的语言和文学作品作为其参照系。现代白话文文本中的“我”至少有两层涵义:它在语言中是单数第一人称,同时它还承担着被译介的指示功能

的所指(the signified of translated deixis)。因此,它是一个极佳的具有可译性的代词。

由此视角出发,我尝试处理沈从文、鲁迅以及丁玲笔下的三种第一人称叙事,并探讨这些文本是如何运用人称以及其他指示性范畴来表现不同类型的历史经验的。我将明确地针对下列问题而发问:当我们谈论五四小说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写作在指示性瞬间是如何表述欲望的?在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语态中,性别重要吗?五四作家在努力为自身摸索一个主体位置的时候,也正是他们以某种“借来的”语态发言的时候,这是否自相矛盾?汉语的现代体验,甚至当它力图在跨语际实践中捕捉到若干历史体验的真正形式之际,是否也只不过在证明其自身的指示性僵局——我是非我?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我在第四章分析祥子与曹先生的对话时,反思了老舍小说中叙事语态、自我表述与言语权力的问题。事实是,祥子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因为没有能力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这一点恰恰与《骆驼祥子》中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全知全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通过这部小说为他发言并谈论到他。读者也许会想,如果这部小说用祥子自己的声音讲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它能不能由祥子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而与此同时又不与他自己的声音相矛盾?人们也许会想起斯皮瓦克提出的著名问题,“庶民能说话吗?”^[6]

沈从文的小说《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在这方面作了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因为它试图用一个下等人自己的声音,尽管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声音,讲述这一故事。^[7]作为有关性欲、暴力、自杀与恋尸狂(necrophilia)的可怖而悲惨的故事,这篇故事分裂成种种压抑性的状况,正是在这些状况下,欲望被性别化,并被否定了满足的可能。^[8]叙事者开篇之际,径直以口头说书人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但这不是前现代白话小说中的职业说书人,而是一个忧郁的人物,倒与康拉德笔下的马洛有些相近之处,后者怀想着过去遭逢的一件毕生难忘的事。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作为沈从文笔下故事的背景,正如康拉德笔下的叙事者讲述的夜晚一样,引入了一个带有悬念的时刻,使“讲故事的人及其理想听众”疏离于“他们的日常行为”。^[9]由于叙事者“我”已为读者准备好一种虚构的讲故事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展开了故事,是有关叙事者本人,他的朋友号兵,以及神秘的豆腐铺老板三个男人之间心理搏斗的故事。这三个出身低下的男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有钱人家的女子,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惟有从一个只可远观的距离,倾慕那个女子,同时看到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近她的家门,并被那一家所接待。小说的高潮是这名年轻女子原因不明,吞金自杀,因此缓解了三个男人巨大的心理焦虑。然而就在这个女子死后刚刚几天,便有传闻说她的尸体从坟墓里不翼而飞。显然有人掘开坟墓,将少女的尸体移到附近小山的洞穴,与之共眠,并在她身上铺满了蓝色的野菊花。但叙事者无法确认他的两个朋友,号兵与豆腐铺老板,究竟是谁做了此事。小说结尾,叙事者描述了进入他自己恋尸狂想像的黑暗世界中的痛苦旅程。

这样的描述仅仅触及到这个离奇故事的表层。就某一层面而言,这个故事展现的是有关欲望、压抑与恋尸狂的心理剧;但在另一个层面,它又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张力关系情欲化,将病理学(pathological)的叙事转化成一出强有力的社会剧。对叙事者而言,这位乡绅之女作为年轻女性的吸引力,既表明她高不可攀的社会地位,也道出了叙述者本人被剥夺了应得的社会权利。因此,性欲望乃是关于缺失与满足的喻说,它阐明了叙事者与其情敌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社会条件。当叙事者与他的朋友号兵狂想着乡绅之女的尸体,就仿佛这具尸体承诺着通往自我满足的途径时,他否定了他本人社会地位之“不受欢迎的状态”(undesirability),并探索了作为一种阉割、无能与压抑形式的境遇。如果说施蛰存的幻想故事将弗洛伊德主义转化为一个代表人物,重新合法化了与“志怪”传统相关联的幻想文类的古典主题,那么,《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有关性压抑的弗洛伊德式寓言,则言说了有关阶级的不可言说的内容,从而以某种方式传达了故事本身深刻的禁忌,并向我们有关社会压抑的熟悉观念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精神分析语言的比喻状态,不多不少,恰恰表现为一个故事——即一个文学表述的喻说,它试图从情爱的层面,使阶级叙事寓言化。这一寓言式表述成功地将一个有关恋尸狂的精神错乱的故事转化成有关不同阶级之间类似的社会欲望(homosocial desire)的叙事。

《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是有关欲望的指示性叙事,它通过娴熟地运用我/我们,她;这里,那里;这,那;现在,当时等词语,来谋篇布局。从文体学上说,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比真实的姓名更为重要,它们直接说明了该文本的跨语际状态。这

与其说是由于一些诸如此类的说话方式,譬如偶尔使用阴性第三人称单数“她”及其所有格“她的”乃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时期发明的新词,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翻译而在汉语同印欧语言之间建立一种等值关系,不如说是因为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代词(我,我们)之间的滑动构造了一种叙事语态,它将其本身的指示状态表示成男性的。^[10]奇特的是,虽然整篇小说没有一个人物有名有姓,但他们的职业特征(通过转喻的联系)却非常突出,构成各自有别的身份。叙事者将自己说成一个班长,把他的两个朋友分别说成“号兵”与“豆腐铺老板”。“我们”和“我”(在性别与阶级方面进行包容与排斥)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了指示关系,从而使有关男性欲望与阶级叙事的文体学成为可能。

不使用真实姓名有一个显著的功效,就是让读者明显注意到指示关系的在场,而这些指示关系则刺激了这篇小说(一部主要关涉到包容与排斥的小说)大部分戏剧性事件的发生。举例说来,叙事者与其号兵朋友使用阴性代词“她”和指示性参照“那女人”,来排斥性地指涉那个无名的乡绅之女。这些表达形式几乎成为专有代词,它借助这一指示性说话方式,排除了所有别的女性。叙事者及其朋友们轻视那些与士兵阶层占据同等社会地位的女性,譬如军官的卖淫的情妇,并污蔑女学生“不文雅不窈窕”而且壮大得如同“水牛”(页 229; 256)。在对抗阴性的“她”与“那女人”的过程中,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代词在整篇故事里也被“性别化”为男性,而这一性别化过程则为跨阶级界限之欲望的动态相互作用,奠定了文体学的基础。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表示叙事者与其同志共同的阶级

背景)在叙事的过程中经历着微妙的变化。小说开篇处,它宽泛地指叙事者所属的军队;而在故事进一步展开时,这一代词开始具有了特定的指涉内容,指两个男人形成的小组,即,叙事者本人以及他的搭档,跛脚的号兵;不久以后,当叙事者发现豆腐铺的老板也爱上那个女人时,后者也被囊括到这一表达形式中。尽管第一人称复数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但此处这一代词却包含着一个恒量:即,叙事者、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以及所有其他地位卑微的士兵。仅以叙事者为例。他在军队里当班长,是仅仅比士兵略高一等的低微军衔。叙事者说道,“可是一到外面,还有什么威武可说?一个班长,一连有十个或十二个,一营有三十六个,一团就有二百以上。”^[1]当他爱上乡绅之女时,他把这种非分之想描述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页 229; 256)。这一民间俗语道出了叙事者对于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逾越之鸿沟的清醒意识。

如果说班长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那么他的朋友号兵的境遇则要更为悲惨。当大部队驻扎一个村落时,一场偶然的故事使年轻的号兵成为残废。叙事者描述这名年轻人的不幸时所使用的语言,值得进行寓言式解读:

一个二十岁的人,遭遇这样的不幸,那有什么办法可言?因为连长也是同乡,号兵的职务虽不革去,但这个人却因为这不幸的事情,把事业永远陷到号兵的位置上了。他不能如另外号兵,在机会中改进干部学校再图上进了,他不能再有资格参加作战剿匪的种种事情了,他不能再像其他青年兵士,在半夜里爬过一堵土墙去与某地女子相会了。总而言之,便是这个人做人的权利,因为这无意

中的一摔,一切皆消灭无余,无从补救了。(页 226; 254—255;黑体为笔者所加)

偶然的跌倒,竟使这个年轻人被剥夺了升迁、求爱以及走向幸福未来的资格。就象征意义而言,他已被阉割,从而脱离了正常的生活。叙事者描述这次跌倒的意义时使用的语言斩钉截铁,从而使读者为即将展开的有关性僭越的可怕故事做好了心理准备。的确,三个男人对乡绅之女的迷恋,必须参照这一象征性的事件予以理解,因为他们“偶然摔到”在卑微的社会位置上,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与优待”,并处于无能的状态。正如故事随后的发展所表明的,叙事者本人尽管生理正常,却与他所同情的跛脚号兵一样几近残废。

这个地位低下的“我们”的群体中的第三位成员是豆腐铺的老板,叙事者与他的跛脚朋友后来同豆腐铺老板一道,加入了一个日常的礼仪,每天从一个安全的位置钦慕他们的欲望对象。豆腐铺老板是当地一个年轻人,强健坚实,沉默少言,总是微笑着,而被逼着要说话时,他照例不回答,即或回答了,他仍然只是忠厚诚实而几乎还像有点女性害臊神气的微笑(页 232;258)。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缄默不语,而他吸引那个美丽女子的方式则是“正露着强健如铁的一双臂膊,扳着那石磨,检查石磨的中轴,有无损坏”(页 236;260)。与跛脚号兵类似的是,豆腐铺老板言辞的匮乏与女性化的微笑,象征着他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已被阉割。

正是这些象征性地“无能”与“被阉割”的下层阶级男子的不幸,被叙事者持续不断地说成“我们”,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女子,而她则身属本地邮政代办所的主人之家,这是该小镇惟一

的绅士家庭。她的父亲是商会的会长，而他的铺子又是当地驻军的兑换机关。叙事者同其朋友们观看着那些体面而有身份的人物，如团长、营长等出出入入这家铺子，而他们则被拒之门外。

将这些男人与那个年轻女子分离开来的阶级界限，完美地体现在将豆腐铺与她的住宅分隔开来的那条街道上。日复一日，叙事者与跛脚号兵造访豆腐铺老板，坐在那里几个小时，等待着可以瞥视那女子过街时的一瞬。“我们常常在那二门天井大鱼缸边，望见白衣一角，心就大跳，血就在全身管子里乱窜乱跑。”（页 230；256—257；黑体为笔者所加）三个男人所占据的位置，展示了欲望的地形学场景。街道另一边的女子极少露面，而这三个男子的心脏与脉搏在共同的节奏（对生活常识的文体学僭越）中跳动着，并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这条街道将他们分隔成整整两个世界。对三个男子而言，她就在附近，而她召唤爱犬时那熟悉的声音便萦绕在耳，但她所处的位置却又如此无望无助的遥远，甚至那女子偶然的一瞥，也不曾得到，真是咫尺天涯。在这令人苦恼的情境中，三个男子与那女人的两只白犬成了朋友，他们想像着借助这两只动物，与那明艳照人的女子进行幻觉式接触。他们与狗的友谊，以及叙事者在描述这一关系时使用的语言，暴露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状况。有一次，叙事者与他跛脚的朋友多喝了一点酒，失言殴斗之前，他对那“残废人”说道：

“你是废人，我的朋友；我的废兄，你是废人！一个小姐是只能嫁给我们年轻营长的。我们试去水边照照看，就知道这件事我们无分了。我们是什么东西？四块钱一

月,开差时在泥浆里跑路……我们年轻,这有什么用?我们只是一些排成队伍的猪狗罢了,为甚么对于这姑娘有一种野心?为甚么这样不自量?”(页 234; 259)

这一突如其来的爆发,触及到欲望(作为一种阶级叙事)的核心。叙事者以“你”开始,随即重新恢复到“我们”以及“我们的”,从生理缺陷移动到社会的欠缺最终到他本人被象征性阉割的状况。此处的关键是象征性的“跛脚”,它将下层阶级的人贬低为“排成队伍的猪狗”。毕竟,叙事者及其友人所能拥有的接近那一绅衿家庭之成员的惟一途径,便是通过他们所豢养的狗。坐在豆腐铺里,他们观望着年轻的军官,穿着极其体面的毛呢军服,有刺马轮的长统黑皮靴子,堂堂出人那人家的二门,而他们却心里充满了难受的妒意。如果那年轻女子是上层阶级特权的象征,那么这三个男子对她的热情则代表了超越阶级界限,跻身上层社会的愿望。无论何时,只要话题转到那个女人身上,三个男子的语言便充满了阶级等级、志气、升迁等词语,这是不足为怪的。下而这段叙事者与其跛脚朋友之间的对话,透彻地道出了那个女子与三个男子的个人雄心壮志与失望心态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们有我们的志气,凭这志气凡事都无有不可以做到。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要做总统,做将军,一个女人,算不了什么稀奇。”

号兵说:“我不打量做总统,因为那个事情太难办到。我这只脚,娘个东西,我这只脚……”

“谁不许你做人?你脚将来会想法子弄好的,你还可

以望连长保荐到干部学校去念书。你可以同他们许多学生一样,凭本领挣到你的位置。”

“我是比狗都不如的东西。我这时想,如果我的脚好了,我要去要求连长补个正兵名额。我要成天去操坪锻炼……”

“慢慢地自然可以做到,”……(页 236—237; 260)

“可以做到”的愿望,与几个男子对那女子的欲望是无法分开的。这种情境的反讽意味在于,他们的欲望是从存在着等级差别的环境中浮现出来的,而这些环境却先验地(a priori)否定了这种欲望的实现。叙事者用来形容这一明艳女子的那些比喻,如“标致的动物”,“好花”,和“仙人”(页 229; 256),标示着横亘在三个男人与他们的欲望对象之间的巨大鸿沟。事实上,她很少被说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毋宁说,对她的指涉总是提升性的比喻,以及置换的象征。她是仙人,而他们是俗物;她是好花,而他们是癞蛤蟆;她是尘世的天使,而他们是一文不名的猪狗。对欲望的铭写(inscription),其前提是将三个男人与那女子分隔开来的巨大的社会鸿沟。她尊贵的阶级地位(叙事者及其友人被无望地从中予以屏除),使她被渴望,却又无可接近。然而,真正的对抗发生在三个男人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对手之间。而那女子仅仅是“男人社会交换的符号与对象。”^[12]

因此,这篇小说中的性欲望不仅仅是一个所指,它也是一个能指,表述着叙事者对自身社会状况受虐狂式的厌憎,并以性爱来置换他本人超越自身、僭越社会这一欲望。那女子成为一个象征,许诺着对臣服地位以及阶级压迫的一种想像式

超越。然而正如跛脚的号兵永远不能康复,无论他如何努力,他在有生之年只能作一名号兵一样,叙事者以及豆腐铺老板作为象征性的跛脚者,也永远无法从他们“低下”的地位中提升上来。

那年轻女子原因不明(一出秘密的罗曼史)、出乎意料的自杀,陡然缓解了这一不能承受的情境,因为它为三个男人绝望的欲望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听闻她的死讯,三个男人的反应纠缠着欢乐与哀愁的复杂情感。叙事者是这样袒露心迹的:

为什么使我们这样快乐可说不分明。似乎各人皆知女人正像一个花盆,不是自己份内的东西,这花盆一碎,先是免不了有小小惆怅,然而当大家讨论到许多花盆被一些混帐东西长久霸占,凡是花盆终不免被有权势的独占,唯有这花盆却碎到地下,我们自然似乎就得到一点开心了。(页 238—239; 261)

花盆的隐喻再一次累加到那年轻女子的象征功能上。死亡在这一情形中不仅使富人成为失败者,而且其“倒毙的”状态亦有可能缝合这些男人与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子之间不可逾越的裂隙。恰恰在这一点上,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我们”开始让位于占支配地位的个人化的“我”(叙事者)以及“他”。现在小说开始表现每个男人都开始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实现”其先前被压抑的欲望。

按照叙事者的说法,那女子的尸骸在葬礼七天之后,被人

从新坟中掘出盗走。鹊起的谣言说这少女的尸骸赤光着半个身子,睡在去坟墓半里的石洞的石床上,地上的尸身各处撒满了蓝色的野菊花。叙事者与他的跛脚朋友猜疑,他们的朋友豆腐铺老板可能就是肇事者。从豆腐铺老板在事件发生后便神秘消失一事来判断,他是掘坟者并非全无可能。^[13]然而,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发现谁是作案者。毕竟,倘若无人承认犯案的罪状,那么跛脚的号兵便只好供认。事实上,是号兵发现了丑闻,并向叙事者坦陈他去看那女子坟墓的经过,而且有挖坟的设想,尽管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良的动机。他解释道,他听说倘若女子吞金而死不超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新复活。他只带着解救她的天真希望,来到她的坟边。这一场景由于叙事者听说了那女子的埋葬处时的奇特反应,而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他开始发现他的跛脚朋友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不知为什么我一望到那号兵忧郁的样子,就使我非常生气要打他骂他。好像这个人的不欢喜样子,侮辱我对那小姑娘的倾心一样。”(页 240; 262)

对叙事者而言,经历过共同渴望同一女子的煎熬之后,跛脚号兵不再仅仅是一个朋友了。此时此刻,号兵显然成为叙事者的一幅镜像以及另一个自我,而叙事者从号兵身上,看到了他自己讨厌去直面的东西。掘开那明艳女子之坟墓的同样的欲望,也深藏在叙事者内心的隐秘处,尽管他从来不曾坦言相告。当叙事者在自己头有点发烧的夜晚睡梦醒回,发现号兵坐在身边时,内情暴露的时刻终于降临了。“我的头脑这时也实在还有点糊涂,因为先一时在迷糊中我还梦到他从石狮上滚下地的情形,所以这时还仿佛只是一个梦。”(页 241; 263)而叙事者中夜醒来,面对号兵这鬼魂一般的人物时,他

面对的是从底层世界浮升上来的另一个自我。这号兵全身黄泥,极其狼狈。他用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言辞讲述着盗尸这一可怕的故事,而且用狂言滥语骇住了“我”。叙事者说道,“我对于这件事还是不甚相信;我还是在心中打量,以为这事情一定是各人身在梦中。……因为这种欲望谁也无从禁止,行诸事实仍然不近人情。他因为追悔恶的行为,把我杀死灭口也做得出。”(页 244;264)叙事者与其另一个自我之间这场高度弗洛伊德式的对抗,暴露了叙事者一直畏惧的东西:即,被压抑之欲望的恐怖性,及其在他本人心中非人化的力量。经受了这场痛苦的经历,并且体验了那个鬼魂附体般的夜晚他所体验的东西,叙事者忏悔道,即使他以及号兵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在有生之年亦将被这梦魇所纠缠:“他是不曾犯罪的,但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却使他一生悒郁寡欢。至于我,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有点忧郁,有点不能同年轻人合伴的脾气。”(页 245;265)叙事者领悟了他梦魇般进入恐怖的魑魅世界进行历险时所付出的代价。

的确,倘若所谓的僭越行为由豆腐铺老板做出的,而且跛脚号兵也企图做同样的事,那么它也同样在叙事者的心中完全展开。倘若叙事者是真正的掘墓人的话,其象征性效果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在这出象征性的欲望剧当中,死亡、僭越、对禁忌的违犯以及罪恶总括起来,又意味着什么呢?没有界限,也就没有僭越。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阶级界限在这篇小说中是头等重要的秩序,因为无论是性别界限,还是生死大限,都不能使三个男人对乡绅之女所体味的这种欲望得以性别化,或是禁止之。因此,对其尸骸的侵犯,象征了对于阶级界限的僭越,尽管它也意味着欲望的完满。如果说阶级体制所

强加的社会禁忌阻碍三个男人接近他们的欲望对象,即那个明艳女子,那么,他们不可能只是通过冒犯禁忌,便可以成功地解除禁忌。叙事者及其友人对自身阶级地位的厌憎,以及他们试图借助那年轻女子这一象征之物从而得以超越的渴望,只能在梦魇里终结。无论叙事者还是他的友人,都无法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通过叙事性地调节现在与当时的指示功能,叙事者告诉我们,号兵现在还是第四十七连的号兵,他还是跛脚,而叙事者本人早已告别与其性情不大相容的军旅生涯,漂流到都市,而又发现都市的生活同样“不大合式”。在叙事者深刻的失望中,他一直被指示性过去(当时)的知识所缠绕,并力图用讲故事的方式,在指示性当前(现在)的状态里战胜过去的记忆。当叙事者对其听众说到那一效果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的事情。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页 245;265)

沈从文笔下为数众多的叙事者每每坦言相告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虚构性。^[14]本篇开场白处,叙事者警醒听众,“凡美丽的都常常不是真实的,天上的虹同睡眠的梦,便为我们作例”(页 223;253)。然而,我们不必将这一有关虚构性的直白视为一种放弃(disclaimer),而应审视叙事者在他本人以及他的听众之间设置的指示性关联,因为正在此处,现实主义的诠释被阻止,叙事者所呼唤的是对这篇故事的一种象征性解读。换言之,说者要求听者不必从字面上领会恋尸狂的故事,它是否真的发生无关大局。最为关键的是,当叙事者挑战听者的

理解力时,在叙事者与其无名无姓的听众(后者镜照出潜在的读者,亦是你我之类的实际读者的镜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讲故事的指示行为总是已经预先假定了不可思议的理解的可能性,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如叙事者的怀疑主义陈述却是出于对叙事者语言之可理解性的潜在信任。也许将听众和读者从这一宛如天方夜谭的诠释当中拯救出来的,恰恰是讲故事之人的信任,即对理解的邀请,这种信任在解读与诠释的外在表现中重演并更新了自身。

这便引领我们到鲁迅的小说《伤逝》,在这篇小说里,关于记忆、性别、时间、写作以及诠释性理解的种种指示性喻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中渲泄着自己。场景现在转换为现代的都市北京(这也是后文将要讨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背景),在那里,一个人最奇异的浪漫梦想在想像中得以满足。

忏悔之音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鲁迅,《我的失恋》,1924^[16]

虽然鲁迅写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是戏仿东汉诗人张衡的《四愁诗》,但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意图并非攻击中国的传统文学,而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16]鲁迅诗中的恋人操

现代白话,而且最为现代式的求婚标志,是他与他“之所爱”互换礼物如玫瑰花、阿斯匹林和金表链等。如果说鲁迅在这一篇漫不经心的戏仿之作里嘲弄了现代的性关系,那么一年之后写就的《伤逝》,却开始严肃对待这种关系,并对之进行考验。^[17]这篇小说描写叙事者涓生与其爱人子君浪漫关系的幻灭。他们浪漫爱情实验的开始,是当他们一同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时一种字面上的跨语际体验。受雪莱、易卜生以及其他浪漫派作家的激励,他们坠入情网,决定作同居的夫妻。然而当涓生失去工作时,事情开始恶化,经过几个月的困窘与苦难,他们人各一方。最后,子君孤寂而死。

涓生的叙事作为小说的副题,冠以一系列“手记”之名。其回忆之举是一种指示性表现(performance),它悼念子君的死,与此同时,也希望写作行为能够达到忘却的目的。鲁迅对叙事者之回忆的表述具有深刻的性别涵义;此外,这种回忆力图抹除子君的印迹,并将她抛掷在词语之间空虚的场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子君从来没有在涓生的回忆中出现。恰恰由于她的存在让人心神不宁,所以叙事者觉得有必要克服对她的记忆,以便恢复他对自己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已经被她的死讯所削弱。因此,当叙事者心怀愧疚地弃绝他过去记忆中的彼时彼处之际,自我叙事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有意的指示性行为,欲将自我锚定在此时此地。它首先是一种疗救的手段,目的是重建一个完整的自我:“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18]

证实而又否认,这一奇特的杂揉,揭示了这篇小说成问题

的状态。涓生的遗忘以及他试图遗忘的心愿,搅扰了他回溯性的叙事所虚设的连贯性。这一张力关系在他偏离回忆行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些离题的内容时常打断关于过去的叙事:“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页 112; 199)这一忏悔,质疑了回溯性叙事的可信度。倘若叙事者记忆衰退,他又怎么能期望读者会相信他呢?意味深长的是,在记忆上永远留遗的事情,却转变成他耻于回忆的事情,于是他陡然中断了这段叙事,以免陷入更深的愧疚当中。那是他在慌张中,身不由己竟模仿了好莱坞电影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方法。“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页 113; 199)省略号可能压抑了记忆中不愉快的部分,但读者不禁怀疑叙事者压抑掉的内容究竟有多少。

虽然整篇小说回溯性的叙事发生在三个时间层面上,但回忆行为只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层面。第一个时间层面是写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第二和第三层面放置在指示性的过去。第二个层面指的是涓生和子君作为夫妻的共同生活,直到子君的死以及涓生的写作时间。在此期间,二人时常回忆着他们同居以前的日子。子君沉溺于回忆他们最初约会时的快乐时光,而涓生日益渴望他单身时的生活。第三个时间层面则更远,它回溯到二人同居之前,其标志是没有任何回忆。

倘若《伤逝》的标题指的是写作的时间(第一层面),那么不难发现,当叙事者懊悔于他与子君的缭乱,并以浓重的怀旧之情哀悼自己的过去时,它呼唤的是第二个层面:“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

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页 117—8; 204)书写这一段悲剧性的故事,是为了戳穿鲁迅身处的时代盛行不衰的自由恋爱与女性独立的宏伟幻觉,这与鲁迅关于性别问题的立场是相吻合的。在鲁迅看来,如果女性在一个男性宰制的社会尚无自谋生路的手段,那么,娜拉离开舒适的家,出走寻找自由,她的未来是不可想像的。^[19]但如果仅仅从这些方面诠释,就无法领会这篇小说的复杂性,因为它对父权制的批判亦同时包含着对现代爱情观的反思,而这一爱情观的男性中心话语却富于反讽意味地再生产着它力求推翻的父权制度。是叙事者本人通过向子君灌输来自西方文学的新知,才将她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也是涓生通过使用舶来的求爱的礼仪,包括电影中的场景,才吸引子君来到他本人有关现代恋爱的志业当中(在五四时期名为“自由恋爱”)。叙事者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场合提及西方浪漫派诗人以及易卜生的名字,这表明他按照自己的利益,将这一以性别为基础的话语,运用到自由恋爱以及妇女解放之中。如果在鼓励子君与自己同居的过程中,叙事者本人被这些话语所欺骗的程度与子君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当他一年后用同样的论点说服子君放弃他们的关系时,涓生的词语听起来是虚伪的: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页 123, 209)

以外国文学的名义践行的自由恋爱的志业,在一个自我戏仿的时刻被迫夭折。谁是那个“隐形的坏孩子”?是邪恶、良知的化身还是现代性本身?整篇小说对现代情爱关系的渴望,被叙事者本人对外国文学的戏仿无情地中断了。

涓生的“伤”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而子君的死反过来又造成了进一步的“伤”,虽然这“伤”是涓生的写作行为试图克服的。叙事者在子君生前和死后篡改过去并消解过去的愿望,最终将子君从自己的生活中放逐,而随之而来的对“伤”的书写,又是为了将她的幽灵从自己的记忆中放逐。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动机,叙事者无法澄清他究竟是为了过去的“伤”而来书写他的“伤”,还是试图为其辩护。不管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这暧昧的作品都对叙事者有利:通过悼念子君的死,他试图将过去的“伤”投射到令人同情的状态,从而可以捍卫自己,反对不负责任的指控。他的写作行为将她指示性地投射为令人不快的过去,并从死者的沉默中获益。当他对子君说起她并不真正领悟“爱情必须时时更新”(页 115; 202)的时候,他正是在指责子君,而子君又不能为自己辩护。通过压抑子君的故事,同时对她进行评判,他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着叙事。花白的叭儿狗阿随的片断(预示着涓生对子君的抛弃),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由于他们不再能负担得起阿随的食量,涓生将它带到西郊,放在旷野。回到寓所,他对子君凄惨的神色很是吃惊。涓生不能而又不愿同情子君的感觉,为此他谴责了她。

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

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页 120, 207)

由于叙事者不久即以类似的方式抛弃了子君,所以他的自我辩护带有很强的反讽意味。子君竟与他手中的狗共享着同一种命运。

倘若某种叙事试图从一个分裂式自我的淆乱体验中分辨出意义,那么自相矛盾便是这种叙事的症结所在。一方面,叙事者将自己过去的生活描绘成仿佛一块平和的港湾,只是由于子君的闯入,方才变成地狱。而另一方面。在开篇的段落里,叙事者又作出了相反的说明:“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页 110; 197)这一巨大反差的真正原因,也许在于“叙事的自我”(narrating self)与“体验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在感受上的鸿沟,因为前者似乎并不相信后者。然而“叙事的自我”不正是从他先前的自我中成长起来的吗?

时间、体验与回溯,都可以为叙事者提供先前不可能达到的自我批评的独特视角,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自我批评一定是毫无问题的。事实上,贯穿整个文本的自相抵牾的陈述以及精心构思的形象,指出了“叙事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重要的关联。这一关联是由逃避的主题确立的,该主题刻画了“叙事的自我”以及“体验的自我”的特征。这两种自我

都试图从自知之明中逃脱出来，而忏悔式写作正是另一种逃避的企图。譬如，不断出现的笼中鸟的形象：

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页 118, 204）

虽然叙事者此处使用的文学套语并无引人注目之处，但是在这将来逃向自由的比喻式投射（figurative projection）中，子君竟如此明显地缺席，这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叙事者是《自由之友》杂志的长期作者。）不但子君从这一唯我论的图景中被省略掉，而且这一隐喻（很快成为叙事者特有的自我形象）亦迅即使他与她疏远起来，甚至是在它使涓生从普通职员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时候。随着这个隐喻的出现，自由陡然间成为叙事者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借助一个词汇的帮助，涓生开始为自由而战，这个词汇有效地解开了他与子君的关系：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页 121；207—208；黑体为笔者所加）

叙事者此时公开谴责子君鸟笼的角色,而赋予自身以鸟的优越形象。这个隐喻一笔勾销了情人及其所爱之间原有的关系,以便确立一种新的关系,即鸟与鸟笼的关系,这就使叙事者可以轻松无愧地摆脱子君。

与笼中鸟的形象相关联,叙事者反复召唤路的形象,以体现他对自由的渴望。在老调重弹地提及创造新开始的需要时,他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子君脱离他的生活这一点上。由于缺乏勇气首先提出断绝两人的关系,所以他决定以暗示和隐喻的方式,向子君“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页 123; 209)对子君而言,新的路走向的是死胡同,而“路”这一意象却有助于叙事者把捉从当下的现实逃脱的可能。这是来自鲁迅《故乡》的遥远呐喊,在那篇小说里,路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希望。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当《伤逝》中的个人之路在叙事者的眼里最终幻化成一条灰白的长蛇时,这一凶险的意象便使路“不那么可靠了”。^[20]然而,叙事者仍决定向这可疑的逃往自由的路上跨去,因为对他而言,生活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而为了独自幸存下来,他必须让自己摆脱阻在路上的障碍。^[21]对于“体验的自我”而言,那一障碍就是子君,而对于“叙事的自我”来说,那就是对子君幽灵般的记忆,这记忆搅扰着他心神的平静。如果说先前涓生用言语将子君从他的生活中逐开,那么现在他则倚赖写作行为消除对她的记忆,将这记忆抛入遗忘之中,并肯定他本人对过去故事的权威的、指示性的控制。

指示性地消解过去的尝试,将“叙事的自我”与“体验的自

我”在一种令人怀疑的忏悔之音中联合起来。子君死后,叙事者重归他单身时曾经住过的小屋。他向读者描述着这间破屋的场景,来开始他的讲述。

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床板。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页 110, 197;黑体为笔者所加)

当描述破屋子的情形,并将其未曾改变的模样与“过去一年中的时光”所经历的生活的骚乱相比照时,叙事者表露出一种深刻的无聊感。然而那哀悼与伤悔之情,是否因为子君之死,便可以传达由之而来的缺失感?或者是否因为最初与子君的纠葛,便可以达成对自我的呵责?也许二者皆有。在任何情形下,小屋不变的外表都镜照出叙事者力图抹掉过去的愿望。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子君在这一年的时光,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从一名活泼的少女转变成一个女人,并最终转化成幽灵般的记忆时,这个过程与叙事者自身状况的反差,便极为显豁明确了。由于叙事者在他开篇处作结,所以将“体验的自我”与“叙事的自我”分隔开来的时间,便构成一个轮回。而那不变的空间抵牾着,实际上取消了叙事者与其先前的自我之间的回溯式的话语所设置的时间距离,其抵牾与取消的程度竟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绝无可能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待叙事者悔恨式的哀悼与回溯式的自我批评。

这种叙事情境的复杂性,由于叙事者对他在子君之死一事中的作用的奇怪解释,而得以证实。叙事者主要的罪恶,他说道,便是他对真实矢志不渝的忠诚:“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页 127; 212)读者不禁疑惑,当叙事者在“真实”与“爱”之间设立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时,他与其说是在指控自己,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他提出这样一个虚设的论点,诱使读者在非此即彼的困境中作出选择。然而这篇小说拒绝被归约成一次抽象的形而上学训诫,更不必说是说谎的教诲了,因为子君之死的悲剧与其说是由涓生对真实的忠诚而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子君爱情的抛弃,而且特别是由于他无法调和他所认为的爱人的要求与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同自由恋爱一样,都是性别化的,而且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倘若叙事者自责为一个“卑怯者”(页 127; 212),那么他由于社会压力而产生的懦弱,与其说出自同谎言生活在一起时的无能为力,不如说植根于他自我中心的世界。对于他那种逃避主义的生活观来说,爱情也不能例外。他通过爱情来逃避无聊与乏味,而一旦生活变得艰难,他又从爱情中逃离。实际上,他对自由的要求如此之大,甚至私下希望“她的死”(页 124; 209)。

叙事者从他虚设的有关真实与爱的讨论中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最终强调了整套叙事的基本框架:“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页 130; 205)读者不必从字面上接受这一套忏悔,因为它以一套相对无害的思想

话语(关于真实与谎言的争辩),来代替现代主体性的深重危机,而且通过压抑受那一危机影响的人与人关系的黑暗现实,从而似乎重新开创(reinvent)了现代性的志业。然而即便是从字面意义看,这一陈述仍旧在文本层面深刻质疑了叙事者以及这一整套叙事。正如叙事者将怀旧式写作视为走向新路的第一步,读者也许会问,这写作是否掩盖了真实?叙事者所拥抱的,是否是在谎言的指导下写就的?也许消生回溯式的写作是一种指示性的暴力行为,这个行为与其说是用来反对“真实”,不如说是用来抵抗对已故女人的记忆。引人注目的是,男性的欲望在女性尸骸上的铭写(inscription),在男性作家恋尸狂的幻想中反复出现,而且表现出如此非同寻常的相似性,这一点正可见于我对郁达夫、沈从文以及施蛰存的分析。

说我是女人

如果子君能活到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会怎样?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解放的”女性而活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解放的”女性是否必须总得像子君那样,在现代的夫妻关系与传统的家庭之间作出抉择?她是否总是必定因爱一个男人而受伤,或是为他而死?她能对自己有所感觉吗?她怎样讲述她的身体,性与写作?而且她怎样向别的女性讲述自己?

与《伤逝》类似,在鲁迅作品三年之后发表的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试图从性别层面处理现代的性关系问题。然而与鲁迅不同的是,丁玲对妇女主体性基础的探讨,乃是让

叙事者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女人的体验。与子君判然有别的是,莎菲拒绝在现代的夫妻关系与传统的家庭之间作出选择;此外,这名“解放的”女性以接近受虐狂式的快感来分析自己,她的欲望对象既有女人也有男人,并且公开讲述她自己的身体与性,这种公开性在中国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全新的。^[22]

这篇小说 1928 年 2 月发表于《小说月报》,顷获成功。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它的发表,“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23]小说的作者被欢呼为“‘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24],而且她对“Modern Girl”(“摩登女郎”,该词的中文音译,见附录 F)的理解,比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要深刻。^[25]丁玲拒绝向五四时代极为流行的自由恋爱小说高唱赞歌,她所塑造的是一个力图了解自己的身份、性与孤独的迷茫的现代女性,这一写作行为站在了同时代人的作品之上。^[26]研究五四时期的小说史家亦将她归类于他们所谓的女性写作的传统,并与庐隐、冰心、冯沅君、凌淑华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27]

丁玲小说的指示性冲动来自其日记形式的表述,它自己向自己说话,而且有时以自我为他者。三十三篇日记记录了莎菲在北京的寒冬贫乏而又奢侈的生活。她大多时间住在旅馆或是租借的房子里,亦曾短暂住在医院。由于厌倦自己的生活 and 友人,她将自己的思绪倾注于自身,就仿佛写作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虽然日记体写作为丁玲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前文本(pretext),但它也有助于创造一种女性写作,这种女性写作的特征是对性别化的主体性极度敏感,奋力抵抗对求爱以及女性的俗套描摹,骤然戳穿浪漫化的恋爱情节,最终削弱视

写作为走向自我认知之有效途径的看法。

西文名字“Sophia”在汉语中的音译“莎菲”，将叙事者直接设置在读者熟悉的汉语文化语境之外。莎菲一如其名，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都市生活方式，它偏离了“传统”意义上家庭以及社会的束缚。她是丁玲早期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之一，这些女性人物在拒斥“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亦发觉自身陷入经济、社会以及道德的危机当中而一筹莫展。最糟糕的是，“她们在自己随心所欲、不合规范的存在状况中时常发现的是，在直面世界的同时，她们也必须遭遇自身。”^[28]莎菲在一家公寓房里与孤独的自我面面相向，这是由第一篇日记所记录的镜中图像导引出来的：“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29]（页44；51）。这种自我审察的方式，与日记写作的反思行为是并行不悖的。^[30]镜子的作用在于为莎菲的女性写作提供指示性隐喻，在这种写作中，她是我（作者）、她（主体）和你（读者）的合而为一。富于反讽意味的是，镜子对其形象的扭曲（惹恼她如此之深），同样预示了她自恋式接近自我时的缺陷，这便如同日记无法对自我（selfhood）之谜提供解答并最终让她以失望而告终一样。莎菲对写作和自我的态度，反映了女性欲图抛弃男性关于女性欲望的书写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在男性主宰的文学语言中寻找全然令女性满意的另类语言时无获而终的结局。

作为一名“自我解放”的女性，莎菲试图将自身嵌入一种

尚待书写的文本当中,在这一文本里,一名女性不再被描画成一个女儿、姊妹、爱人或者朋友,而是一个自主性的我。然而这不是一项可以轻易实现的任务,因为在以往的文学中只有作为母亲、女儿、妻子、姊妹或者恋人的女性,所谓自主性的自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页 51; 56)莎菲成为自身的谜团。自我讯问、暧昧不清、不确定性以及自恋情结,恰恰成为这种女性写作的标志。

莎菲的日记是以一种汉语语言学家称之为“欧化”的白话文写就的。叙事者大量使用了冗长的连接词和从句,尤其是因果从句——由“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以及“尽管”等词语引人的条件的、让步的、时间的原因。^[31]虽然这一文体在五四小说中并非不同寻常(它促成了现代汉语白话文散文风格的发生),但是它出现在莎菲的日记里,却反映出叙事者讲述自身淆乱的欲望时,一种饶有趣味的选择。叙事者在沉思其处境时陷入种种“但是”和“虽然”,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暧昧心态,即她对苇弟的厌倦,以及她对西化作派的凌吉士的强烈渴望。在对待这两个男人时,莎菲开始与自身欲望的不确定性而面相觑:“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的在得意得笑了。”(页 47; 53—54)苇弟的眼泪与多愁善感使莎菲无法善待之,因为她觉得他无聊而又缺乏魅力。这种“男性气质”或者性吸引力的缺失,与其说触及到苇弟本身,不如说它道出了莎菲对于男性气质以及男性性本质的幻想。她所幻想的是何种类型的男人?“我又梦想到欧洲中占的骑士风度,这拿来比拟是不

会有错,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过的。他又能把那东方特长的温柔保留着。”(页 72; 73)莎菲幻想的并非一个白种男人,而是一个拥有白种男人之性魅力的中国男人,这一幻想即刻取消了苇弟自称拥有男性气质的资格。

这样的描述凸显了东西方遭遇时的性政治问题,在这种遭遇里,欲望、值得想望的事物(desirability)、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权力关系的重组形式(reconfiguration),沿着文化、民族和种族的脉络重新配置起来。可以说,弱势民族被西方的宰制性在场象征性阉割了,而这种在场又同时反馈在被宰制者与宰制者的性幻想中。^[32]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把莎菲的立场简单化为一个被殖民者的立场。在她与凌吉士的关系当中,莎菲尚能与自身的情欲狂想相斗争,而且能为她本人,一名中国的女性,重新界定欲望和性。毕竟是莎菲,而不是她的“骑士”,跨出了侵略性的第一步,并迅即决定终止这种关系。日记以公开的性语言,通过将叙事者分派成一个引诱者的角色,改变了这一骑士罗曼史。

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的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会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盘算他吗?后来我特意说我想请他替我补英文,云霖笑,他听后却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含糊糊的回答,于是我向心里说,这还不是一个坏蛋呢,那样高大的一个男人却还会红脸?因此我的狂热更炙炽了。(页 52, 57—58)

莎菲的侵略性与凌吉士的窘态,颠倒了传统的求爱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而,如果说前者对社会常规的藐视

靠的是对普遍接受的性别角色的颠倒,那么,倘若那男子决定予以回应,她又该做些什么呢?莎菲很快便惊奇地发现她梦中情人的真相。

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这便是他的志趣!(页65—66,68)

金钱,权力,以及资本主义所勾勒的一名西化的中国男子的男性气质,竟是这样一幅暗淡的图像,结果在莎菲的眼里,这名男子开始散发出某种特别的性气息。与凌吉士相关联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使叙事者骤然警醒到现代男性气质的社会经济构成,这种男性气质的性的魅力无法脱离其压抑的意识形态。莎菲最终抛弃了凌吉士,而且在此过程中,她亦向她本人对白人骑士的幻想,宣告永别。

那么,整篇日记又是如何以指示性的词语,在对抗资本主义男性气质时,建构其自身的女性气质呢?面对着梅贻慈所命名的“写作本身的局限”,这篇日记审视了其本身的意义的基础,以便开启女性写作的可能性。^[33]就此意义而言,莎菲采

用的文本策略,是用女性尤意义的世界来对抗男性主宰的意义与价值观的世界。对牛奶的意象(也是莎菲所喜欢的表述女性气质的液体意象)的惊人运用,便是--例。她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如是写到: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页43,50—51)

曾有论者以为,这个段落从符码的意义上,指涉着自淫状态,无论这种解读恰当与否,它依赖的是分析者在多大程度上索解文本的字面涵义。^[34]假定我们的解读行为并不仅仅是要阐明符码的信息,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比喻的层面,一方面在莎菲的写作与阅读之间找到--种有意义的关联,而另一方面又在牛奶与自淫之间发现某种关系呢?思考一下紧随上面引文之后的段落: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〇六,百零机,美

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页 43—44, 51)

莎菲的读报行为,并不试图理解她所阅读的内容,或是揭示某些潜藏的信息。这一描述,与前段引文中她重复不停的喂奶之举,颇为奇特地并行不悖。一如她为喂奶而喂奶,此时此刻她所做的,是为读报而读报。这些无意义的琐屑之举之所以不断重复,是为了缓解无聊厌倦之感,而这种无聊与厌倦,在她沉思自己的生活中令其不快的周遭环境时,使她身心俱疲。莎菲无法适应现代男性主宰的世界中充斥的国内新闻、国外要闻、本埠琐闻、以及教育界、党化宣传、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的报道。她不加区分地翻看这些栏目,对标题新闻、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以及美容药水的广告,皆一视同仁。莎菲的阅读行为,就像例行公事的表演,一如她的日记写作。既然凡此等等都是不及物的(*intransitive*)的行为,其意义只能达及行为的主体,我们便能在这一文本中比喻式地解读自淫的涵义。就此意义而言,不仅仅喂奶的行为,而且莎菲愤世嫉俗的阅读和写作,也可以被视作自淫的文本策略。

将日记写作说成自淫的比喻,此乃老生常谈,然而关键的是,莎菲在一个充斥着自恋、自怨与施虐受虐的矛盾表达的文本当中,究竟是如何将这种写作联系到女性气质的?此处的女性气质,似乎被建构成一种同语言和写作相关的相互抵牾的存在状态(施虐受虐狂),而这种抵牾在于叙事者在大声疾呼的同时,却又强迫性地书写自己:“语言,文字是怎样在这时显得无用”(页 78; 78)。向第三人称的转变,就仿佛她正在向别的什么人说话,在此过程中,莎菲在日记的最后一页这样遣

责写作行为：“在这本日记里，与其说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记录，不如直接算为莎菲眼泪的每一个点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觉得更切实。然而这本日记现在是要收束了，因为莎菲已无需乎此——用眼泪来泄愤和安慰，这原因是对于一切都觉得无意识，流泪更是这无意识的极深的表白。”（页 79；78）关于眼泪（另一种表达女性气质的液体意象）的隐喻，关涉到写作行为以及张力的缓解。它代表一种自觉的、女性化的痕迹（signature），标志着对男性主宰之写作的疏离，以及对笔与墨的所有权的规避。眼泪，带着消散与空白的内涵，意味着意义的缺失，而且通过打破有关“谨慎”的规范、社会的禁忌以及以“墨”书写的公开写作的成规，这样一篇充斥着眼泪的日记所凸显的正是写作的局限。日记结尾处莎菲诸般体验所具有的欣快感，读起来就像是自我表述的危机中一次受虐狂的沉溺。当她从第三人称走向第一人称的言说形式之际，她如是宣告：“可是在这最后一页的日记上，莎菲应该用快乐的心情来庆祝，她是从最大的那失望中，蓦然得到了满足，这满足似乎要使人快乐得到死才对。但是我，我只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页 79；78—79）

莎菲的自恋，深刻体现在她对写作与阅读的表达行为中性别差异的铭写。莎菲坦言相告，她之所以保留这份日记，是为她所挚爱的女友蕴姊的缘故，“自然，这日记，我总是觉得除了蕴姊我不愿给任何人看。第一是因为这是特为了蕴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记下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二来我也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会因了别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下罪一样的难受。”

(页 72; 73)写作被理解为两个女人之间情感联系的方式,以及对传统的、男性的关于欲望和性之叙事道德权威的抵抗。

就此意义而言,莎菲将自己的日记显露给一名男性读者看,这一冲动行为违背了她本人和蕴姊之间指示性的阅读约定。换言之,这本日记并非是给男人看的。不过,她让苇弟读到整本日记的一部分,因为她想让他了解她的真实面目。苇弟却未能把握这些日记“故意流露的”含义,而只是相信另一个男人,即凌吉士,情场得胜,成为莎菲的情人。这部分日记并不能让苇弟理解莎菲,因为他坚持用性别化的方式解读莎菲的日记,这种固执己见,最终导致了一种老套的三角关系,而在这种关系里,他的对手战胜了他。莎菲探讨了苇弟对她的“误”读:

谁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这只能表现我万分之一的日记,也只能令我看到这有限的而伤心哟!何况,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设法用文字来反复说明的日记给人看,已够是多么可伤心的事!并且,后来苇弟还怕我以为他未曾懂得我,于是不住的说:“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赌气扯了这日记。我能说我没有糟蹋这日记吗?我只好向苇弟说:“我要睡了,明天再来吧。”(页 73; 74)

莎菲在女性文本与男性读者之间的这种寓言式遭遇中,将写作行为与阅读行为构造成深刻的性别化行为。富于反讽意味的是,这本日记假想的女性读者在有机会阅读之前,竟死于非命,莎菲视蕴姊之死,为传统言情文学的牺牲品。在忆

及她们二人在上海共度的时光之际，她回想道：

在去年这时候，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有蕴姊千依百顺的疼我，我假装病躺在灰上不肯起来。为了想受蕴姊抚摩我，便因那着急无以安慰我而流泪的滋味，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满意的事而哼哼唧唧的哭。便有时因在整日静寂的沉思里得了点哀戚，但这种淡淡的凄凉，却更令我舍不得去扰乱这情调，似乎在这里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缕甜意一样的。至于在夜深了的法国公园，听躺在草地上的蕴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不愿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会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去的这样快，我当然不会一人漂流到北京，无亲无爱的在病中挣扎，……（页 70；71—72）

蕴姊对爱的歌唱，参照她与她所爱之男子的不幸婚姻，极具反讽意味。那“苍白脸色的情人”指涉的是才子或者“小生”的刻板形象，在传统小说和戏剧中盛行不衰，代代流传。^[35]莎菲弃绝传统的缠绵之爱，并抗议她所挚爱之女友的无端受害。她的日记抗争着曾打动无数多情男女之魂灵的古典情剧《牡丹亭》，通过坚信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亲密交谈，她以性别化的词语，重新界定了阅读和写作。这样一种女性间的交谈，使才子（本土的男性美）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骑士（舶来的西方理想）都成为冗赘之物。然而，蕴姊在能够读出这些书页的涵义之前便过早去世，深刻地揭示出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渴望。在结尾处，莎菲的日记真正成为眼泪的记录，它哀悼着心心相印之女友的离去。

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建构问题而言,女性间交谈的这种失败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和那些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性别化的文本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张力寓言化了?最后,文学批评在认可性别化或者非性别化(?)之解读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下一章我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将落实在重新思考文学批评与中国民族建设的努力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种关系进入我们的讨论之前,性别问题提出的方式,还只能是在个别文本中表述男性气质或是女性气质时的尖锐姿态,就仿佛这样的表述本身即足以为批判性思考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换言之,本章所涉及性别问题还需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话语更为宽广的诠释语境中予以重新建构。

注 释

- [1] Benveniste, p. 224; 下文同出于此。
- [2] Silverman, p. 128
- [3] 就此层面提出的一个典型问题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否存在与西方自传式传统可比的传统。对我来说,这种提问方式与其说揭示了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不如说暴露了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困境。类似的问题还包括中国有史诗传统吗?中国文学中有悲剧吗?不论答案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身只有在所谓的西方文学被视为所有文学作品的丰泉时,才是有意义的。Wu Peiyi 的 *Confucian's Progress* 就是“有还是没有”这一老式问题继续在中国学领域争辩不休的一个近证。本章也反思了我的博士论文《第一人称叙事的政治》(*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在论及中国现代叙事问题时所表露的早期立场。
- [4] 在所有以屈折语形态书写的文学作品中,大概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嫉妒》(*La Jalousie*) 是克服母语形式限制之最为杰出者。读者常常赞叹其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叙事者的如下尝试,即避免任何自我指涉性的言说标志。虽然其效果当然是对以“我”为中心的心理小说进行了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戏仿,但这位作者亦只能以此方式对抗法语的局限。举例说来,他便无法走出自己的方式,在不严重危及法语语言的情况下,消除自己句子的语法主语,而这一点恰恰是写作汉语者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因为汉语当中动词变位形式的阙如开启了范围广泛的文体学可能性。
- [5] 为帮助那些有困难想像这种语言状况的人,请允许我不揣冒昧,以英语中的祈使语气做一个不甚完美的类比。比如祈使句“Let's go for a walk”和“Come and stay with us”。在这两个句子里,主语是暗指的,不直接说出来,而动词保持不定式形式。事实上,不可能恢复第一个句子的形式主语,因为该句子从来不从主语部分开始。至于第二个句子,我们可以加上代词“你”,以获得一种强调的效果,但在通常的情况下,第二人称代词的出现是多余的。稍稍延伸一下想像,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推论,一种非屈折语形态是如何运作的。汉语中,普通的陈述句在没有语法主语的时候也是极容易理解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添加一个主语反而显得多余或者荒诞,就好像英语中“You come and stay with us”或者“(We, you?) let's go for a walk”等类似的例子一样。
- [6] 参见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7] 沈从文对边缘人,如乡村女子,下层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等,皆有兴趣,对此写作倾向的讨论,见 Kinkley。
- [8] 对沈从文的传记式研究,见 Kinkley, 对这篇故事特定环境的讨论,见 上德威, pp. 284—286。
- [9] 上德威, p. 222。
- [10] 参见我在第一章对阴性“她”的讨论。
- [11] 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收入《沈从文小说选》,页 229; 许开煜 (Kai-yu Hsu) 英译,收入 *Lau et al.*, p. 256。下文出处同此,汉语原文页码在先,英译本页码以斜体字在后。
- [12] *Teresa de Lauretis* (p. 5) 的观点有助于阐明这一情境。
- [13] 豆腐铺老板可能参与了这一可怕的事件,这在小说前面的场景中已有前兆。在一起观看公开处斩的场面时,跛脚的号兵问那年轻人是否害怕死尸“血迹假然”的样子,叙事者如是回忆道:“这年轻乡下人的回答,却仍然是那永远无悲恸的微笑。看到这年轻人的微笑,我们为我们的友谊感觉喜悦,正如听到那女子的声音,感觉生命的完全一个样了。”(页 233; 258) 死亡、性欲望以及他们生命的圆满,都交汇在这一刻。
- [14] 举例说来,在另一篇题为《灯》(《沈从文小说选》,页 154—174) 的小说里,沈从文的叙事者也戏弄了讲故事的成规。该故事的英译者为许开煜,见于 *Lau et al.*, pp. 237—246。
- [15] 《野草》,收录《鲁迅全集》,2:170; 英译本为 *Lu Xun, Complete Poems*, p. 171。
- [16] 《〈野草〉英译本序》,中文原文收录《鲁迅全集》,4:356; 英文转引自 *Lu Xun, Complete Poems*, p. 256。鲁迅在杂文《我和〈语丝〉的始终》中重述了这一想法,收入《鲁迅全集》,4:166。
- [17] 在同时收入《彷徨》集的一篇小说《幸福的家庭》当中,鲁迅幽默地嘲笑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观念,他描写一名小说家梦想着现代的家庭应该由幸福的“对儿”组成。他们不但出了爱情而自由结婚,并且“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鲁迅全集》,2:36; 英译本为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p. 157—158, 译文略有修正)
- [18] 鲁迅,《伤逝》,收入《鲁迅全集》,2:130; 英译本为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p. 215, 字句略有修正。汉语名字的拉丁化已从韦氏系统转换成拼音。下文出

处同此,汉语原文页码在先,英译本页码以斜体字在后。

- [19] 例如,见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收入《鲁迅全集》,1:268—274,此文最初是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亦见 Hanan, p. 71。
- [20] 李欧梵,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p. 88。
- [21] 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孤独的旅程或“孤独的旅行者”是中国现代小说中一个主要的形象。见其“The Solitary Traveler: Images of the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Hegel and Hessney*。
- [22] 英语世界对丁玲生平与著述的研究,见梅贻慈 (Yi-tsi Mei Feuerwerker), *Ding ling's Fiction*; 以及白露 (Tani Barlow) 为丁玲作品 *I Myself Am a Woman* 撰写的导言。
- [23] 毅真,《丁玲女士》,收入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页 223。
- [24] 茅盾,《女作家丁玲》,收入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页 253。
- [25] 钱谦吾,《丁玲》,收入黄英,页 185—206。
- [26] 对自由恋爱的文化遗产及其相关背景的讨论,见李欧梵, *Romantic Generation*, 特别是第 13 章“The Journey of Sentiment,” 以及第 14 章“The Romantic Heritage。”
- [27] 近期对此女作传统的讨论,见文隽 (Larson), “The End of *Funu Wenxue*”; 及其“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刘禾, “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周蕾 (Rey Chow); 以及孟悦、戴锦华。
- [28] 参见梅贻慈, *Ding Ling's Fiction*, p. 29。
- [29] 《莎菲女士的日记》,收入《丁玲短篇小说选》,页 44; 英文译者为 Tani E. Barlow, 见丁玲, *I Myself Am a Woman*, pp. 49—81。若干词句根据原文并参照 A. I. Chin 早些时候收入 Isaacs 所编之文集 (页 129—169) 的译文略有修正。下面的引文中,中文原文页码在前,英译本页码以斜体在后。
- 五年后,丁玲在《文学》(1.4 {1933}) 杂志发表一篇续作。其标题为《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分》,而续作无法与原作相比。先前之作的心理学洞见以及丰富性,在续作中荡然无存。这位日记作家坦言承认她无法再进行以前的那种写作。作者对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执著,损害了她本人的创造性天才。
- [30] 顺便一提,Colette 的《流浪者》(*La Vagabonde*),一部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法国女性主义小说,同样以一幅自恋式的镜像开始,而以叙事者致情人的日记式书信(她为追求自由以及女性自我的完整,而抛弃了这位情人)告终。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共通之处,揭示了女性写作许多惊人的特征。
- [31] 对现代汉语写作中欧化文体这一层面的讨论,见耿德华,页 239—240。

[32] 参见 Fanon。

[33] 梅贻慈, *Ding Ling's Fiction*, p.48。

[34] 参见丁玲, *I Myself Am a Woman*, p.355n1。

[35] 思考莎非是否故意曲解《牡丹亭》的涵义,以适应她本人的需要,这是饶有趣味的。倘若《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性别问题显然同阅读行为和写作行为相关,那么,可能为莎菲所忽视,而在古典戏剧中已得以表述的阅读状态究竟是什么呢?《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在决定女主人公命运的游园活动之前,杜衙设帐的老师陈最良与学生丽娘及其侍女春香之间,有一系列喜剧性的对话,而话题集中在对《诗经》的解释上。当老师将《关雎》一篇的意思解释给自己年轻的女学生时,女性受教育的场景正式开始。陈最良首先援引《毛诗》的名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然后引经据典,解释该诗如下:“论《六经》,《诗经》最葩,四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而且“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最后他吁求孔子作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二字,付与儿家。”(汤显祖,《牡丹亭》,页26;白之[Birch]英译)然而,丽娘与春香对陈最良的附会之解全无兴趣,而是坚持对该诗的字面诠释即,她们将其读作一首关于爱与交配的抒情之作。当春香问,“怎样声儿?”或是“为甚好好地求他?”春香的读法有效地颠覆了千百年来主宰着诠释该诗的方式的确立已久的解经学传统。值得回味的是,此出之后降临到丽娘身上的事件(游园之后,她与柳梦梅在梦中的浪漫遭遇,以及她的相思之苦),直接的原因便来自这叛逆性地读解经典作品的最初时刻。

然而,我们并不能随即作结说,我们在这出戏里发现的性别化解读,可以确立一种女性的视角,尽管这种女性视角能够从文本中推论出来。通过女性人物来道出颠覆性的诠释行为,这在有明一代的文学作品中并非标新立异,该事实使这一情境大为复杂化。它不过是明朝盛行的“情”与“礼”之更为宽泛的哲学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有鉴于戏剧这一通俗形式在等级森严的古典文学中所具有的卑微地位,在一出戏中对《诗经》的一首诗进行性别化解读,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因为它体现了通俗文学形式的声音,而且在此过程中,它还嘲笑了私塾先生这一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悠久的寓言传统(tradition of allegories)。情形便是如此,因此,我们对《牡丹亭》或者任何传统文本进行解读时,必须仔细地重新设定条件,并详尽说明文本自身之内可以发现的迹象。倘若这样理解,那么性别化解读的任务,就不再是识别文学文本中男作家或女作家在描摹女性时

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而是要阐明那些在舞台上演出的(staged)或者伪装起来的复杂的对抗形式(时常被符码化为传统文人文化中的女性),而这些形式在抗拒着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实践和思想实践。

Ⅲ 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在《迟到的现代性与审美文化》(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一书中,格利高利·尤斯达尼斯(Gregory Jusdanis)考察了现代希腊的民族文化兴起时所伴随的环境因素。在他看来,希腊18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事件,主要关系到精英分子的欲望,他们希望看到希腊整合到更发达的欧洲民族国家,并使自身西方化,现代化。

对他们而言,现代性与西方是同义词。当他们按照欧洲的范式,希望获致经济、社会、政治的联合时,他们也从欧洲的种种情境里,将若干结论普遍化了。希腊的情形表明,潜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总体论述中的二分思路,从一开始就公然在场。与现代性最初的遭遇,使希腊社会被投放到意识形态对抗(东—西方,传统—现代,纯粹的希腊语—现代希腊语,古典—当代,族群—国家)的急流当中,而这些对抗导致了社会的动荡,有时竟促成了暴力。为舒缓张力,即便仅仅是以想像的方式,另一种现代的建构也被输入进来,这便是自主的审美活动。^[1]

所谓“审美活动”，尤斯达尼斯指的是符号与表述的领域，而这些符号与表述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意义，就像英语、法语、德语国家的情形那样，文学被视为一种使人民得以社会化的手段，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开始表述为民族价值的那些象征的与经济价值。这些象征与表述，取代了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种族—宗教的身份认同，它们通过在想像的领域里使地方性的忠诚(local loyalties)同语言的变体(linguistic variations)融为一体，从而成为新国家的合法性的源泉。民族统一在成为政治现实之前，是在话语的意义上被体验着的。

虽然尤斯达尼斯的分析有时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方式(尤氏的著述令人不禁想起安德森)，转向了社会学决定论，但它也提出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譬如怎样才能富有成效地研究一个社会的文学与文化规划(projects)，这个社会发现自己与现代欧洲的宗主国相比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它迫切需要减轻古代传统的重负，以求赶上世界其他的民族国家。^[2]我发现与本章主题尤为相关的，是尤斯达尼斯对于文学批评、文化经典(canon)的形成以及其他相关实践的切中肯綮的分析，正是这些实践，使希腊现代文学成为现代希腊的一种社会体制(institution)。倘若这一切对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者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与现代希腊、印度、非洲以及阿拉伯民族不无类似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力图在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时代幸存下来，而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直面西方强有力的现实，并屈服于这一现实，无论所谓的西方究竟是以殖民者、半殖民者、人文主义者、福音传道者，还是以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身份，冲击着他们的意

识。这一层面的体验促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共同的词汇表，在那些有着不同历史的文化与社会的现代经验中都有这样一个词汇表。因此，诸如“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与“现代”之类的词语范畴，不仅仅是对宗主国欧洲理论的翻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传介式的表达形式，而这些形式承担着这些民族在体验一个整体化的西方时，必须忍受的重负。^[3]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批评在中国成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它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了理论语言，借此，他们能够解决与西方的窘困关联，同时反思自身的存在状况。当然，理论的这一功能，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现代历史时期的文学话语，但是体制化的(institutionalized)文学批评逐步发展为20世纪中国的一种奇特建制(establishment)，成为一个中心舞台，文化政治与民族政治经常在这个舞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4]这一现代批评实践的肇始，可回溯到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瞿秋白等人的写作行为，而最具爆破力(exploded)的表达形式，则在毛泽东对于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文本独特的诠释中达到了高潮。借助这一诠释，毛泽东发动了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包括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贯穿整个20世纪，当中国的精英人士倾全力于文化、国民性、身份认同、现代白话文以及现代文学的地位等议题的时候，合法性的问题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本书第七、八两章将通过集中论述民国初年文学批评和经典规范形成的具体环境，在体制化的层面追问这一问题。我有兴趣关注的是包容与排斥的政治究竟怎样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过程，以及在压制另类叙事和对抗性话语(counterdiscourse)时，究竟怎样体现在若干重要的后果上。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当我试图发问究竟是何种合法化过程使得“中国文学”变成这种局面的时候,我批判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指明现代文学实践与民族建设的政治二者之间共谋的程度,而是探究使得这样一种实践得以出现并形成规模的矛盾状况(contradictory conditions)。所以,我并不是要追随尤斯达尼斯多少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倾向,描摹在“迟到的”现代性的压力下一种民族国家文学是怎样形成的,毋宁说,我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中国现代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中矛盾状况与争议之声(譬如性别化的视角)的发生地。因此,合法性问题的反面是,在主流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旁,是否还存在另类叙事和历史,对关于民族国家、文化与文学的耳熟能详的主流话语提出质疑?这一关注,几乎无可规避地促使我在第九章重新思考晚清时期,以及“五四”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对抗性话语而重新浮现的有关“国粹”问题的旧有论战。我希望这一论战变化的动力(changing dynamics)将阐明范围更广的抗争性叙事和对抗性话语,正是这些叙事和话语,可以使我们能够比较复杂地理解民国时期的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5]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为了将此处讨论之问题的相关意义传送到当代有关民族文学的理论话语这一更为宽广的语境中,我以对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有争议的文章,即《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的若干批评入手。詹明信在此谈到了非西方

知识分子对自己身属的民族国家的痴迷。在他眼中,这些知识分子将“第三世界”表述给西方,而他们的表述多多少少是透明的,并与詹明信本人假定的“我们”或者第一世界的表述恰恰相反。关于两个世界的表述与权威的这一未加检验的假设使詹明信得出一个颇有争议的假说,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可以读作民族寓言。^[6]艾哈迈德(Aijaz Ahmad)尖锐批评了詹明信所建构的成问题的理论,即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美学,并强烈质疑詹明信声称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拥有,而第三世界并不具备的假想出来的(imputed)知识基础。

如果我们看一看詹明信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用生产方式来定义的(分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第三个范畴——第三世界——却完全是用一种外部强加的“经验”来定义的。在前两个世界起着构造人类历史作用的东西,在第三世界竟告阙如。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这种分类方式把世界划分为创造历史的人和仅仅是作为历史客体的人。^[7]

举例说来,詹明信在解读鲁迅的文本时究竟把哪些起着构造文学史的作用的东西省略掉了?是否第三世界的文本只能被归结为纯粹的“经验”,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文学却有能够构造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方式?就这些问题而言,詹明信的假说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而并非纯属谬误,因为它运转于第一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取向和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例如,可能恰恰是文学批评的体制,而不是

“第三世界”文学,把一部分文本经典化,代表“真正的民族经验”,并且把它们作为这样的经验翻译介绍给西方,而詹明信从来不曾考虑到这一可能性。他本人对鲁迅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规范围绕鲁迅作品的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意义。我的目的并非辩驳詹明信对个别文本的特定解读,而是关注他本人第一世界的盲点,即视而不见这些文本以符号意义为中介(mediated)的现实。我所考虑的中介因素,是指现代文学批评的体制,正是这一体制在民族文化的领域里,并在涉及跨国权力关系时,扮演文本生产者及经典规范生产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跨国的权力关系,明显体现在詹明信本人把第三世界文学展示给第一世界学术受众时的“翻译行为”。其结果是两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就民族主义话语的问题,达成了一次奇特的跨国联合创作。

也许第一世界的理论家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当下挪用,关涉到詹明信如此切中肯綮地描述出来的多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倾向。然而在很多层面,这些倾向仍使我想起19世纪关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话语,这一话语仍旧存活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当代批评词汇之中。歌德1827年首创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提出了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流观,这一交流观的目的在于通过为数众多的具体现象,揭示出“元现象”(Urphänomen)的准则或者永恒的同-性(Eternal Oneness)。正如安东·伯尔曼(Antoine Berman)指出的,对这位德国诗人而言,“世界文学”的观念并非指过去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之百科全书式的总和,亦非指已然获得普遍地位,并成为所谓文明遗产的有限的杰作之总和。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关注的是不同民族文学或者地

区文学之间关系的现代状况。”^[8]因此，“世界文学”并不表示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学将丧失其个性；恰恰相反，通过准许各国文学进入经济交换以及象征交换的全球系统的等级关系，“世界文学”构成了各国文学。不足为奇的是，世界文学的出现，与世界市场(Welmarkt)的出现是同时的。弗里慈·斯特里奇(Fritz Strich)富于启发地评论了文学与经济相辅相成的关系(symbiosis)，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场思想交易，是各民族思想观念的交通往来，是一个文学性的世界市场，而不同民族将他们的精神宝库带至那里，用来交换。歌德本人便特别喜欢用取自商业贸易世界的这一类形象，来阐明自己的思想。”⁹下面一段文字，引自声名遐迩的《歌德谈话录》，“世界文学”的概念首次出现于此，而这段文字则支持斯特里奇的观点。

理解并研习德语者，他发现自己身处各个民族分别提供各自**商品**的**市场**上，而他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相应着他可以**丰富**自己。因此，每一名翻译者都应被视为一名调解者，力图推进这种普遍的精神**交换**，并以之为责任，使这种一般化的**贸易**再进一步。无论对翻译的缺陷可以怎样评头品足，翻译仍旧是世界上普遍的交通往来中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行为之一。《古兰经》说得好：神在每个民族的语言中，给予这个民族一名先知。就此意义而言，每一名翻译者都是他所属民族的一名先知。¹⁰
(黑体为笔者所加)

如果歌德直接关注的是在德国文化中翻译的重要作用，那么，他所使用的经济喻说，却指出了一种话语的历史条件，该话语

有助于歌德想像一种全球化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德国语言和文学将成为“世界文学”绝妙的“交换市场”。举例说来,诚如他在《谈话录》稍后处指出的,“德国命中注定要将自身提高到代表全世界公民的状态上去。”^[11]

有趣的是,“世界文学”的观念,有点类似于今日的“后现代主义”,乘着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翅膀,渗透到欧洲之外遥远的市场。从一开始,这个德语词汇的汉语翻译“世界文学”,就背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得解释并证明中国在现代国际共同体(community)中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12]实际上,中国作家完全没有那标志着歌德对于德国语言和文学之信心的乐观看法。一代德国巨匠认为自己占据着一个世界市场,而所有民族皆为他提供各自的商品,而他在丰富自身的时候,崇高地(magnanimously)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与之不同的是,“五四”作家却大幅度转向欧洲文学,目的是要学会怎样生产一种民族经典,既值得被世界文学接受,也值得被西方评估。这正是陈独秀 1917 年发表的文章《文学革命论》激动人心之挑战的要旨:“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13]

然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作家仅仅被一种梦想,即为自身在世界文学中寻找一个合法性地位,冲昏了头脑,那么这即使不是彻底荒谬的,至少也是不准确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观念的汉语翻译,必须与其他竞争性的理论和话语(这些理论和话语有很大一部分也自域外舶来,触及到何为文学以及文学应该怎样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等问题)一同思考。这些竞争性的立场包括众所周知的“惟美”理论、人生派、平民文学、阶级文学、普罗文学等等。我将试图说

明,在民族国家斗争不同的危急关头,使用这些译介过来的理论有着不同的意义。

譬如郑伯奇,创造社的著名批评家,便是民国时期呼吁建设“国民文学”的第一份宣言的作者。他的文章《国民文学论》,1923年11月至1924年1月连续三期刊载于《创造周报》(第33—35期),他在文中指出,关心中国文学之发展者,应将此任务视为当务之急。郑伯奇认为,此事的紧迫性在于,军阀混战时期逐渐恶化的国内形势已经造成了普遍的茫然和沮丧。^[14]

郑伯奇纵览并批评了当时影响甚大的,特别是创造社的会员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所奉为圭臬的若干艺术和文学理论。他挑选出并且批判了“为艺术的艺术”、“人生文学”、“平民文学”、“阶级文学”等理论,也抨击了世界文学的观念,因为这些理论无法使艺术与生活“忠实于一切现实的东西,……国家生活国民感情,实在是我们今日现实生活的差不多一大部分。”他建议“国民文学”的观念要么总括所有这些流派,要么干脆一举取而代之。然而,世界文学不总是早已暗示了“国民文学”吗?郑伯奇的回答是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基础:他将世界文学归类到不真实的、虚幻的领域(这与歌德形成鲜明对比),并集中关注“国民文学”,视之为真实的与现在的领域:“我们是世界市民,我们是 *Cosmopolitans*,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这是现实。”^[15]虽然郑伯奇试图使自己摆脱“国家主义”式民族文学,但他无法从理论上有力地论述自己的立场,而只能声称“爱乡的感情”与“类似的意识”。^[16]男女老幼有所差别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主张,“无论什么人对于故乡的土地,都有执着的感情。”^[17]有趣的是,郑伯奇提及性别

与年龄的差异,只是为了消除这些差异的痕迹,以求为他本人有关国民文学的整体化观念留出余地。我将很快回到这种批评理论的性别政治上。

无论是郑伯奇,还是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都不曾在“国家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由此产生的滑动(slippage),覆盖着一个非常广泛而又悬而未决的思想话语领域,在那里,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这种语言的细微差别中挑挑拣拣,以求为自己的政治需求补充能量。虽然反对国家者,尽可以让自己大谈特谈个人、人民或者民族,以对抗国家——这种动力(dynamic)在第三章已有所论述——但是反过来,那些拥戴着国家的含糊其辞的著作也能通过宣称代表着人民与民族的利益,而从这一局面中获取好处。

一个很好的例证是,1930年国民党政府试图推行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反对革命文学的兴起,这一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为此目的,一些新期刊应运而生,如《前锋周报》与《前锋月报》,发表的作品主要描述英勇的战斗场面和爱国主义的感人实例,而其作者大多是默默无闻者,如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与黄震遐。鲁迅富于洞识地解读了黄震遐描写“青年军人”在中国西北“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故事,他将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黄震遐用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形象,实际上他无意间将自己与“法国客军”相关联。鲁迅讽刺到: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

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战在野蛮的非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非洲的阿刺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基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18]

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惟妙惟肖地捕捉到一块不确定的领域，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者、军阀、帝国主义者以及激进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就中国民族主义的意义问题而展开相互争夺。^[19]当时，大多数左翼分子视自身为国家主义的敌人，并公开批评政府。^[20]这样的冲突经常逐步升级为暴力的冲撞，而且常常导致政府对激进文学作品的查禁（见第八章）。但是，如果政府对于民族的合法性表述遭受了质疑——的确，这正是共产主义者攻击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基础——那么，诸如郑伯奇所提倡的国民文学，又怎样适应这些两极化的民族主义构想呢？它又怎样关系到在不同时期，同样深刻关心着国家的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规划呢？

郭沫若，一位因翻译歌德的作品，而赢得中国的歌德这一可疑的头衔（一个对陈独秀早期挑战的及时回应！）的作家，虽然并不赞成郑伯奇关于国民文学的特定看法，但是他关于

文学和艺术的论点,即,他视之为现代世界的美学所具有的民族建设功能的一部分,却比郑伯奇的爱国取向表现出更高的理论水准。他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演讲时指出:

我们可以知道,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情感,并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此类的事实很多,一时也说不完:如意大利未统一前,全靠但丁(Dante)一部《神曲》的势力来收统一之效果;法国革命以前福祿特尔、卢梭的著作影响很大。从前德帝国之成立,Treitschke说,歌德的力量不亚于俾士麦(Bismarck);俄罗斯最近的大革命,我们都晓得是一些赤诚的文学家在前面做了先驱的呢。^[21]

郭沫若认为文化建设的规划,是更伟大的民族建设事件必不可少的先驱,并强调文学是实现这个目标极为有效的途径。在论及20年代中国大局的混乱状态,以及一般国民的生活中艺术文化的衰亡与堕落时,他呼唤艺术家与作家提高人们的感情与精神,调动他们投身于更加伟大的事业。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发现中国的国家和政府与大多数欧洲政府所进行的中央集权(centralized)领导相比,完全缺乏对文化建设的赞助,因为大多数欧洲政府都想方设法提倡艺术,设立文学奖金,建造美术陈列馆,建设国立戏院等,不遗余力。^[22]郭沫若关于艺术家与作家的职能的论点,主要来自一种比较的视角,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中国的民族文学与文化倘若不同同时或隐或显地参照国际舞台或者“世界文学”,就无法进入繁盛期。郭沫若的观点所表述的,与郑伯奇的立场大相径庭。^[23]

然而,郭沫若究竟是怎样看待全球与局部的辩证法的?就在他完全认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证自明的逻辑时,他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世界市场上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的参与程度。就中国而言,军阀主义以及买办资本主义有效地混淆了地方性与全球性或者中国与非中国之间的界限,而这些界限本是民族主义发挥作用的地方。郭沫若使用当时在左翼话语中颇为典型的列宁主义语言,于1926年发表《艺术家的觉悟》一文讨论这种境遇:

中国的革命对于外国的资本家是生死关头,对于本国的资本家也是生死关头,他们的利害是完全共通的,要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国际就是一个无形的资本主义的王国。只要他们的资产家的地位能够保持,中国会成为怎样,中国人会成为怎样,他们是不管的。^[24]

我情不自禁要把这一段引文解读成对于经济比喻(买卖,精神交换,世界范围普遍的交通往来)的一种反讽式颠覆,而这些比喻本是早些时候歌德阐述其“世界文学”的概念时所采用的。就在歌德看到不同民族普遍交换的愉快场景的地方,郭沫若发现的却是跨越民族界限并在东西方之间发生的剧烈的阶级冲突。这一立场促成了他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对国民文学的著名召唤:“我们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就是世界革命。我们的国民革命的意义,在经济方面讲来,同时也就是国际间的阶级斗争。”^[25]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为郭沫若提供了一种无产阶级世界主义的浮华语言,而这种世界主

义被认为有助于重新界定与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相对抗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功能。但是，尽管这种理论大大阐明了当时的问题，也揭示了郭沫若在发出对革命文学的呼唤时，他本人以及其他成员所面对的特殊环境，然而它也遭遇到一种困境，即表述的问题，这一问题有代表性地对抗着阶级理论的倡导者。

的确，究竟谁代表受压迫者以及无产阶级？郑伯奇早期对于“阶级文学”的批评，恰恰提出了这一难缠的问题：

主张阶级文学的人们往往强第三阶级的人替第四阶级作无谓的呻吟，这确是错了；我也承认第三阶级的自觉的人可以替第四阶级的抱不平，但是代抱不平绝不是现身说法。第四阶级的痛苦，只有第四阶级的人们自己感受过，自己可以表现。其他的阶级，虽不隔岸观火，那所表现的，总不免隔靴搔痒。^[26]

我在第三章结尾处，曾扼要触及 20 年代中至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将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予以拒斥的事实。这一时期关于“普罗文学”与“革命文学”的整个论战，集中在阶级意识与表述问题上。虽然成仿吾与郭沫若之类的批评家大声疾呼“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否定旧自我，获得阶级意识，但其他人却开诚布公地质疑了进步的知识分子试图表述下层人民体验时，所固有的自欺欺人的可能。^[27]这一群体中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郁达夫，便强烈反对其激进的同道所具有的自满情绪。1927 年，他在与郭沫若等人发生一系列争吵之后，与创造社断绝了关系；一

年后，他写道：

我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生在十九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这些主张，我都已经在了一本小著名《奇零集》的那册书里说过了，大约读过那册书的人，总已经知道得很明白，我也无须来再述。不过我对于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来组织工会，不是无产阶级者，而只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不管你有几千万家财，有几十乘汽车，有几十间高大洋楼，只教你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心，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者的这一种理论，我是绝对否认的。^[28]

对此问题，鲁迅与郁达夫的看法常常是一致的，而且他早在1924年，就在小说《祝福》里触及了这一问题，大约和郑伯奇论国民文学的文章同时。这篇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堪称描摹上层阶级的一名成员与一个社会受害者之间的重大（fateful）遭遇时，最不妥协的（uncompromising）作品之一，该作品展现了如何表述无法表述之体验这一叙事问题。正如周蕾富于洞识的分析所指出的，鲁迅的小说“引人注目地说明，写作最强有力的形式效果，即，保持距离（distancing）的表述效果，从不曾真正缓解痛苦，而只是加重了内疚。”^[29]受伤害的“他者”祥林嫂，是叙事者怜惜的

凝视所无法穿透的，叙事者对于这名不幸女人的同情，最终无法超越他本人受阶级限制的叙事所具有的指示功能（*deixis*）。并且，“保持距离的表述效果”同时也深刻地受到性别的限制，这就并非偶然了。

也许鲁迅要比同时代人更为敏感地意识到性别与阶级问题，以及作为阶级的性别（*gender as class*）的问题。而大多数现代作家与批评家，主要是男性，在讨论民族国家、阶级、世界资本主义、文化与表述等话语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一个明显的盲点。这一盲点与他们本人在这些话语中无意识的性别角色有关，因为大多数此类作家在处理压迫与剥削的问题时，发现下层阶级的女性形象要比下层阶级的男性形象更受欢迎，这不可能是纯属偶然的。虽然他们关于表述的思考有一部分极富洞见，而且甚至对今天的批评话语（如庶民研究）仍不无裨益，但是忽视性别（*gender-blind*）的研究取向其问题是，它常常遮蔽了压迫与剥削的另一面，而这正是当时男性主义—民族主义（*masculinist-nationalist*）话语的特征所在。这些批评家似乎并未忽视女性问题，或是对女作家漠不关心。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自封进步的思想家曾经错失良机，不去对所谓的女性问题发表一点看法。而鲁迅、茅盾、叶圣陶，此处仅仅罗列几个名字，都经常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有希望的女作家发表作品。我所说的他们在文学话语中无意识的性别角色与这些男作家的意向几乎毫无关系。毋宁说，这一未被识别出来的状态是一种思考与言说的方式，它通过抹除自我以及他人的性别特性（*gendered specificity*）的标志，使得一种普遍化表述的政治（*a politics of universal representation*）成为可能。

想必读者还记得郑伯奇从他本人国民文学的观念出发抹

除性别差异的论点,以及他所声称的无论男女老幼,对于故乡的土地,都有执著的感情纽带。有趣的是,他本人在该文后面对男人女人的描述中,又使用了一种性别化的语言:“离乡背井的时候,泪湿襟袖的,固然多是妇孺之流,丈夫所不屑为,但是一旦重归故乡的时候,就是不甘槁首乡井的莽男儿,也禁不得要热泪迸出。”^[30]他用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贬损之词(“妇孺之流”),以及用于男人身上的赞美之语(“莽男儿”和“丈夫”),是深刻地性别化的,正如他关于眼泪的比喻一样。尽管其论点是反性别化的,但郑伯奇性别化的语言却与其国民文学规划的中立性相抵牾。下文很快将会看到,萧红的《生死场》关于故乡、民族、女人、阶级与文学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性陈述。

性别与批评

文学批评是不是性别化的?文棣(Wendy Larson)近期在研究庐隐和冰心时指出,“现代文学为女性提出了一个新的主体立场(subject position),即,女作家的立场,它在性别上是明确的。而男作家的情境却有所不同,因为虽然他们也以表述新自我为己任,但这一新自我却是一种普遍化的、现代化的自我,并非特指男性本身。”^[31]文棣此处指出的男性性别未被指认为一种性别化的立场,其功能是在现代文学批评的普遍化话语中,遮蔽了性别政治的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我从性别化的视角,不断思考国家民族文学的意义时,最为关注的状况。本节批评的要旨,并非集中在前面讨论的郑伯奇关于“国民文

学”的特定阐述,而是落实在民国时期民族建设的过程中,体制化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性别化情境,以及相关的话语实践。

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讨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往的研究成果时,强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她在解读鸳蝴派故事以及其他文本时表现出来的对抗式研究取向,有效地澄清了文学表述和体制化批评的性别化政治。她之所以批评以往的鸳蝴派研究,并非因为那些批评家通常不能在自己的著述中注意或者谈及女性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对此语焉甚详——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女性问题并未成为一个断裂点,一个进入不同类型之解读的切入点。女性可以被提及,但只是被放在历史、社会、传统以及诸如此类‘更大的’标题下。”^[32]周蕾的观察可谓及时而且重要,因为它展示给我们,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并非仅仅是关于真实的女人与性征(sexuality)的——有些批评家虽然在理论上不熟悉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但一以贯之地表现出对所谓的女性或者女作家形象的兴趣——按照周蕾此处援引的丝科特(Joan W.Scott)的说法,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乃是一种解读和介入主流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方式。作为一种形式分析的手段,这种批评所处理的,“不单单是性别,而且还有文化解读过程中为权力所渗透的等级化和边缘化。”^[33]

性别与性征的喻说,既主导着鸳蝴派的小说,也控制着五四一代对这种小说文类的批评。林培瑞(Perry Link)在《北京鸭与花蝴蝶》(*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一书中提到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是鸳蝴派小说或者所谓的“礼拜六”派的出版商1921年刊登在上海一家报纸上的,“宁可不要小老嬷,不

可不看《礼拜六》。”^[34]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叶圣陶,公开反对这一广告的海淫之语。他说道,“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35]为什么叶圣陶对他几年前熟视无睹的事情,现在的反应却如此强烈?此处的关键是什么?这则广告将阅读体验与性体验毫不掩饰地等同起来,是否有颠覆新文学之议程的危险力量?^[36]

这里所说的议程,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1921)的改革纲领,它一心一意致力于把上海趣味低级之小说的消费者转变成民族文学严肃作品的读者。因此,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与《礼拜六》这两种杂志之间在读者群、性别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建设等方面的斗争,便是关键所在。有趣的是,作为文学卖淫活动(literary prostitution)的鸳蝴派小说的性别化构造,却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以其对手为起点,而是以其自身的性政治为开端。把妓女与鸳蝴派小说等同起来的这一娱乐消费的逻辑,标志着一种有关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意识形态构造,它虽与文学研究会的构造有所不同,但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譬如鲁迅在写作有关鸳蝴派小说的文章时,就嘲笑了这种有关女性气质与卖淫活动的喻说。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

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37]

鲁迅对鸳蝴派小说的解读,以卖淫活动之喻说为焦点,试图揭露此类文学作品的性别政治。如果说茅盾等其他批评家贬斥鸳蝴派文学主要是因为其粗俗性以及**对享乐的强调**,那么鲁迅则有所不同,他之所以提出异议,是因为这些作品将**男性气质**投放到**金钱以及男人的购买权**之中,与此同时却把**女性气质**等同于卖淫行为。这一点促使我重新思考周蕾的做法,即策略性地把**女性气质**赞同为鸳蝴派小说的积极特征。^[38]无论读者接受与否,鲁迅的解读要求我们在检验鸳蝴派小说的性别政治时,不仅要与其对手意见相左地解读,而且要在二者之间可能的共谋关系上来考察。这一共谋关系,恰恰存在于鸳蝴派文本与左翼批评家的语言之间作为**卖淫活动的女性气质**的喻说的自由传播(circulation)之中。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并非要接受鸳蝴派小说本身的女性气质,而是要拆解其基本的性别政治,以便我们有可能将五四一代的批评与鸳蝴派的小说皆读解为对于女性气质的男性构造。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一种性别化的解读法,并非将一个文本归约成女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更不用说简化成女人或者男人,这样的解读法也不是要先验地确定女性气质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无论它是以一个本质问题还是一个被构造的身份提出来的。对我来说,更富成效的研究取向,是深入探索这样一些特殊的历史构成(formation)和实践,它们使得“女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进入到与其他的话语构造达成关系的变化着的意义的场域。换言之,只有就这些关系的表述性而论,一种特定的有关“女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的构造,才可能在其语境

中成为有意义的。^[39]

鲁迅对鸳鸯派小说的解读,除开关注鸳鸯派作家与其批评家之间的共谋关系之外,还以对比的眼光,观察了倡导新文学的自由派与左翼分子对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构造。举例说来,当时的文学研究会与激进的左翼分子同样赞成的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规划里,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构造,与其说是在男人的购买权与女人的卖淫活动方面,不如说是在被理解为具有阳刚之气的不同的价值观,即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方面。取卖淫活动而代之的,是蹂躏,它通常联系着女性的性征与女性气质,成为民族文学和反帝宣传中最常被使用的比喻之一。然而,正如我在下文的分析将要指出的,这一比喻在男作家与女作家的手里,运用起来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性别方面的差异时常令人惊异地一以贯之。有争议的问题不是如何描摹日本人真正的暴行及其对中国女性犯下的滔天罪恶,而是中国的男女作家在民族主义斗争的语境中,怎样决定去诠释这些性暴力的行为。其诠释方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性别是怎样参与民族主义话语的。

选取男作家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为例。其情节线索之一讲述的是农村寡妇李七嫂的故事。她饱受可怕命运的折磨,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丈夫、情人和孩子,而她最大的苦痛,是受日军蹂躏而遭丧身之辱。作为被蹂躏的牺牲品,她加入了男作家笔下为数不少、同样受辱的牺牲品之列,而她们的故事会激发普通的中华儿女踏上革命的道路。然而,作为一个象征交换的符号,她本人女性的身体则被民族主义的议程所取代,并且被否认了其特殊的女性体验的意义,因为中华民族决定着这种体验的一切涵义:作为女性的中国正在遭受日本蹂躏

者的污辱。^[40]由于中华民族本身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所以强奸的罪恶只有在它是外国侵略者犯下的,才能获得意义。但正如《八月的乡村》里面一名游击队员漫不经心地揭示的,虽然女人也被要求着参加革命,但民族主义革命是男性化的:

“革命? 革命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全杀了;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了,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再纳粮,纳租,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懂了吗? 比方没革命以前,富人们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老婆,你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起一个老婆呢;革命以后,一个钱不花,你就可以有个老婆!”^[41](黑体为笔者所加)

民族革命的性别政治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丁玲和萧红二人,就反对民族革命造成的新式父权制所导致的女性的从属状态;^[42]白露(Tani Barlow)对于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精彩分析,便有助于阐明抗日战争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冲突。女主人公贞贞,一个被日军蹂躏的牺牲品,被抗日组织所挽救,并为抗日组织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于是贞贞的身体成为象征性的战场,在那里,敌我双方的男性军人在争取主权时相互交战。在贞贞的同乡人眼中,她沦为一个娼妓,而在革命战士的眼里,贞贞却是一个英雄,因为她为了民族国家的神圣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两种解读方式对贞贞本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她拒绝被视为惨遭蹂躏的牺牲品,最后她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去寻求教育、知识以及界定她自身存在之意义

的权利。简而言之,这篇小说拒绝用有关蹂躏的比喻来指涉中国的受辱。^[43]

与丁玲的小说类似的是,萧红的《生死场》(1935)完全颠覆了民族主义话语中受辱女人的比喻。就仿佛是有意戏仿萧军的小说(尽管事实上,这一男一女两位作家作为情人生活在一起),发生在萧红作品中的蹂躏行为(也设置在抗日战争的前夜)的肇事者不是日本军人,而是一名中国男子。这是值得深思的。萧红的小说将民族认同的问题,放置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点,并挑战了民族主义对于这种意义的控制,以及对这个身体的所有权。与那些男性农民有所不同的是,乡村妇女金枝从来不曾有效地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主体,因为她被迫在丈夫以及那个蹂躏她的人的手下忍气吞声,这一生理体验,与由于日本人的在场而施加给她的民族认同相抵触。萧红拒绝将女性身体升华或者置换,这便导致了一种性别化的立场,该立场介入了小说表面上建立起来而实际上予以颠覆的民族主义话语。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人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的权利而战。这篇小说中的女性却因为自身被男性所占有,所以并未自动地共享着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

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富的短篇小

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直到她在 1942 年过早离世。^[44]作为一名小说家,她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淑华、张爱玲、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后面这些女作家直到最近,仍在中国文学中多多少少处于边缘地位。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 30 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虽然这种不无裨益的解读保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位置,而无论这一经典位置与其他大家相比是何等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讨论萧红的目的,并非要抬高这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批评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性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应该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一做法负责。我承认我反感将经典化视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天赋人权”(entitlement)的话语。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正是在这里,我的女性主义研究取向从某些修正式的女性主义批评出发,主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当然,修正式批评的重要性仍有待进一步的认识,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身却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人们只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被历史地降到边缘地位,而另一些人却有意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45]举例说来,虽然在文学史上囊括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会使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

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法究竟是必然会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这一思想进行挑战,还是通过赋予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这一经典规范?当斯皮瓦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反经典规范来扩大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46]

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价,一直受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煞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策略的颠覆。^[47]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其结果是,今天人们如果意识不到那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性中心的批评传统,就无法真正解读萧红的创作,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然而,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为止,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48]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在后记中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49]相

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眼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50]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除去鲁迅和胡风莫立的生硬的民族主义的解读外,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阅读?我对《生死场》的分析,关注的是作为意义争夺(contestatory meanings)之重要场所的农妇的身体。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1935年版设计的封面图案(黑色的块面包含小说的标题,并叠印到深红色的背景上)展开的一场争论,似乎暗示了不同读法的可能性(见图3)。勿庸赘言,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义一直观点不一。有人说画中的黑色的块面喻示着一座旧碉堡,而背景上的深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面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图。^[51]只有一位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的绘画及其他艺术创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他认为,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嘴角及脖颈的笔直线条表现了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52]虽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头像来代

表东北人民,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一种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头像,又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图中斜穿而过的线条不仅象喻中国领土的分裂,而且也象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疾病,还是自尽。女性身体的无所不在,在民族国家话语上投射了一道全范围的阴影,并一力坚持在东北农村的生死搏斗中添加女性身体的异质性意义。当然,人们不一定接受以上的读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生死场》的封面设计引发的争论质疑了在以往的萧红研究中盛行不衰的单一的民族主义的诠释,因而至少开辟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空间。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的细节,何以直到最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作过评价。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与死的意义。^[53]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的分析再向前推进一步,说明女性的身体为观察民族国家的沉浮提供了批评的视角,而不是反之亦然。

小说中女性身体的界限,主要是通过农村妇女对于生育、疾病、性、衰老与死亡的体验来界定的。尽管这部小说暗示着

生死轮回的佛教观念,但在某些人物身上却并不拥戴佛教的信仰;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女性身体的困境,将其受伤害的意义落实在此生此世当下的社会经济语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因果报应的世界里。死,是身体可怕的分解,而不是对生活之苦难的最终规避。贫穷、无知、阶级剥削、帝国主义以及父权制皆达成共谋关系,试图使农村人民,特别是妇女,降低到动物的生存层次上。

虽然小说中的妇女无止无休地生育着,但旺盛的生育力被投以一束令人震惊的否定的目光。生命的过度,使这个村庄的贫困更加恶化;更为糟糕的是,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惩罚。当叙事者描述这个独特的女性世界时,她的语言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的同情闪现在对妇女分娩场景的描写:“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54]除了五妹的大姐之外,另有三名村妇在一个独立的章节中生下孩子。金枝的分娩因其丈夫在分娩之日的前一个晚上仍欲行房事,而变得更为艰难。在王婆的帮助下,她生下一个女婴,但这个女婴却在一个月后,被她自己的亲生父亲摔到地上,一命呜呼。李二婶错结姻缘,几乎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甚至二里半的傻媳妇,也在分娩的世界里挣扎。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列在一起,时时几近讽刺。“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里撞出来了。……在乡

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页74;56)

生活与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有杀婴,有绝症,有战争以及瘟疫。虽然男人难逃死亡的命运,但女性似乎更为经常地屈从于死神的威胁。在大多数情形下,叙事者将女性受难者一个一个地呈现给我们。在这些牺牲品当中,包括王婆摔死的自己三岁的女儿小钟,以及她长大成人后死去的女儿冯丫头;金枝的那个被亲生父亲杀害的小女孩;一同上吊而死的北村的老婆婆和她的孙女;美丽的月英因瘫痪而又无人照看,终致身死;最后,二里半的媳妇和孩子都在战争期间死去。相形之下,男人很少死亡这一叙事安排,只是因为影响到妇女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当金枝成为寡妇,并被迫自谋生路时,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何时、何地、为什么以及怎样死去的,而妇女死亡的方式,如王婆的自杀事件,却获得了远为细腻的处理。整部小说有两名试图自尽的女人,一个是日军占领前的王婆,另一个是日军占领后北村的老妇。她们有一个而且是共同的原因:即,她们失去了爱子。叙事者没有详尽描述王婆听到自己儿子被政府处决的噩耗后内心的悲痛,却转而将笔触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生理外观及其带来的身体残损上。她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她可怕的嚎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等身体细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在这里,惟一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由于农村妇女与自己的身体密切地生活在一起,所以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的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而且不分轩轻。月英曾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她瘫痪之

后,她丈夫开始失去耐心,而且全然抛弃了她。他拒绝给她水喝,而且为了进一步折磨她,又在她的床上放了一堆砖头,作为她病弱身体的支撑物。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而从前的美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她的腿像两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页 51—52;40)

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膊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日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女性之躯任人摆布的无望还体现在乡村妇女的性经历中,而这份经历总是与怀孕相关。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种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

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玉米田上的稻草人。(页 30;25)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暧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一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在这里,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一种身体的畸变(邪异),将她腹中的非法胎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类社会中面对的走投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这一性别化的知识由母亲传输给女儿,是母亲禁止着金枝走近河畔,因为河畔的男人勾引过金枝:“福发的媳妇,不就是在河沿坏的事吗?全村就连孩子们也是传说。唉!……那是怎样的人呀?以后婆家也找不出去。她有了孩子,没法做了福发的老婆,她娘为这事羞死了似的,在村子里见人,都不能抬起头来。”(页 25;21)实际上不仅仅是金枝重蹈福发媳妇的道路,而且勾引她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福发的外甥成业。同他之前的福发一样,成业对他所勾引的女人从来不曾放在心上。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遭遇,他只是推倒她,以全身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体上。他从不曾亲吻她,亦没有温柔的话;毋宁说,成业之所作所为完全受基本欲望的驱策。由金枝的母亲安排、欲掩盖女儿耻辱的二人之间的婚事,所重复的

也不过是中国父权制家庭古老的夫妻对抗 (conjugal hostility) 的故事。丈夫时常斥责妻子：“懒老婆，白天呢做什么来？”而出嫁没几个月，妻子就渐渐学会了如何诅咒丈夫，并“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页 73；55）

小说笔墨所及的农村妇女当中，王婆得到了特殊的关注，因为她要求村里的妇人尊敬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要求她自己丈夫的尊重，因为她本人拥有不同寻常的智慧、言语的权力、勇气、以及独立的心智。她年青的时候，曾离家出走，为反抗自己第一个丈夫的纵欲行为而永远离开了他。而她现在的丈夫赵三，是第三个。村里的女人常常聚集在王婆的家里，倾听并吸取着她的故事。王婆关于生与死的深奥知识，来自她本人关于爱、遗失、贫困与忧愁的亲身体验。当她讲述故事的时候，便一如在以权威的身份宣讲着妇女的“历史”，而她的听众，所有的女人，完全被她的语气和音调所震撼。自打中国妇女在男性中心的历史编纂学中被否认了主体位置以来，讲故事或是长舌妇般的唠叨，成为女性之间传达她们关于生与死之独特知识的惟一工具。《生死场》中王婆讲述的故事之一，是有关她三岁的女儿的致命的一摔。当她说话的时候，一道闪电陡然划破天空，而讲述者突然失去常音，仿佛魂不附体：

“……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辗死一样。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

“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钟呀！……我接连着煞苦了几夜没能睡，什么麦粒？从那时起，我连麦粒也不怎样看重了！就是如今，我也不把什么看重。那时我才二十几岁。”（页 11—12；11—12）

这是如此鲜明地充溢着流血的鼻子、嘴、喉咙、小手与肚子的悲惨印象，正是从她对死的深切体验里，王婆领会了人类身体的无常。也正是这种知识，赋予她一种强有力的性格，以及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所以她四处奔走，帮助村里的女人生育，照看病中的村妇，甚至骑上一匹老驴去屠宰场。然而王婆在父权制社会里作为女人的困境，也是造成她最终弃绝女性身份的直接缘由。她自杀未成之后，为替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她开始教导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女战士。当日军入侵东北时，王婆加入了男人们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的行列。不足为怪的是，从这时起直到小说的结尾，她的权威体现在村里的男人作为民族战士的日渐提高的重要意义上。

这便将我们引领到萧红本人对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这是胡风在其后记当中有意强调过的。我们只要把萧红对日军占领前的农村生活图景的描写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稍作比较，那么，萧红态度的暧昧性就马上进入我们的视野。不难看出，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萧红笔下的悲惨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例如《八月的乡村》里有一段游击队员小红脸思念家乡的描述，就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他（小红脸）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自在地咬着小烟袋去耕地？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底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55]这种太平的景象是萧红小说中所没有的。

两萧眼中的社会图景如此不同,惟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的作品里孕含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的作品重在描绘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在《生死场》中,不论是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使作者无法将现存的父权—男权社会理想化。国家的劫难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

萧红在后七章中清楚表明,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这种归属与认同赋予乡村男性农人以民族主体意识,使他们得以克服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去向他们的女人传播新的福音。比如,王婆的丈夫老赵三,就对民族主义的说教有着极高的热情,并热衷于向寡妇宣传:

那夜老赵三回来得很晚,那是因为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把儿子从梦中唤醒,他告诉他得意的宣传工作;东村那个寡妇怎样把孩子送回娘家预备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式,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页 114—115;82—83)

在老赵三心中,他的宣传工作提高了他自身的价值。由于获得了新的自我定义,穷苦的男性农人得以借助民族主义超越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个得到认可的新定义在一个新的权力话语中仍将男性置于主体地位,因此,它与一个“衙门里的官员”并无根本区别,不过是旧有父权体系的翻版。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她们必须在

以某种自我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人并为民族国家而战。男性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民族主义不仅给予男性以新的自我定义,同时还重振了他们的“男子汉”之气。在村人出发远征前立誓忠于祖国的庄严场合中,李青山的演讲明确无疑地传达出民族国家话语的性别涵义:“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页120;8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喊声先从寡妇群里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同上)寡妇在响应这一号召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性别,加入了弟兄们的行列。人们几乎可以在她们的誓言中,识别出悲剧性人物秋瑾的类似的声音。^[56]

小说中抗日情绪的高潮集中在第十三章。然而,这一章并没有去肯定民族主义,而是叙述了民族主体的诞生过程。比如,老赵三在其过去的生命岁月里和其他人一样,不过是一个乡村家庭的家长,以及不敢反抗东家的懦弱的农人。他“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页119—120;86),只有通过一种话语——民族国家话语,赵三才发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重新)构造了民族主体的复活。在向自告奋勇的战士们讲话时,他喷涌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头,我是中国

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页 121;87)

这段话有着一切民族国家话语的共同特征，如个体在一个共有空间(“中国”、“国家”)里采用主体立场发言(“我”、“我是”等等)，并由此获得新的自我定义和发现新的生命意义(“拯救国家”)。就连那个离开自己的山羊就无法生活的二里半，最后也成为这样的主体。

与其他角色不同的是，二里半是个跛脚，因此可以说他的男性特征被象征性地阉割了；不仅如此，他同动物之间那种不寻常的依附关系，也使他的身份更接近女性。王婆时常关爱自己的毛驴并同它讲话，而二里半正与她一样，也把自己的山羊视为家庭的一员。正是这种“女性”特征妨碍着二里半像别的男人一样爽快地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当村民说服他交出山羊作为献祭仪式上的牺牲时，他却设法找到了一只公鸡去代替，从刀下救出了老山羊：“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甚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别人的眼睛，尤其是老赵三的眼睛在骂他：‘你个老跛脚的东西，你，你不想活吗？’”(页 121—122;88)然而二里半最后还是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男性”——小说结束在二里半出发寻找革命军的情节上——但那是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世之后。他从一名沉溺于自身的农民向民族国家主体的转型，再一次说明，成为民族国家主体的关键对男人和女人是有所差别的。父权—男权的体系是以财产来衡量确立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而妻子儿女正是男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日本侵略者夺走他们时，二里半才起来抗日，从一个“自私”的农民转变为

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话语通过赋予他新的主体位置,从而使这个男人获得“阳刚之气”。这一转变同失去丈夫的女人金枝的下场相比,表明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成为“中国人”的过程是十分不同的。在小说中,作为寡妇的女人只可能有两个下场:或是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加入到“弟兄们”的行列,却无法分享那些男人所占有的自尊和地位,并最终像王婆的女儿一样被杀害;或是像金枝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

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后去哈尔滨城里作缝穷妇。惟恐被日本人抓住,她以泥抹面,直到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又老又丑的乞婆,方才作罢。在进城的路,她果然遇到一群日本兵,而日本兵一开始拦住她,看过她的样子便把她安全放过。逃脱日军之手的金枝,却又落入省城一个中国男人的魔爪。作为缝穷妇,她必须到主顾的家里,而在一次找活的过程中,金枝又被强奸。这一经验使她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深切的认识;因此,当王婆斥责日本兵切开中国孕妇的肚子,残杀女人和婴儿的暴行时,金枝的反应是:“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王婆的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页 140;100)金枝所获得的知识,是以身体为代价的。为使自己的身体不再受男人所扰,她决定落发为尼。使她大失所望的是,村里的尼姑庵年久失修,于是她深感将来的路上毫无希望可言。小说结尾处,无家可归的金枝与走向革命的二里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尽管种种证据表明的是相反的结论,男批评家对小说大意的关心,使得民族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研究中非但

不是例外,而且是惟一的解读规则。在40年代,当时极为重要的批评家茅盾评论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时,虽然与胡风观点不同,却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的。简言之,他批评萧红没有参与民族国家的斗争。例如茅盾在缅怀萧红在香港的最后岁月时写道: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57](黑体为笔者所加)

的确,萧红没有表现胡风曾在她的作品里发现的那种民族主义热情。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她甚至不再介入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58]但作为被茅盾贬为“情感富于理智”的女性,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斗争。那场斗争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去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而言,“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

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因此毫无理由把她“缺乏”“民族主义”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而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后者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重新发明自身,而民族革命亦不例外。

这一困境十分生动地呈现在她写于1936年的一篇短文《失眠之夜》里。萧红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这样写道:“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萧红的怀疑主义直指她的情人萧军,后者的民族主义热情在她看来,恰恰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情感。萧红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暧昧态度,使她与情人萧军之间的怀乡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萧红似乎很难与萧军那种热切悲壮的思乡之心发生共鸣,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向“家”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而我呢?……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59]

“我家是荒凉的”,这是萧红的叙事者在《呼兰河传》中一再重复的一句话。在叙事者家乡的村里有两座庙,老爷庙与娘娘庙——甚至连庙里的神仙也服从于性别的区分。老爷庙里的泥像个个“威风凛凛,气概盖世”的威猛相,而娘娘庙的泥像却慈眉善目,温驯而屈从。读者可以知晓,这些泥塑的神像几乎全是男人造的: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

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60]

诚然,作者本人年方二十便离家出走,原因在于她的父亲,那个在她心目中在在体现父权制之邪恶的形象,力图逼迫萧红屈从于一场指定的婚姻。^[61]在1936年与作者其他类似的散文同时发表并收入《桥》这一文集的《初冬》一篇,萧红的叙事者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永远不再踏入他父亲的房子一步:“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62]这一父亲的形象,在萧红漂泊无定的青岛、上海、东京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短暂而充满风暴的生涯中,一直让她梦系魂牵,直到她1942年病逝于香港。^[63]

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萧红并不身处文学史上亟待重写的边缘化作家之列。恰恰相反,历史本身必须参照被普遍接受的诠释,通过再解读萧红本人复杂的写作行为,来经受批判性审查。诚然,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女作家这个附属范畴(subcategory)本身就是以“民族”文学的名义发明出来并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一“民族”文学却不能将其自身的性别化条件命名为男性的。这一附属范畴使得男性批评家可以把女性的写作纳入更大的民族范畴,就像国家将“妇女”的范畴运用到政治动员上。而我此处刻意凸显的这种性别化的文学批评实践,一直是民族主义话语得以生产的主要场所。在这样的知识框架里,在一个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男性宰制的批评传统中,解读文学文本(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一长期的实践,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证明,而且完全无法遭受质疑

的。^[64]因此,除开将女性写作视为一种歧异之声外,我还将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作品的诠释,看作介入现代文学批评霸权式实践的一种干涉行为。民族文学、民族国家取向的文学批评、学科与机构建制必须被打开、质问并进行完全的反思,这至少也该聊备一说。

下一章我将转向文学经典本身的形成问题。通过探讨一家小出版社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如何成功地促成了中国新文学权威文选之诞生的过程,我想凸显的是在以往有关“五四”文学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文学史的某些重要的时刻与层面。

注 释

- [1] Jusdanis, p. xiv.
- [2]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 [3] 关于这一问题讨论,见 Chatterjee.
- [4] 英语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批评流派的历史描述,见 Galik 以及 MaDougall.
- [5] 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讨论中国国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述,见杜赞奇(Duara),《拯救历史于民族》(*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 [6] 参见詹明信。
- [7] 艾哈迈德, *In Theory*, pp. 99—100(译者此处借用陈燕谷先生的打印稿译文)。这一批评最早是以题为《詹明信的他者修辞和“民族寓言”》的文章形式付梓的。在该书的其他部分,艾哈迈德也批判了“第三世界”的观念(第一、二、七、八章)。他在另一篇早期的文章《“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Third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中处理了同一问题。
- [8] 伯尔曼,页 55。
- [9] 斯特里奇,页 17;转引自伯尔曼,页 55。
- [10] 歌德,页 18。
- [11] 同上,页 30。
- [12] 对于歌德在中国接受状况的研究,见 Debon 和 Hsia。Galik(页 171)断定“世界文学”这一新词最早出现在胡适 1918 年撰写的文章《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但我复核了原文,发现胡适该文使用的词语是“世界的戏剧文学”。Galik 所引用的页码同样有误,应为页 382—385。关于胡适的文章,见赵家璧,1: 376—386。
- [1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收录于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1: 47。
- [14] 郑伯奇在后来的—篇文章中(1942),回忆到早期这篇文章撰写于北伐之前,当时反抗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正空前高涨。他承认此文乃匆忙写就,无暇全面考虑问题。见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收录于饶鸿竞等编,2: 761—762。
- [15] 郑伯奇,页 76—77。
- [16] 对于郑伯奇放弃以前观点的讨论,见张英进,《在现代中国建设—种国民文学》(*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页 15。

- [17] 郑伯奇,页 80。
- [18]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收入《鲁迅全集》,4:246—247。
- [19] 杜赞奇的文章《民族的地方叙事》(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地方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关系。他所讨论的情境与文学话语中的情境相比,不仅类似,而且相关。
- [20] 郁达夫的文章《艺术与国家》(收入饶鸿竞等编,页 55—59)在郑伯奇的论文付梓七个月以前,刊登在《创造周刊》,此文即可从这一角度把握。
- [21]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收入饶鸿竞等编,页 103。我自己将之译成英文。在汉语原文中,Dante, Treitschke, Bismark 的名字用西文原文给出,放在括号内。
- [22] 同上,页 104—105。倘若有识者觉察到这里面一种危险的倾向,具体体现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国家对于艺术与文学作品前所未有的监督,那么,郭沫若的要点就不足为怪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郭沫若本人成为高级官员,掌管着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
- [23] 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语境中有关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讨论,见德利克(Dirlik),《无政府主义》,第一、二章。
- [24] 郭沫若,《艺术家的觉悟》,收入饶鸿竞等编,页 121。
- [25]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收入饶鸿竞等编,页 133。
- [26] 郑伯奇,页 79。
- [27] 参见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收入《鲁迅全集》,4:228—241(亦收入饶鸿竞等编,2:954—964)。
- [28]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收入饶鸿竞等编,2:1071。亦见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收入饶鸿竞等编,1:146—148。郁达夫同创造社脱离关系的正式声明,刊登在《申报》,1927年8月15日,见饶鸿竞等编,2:1065。
- [29] 周蕾,页 111。Theodore Hutters(“Blossoms in the Snow”)与安敏成(Limits of Realism, pp. 76—92)都曾论及这篇小说反讽式的叙事者所具有的调解作用。
- [30] 郑伯奇,页 80。
- [31] 文隽,《女性主体性与性别关系》(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页 127。亦见其《妇女文学的终结》(The End of Funtü Wensue)。
- [32] 周蕾,页 50。
- [33] 同上,页 52。
- [34] 林培瑞,页 171。

- [35] 叶圣陶,《侮辱人们的人》,收入魏绍昌,页47。
- [36] 参见张英进,《建设一种民族文学》,页8。
- [3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229。
- [38] 参见周蕾,页55。
- [39] 关于性别与表述性的讨论,见 Butler, *Gender Trouble*。
- [40] 这并非否认抗战期间日本军人对中国女性所犯下的具体罪行。此处我想做的,是说明这个时期的话语实践所证实的女性民族主义体验的复杂性。
- [41] 萧军,页129。笔者自己译成英文。
- [42] 参见丁玲的文章,《三八随想》,收入其《我自己是个女人》(*I Myself Am a Woman*)。
- [43] 白露,导言,收入丁玲, *I Myself Am a Woman*, p.38。
- [44] 英语世界对萧红生平与著作的研究,见葛浩文。
- [45] Suleiman 在《颠覆的意图》(*Subversive Intent*, pp.11—32)一书中对于法国先锋派运动的性别化边缘政治所作的分析,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 [46] 斯皮瓦克,《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页276。
- [47] 参见《萧红研究》。
- [48] 葛浩文是一个著名的例外,他不十分赞成把《生死场》归入反帝抗日作品一类。而与萧红小说民族国家式解读法更为激进地决裂的出色著作,见两位大陆女批评家孟悦和戴锦华,页174—199。
- [49] 胡风,《读后记》,页3(葛浩文英译,页280),收入《生死场》。
- [50] 鲁迅,《生死场》序言,页1,我的英译。
- [51] 刘福臣,《萧红绘画琐谈》,收录于《萧红研究》,页209—210。
- [52] 同上,页210。
- [53] 参见孟悦和戴锦华,特别是页174—199。
- [54] 萧红,《生死场》,页70,53。除非特别说明,英文译本采用的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 Ellen Yeung 的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ules of Hulan Rivers*。在这段英文引文中,我有意将“生”与“死”不作翻译,是为了保留两个词语的暧昧性。下面的引文当中,中文原文页码引用在先,英译本页码以斜体标明在后。
- [55] 萧军,页4。
- [56] 秋瑾(1875—1907)是为共和国革命而英年就义的女烈士。英语世界对其生平与著述的研究,见 Hankin,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Spence,

pp.83—93;以及 Ono,pp.59—65。秋瑾本人的著述,见《秋瑾集》。

- [57] 茅盾,萧红《呼兰河传》前言,页10;葛浩文英译,页280—290。
- [58] 葛浩文,页78。
- [59] 萧红,《失眠之夜》,收入萧红,《代表作》,页59。
- [60] 萧红,《呼兰河传》,页174;葛浩文英译,页174。这部作品1940年11月29日完成于香港,她去世后才出版。
- [61] 在其自传体作品《永远的追忆和憧憬》(见萧红,《代表作》,页3—4)中,作者将自己的父亲描摹成一个全然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与宽容的男人。他是呼兰当地一个有影响的学者以及有势力的豪绅,却鄙视并时常殴打自己的亲生女儿。萧红的母亲对女儿亦很严酷。全家之中惟一爱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但在家里却没有权力,而且实际上是家里被抛弃的人。
- [62] 萧红,《初冬》,收入萧红,《代表作》,页7。
- [63] 实际上,萧红不仅仅在自己的写作行为中,介入女性身体的象征领域中激战方酣的对抗性话语。她本人的一生,便是由一组长系列的绝望的尝试组成的,她是如此孜孜不倦地试图区分作为女人与作为中国人的意义。早在她与萧军逃离日军统治时期的东北之前,萧红已经开始规避开她暴戾专制的父亲。在她随后与萧军在上海等地漂流的岁月里,她又不幸遭受后者持续的虐待与身体的侵犯。当她无法忍受他的暴力时,她所能做的常常是离家出走。曾有一次她为了躲避萧军一段时日,出走之远竟离开中国,远渡日本。由于中日两国在1936年的恶劣关系,选择日本作为自己偶居的国度,是值得进行症候式解读的。无论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萧红的抉择说明她强烈希望保护她的身体与心智不受男性的宰制,即使这意味着她本人会从她自己的祖国被放逐出来,孑然一身流浪在敌对的国家里。
- [64] 正如我在《发明与干涉》(*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女性批评家最近开始用“女性文学”和“女性传统”之类的词语,力图从男性中心的批评文字中收回女性的创作。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从20年代到1936年去世，鲁迅最常去的地方是上海一家日文书店，即内山书店。^[1]在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位中国作家与书店的日本老板内山完造之间牢固的友谊。^[2]鲁迅经常参加内山组织的漫谈会，还在内山书店举办过三次由他本人和其他人收藏的德国、俄国木刻藏品展。^[3]他在上海生活的不平静的最后几年里，让多数寄给他的信都寄到内山那里，不管他的左翼朋友或业务联系人什么时候想见他，总能在哪里找到他。^[4]尽管鲁迅在上海的这些活动细节很有意思，但我在这一章里要谈的不是他，而是一个也经常光顾这家日文书店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去那里主要不是为了买书（因为他的日语知识不过是能读日语中的汉字而已），而是去见鲁迅并同他商量事情。^[5]这个年轻人就是位于内山书店附近的良友公司的初级编辑赵家璧。长期以来，赵家璧的名字一直同《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个权威项目联系在一起，这部巨著的最初构想和出版几乎完全可以归功于他的想像力和社交能力。

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文学

赵家璧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人物,这种人经常出现在学者的卡片索引中,并且提醒人们注意一些有关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叙述的不可靠。作为一个自称文学爱好者的人,赵家璧出生太晚(1908年),未能赶上五四运动;但作为一家小出版社的编辑,他却学会了如何以其特殊才能结交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和学者。^[6]他使人想起詹姆斯·波斯维尔(James Boswell),尽管他可能没有这位英国传记作家那么显眼。同波斯维尔一样,他爱强调自己在名人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他发表的一些传记片断,如《老舍和我》、《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十件事》、《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7]诚然,赵家璧从未打算写波斯维尔所写的那些抬高自己身份的访谈录和冗长的传记,但他确实设法实现了一个非凡的文学规划,这个规划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或好或坏的重要影响。

据赵家璧本人回忆,对五四文学进行大规模编辑、分期和编纂选集的念头,是1933年他有一次到内山书店,在一本出版社目录中看到日本文学人系时产生的:

有一次,内山先生送了我几本日本的新书目录。目录中有一套日本创作文学的文库,按时代先后编成完整的一套。当时正值国民党提倡复古运动,叫青年学生尊孔读经;进步的文化人都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运

动的革命传统,才能拯救中国。“五四”运动离开那时不过十多年,但是许多代表作品已不见流传,文学青年要找这些材料同古书一样要跑旧书摊。日本的文库计划触动了我要出版一个“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的念头。^[8]

这个想法不久就兑现为煌煌十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从日语汉字中借用了“大系”一词,把这个新词引入了现代中国。他与老朋友,当时的《现代》主编施蛰存,以及同事兼好友郑伯奇(他于上一年加盟良友公司)商讨这个书名,得到两人的热烈赞同。他后来回忆,郑伯奇说,此前中国出版界尚无人用这样的总称词来命名一套丛书,这是一个独出心裁的新词。与老板进一步协商之后,赵家璧决定用这个外来词来突出自己构想的新异之处,以取代他在编辑多卷本作品时曾数次采用过的“丛书”(如《一角丛书》、《良友丛书》)这一本土词语。^[9]

“大系”的编辑于1934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它几乎使五四时代以来的所有尚健在的著名作家和批评家都参与进来。然而,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细节,即认为30年代初五四文学已经衰落并且被迅速忘却,这似乎与官方文学史有关五四文学高涨的通常说法相悖。赵家璧的说法是否准确把握了五四文学在30年代的处境呢?我们难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高雅”文学(其读者主要是进步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小团体)在上海中下层市民中流行并不广,他们更喜欢看电影或者读鸳鸯蝴蝶派小说消磨时光。^[10]然而,在谈到民国时期文化产品的类型时,对于“雅”和“俗”这类耳熟能详的理论术语必须慎之又慎。

从 30 年代看,高雅文学和通俗小说是难以区别的——在此,可能需要更具想像力的分析类型——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理论用语中,有关“大众文艺”和“通俗文学”的论争占有很大的分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小说家们以出版畅销书打破了这种区别。巴金的感伤小说《家》既包含了五四文学遗产,又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商业上的成功。^[11]当“严肃”文学开始要求在商业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时,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地位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不再能够垄断中下层市民的阅读。林培瑞(Perry Link)注意到这种变化:

作为一个整体,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丧失它在中国市民读者中的主导地位。巴金、茅盾、曹禺这些五四作家在当时的学生和其他“新潮”读者中颇有市场。这些“新潮”人物在本世纪最初十年读的可能全是鸳鸯蝴蝶派故事。到 1935 年大多数城市读者无疑两类作品都读,虽然读的时候心情有些不同。30 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相对衰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进攻以及城市民众中随之产生的民族危亡的急迫情感。民意使得包括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在内的一些主要通俗作家毫不含糊地登上了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舞台,这种行动拉近了他们与五四作家的距离,后者一致主张文学应当服务于现代国家。^[12]

如果林培瑞的论断正确(我想他是正确的),那又该如何理解赵家璧关于五四文学在 30 年代初几乎完全消失的说法

呢？这里应当注意，赵家璧的叙述里并没有说，相对于鸳鸯蝴蝶派小说而言，五四作家缺乏通俗的吸引力，他很可能认为这根本无关宏旨而不予考虑。追随着他那时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表达了他所称的蒋介石的文化高压政策的担忧。当时（1934年2月）蒋介石正要发起新生活运动以弘扬传统儒家价值。为了回应这些变化，赵家璧把他的这个规划设想成一种反对诋毁新文化运动的方式。作为一个精明的编辑，他不过是用五四文学正“面临”消亡来促使其他人参与其项目。而他所想到的那些人，无一例外均是新文化时代的先驱，这个项目的成功与否和他们利害攸关。同时这也给了赵家璧向往已久的机会，使他能够结交许多久仰的人物。

赵家璧也可能是从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那里接受了政治抵抗的观点，然后又把它变成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这样，他对五四文学的评论就不仅仅是用来招揽人参与其项目的手法了。我的这种推测产生于赵家璧对他年轻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英的一次谈话的叙述以及阿英当时写的一些评论。阿英热烈赞同赵家璧的新构想并且慷慨相助，用自己个人藏书中的五四资料为他提供方便（阿英的个人藏书非常出色，很有名气^[13]）。实际上，这位评论家本人刚刚完成《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编纂，以张若英的笔名由光明书局于1934年9月出版。在交谈中，阿英把这本书的亲笔签名本赠给赵家璧，并让他去查阅刘半农刚出版的五四实验诗集《初期白话诗稿》。阿英特别提到这本书的序言，刘半农在序言里以一种深切的怀旧意识回顾五四的黄金时代。阿英在自己那本书里引用刘半农的话来强调保存现代白话文学成果以使之不被时光消蚀的重要性：

虽只是短短的二十五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而当他 and 当时的另一位干部(陈衡哲)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是:“那已经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14]

毋庸赘言,阿英和刘半农那代人视为“新文学”(或“五四文学”)的那批作品所包括的时间范围,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家所理解的“新文学”一词包括的时间范围要短得多。按照阿英的阐述,五四文学时代在形式上恰好处于两次革命运动——1919年的五四和1925年的五卅——的间隔里,尽管他并不否定新文化运动所起的先锋作用。^[15]茅盾不同意这种分期(后面会论及这一点)。然而,我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并不是要卷入他们的分期策略(对此我将在本章后面涉及),而是一方面要探讨阿英、刘半农和赵家璧在五四文学业已去远的看法上有趣的吻合,另一方面要探讨刘半农、阿英和赵家璧等人用诗集、论文集、大系等形式对这一时期文学所作的编选和经典化。这并非是要否定一些五四作家或许已被这个时代遗忘,而是要求在阅读时注意这些人物的主张与某些实践形式的关联。除了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的政治动机外,例如阿英是一

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各种理由倡导五四文学,对这些不同的项目以及它们赖以产生和由它们表现出来的历史状况,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线索?或许,30年代初的这种经典化尝试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的东西:左翼作家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与这些斗争相伴随的合法化话语,上海出版界的复杂情况,还有某些个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所下的赌注。

前面谈到,巴金的畅销小说《家》作为商业化的进步文学突然在30年代的商业市场出现,并从鸳鸯蝴蝶派小说那里争取了大批读者。这部小说于1931年4月以《激流》一名在上海《时报》连载,分246期,直到1932年5月载完。由于小说很受欢迎,开明书店于1933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更名为《家》。到1937年初,《家》已行销十版。1933年至1951年,该书共印刷了33版。^[16]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中,巴金的受欢迎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叶文心对邹韬奋及其新闻事业的研究表明,《生活周刊》这样的通俗刊物——该刊以每周15万份的发行量而自豪(这是1949年以前在现代中国由独家期刊所创的最高发行量)——明确参与了“对当代事务的严肃评论并介绍其读者广泛涉猎那些被视为进步或同情社会改革的社会科学出版物”。^[17]的确,在上海,文化生产的多变局面,使出版商和书商即使在不利的政治气候下也有可能销售激进政治读物,其中一些企业家知道把资金投入左翼文学是在冒生意的风险,但常识或许使他们知道,激进政治刊物会畅销,他们的钱花得值。

在一封谈及这种状况的信里,鲁迅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促使出版商和书商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巨大压力去销售左翼作家的作品的,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同情左翼事业,不如说是因为

他们常常看到靠政治赚钱的机会，“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骼，但以渔利。有些官原是书店的股东，所以设了这圈套，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版物之情形可以推见。”^[18]这“圈套”和“方法”指政府可能强行设施的书刊审查。考虑到这封信的日期（1933年11月5日）和1934年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成立，不能不惊叹鲁迅的洞察力。1933年对于上海有魄力的出版商和电影制片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11月12日，一伙自称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成员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捣毁了摄影器材并散发传单，号召立即采取行动，反对控制电影业并在银幕上宣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煽动家。^[19]11月13日，四川北路851号的良友图书公司门市部被一不明身份者用铁锤击碎。几天后，一个自称作家的人带一捆手稿来到良友公司，坚持以高价把手稿卖给该公司。^[20]人们普遍相信，橱窗事件和这起敲诈是国民党当局对良友公司的警告，如果继续印刷丁玲、鲁迅、阿英、周扬、夏衍及其他左翼作家的著作，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是1933年6月赵家璧编的良友丛书出版了丁玲未完稿的小说《母亲》。5月14日，秘密警察绑架了丁玲和她的情人冯达（自胡也频死后她就与冯同居），并把他们软禁在南京。^[21]良友公司及时抓住此事渔利，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丁玲已被国民党杀害。^[22]这件事被广泛宣传，许多认定她已遇难的悼念文章见诸报端。赵家璧手里正好有丁玲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一百份作者的署名页复印件，这份署名页是作者签署出版合同时，赵家璧巧妙地在她手里得到

的。^[23]快到6月底时,良友公司加紧在报上(包括上海两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时报》和《时事新报》)为丁玲的小说作广告。据赵家璧回忆,一百份署名页于6月28日售出,一个月之内,第一版四千册书亦已告罄,良友公司不得不在10月和12月增印两版,每版重印二千册。的确,这部小说成为当时已出版的良友丛书中的头号畅销书,为公司赚取了大量利润。^[24]看到丁玲自传体小说的成功,赵家璧立刻签约出版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该书于1934年9月问世。这本书销路甚佳,不得不于1935年6月重印。回过头去看,橱窗事件提高了良友公司的知名度,给它带来宝贵的无形资产。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良友公司是1925年7月由一位叫伍联德的广东人创办的。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前艺术编辑,伍联德最初在一家专门给其他商家承印单幅图片的小印刷所当老板,但1926年1月创办《良友画报》后不久,他就成为成熟的出版家。^[25]《良友画报》在全国城市的发行量迅速增加,在诸如体育、妇女问题以及电影等大众感兴趣的领域,它做得尤为出色。早在1928年,当赵家璧还是光华大学附中高年级学生和校学生刊物编辑时,伍联德就注意到他。赵家璧成为光华大学的学生后,伍联德就给他机会在课余时间为良友公司工作,让他担任月刊《中国学生》画报编辑。在三年编辑期限内,赵家璧赢得公司的信任,1932年大学毕业后,伍联德就让他到良友公司工作。

赵家璧进入良友公司时，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对他来说，金钱、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仅仅是这一行当的一部分，在他各种计划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他很早就怀有的抱负，即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和出版家。赵家璧后来坦露，他对装帧精美的书籍感兴趣，他被良友公司吸引是因为在他眼里，印制纸张一流、有时髦图画作插图并以昂贵材料装订的《良友画报》是这一职业的理想与美的体现。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就对制作精美的图书、出版文学经典作品梦寐以求。他学过英国文学，并听过徐志摩、胡适、潘光旦、罗隆基和其他与新月社有关系的作家和学者的课。赵家璧把自己看作是徐志摩的学生。他像他的老师一样夸示他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对西方经典作品的推崇。在一篇描述他为良友公司所编的第一套丛书的文章里，赵家璧回忆了在大学图书馆度过的无数美好时光，在那里他浏览西方文学书籍，并喜欢上诸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个人全套作品集。他的职业兴趣把他引到了上海的四马路，那里有商务印书馆、世界图书公司以及其他重要的出版社。在这些地方贪婪地浏览时，他发现自己被标有《百科全书》或《ABC丛书》等书名的丛书和文集所吸引。他认为对其职业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首先是像中美图书公司这样的位于南京路和四马路上的几家西文书店。

午休时间或下班以后，我常常在那里徘徊欣赏，乐而忘返。各种进口图书，特别是成套的文学丛书，例如《哈佛大学文学丛书》、《万人丛书》和《近代丛书》等，一律开架陈列，随你翻阅。我像跨进了一个知识的宝库，不但作

品、书名、作者开阔了我的眼界，单单那些丛书的编排、扉页、封面装帧、整体设计和大小开本等，都保持统一的规格，我被这种排列整齐美观、内容丰富多彩的成套书迷住了。我问自己，将来是否也能为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编辑这样规模的成套书，来满足我国的文学读者呢？根据我当时的实际情况，那当然是纯属梦想；但我自信先可从小的做起！^[26]

赵家璧的青春抱负与良友公司的利益大体一致。1932年，他向伍联德呈交一份预算，请伍联德批准他建议编辑的第一套丛书——“一角丛书”，这套丛书每册一角，预计将突破三千套的销售量。伍联德觉得他的想法有意思，能赚钱，同意他着手编辑。在成为良友公司正式雇员的头两年中，赵家璧得到很多机会来展示他运用技巧和毅力去完成艰巨任务的能力。1933年，他编辑良友文丛时，设法从中国现代文学一些最知名的作家那里吸引稿件，如老舍（小说《离婚》）、鲁迅（苏联短篇小说译文集《竖琴》，共十篇）、巴金（以《爱情三部曲》著称的《雾》、《雨》、《电》）、施蛰存（短篇集《善女人行品》）、茅盾（《话匣子》）、凌叔华（《小哥儿俩》）、郁达夫（《闲书》）、谢冰莹（非常畅销的《一个女兵的自传》）以及叶绍钧（《三四集》）等。^[27]

1934年底，赵家璧沉湎于初次成功的喜悦之中，因为他所编的第二套丛书那时已有十本出版，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丁玲和沈从文的销路很好的作品。所以，1934年，他提出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构想时，几乎毫不费力就得到老板的同意。对伍联德来说，同以往投资的项目相比较，这套大

型项目需要更多资金,但同赵家璧的前两套丛书那些由各个作家所写的单卷本相比较,它也意味着更大的收益。情况的确如此,因为布封面《大系》以二十元一套或两元一本的价格上市销售。相比之下,“一角丛书”的效益就要低得多,即每本只卖一角钱。虽然赵家璧的第二套丛书《良友文丛》赚得多些,布封面版每本定价9角,平装本每本定价5—7角。例如,丁玲的《母亲》平装本每本定价5角,沈从文有关丁玲的回忆录及其续集每本为6角。^[28]

赵家璧在1935年初为《大系》精心策划的广告战包括一本40页的样本册,由各卷编辑陈述该卷内容的短文《编选感想》组成,一篇蔡元培所写的总序缩印件(以他那倍受推崇的书法写成),编者的照片和该书封面的彩色复印件,以及由著名作家、批评家写的简介该书的广告等。由于这些努力,这套书大部分在出版前即已预售出去。良友公司最初印了两千套布装本,随即又重印了两千套布装本和数量相同的平装本。对一个不大的商家而言,十卷书(五百万字)印了六千套,不仅对其经济收益,而且对它在出版界的职业形象都有巨大影响。^[29]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将伍联德的商业野心和赵家璧对成功的追求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正如前面所说,对赵家璧而言,金钱和政治不过是这一行当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他实现自己很早就有的梦想,使自己成为出版业最出色的编

辑提供了一个机会。一开始，赵家璧在采用有版权保护的材
料方面、在政府书报审查问题上以及仅仅在试图得到别人的
合作方面，就碰到许多困难。^[30]1934年12月25日鲁迅致赵
家璧的信，使我们可以重新感受当时的某些背景。鲁迅在信
中谢绝了赵家璧请他选编三部小说集之一并为该集作序的请
求。鲁迅一开始就提到他为一家文学期刊写的一篇文章，对
这篇六千字的文章发表前就被政府检察官删去四分之三表示
愤慨，他关于明末的感想和偶然提到的古书也被认为是对国
民党政府的影射（它们的确是一种影射），然后他写道：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
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
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
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吟”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
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
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
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
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功夫，两者
之一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就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
就由一个不被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察官们虽
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
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察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
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
他们。^[31]

三个月后，鲁迅改变了主意。在1935年3月6日的一封

短筒中,他告知赵家璧,序言已达到一万字,准备付梓。关于其政治观点这个敏感问题,他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小心,总不免发一点不妥的议论。”与他当初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加了一句:“如果有什么麻烦,请先生随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了,此事前已面陈,兹不多赘。”^[32]是什么使得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了他的初衷呢?

在一篇纪念郑伯奇的文章里,赵家璧透露,郑伯奇曾经为他说项,并且成功地说服鲁迅改变想法。^[33]这一细节在1935年1月4日鲁迅写给郑伯奇和赵家璧两人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鲁迅在信中请他们派人送《新青年》和《新潮》至内山书店,这样他可以开始编选。^[34]郑伯奇是怎样参与此事的呢?在早期的创造社里郑伯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1932年他化名郑君平进入良友公司。^[35]赵家璧是靠了郑伯奇广泛的社会关系才能结识鲁迅、阿英、夏衍、周扬、丁玲、张天翼、茅盾、何为、楼适夷等人,他们都曾为他的《一角丛书》、《良友丛书》或发行极广的《良友画报》出过力。赵家璧为《大系》找的十位编者,几乎无一例外都与郑伯奇进行过密切的磋商。这十位编者是郑振铎、郁达夫、鲁迅、阿英、郭沫若(后来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坚持下,由朱自清取代)、胡适、周作人、洪深以及郑伯奇本人。赵家璧与郁达夫早在1932年10月就相识了,当时他请郁达夫为《良友丛书》写一本书。会面是由郑伯奇安排、在郁达夫寓所里进行的。郑伯奇这样做需要克服巨大的感情障碍,因为在把郁达夫开除出左翼作家联盟时,这两个过去的创造社成员曾发生严重龃龉。

另一方面,与郑振铎的合作由于巴金的缘故而进展顺利,巴金当时正在北京同靳以、郑振铎一起编《文学季刊》。1934

年8月,郑振铎来上海,赵家璧得以同他晤谈。郑振铎不仅在如何组织安排大系问题上给了他有益忠告,而且还帮助他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接洽。胡适早就同激进政治力量分手,被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拥护现存体制的反动分子。赵家璧不顾阿英、郑伯奇这些人的反感,找胡适来参加这个以左派为主的项目,是因为(按他后来的回忆)胡适的名字可作为烟幕以掩护《大系》免受政府检察官的频繁干预。我们无需对赵家璧的说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就可以看出,胡适的名字当然能大大提高《大系》的知名度。^[36]

不应忘记,1931年2月,国民党政府曾经处决包括柔石、胡也频在内的五位左联成员,这种严酷无情的惩戒导致对一些左翼作品的出版采取日益严格的控制,其结果是在1934年初建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政府要求出版社在付印前把所有要发表的稿件送交审查委员会审批。1934年3月14日,也就是赵家璧收到鲁迅谢绝担任分卷编者的信的9个月前,《大美晚报》报道说,国民党上海党部查禁了上海25家出版社的149种书籍,被审查的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丁玲、田汉、巴金、胡也频、蒋光慈、阿英、柔石、茅盾和冯雪峰。^[37]在这样严峻的现实条件下,赵家璧仍然邀请上述被查禁作家中的四位——鲁迅、郭沫若、茅盾和阿英——作为客座编辑,他对左派和右派的巧妙安排能力的确令人叫绝。除郭沫若在最后关头不得而被朱自清取代之外,赵家璧的项目奇迹般地通过了审查而未使编写计划受到多少损害。茅盾所选的小说集最先出版(1935年5月),除了阿英编选的研究资料卷,其他各卷也都在一两个月内如期出版。由于意想不到的干扰,阿英最后一个交稿,但赵家璧还是设法在1936年2月出齐了全套《大

系》。这部书的实际编辑和付梓出版,前后只用了不到两年。^[38]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在本章有限的篇幅里,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去重复各个编者对其选本的重要性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说法广为人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人们总是从《新青年》说起,文学革命、文学社团的形成、白话文运动、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等等。自从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大系》的其他编者奠定了经典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基础后,这种千篇一律的叙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和欧洲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着。例如,茅盾提出按有组织的原则来选取文学社团的建议,在小说卷的编选中得到采用。茅盾自己围绕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编选,^[39]郑伯奇的一卷以创造社为中心,鲁迅则将其他各种文学社团的出版物都囊括进来。不属于这些特定社团和文学圈子的文学作品则被置之不理。然而,对于一种文学形式非常适用的标准,用于另一种文学形式就似乎不奏效。例如,两卷散文就是按完全不同的原则编选的。按照其本来的构想,赵家璧是根据周作人与郁达夫当时所处的不同地域位置来理解其不同的编辑角色的。他以为他们会提出一套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的作家名单,但两位编者自己却对这种地域兴趣或文学安排方式并不恭维。相反,他们更愿意按自己的“趣味”行事,选取的是他们所喜欢的拥有“个人风格”的作家。^[40]

《中国新文学大系》由十卷组成,取舍的一般标准来自于

人们关于文学的普遍预设(何谓文学),各卷在将这个标准运用于对历史材料的权威性阐释的时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预设。人选的文学作品被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分类使这些作品在经典化尝试中再一次得到合法化。十卷中三卷是短篇小说,分别由茅盾、鲁迅和郑伯奇选编。一般不选较长的作品和长篇小说(只有少量被阿英编入索引),这不仅是因为五四时代的作家喜欢短篇的形式,也是因为长篇作品多有独立的版权,不易再版。^[41]此外,还有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编的两卷散文,朱自清编的一卷诗歌和洪深编的一卷戏剧。更重要的是,由胡适、郑振铎分别编选的第一、二卷包括了“建设理论”和“文学论争”,这使得五四文学的“理论”方面得以突出。这些“理论”卷和各卷卷首的导言,与蔡元培的总序以及阿英主编的末卷《史料与索引》一起,基本上限定了《大系》所选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应有的阅读评价方式。

如果《大系》的遗产需要用当代观点重新认识的话,应该以什么为根据来从事这项工作呢?认为“纯”文学应当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看法是无益的,因为这种看法常常有助于掩盖那些持这一主张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指出某一流派或作家的“歪曲”或疏漏,并对编者在编选中的政见、分期和意识形态偏见持普遍异议。但我们何以知道自己不是在作另一种同样偏颇的解释呢?一种自命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更为公正的反叙事,就能使《大系》的遗产得到有趣有益的评价吗?我担心这种“完善”和“校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愿望本身,就是受一种完美神话所驱使的。在这种神话中包含着一个虚假的期望: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种对整个情况作

不偏不倚叙述的文学史写作,从而能给历史本身以公正的评价。换句话说,业已确立的经典可时时受到质疑,而制造经典的做法却无需经受严格的考察。但我想知道的是,如能用比“完美”或“正确”更有趣的依据去审视经典的制造,这种依据能否奏效?例如,能否问一问,文学史的撰写是怎样在认为有必要时,为自己的合法性编造了说辞的?

编辑《大系》的有关情况表明,编者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五四文学遗产时,对他们向往的目标并没有提出不真实的期望。他们并不太关心是否用不偏不倚的观点看待中国现代作家的成就,而更关心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对抗的话语领域对合法性的特定诉求。尽管在决定内容的取舍上每个编者都按其好恶行事,但这种合法性诉求的关键在于那种强有力的共同(男性)意念,即认为《大系》是有意的凸现。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正是合法化问题使编者们的共同努力对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读者都具有了意义。以下分析,打算对这种合法化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讨论的中心是《大系》所力图在其文学事业和当时觉察到的历史紧迫要求之间建立的那种联系。

良友公司为《大系》作的广告中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把这个项目称为“现代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再现”。人们不应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自夸或营销策略而加以忽视,因为分期恰好是《大系》编者们据以要求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权威阐释的主要理论防线之一。当然,《大系》并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形式上的分期的最初尝试。早在1922年,胡适就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意在晚清和现代文学作初步的分期。30年代初,单独的现代文学史编开始出现。它们包括陈柄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

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以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4年)。^[42]这里,王哲甫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视为第一部论述现代文学的发生的严肃学术论著。关于现代文学的分期,作者划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胡适呼吁文学改良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33年其著作写作发表的时候。^[43]1934年4月,在一篇评论中,茅盾对王哲甫的主题和材料处理表示颇为不满,并呼吁搞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研究项目,把理论文章、有关各个文学社团建立和解散的情况以及这些社团的刊物、作品梗概、还有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与评论都包括进来。^[44]即使茅盾的呼吁对赵家璧《大系》的产生没有直接作用,他参与编辑却对该书的倾向与格局的形成影响很大。不管编者何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茅盾的意见却总是被采纳。

在分期问题上,阿英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言提出,以1919年5月4日和1925年5月30日作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开端和结束。但茅盾和郑振铎则作了不同的划分。^[45]茅盾在回顾他1934年写给赵家璧的一封信时说:

断代以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为界较为妥当,因为新文学运动从“五四”前两年就开始酝酿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像很热闹,其实作品并不多,“五卅”运动前后开始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讨论,并未产生相应的作品;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

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阶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46]

因此,他提出 1917 年到 1927 年的十年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阶段的建议,这一意见最终被赵家璧和编辑集体的其他成员所采纳。茅盾的分期严格按照相应的政治事件去理解文学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阿英并无根本不同,只不过他的重点从反帝斗争转向了国共斗争。

《大系》出版以来,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扩展了其内容,并使自己跟上时代以适应 1927 年以后现代文学史的新发展。但《大系》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在后来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后来的文学史沿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路线而日趋政治化。例如,1939 年李何林撰写他的现代文学史时,沿用并修改了《大系》在文学分期上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并帮助巩固了左翼在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支配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来建立一种政治上正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但无论是王瑶还是那些步其后尘的官方文学史家都未停止使用《大系》所提供的资料、分期方法以及体裁分类。这些因素以及把它们作者联合起来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文学史家对作者和文本的选择,或许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

相比之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 年)作为摆脱大陆学者所写的官方文学史模式的早期尝试而引人瞩目。太平洋两岸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当代学术成就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夏志清的著作,因为它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张爱玲、沈从文这些曾处于边缘或受到压抑的作家。通过重新把这些

作家纳入中国文学史,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看法。当然,这一方面是作者以自己的反叙事取代既定的经典而对经典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更是从理论高度对文学史写作本身提出的挑战。由于夏志清始终以反共的冷战意识形态来对待经典制造的问题,在后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他修正方法的缺陷。他与普实克之间引入瞩目的论战,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何等激烈。回顾既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年代(甚至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者们都同样难以保持其作为学者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各自的诉求是截然不同的。

在70年代的台湾,余光中及其合作者出版了一部由台湾国语作家的作品构成的反经典(counter-canon),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这个多卷本选集自称为“大系”,表明其反经典努力深受《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影响。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事件向我们表明《大系》的遗产的确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煌煌二十卷《大系》的续集(1927—1937)。^[47]1982年,编辑工作刚刚着手进行,出版社负责人丁景唐不仅向当时已七十多岁的赵家璧求教,而且几乎逐字照搬了《大系》原来的版面。除了增加报告文学和电影外,续集的文类基本上是由理论、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组成的。像原《大系》一样,续集也有一卷研究资料索引,各卷惯常的权威性序言由官方认可的评论家和作家撰写,他们包括: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甘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伦、夏衍。^[48]

这使我想起《大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些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作者的取舍问题上的批评家往往忽视这个方面。我指

的是理论卷和各卷序言对编着们在作者和作品的取舍上施加的限制性影响。的确,在《大系》的总体构想中,理论所占的沉重分量不免令人印象很深。正如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现实主义的界限》里指出的:“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赋予的那种明显夸张的力量,只能在新文学由以产生的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根据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学借鉴的特定类型来加以理解。”^[49]或许,这里的文化危机可以进一步具体阐释为对合法性的需要,因为各个编者从一开始就迅速抓住理论话语在争夺合法性方面所具有的头等的重要意义。例如,赵家璧最初对他的朋友、当时的《现代》主编施蛰存提及《大系》构想时,施蛰存就指出,对这样一个大型项目来说,只选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绝对要把理论和研究资料包括进来。如前所述,茅盾在评论王哲甫的著作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郑伯奇和阿英(当时赵家璧也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都力劝赵家璧考虑采纳施蛰存的意见。他们俩甚至为理论卷推荐了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小说月报》前主编、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台柱郑振铎。郑振铎不仅接受了这一提议,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都被主编所实行。他提的一条建议是,理论部分分成两个标题,第一卷名为《建设理论》,应当包括自文学革命伊始所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第二卷《文学论争》应着重于新旧文学阵营之间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有关文学改革的重要论争。郑振铎主动要求编第二卷,并建议让胡适编《建设理论》卷。^[50]

总的来说,《大系》赋予理论、批评和论争以重要地位,并将它们置于文集的显要位置。我们或许可以充分地说,正是由于他们齐心协力地倡导理论,五四作家才能够压倒鸳鸯蝴

蝶派这样的竞争对手。在这里,理论在一个话语领域里扮演了合法性角色,在这个话语领域长期的象征资本是一种比金钱更好的投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旺完全依赖娱乐市场,其报酬或多或少是由大众消费决定的。而五四作家则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评论和文学史写作这样一些体制化的做法,来着力于生产自己的合法性术语。理论起着合法化作用,同时它自己也具有了合法性地位,它以其命名能力、引证能力、召唤和从事修辞活动的的能力使象征财富和权力得以复制、增值和扩散。五四作家和批评家凭借这种象征权威而自命为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同时把其对手打入传统阵营,从而取得为游戏双方命名和发言的有利地位。相比之下,鸳鸯蝴蝶派作家缺乏对理论话语的兴趣则对他们十分不利。

我并不是说五四作家和批评家压制了他者的声音。自我合法化不得不同时消解他者的合法性,这常常需要用自己的措辞来虚构他者的语言,而不是对他者的声音进行实际的压抑。例如,郑振铎编的《文学论争》卷收入了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3月号上的王敬轩、刘半农的著名通信。这段文学史家熟知的插曲涉及到两个激进思想家,他们不能容忍旧派文人对其文学革命号召的普遍冷漠,想激起反应。为此,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用旧派文人的语言对进步思想家进行攻击,这一虚构的挑战受到他的朋友刘半农的反驳,其他人很快加入了他的反驳,直至论争逐步升级为以林纾为首的古文捍卫者同《新青年》的现代白话文倡导者之间的著名斗争。有趣的是,当林纾认同了王敬轩这个虚构人物的观点并用他自己的声音说话时,他就步入一个已为他设置好的话语位置,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在敌方领土进行的必败之战。从比喻的意义上

说,郑振铎所编的那一卷是这个极端事例的进一步延伸。在《文学论争》卷里,新文化人士和“保守派”之间的所有论争的安排和设置都有助于前者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合法化自己的立场。^[51]

新文化人士及其对手为争夺自我合法化而展开交锋的话语基础是什么?如果说林纾由于被归入“传统阵营”而代表了一种失败的事业,“学衡派”则立足于其西学根基发出足以同新文化人士相抗衡的声音。但正如我在下一章要说明的,这第二次论争被新文化人士牢牢控制着,而且必然为《大系》的编者所限定,似乎国粹派批评家不过是中国革命中一股保守的逆流罢了。这场斗争成败的关键完全在于谁能够掌握代表中国和西方发言的权力。蔡元培为《大系》作的总序,对于理解新文化人士在争夺知识权力时所惯用的话语策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序言的第一段说: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文化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52]

蔡元培接着详细阐述了科学和艺术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在结束语中呼唤中国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的诞生。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不借助西方的权威就不再可能在知识话语中取得有利地位,所以蔡元培用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传统以及文艺复兴来阐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反映了中国知

识分子所面临的知识权威危机。尽管这样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决不能低估不同政治团体为争夺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对方的权力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来夸大西方的重要性。蔡元培的说法并不新鲜,它只是重复了胡适以及大多数新文化人士对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一贯看法。但是,在与《大系》直接相关的语境中,它的意义在于在经典制造和文学史写作等具体层面上展示合法性问题。简而言之,欧洲文艺复兴在这里显示了一种不容置辩的权威性,从而使《大系》本身得以合法化和经典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系》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意义的终极权威。例如,《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并且按照这种分类原则来组织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类范畴被理解为完全可以同英语中的 fiction, poetry, drama 和 familia prose 相对应的文类。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学形式规范的经典化,使一些也许从梁启超那个时代就已产生的想法最终成为现实,这就是彻底颠覆中国经典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意义的合法性源泉。我在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今天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情:自从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以来,小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经典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现代诗歌已基本上放弃了传统格律等等。我更为关注的是变化着的文学观念(什么样的写作算是文学),这种观念是如何对现代文学的写作和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以及它是如何形成当代人的古典文学观念的(哪些部分具有教学价值和学术研究的价值)。

阿英在《大系》史料卷开列了十部 1924 年至 1931 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以及十多部外国文学史著作。在这十

部中国文学史中,有一些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鲁迅开拓性的《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版,1931年再版)、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6年)和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7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旨在对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进行理论阐释的重要著作,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一现代文学史纂学谱系,虽然由于战事影响,该书的出版延误多时,而未能列入阿英主编的史料卷。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中,郑振铎明确阐述了为什么必须重写古典传统:

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学史遗落了但丁和鲍卡契奥(即薄伽丘),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53]

在中国,以及在后来的海外汉学界,对白话文学和通俗形式的倡导耗去了20世纪学者的大量精力,他们按照自己时代对欧洲现代文学形式和体裁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经过了重重中介),实际上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重写。虽然我们对这些成果应当给予充分的信赖,但人们容易忘记的是,不论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什么东西,它们都不可能摆脱一种总是有欧洲文学参与的学术史和合法化过程。人们总是能够提出这样的异议:为什么一谈到体裁形式,就要用小说、诗

歌、戏剧、散文等形式来限制人们对汉语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体裁和形式的认识呢？为什么一些写作形式由于正好不符合这些形式类型而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呢？在人们常常问到的那个既简单又难以回答的“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从世纪之交以来，这个双程扩散的新词语的词源似乎一直通过英语翻译提示着一个同义反复的答案：“文学”就是 literature。但“文学”为什么正好等于 literature 呢？

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这种区别能使我们了解主体作用的意义吗？它又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所陷人的深深的困境呢？这种困境的实质在于中国人企图利用非中国的或中国之外的东西来建构中国人的同一性，从而使自己从矛盾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既支持又损害了他们那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即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世界民族文学和文化之一员的努力。这又使我回到前一章讨论过的世界文学问题上来。赵家璧的尝试再次可以作为例证。《大系》出版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编辑一套十卷本的选集，该书是《大系》的姊妹卷，名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它很少为当代学者所知。这一规划在《大系》全部出齐一年后，即 1937 年春开始实施，同年秋天，日本人攻占上海而使计划告吹。

早在 1935 年秋天，赵家璧给蔡元培带去一本刚刚出版的《大系》时，蔡元培就提出编一套姊妹丛书的想法。据赵家璧回忆，蔡元培对《大系》很满意，并说，“假如这部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继续地编第二期；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

洋的优秀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就不会获得目前的成绩。”^[54]为了着手这一新计划，赵家璧列出十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作家（其中有些是《大系》编辑集体的成员），邀请他们参加编辑新书。这部《大系》各用一卷来编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文学，剩下各卷编南欧、斯堪的那维亚、俄国、苏联及新兴民族（波罗的海国家）文学，反映了各民族文学的地位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程度。^[55]作品多为五四时期发表的译文。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时，赵家璧已经收到一些稿件，其中包括蔡元培的序言、原定在1937年9月出版的南欧文学卷校样和一部分日本文学卷校样。在此之前，《良友画报》已经为这部时运不济的书登了几幅广告。

战争使这一规划夭折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30年代中后期，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郑伯奇把世界文学描述为纯粹想入非非的东西，到赵家璧为这个雄心勃勃的“大系”所作的规划——它将把中国文学放在一种与外国文学即使不能相提并论，至少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关系上——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增长着的自信，这是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各民族文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自信（这种自信也使得蔡元培随时准备承认外来影响）。这种自信体现为经典的制造、文学批评的体制化、理论话语和文学史的写作，等等。实际上，《大系》毫不客气地把所有这些功能尽收网底，并为自己造就了一大笔可观的遗产。这部《大系》的姊妹选集的制作暗含着一句潜台词：把这两部选集放在一起，就可以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的到来使它丧

失了向世人展示的机会,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附 言

1946年,赵家璧收到一位住在东京的中国新闻界人士的信,信中转达了日本反映家仓石武四郎的想法,请求允许他把十卷本的《大系》译成日文。赵家璧当即表示同意。^[56]一年后,他收到东京讲谈社寄来的《大系》第三卷日译本——茅盾编的小说卷,还有一本八页纸的《大系》广告册。此后直到1954年,他才又一次得到这位日本译者的音讯。当时,仓石来华访问,他们二人在上海首次见面,当被问及翻译《大系》的事时,仓石解释说,他只能发表这一本,后来由于各种他不愿谈的原因而不得不中止译事。1984年,赵家璧访问东京,在那里碰到已故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并访问了出版茅盾卷日译本的原出版社,在日本同行的帮助下,他揭开了这一翻译计划突然中断的真相。原来,在1947年,美国占领军总部强行实施书报检查,于是这个计划成为美国当局反共政策的牺牲品,使其中中国编者深为遗憾。

注 释

- [1] 内山书店建于1917年,是日本人在上海开的书店中历史最久的一个。关于内山完造的研究,参见小泽正元;P. Scott;和 Fogel 的《上海的日本人及中日战争》。还可参见赵家璧《书比人长寿》第292—298页;刘献彪和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第227—241页,第242—246页。
- [2] 鲁迅是1927年12月迁居上海后在内山书店第一次结识内山完造的,他搬家后成为内山书店的近邻。鲁迅是一个藏书家和热心的读者。据鲁迅日记所记录的开销,从1928年到1935年,他平均每年仅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支出达600元到2400元。(参见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载刘献彪与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231页)鲁迅和内山完造结下很深的友谊,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内山书店。如果他因病未来,内山完造也要派人问讯或亲自造访。当日军1932年1月28日进攻上海时,内山完造帮助鲁迅一家避往英租界。在鲁迅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多次伸出援助之手。1935年内山完造出版《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为之作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209—211页。
- [3] 内山完造的书即产生于这些谈话。
- [4] 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鲁迅总是让人在寄信时把地址写作“内山书店转周豫才”。前此他也用过四马路的北新书局作为通讯地址。
- [5] 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72页。
- [6] 在一篇纪念他的老朋友靳以的文章里,赵家璧说他比靳以大一岁。如果这个说法准确,那么赵家璧一定是出生于1908年。我没有证实这一点。参见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120页。
- [7] 参见赵家璧《老舍和我》、《回忆郁达夫》、《回忆郑振铎》以及《回忆郑伯奇》。
- [8] 赵家璧《编辑忆旧》,172页。
- [9]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67页。除了杂志上的连载小说之外,丛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人文学科出版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赵家璧的丛书要与当时的大小出版社出版的最流行的丛书相竞争。例如,王云五在1930年代初执掌商务印书馆时出版了著名的人文生物论丛。
- [10] 参见 Link; and Rey Chow, 尤其是第二章。
- [11] 了玲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母亲》的出版情况充分显示了“严肃”文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并为出版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 [12] Link, pp. 14—15.
- [13]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66—167页。
- [14] 钱杏邨(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2页。参见刘复《初期白话诗稿》,见《半农杂文二集》,353页。
- [15] 钱杏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页。
- [16] 龚明德《巴金〈家〉的修改》,同上,246—263页。
- [17] 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Weekly*, 1926—1945," in *Wakeman and Yeh*, p. 191. 关于现代中国小说和杂志的读者的研究,参见 Lee and Nathan。
- [18] 《鲁迅书信集》第一卷,431页。
- [19] 该会禁止剧院上演田汉、夏衍、金焰、胡萍等人的影片;参见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五卷,321—323页。
- [20]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里详尽地叙述了针对良友公司的这一系列有联系的暴行,还可参见鲁迅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六卷,123—124页。茅盾在《1934年的文化“围剿”与“反围剿”》中也提到这些事件。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63页;《编辑生涯忆鲁迅》,11—12页。
- [21] 关于丁玲被捕和监禁的情况,见丁玲《魑魅世界》;张维夫、袁良骏《丁玲研究五十年》;《丁玲研究资料》。
- [22] 在《书比人长寿》里,赵家璧说是鲁迅强烈要求他出版丁玲的未完成的小说(第6页)。鲁迅当然非常关心丁玲的生死,他甚至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营救丁玲的活动。但是,我对赵家璧的说法略有保留,因为我的分析表明,这种商业利益与政治的一致显然是偶然的。
- [23] 丁玲于1932年开始写这部小说,原打算在《大陆新闻》上连载。但这家报纸很快就倒闭了。赵家璧让丁玲与良友公司签了合同。丁玲每写完一章就寄给赵家璧,这也可以说明丁玲被捕时手稿为什么会在赵家璧的手里。在此之前,丁玲已经在赵家璧编辑的《一角丛书》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法网》。参见赵家璧《书比人长寿》,61—62页。
- [24] 我粗略估计,6个月内卖掉8000册的收入大概是7200元,因为赵家璧编辑的丛书的布封面版每册售价9角。丁玲在湖南的亲属闻讯后纷纷来信要求分成,赵家璧在商业上的成功由此可见一斑。在1934年1月22日致赵家璧的信里,鲁迅建议他不要给提出要求的人寄钱,而只是给丁玲的母亲寄100元,其他的等

接到了丁玲的亲笔信以后再说。鲁迅还随信附上丁玲母亲的通讯地址。《鲁迅书信集》第一卷,482页。

- [25] 参见赵家璧《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227—228页。
- [26] 同上,227—237页。
- [27] 赵家璧也写了一本评论美国当代作家(包括海明威、福克纳等)的书,在同一套丛书出版。参见赵家璧《新传统》。
- [28] 这类消息总是刊登在封面的内侧或封底刊登广告的地方。
- [29] 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63—66页。
- [30] 例如,鲁迅所选向培良的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就因版权属于光华书局而无法入选。参见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69—70页。
- [31] 《鲁迅书信集》第二卷,704页。事实上,赵家璧收到鲁迅的两封注明12月25日的与《大系》有关的信。在第一封信里鲁迅同意写导言,但因健康缘故可能要拖延一段时间。在第二封信里鲁迅出于正文里所说的理由推翻了原来的决定。赵家璧对《鲁迅书信集》第836和第838两封信进行比较后相信,鲁迅把日期弄错了,第838信应当是写了26日而不是25日。我认为赵家璧的分析是正确的。参见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60页。
- [32] 《鲁迅书信集》第二卷,766—767页。文章实际完成的时间是1935年3月2日。这篇文章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批评家们公认这是关于五四小说的权威文献。
- [33] 按赵家璧的说法,这次会商是在内山书店进行的。见《编辑生涯忆鲁迅》,62页,在《回忆郑伯奇》里也有类似的叙述,231页。
- [34] 《鲁迅书信集》第二卷,718页。
- [35] 事后证明郑伯奇是被左联派到上海出版界工作的,参见赵家璧《回忆郑伯奇》,227页。赵家璧认为郑伯奇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他和30年代上海电影界和文学界的共产党艺术家(如阿英、夏衍)过从甚密。1978年他才从夏衍那里了解到郑伯奇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
- [36] 后来赵家璧对胡适公开蔑视良友公司感到气愤。在徐志摩去世后不久,赵家璧就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商量出版徐志摩遗作之事。但胡适说服陆小曼将手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使赵家璧功败垂成。见《回忆徐志摩和陆小曼》,收入《书比人长寿》,44—58页。
- [37]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记述了这方面的许多情况。《鲁迅全集》第六卷,

361—373页。更详尽的资料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二卷,190—254页,510—552页。

- [38] 据赵家璧说,阿英的延误是由于国民党特务为逮捕他而将其父扣押,他不得不在外面躲避一段时间,无法利用图书资料。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84页。
- [39] 茅盾《1935年记事》,9页。
- [40] 周作人《现代散文导论》上,郁达夫《现代散文导论》下,见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79—197页,199—222页。
- [41] 我在上文曾经指出,赵家璧最初的计划是出版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想法行不通:“选一百种书,要牵涉到十数家出版社的权说,谁愿意把版权让给你呢?而当时大部分作家,因迫于生计,许多作品都是以一次稿酬卖绝版权给出版社的;即或作者保留版权,作者同意了,原出版者也不会答应良友编入文库。”赵家璧《编辑忆旧》,172—173页。
- [42] 关于这些著作的讨论,参见张英进,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pp.351—353。
- [43] 见王哲甫,95页。
- [44] 茅盾的评论见《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茅盾全集》第20卷,241—248页。
- [45] 见钱杏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页。还可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71页。
- [46] 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9页。赵家璧的《编辑忆旧》证实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 [47] 实际上早在1936年赵家璧就计划编纂《大系》的续集,但是日本的侵略和良友公司内部的问题使他未能如愿。赵家璧《书比人长寿》,34—35页。
- [48] 丁景唐《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新的多卷本大系,名为《中国新文艺大系》,分五个时期包括整个现代史:1917—1927,1927—1937,1937—1949,1949—1966,1976—1982。
- [49] Marston Anderson, *Limits of Realism*, p. 2.
- [50] 赵家璧《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168—169页。
- [51] 郑振铎的导论毫不掩饰这个意图。见《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论》,收入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53—80页。
- [52] 蔡元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总序》,收入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

集》，3页。

[53]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页。

[54] 赵家璧《编辑忆旧》，62页。

[55] 各卷的编辑分别是傅东华(英国)、赵家璧(美国)、黎烈文(法国)、郑伯奇(日本)、郭沫若(德国)、郁达夫(斯堪的那维亚)、戴望舒(南欧,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鲁彦(波罗的海国家)、耿济之(俄国)、曹靖华(苏联)。见赵家璧《编辑忆旧》，63页，173—175页。

[56]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的苦难经历》，收入《书比人长寿》，265页。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在现代语境中,什么是文化,或者,文化做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民族建设的课题中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在这一章,我将集中讨论“文化”(culture)的问题,以求总结自己的思想,并力图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前几章探讨过的一些问题。本章的讨论以国粹运动为出发点,来考察更广泛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的问题。这些话语的形成为“文化”建设以及后来的“文学”(literature)建设打下了基础,并成为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所。我将探究,“文化”作为国家与人民之差异的主要承担者(fundamental bearer),如何逐渐成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如果国粹论争的基础是文化差异,那么,这种文化差异是否排除了对权力的思考?如果不是,那么,中国国粹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其文化话语中,是如何看待差异、权力以及作为权力的差异的?

尽管文化一词在汉语中古来有之,但是,古汉语的“文化”一词却并不具有“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含义。^[1]在古汉语中,文化指“文”的状态,即,文艺修养,与“武”,即,军事技能相对。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bunka,“文化”的日语“汉字”

对等词被汉语借来，“文化”的新的民族志含义才进入汉语之中。^[2]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考察“文化”一词的含义在20世纪中国的变化，必须注意到它与其他语言和话语特定的历史关联，并且不能总是追溯到汉语最初的词源(etymology)。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文化”作为话语的特权领域涌现出来，这并不让人吃惊。“文化”或者“culture”的现代含义是近代东西方遭遇的历史产物，这一遭遇促使本土知识分子不得不关注种族、发展、文明和民族认同的问题。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一种明确的文化(种族、宗教或者文明)的观念是否有用？或者，这一观念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人们讨论自身的时候)、敌意或者攻击(当人们讨论“他者”的时候)相联系？”^[3]赛义德的问题要求我们视文化为一种话语观念，而非一种民族志对象，西方便以这种话语观念为工具，历史地建立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知识，并使之合法化，以与自我相对立。^[4]在反思中国关于国粹的论战时，我发现文化的话语观念通常是不无裨益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当非西方知识分子参与建立关于自我以及西方他者的东方化知识时，文化话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被借用的语言的含义、目的和语境是否发生了变化？在主方语言的语境中，被用于什么样的目的？西方主义是否是东方主义的反面？^[5]

在一篇关于中国国粹运动的论文中，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指出：“‘国粹’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群体的运动，最先宣布了醉心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出现。”^[6]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指出，“文化”(culture)的发现是通向民族认同的道路，它标志着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中国整体化世界观的

裂解。^[7]的确,与相关的词语“民族”(日语为 minzoku,英语为 nation)和“国学”(日语为 kokugaku,英语为 national learning)一样,“国粹”一词(日语为 kokusui,英语为 national essence)最早是作为文化话语的一部分从日本舶来,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理论语言,用以谈论种族、文明和民族认同,并用以解决在现代世界作一个中国人的矛盾。^[8]晚清时期,当国粹观念最先进入汉语话语时,它立刻在排满革命中担负起重要作用。国粹观念强调汉民族独特的民族认同,体现在汉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经学当中,这一观念强有力地吸引了章炳麟等全身心致力于排满事业的晚清叛逆者。^[9]在章炳麟看来,国粹主要包括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以及“人物事迹”,而所有这些都保存在国学当中。^[10]保存汉族种族的任务落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身上,他们深谋远虑,并有能力重建和保护这一知识实体。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国粹观念开始剔除早期有关汉民族种族优越性的修辞,逐步包容了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含义。

在本章,我试图分析两次国粹运动的倡导者们使用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旨在理解“国粹”一词其含义的重要转变,即从种族/文化的含义向文学/文化含义的过渡。我将追踪主要以“国学保存会”(其重要出版物《国粹学报》于1905年创刊)为代表的一群作家、学者和教育家的活动,由此考察第一次国粹运动。我对第二次运动的探讨将集中在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哈佛受教育的学者群体。这些学者回国后,致力于倡导中国古典文学,视之为国粹,并在东南大学担任教职。

与倡导国粹相关的一些作家、学者和教育家群体(包括国

学保存会和创建于1909年的诗社南社)的活动,研究者们对之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1]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这些群体视为中国革命中的“保守”阵营。尽管我发现自己有时会随意使用“激进”一词,但我仍对将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三分为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存有疑问,因为这样做,只能将现代中国的历史简化为普遍的(欧洲的)有关进步(progress)之叙事的一个地方版本。^[12]事实上,国粹派(保守派?)和新文化运动者(激进派?)都主要致力于中国民族认同的问题,这一关注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界限极易相互渗透。因此,我试图彰显一些他们共有的知识背景,以及他们相互对立的状态。正是这些背景与状态,使得竞争的双方关系密切,但不是作为激进派、自由派或者保守派,而是作为中国民族建设和文化建设过程中相互竞争的声音和彼此共存的叙事而存在。

《国粹学报》

在东京对中国学生公开演讲时,章炳麟扼要概括了他提倡国粹运动的意图:“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13]类似的,《国粹学报》的编者与著者,如刘师培、黄节与邓实,虽无一例外是献身国学的古典学者,但他们所想像的学术与其说是自足的实体,不如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志业之一部分,即要拯救并合法化一种种族身份,它判然有别于满族以及其他外来民族的身份。^[14]一方面,这些学者认同于明末遗民的传统,自认乃是过去一直遭受

外来入侵威胁的、本真的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魂”（日语是 *kunidamashii*，英语是 *national soul*）思想却脱胎自日语对德语“*die deutsche Seele*”（民族主义话语）一词的翻译，这一现象深刻地削弱了他们所声称的文化本真性。^[15]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民族认同观念中，明末遗民的话语在 1911 年之前作为排满运动的宣传，具有公开的颠覆性。这在会社（*society*）成员组织的各种活动中是昭然若揭的。除了刊行明末遗民的传记材料、编撰先前被清政府禁毁的文学作品的详瞻目录外，这一群体还不遗余力地编辑并重印明末遗民本身的著述，其中有一部分显然具有煽动性。然而，以汉族文化的名义反抗清朝统治的政治行动只能解释这场运动的一个层面；而最为深刻的层面是一种危机感，那是他们关注现代世界（他们视之为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所界定）里面中国的种族以及文化认同时产生的。

黄节连载于《国粹学报》的《黄史》一文，表现了这一学术群体在建构中国认同方面最为雄心勃勃的努力。富于反讽意味的是，黄节的种族理论却是源自法国的东方学家拉古贝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观点，后者的观点亦曾被刘师培与章炳麟所采用，引荐给中国读者。^[16]这位法国人的作品主要写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刊登于他在英国编辑的刊物《巴比伦与东方记录》（*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到 1900 年，其论文的绝大部分收入其作品的日文本《中国文化史》一书，从而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17]意味深长的是，拉古贝里在表达对中国文化的钦敬的同时，却又并不掩饰他对中国人的蔑视。这一东方主义式的对已逝文明的嗜好，似乎刚好符合国粹派的纲领，因为他们的使命毕竟是要（从遥远的

过去)恢复一个真正的民族认同给中国人。然而,在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中,拉古贝里的东方主义与中国学者对此种知识的共同书写里面,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拉古贝里从来不曾质疑他本人的主体性或是他与东方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中国学者却被迫抛弃一个不受欢迎的现代自我,以换来一个他们的能力所不逮的古代理想。

这一由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与中国的学者共同创作的所谓的国粹,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黄节在《国粹学报》创刊号的导论文章里,将“国学”确认为真正的中国精华的宝库:“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18]他稍稍提到明治维新时期高扬日本国粹的两位上将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的名字,以支持他本人在《国粹学报》上推行国学思想的志业。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当日本人在德川时代首倡国学思想时,他们是为了一改当时亲华的思想氛围。实际上,“国学”(kokugaku)一开始是日本本土对古代诗歌的语文学研究,以及复兴作为“古道”(kodo)之“神道”的一种关注,它是反对儒教与“唐心”(karagokoro)的。^[19]而黄节与其他中国学者却挪用了这一思想,用来增强汉族抵抗满清统治的声势。他甚至把13世纪宋朝的倾覆归咎于中华国学的衰微,因为有人遗弃了自身的传统,竟转而倾慕蒙古人的语言和作品。尽管黄节本人的爱国主义是不容质疑的,但他所提倡的国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却不很清楚。倘若他影射蒙古人侵一事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是汉族,那么当他提倡“诸子百家”(古代非经典的哲学家)的著述以对抗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时,他所指的似乎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因此,国学的思想捕捉到的,是族群(ethnic)身份与文化精粹的不稳定建构。这两个层面之间的滑移揭示出来的,是黄节

作为一名现代人的危机感,而不是他试图确立的族群身份与文化精粹的特征。

如果所有的国学都奠基在国粹之上,那么,整体化地总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就并非难事了。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许守微从中国的精神主义与西方的物质主义层面,谈及这种差异。在他看来,国粹满足的是个人的精神需要,而西方文化提供的是物质的丰富,二者与民族国家的康乐是密不可分的。此处,识者可以捕捉到一种熟悉的回声,它呼应着张之洞早期对国学与西学的论述。然而,当许守微动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权威性,来证明自己重振国学的努力是正当的时候,精神主义—物质主义的二元分化轰然崩塌了。结果表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建构中国的国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由与理论框架。许守微论述中自相矛盾的迹象,反映了他的热望与他深刻的暧昧性之间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这种热望是在面临帝国主义之际对文化认同的肯定,而这种深刻的暧昧性则关系到在一个世界体系(不再能够在自身的基础上使主流的声音合法化)中这种认同的来源与权威性。

《国粹学报》的创办者与编者之一邓实则撰文数篇,试图命名国学的内容。通过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置于儒家之上并反对之,邓实等学者预示了提倡新文化者打破偶像运动的先兆,并且无意间揭示了两个流派共同的话语基础。虽然邓实所有的著述皆围绕着这样一个前提:的确存在着一种国粹,有待从汉代以降儒家的政治禁忌下解放出来,但究竟什么构成国学或是国粹,他对此问题的现点却无法支持这一前提。举例说来,在《国学真论》以及《国学无用辩》二文中,他

区分了“国学”与“君学”。邓实告诉我们,这种区分乃仿效西方的政治理论,后者认为民族国家与帝国秩序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系统,而民族国家注定要在事物进化的秩序中,战胜帝国秩序。邓实说道,“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为爱国,以功令利禄之学即为国学,其乌知乎?国学之自有真哉。”^[20]

尽管在邓实的论述中存在着排满宣传,但使他的观点让人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对民族认同的本质主义看法与他非中国的参考框架之间的内在冲突,不如说是国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这二者皆是现代时期的发明。国粹学派的理论似乎再一次预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到来,后者是提倡新文化者在20年后重新界定出来,作为反抗古代王朝“封建的”、贵族式的文学实践时的一项民族志业。每一个文明化的民族国家都必须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并以个别的天才为代表,譬如英国、德国、法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这一思想是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时常联系着赫尔德的名字。当国粹学派拥抱这一理论,将其视为超越时间的真理,并用它来重估自身的古典传统时,他们没有想到,从过去的时代抽取出国粹,这已经清楚无误地刻上了现代时期的印记。

1908年,章炳麟与曾求学巴黎的《新世纪》的编辑们围绕汉语书写系统的价值,发生了一场论战,这一论战例示了第一次国粹运动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讨论的政治要旨。《新世纪》指斥汉语象形/表意的语言为“未开化人”所用之语言,并呼吁以自命为国际语言的世界语(“万国新语”)来废除并取

代汉语。^[21]章炳麟在《民报》发表长篇论文予以辩驳,该文同时连载于《国粹学报》,他通过强调世界语乃源自欧洲这一事实,置疑了国际主义者的主张:“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22]出于“小学”学者深厚的学养,章炳麟描述了汉语的演化史,弃绝了《新世纪》群体所信奉的非历史的以及欧洲中心的观点。^[23]

虽然章氏论述中渊博的学识反映了他作为古典学者的非凡成就,但我同样被他早在本世纪之初便显露的洞见卓识所深深感染,他指出文化差异在有关权力与宰制的启蒙框架中,是无法恰当把握的。按照他的论点,无法将某一种语言全然翻译成另一种,这与一种语言的优越性或是另一种语言的野蛮性是全无干涉的;毋宁说,它所显示的是,它们不可化约的差异性是无法调和的。章炳麟以拜伦诗歌的中译本为例,力陈按照一种语言的标准堪称绝美的一首诗,如若参照另一种语言的标准来判断,就会完全是枯燥无味的。当这位小学家问道:以谁的名义,欧洲将自身设置成普遍价值的合法承担者?此时此刻,章炳麟所带回的,恰恰是有关种族与文化认同这一场论战的核心难题。当西方无可抵挡的宰制力席卷全球,莅临在场时,章炳麟充分意识到纯粹的语文学论述与《新世纪》的团体相比可能是无足重轻的。所以他也在文章的某个段落援引一位西方传教士的言论,以捍卫汉字的尊严。^[24]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抵抗西方的威胁、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时,中国学者仍需参照一个借来的权威,这一困境说明了国粹学派从始至终之事业的特征。该刊物固定的栏目之一

《爱国随笔》即可视为此一悖论的具体表现。作为该栏目的编者,邓实足以自豪的是,他一段又一段地报道洋人对光辉灿烂之中国古代文化的景仰之情。譬如,丹麦文学士仿刻大秦景教碑运归欧洲;日儒崇拜孔子,发起孔子祭典会;一位法国收藏家藏有大量远东古代的美术品,并在卢浮宫展出。^[25]在某一层面上,这是东方主义的反面;然而在另一层面,力图成为自身历史的主体,以及求助辉煌的过去以从事当下的斗争,这一渴望无可规避地与赛义德所批判的西方式的东方主义相抵牾,因为赛义德将表述的权力指派给西方,而在西方“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正如法国人所说:*faute de mieux*(因为没有更好的)。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Sie können sich nicht vertreten, sie müssen vertreten werden*’(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26]

《学衡》

国粹的志业,超越了国粹运动的刊物所存在的时间段,这场运动在1911年后开始衰落,并受到与《新青年》杂志相联系的所谓激进知识分子的攻击。^[27]1919年,刘师培创办了最终夭折的刊物《国故》,试图抵抗新文化运动,并拯救国粹的事业,然而该杂志终因刘师培的去世而在同一年停刊。直到1922年《学衡》的创办,国粹的问题才开始吸引形形色色的文

学阵营以及政治阵营给予严正关注。实际上,这家新刊物是1911年后惟一一家出版物,可以在重整国学的事业、推行具体规划的组织力量方面,堪与《国粹学报》相比拟。《学衡》杂志的简章宣布了他们与较早的国粹派之间在思想上的亲和性:“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28]然而,此处的国粹观念与1911年之前章炳麟、刘师培、黄节等人首次使之在公共话语中流行开来的观念,是否承载着相同的意义?如果不是,那么这种意义的转变,又能告诉我们五四时期知识的权威性,以及思想信念不同的知识分子对民族认同问题的持续关注,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者们已经论及那个时代思想氛围的有趣转变,当时,对国粹的讨论因为《学衡》派的出现而卷土重来。劳伦斯·施奈德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境况:“《学衡》创建之际,正值满族失势、君主制垮台之时,因此,诗人手边的任务与那些单一的而且惊人的戏剧性活动相比,要更多一些散漫,更少一些协调。此时此刻,东林党、复社以及侠客的形象被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最近的源自西方的模式——马修·阿诺德的诗人——批评家形象。”^[29]实际上,《学衡》的创刊号背靠背精美印刷着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威严画像,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还有过于这样一桩事实吗?相形之下,早些时候的《国粹学报》则全然致力于推行汉族艺术家的传统文学、绘画和书法。新创办的《学衡》杂志的随后几期,却继续特别刊载着欧洲历史的伟人,只是偶尔印上东方文化的先贤。莎士比亚的肖像与约翰·弥尔顿相辉映(第3期),狄更斯与威廉·萨克雷(第4期),释迦牟尼与耶稣基督(第6期),萨缪尔·约翰逊与马修·阿诺德(第12期)等相比肩。

虽然“国粹”一词继续被呼唤着,但其意义在《学衡》派之手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至为重要的是,标示着国粹运动之特征的对西方的暧昧态度,却被深深植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体系所取代。如果说《国粹学报》将孔子贬黜到次要地位,这在精神上更接近《新青年》而不是《学衡》,那么《学衡》复活古代智者的形象,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每一种伟大的文明皆有其最为特出的先贤。苏格拉底与孔子分别代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人文主义精粹,这一思想并非《学衡》派的发明创造,他们乃从哈佛的教授欧文·白璧德(1865—1933)那里习得这种观念,后者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对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影响。^[30]

形形色色的文学学会与派系在校友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这在民国初年乃是常事。譬如“创造社”即由一群留日学生创办,而“新月派”的大多数成员皆有欧美教育背景。具体到《学衡》杂志,其主要创办者皆求学北美,吴宓与梅光迪在哈佛师从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胡先骕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习科学。这些留美学生经由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这一中介,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国粹观念。白璧德的论文《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由胡先骕亲手翻译成中文,刊登在1922年3月号的《学衡》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白璧德对卢梭、易卜生、斯特林堡、托尔斯泰以及萧伯纳等在中国年青人当中的风行不以为然,他教导年青一代遵循着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国际主义,将西方古希腊背景之精髓与东方儒家背景之要义融会贯通:

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邃

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今中国留美学生,潜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渊源者,不过五六人,实可慨叹……吾所希望者,此运动若能发轫于西方,则在中国必将有一新孔教之运动。^[31]

理解这些杰出的留美学生的身份应不是难事。《学衡》杂志不遗余力,试图确立白璧德的权威地位,然而此段引文的自我宣传,却揭示了这位美国权威被挪用到中国语境时的方式。他们呼唤欧文·白璧德的名字作为另一名权威人士,是为了加强《学衡》派在与其对手提倡新文化者进行论战时的威力。因为后者翻译并介绍了约翰·杜威以及伯特兰·罗素,且自诩为西学的代言人。《学衡》的对抗姿态,只会使中国对自我与西方之地位的思考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因为倘若可以用某一名西方权威的支持来质疑另一位西方权威,那么,对于西方的同质性看法就不再成立。然而,《学衡》派对追求西方的异质性知识的潜在可能却并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介人的方式曾如此恰到好处地打开了这一层面。他们取消了东西方的分化,代之以“真”“伪”之别的新的二元对立修辞或是一种新的话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树立的偶像如卢梭、易卜生、托尔斯泰和尼采被称作“伪”并予以弃绝,而西方文化真正的精髓体现在希腊罗马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32]在他们看来,事情的关键并不是以中国文化的精华去对抗西方文化,就仿佛两种文化是不可调和的系统(早些时候的国粹派与提倡新文化者皆如是以为),而是确定谁有权威对每一种文化发言,并将两种文化的精髓整合起来,熔铸成梅光迪所称的“真正新文化”。^[33]

鲁迅敏感地意识到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以来滋生的形形色色的国粹宣言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他 1918 年撰写的《随感录三十五》，论及了国粹的提倡者：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34]

周作人在 1922 年 4 月对《学衡》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35]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保存所谓的国粹，而是在生产有关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学的新知识的过程中，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权威。与之前刘师培的《国故》杂志类似，《学衡》自认的使命乃是唱出与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与现代白话文文学相对抗的歧异之声。^[36]在《学衡》一致努力的背后，是一种紧迫的需要，它要展开的是赞成国粹或者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论，而不是形成有关经典的成熟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他们虽然尊奉孔子为民族之圣，却极少详细研究作为国粹或是国学的儒家思想，这进一步提示我们，“国粹”的能指从来无法包含国粹的意义。后者是在回应变化的历史事件的浪潮时被界定并被

重新界定的。

《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公开对抗,在中国现代史上通常被视为保守派的表现。这样解读的危险是,人们会轻而易举地落入他们的对手,即提倡新文化者的修辞陷阱当中,因为后者首当其冲给《学衡》加派上一个社会进步之绊脚石的恶名。对我而言,当时的环境相当错综复杂,因此需要更深细的探究。举例说来,吴宓早在题为《论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即进行了这样的解读:“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37]但许多学者已然指出,《学衡》派与西方保守派之间有相似之处,人们不能将他们自我辩护时的论点信以为真。^[38]

那么我们是否便可以得出结论说,《学衡》派在不知不觉中践行了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这样做就会再一次遮蔽问题,并无法解释《学衡》派达成其立场时所采用的方式。对我来说,人们似应审察《学衡》派成员的话语策略,他们运用这些策略将自身建构成人文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全面争论中的参与者。换言之,关键是要解释《学衡》派设法与西方建立一种话语联系时所采用的方式,而不是简单描述西方的保守主义与它们在现代中国对应物之间的类同与差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学衡》派尝试着用当时美国的学术话语(该话语的权威性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重新构想(reframe)有关国粹的论战。因此,这些留美归来的学生认为陈独秀与胡适乃全球性问题(新人文主义与激进主义之战)的地方性表现,而他们则担负着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欧文·白璧德不是已经用这种人文主义的、福音般的使命激励过他们,并呼吁一场“新孔教

之运动”吗？他们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暴露并修正提倡新文化者对于西方以及对于中国过去的“误读”（misrepresentation）。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被假想为对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极端流行之恶果的抵抗。

于是国粹理论便开启了一块解释空间，使《学衡》派能够将儒家思想重读重构成“人文主义”或者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华。然而与先贤康有为不同的是，他们在为现代时期重新界定儒家思想的时候，并不关心国教的匮乏；毋宁说，他们试图确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使东西方的精髓在此基础上融汇成一种理想模式，以使某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未来成为可以想像之物。到《学衡》派的时代，当国粹观念开始代表纯文学的精神所主宰的一种文化等级制度时，它已然摆脱了其早期的种族内涵。这一文化与文学的价值观世界，包含着吴宓援引的马修·阿诺德所作的定义“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39]出于同样的理由，儒家思想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而是一种超验的精神，能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产生新的意义，并提供新的象征资源。因此而有新词“新”儒家思想。^[40]此处的“新”字是关键所在，因为一方面，它说明了欧文·白璧德的门徒们挪用儒家思想并使之与现代经验相关联的方式，而在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学衡》派与提倡新文化者共享的话语基础。^[41]所有这一切都与国粹派所表达之观点大相径庭，因为对国粹派来说，汉族身份，或是儒家经典之外的古代哲学，构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人的精髓。通过吸收早些时候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思想，《学衡》派在提倡新文化者所利用的同样的话语基础上，发动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其目的是要削弱对手对西方知识的垄断。

虽然《学衡》吸取欧洲现代哲学思想的程度不亚于《新青年》，但它对历史性地理解问题的坚持与强调，与五四反传统主义的主流“文化”话语格格不入，在现代性的铁的必然性里找到断裂的缝隙。面对着现代时期令人苦恼的问题，“中国怎么了？”提倡新文化者通常在传统文化的罪恶中，或是在国民性的缺陷里，寻求着答案。相形之下，《学衡》派则实行了一条不同的思想路线。譬如柳诒徵便指出，中国的动荡乃因历史事件的无常，而不必归咎于儒家之类的文化传统。他说：“中国今日之病源，不在孔子之教，……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诸人固皆不奉孔子之教。”^[42]他总结道，孔教道德的付之阙如，而不是其持久的在场，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衰微。柳诒徵以儒家思想为救治近世中国之病的药方，这样他便只能从他本人尖锐的诊断所迹近的历史洞识中撤身出来，而倘若他再深究一步，即可意味深长地批判镶嵌在新文化之启蒙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话语。^[43]

当胡先骕谴责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罪恶，并且同柳诒徵一样，将中国公众道德的堕落归罪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侵入之时，他仍旧假定着中国文化是一个固定的、同质性的以及非历史的意义场所。“而吾数千年之古国，或将有最后灭于西方文化之恶果矣，可不惧哉！”^[44]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梁启超一战后游历欧洲重返中国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1920）论调相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亦与梁漱溟有争议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一书的想法不谋而合。对西方物质至上主义文化的幻灭，似乎已然促使这些学者在自身文化的象征资源中，寻找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使得这一图景复杂化的是西方人在当时的倾向,西方人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正经历着一段时期的危机,并将摆脱困境的渴望投射到他者(部分是东方)身上。梁启超笔下的欧游经历,加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极为流行的《西方的没落》,以及欧文·白璧德对现代性的批判,共同证明了西方战后对现代性失望与幻灭之潮的兴起。^[45]

另一方面,梅光迪与提倡新文化者的争执,由于不执拗于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亦展现了批判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可能性。这一点清晰可见于梅光迪对提倡新文化者当中流行的中国文学进化论的激烈批判。正如下文所能看出的,梅氏论点的根基乃是东西方的文学传统存在不一致性。

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 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46]

需要注意的是,梅光迪对进化论的摒弃,并非基于文化的差异,因为他不是在辩驳西方观念与中国文学的不一致性,而是基于西方传统本身缺乏足够的证据。他的批评直指当时西方知识的主流模式,就此意义而言,这一批评在他身处的语境中,构成了一种有效的干涉。他属于极少数勇于针锋相对者的行列,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五四思想话语的异质性。梅

光迪通过吁请西方的权威,试图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打击提倡新文化者。然而,他直接针对进化论、民主或是白话文学时其批评的效力,却因为他明显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吁请的权威之来源同样令人怀疑,而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由于梅光迪在批判现代性时,拒绝处理帝国主义与欧洲的支配性这一棘手的问题,所以他在认同欧洲启蒙时代的保守阵线时,最终又复活了现代性话语。此处暴露了梅氏政治表述的基本困境。一方面,他是发自内心地关注国粹、民族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生死存亡。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化精英主义又使他无法感受到国粹理论与反抗外国宰制的民族主义斗争之间的逻辑关联,而早些时候的国粹运动已经在此之上茁壮成长起来。在稍晚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强调了整个民族对真正而且热诚之学者的极为紧迫的需要,这些学者必须被发动起来,“以拯国家,以殉真理”。^[47]显然,他受民族主义之激励而产生的对学术以及对文化精华的热情,不亚于早些时候国粹派的渴望。然而与那些在国学与排满运动之间确立有意味之关联的前贤有所不同的是,梅光迪难以为自己的理论设置一个基础,并仍旧是一个未能如愿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拒绝批判帝国主义,也未能将自己的努力联系到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上。

《学衡》派所想像的文化精华以及全球化人文主义的志业,显然低估了中西之间的历史冲撞。按照吴宓的说法,由了一种伟大文明与另一种伟大文明的精华是同构的(isomorphic),所以西化的志业不必与国粹的规划相抵牾。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吴宓解释道:

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忧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

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其实二说均非是。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48]

当吴宓展开自己的人文主义纲领时,他所谈论的国粹乃以西方为模式,这一点是昭然若揭的。恰恰因为西方文明乃由古希腊传统与犹太教—基督教组成,所以中国必须保留其孔教人文主义与佛教思想。在此古典的一宗教的人文主义范式之外的任何流派,无论它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还是道教,非谬即“伪”。^[49]人文主义所包含的是“the truth that is taught by the sage”(夫圣道者,圣人之道也)或是“ideal[men]”(出类拔萃之人,谓之圣人),而这些圣人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和释迦。^[50]

《学衡》派从一开始就拥抱着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这一思想允许他们批判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的罪恶,但也阻止他们去质疑恩师成问题的实践,因为白璧德普遍化的人文主义不仅仅试图在19世纪语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现代欧洲移植古希腊的文明,而且贸然以权威的口吻谈论着儒家思想。^[51]将欧文·白璧德的声音译介给足不出户的中国读者,借此,他们加强了,而不是质疑了主宰着五四的激进分子与进步的西方思想家之关系的一种权力话语。

毋庸赘言,国粹的倡导者遭到了提倡新文化者的有力抵抗。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撰文尖锐批判了文化本质主义者的反动意义。^[52]举例说来,胡适在评论梁漱溟关于东

方与西方的雄心勃勃的理论时,便批判梁对中国文化采用了一种整体化与非历史的看法。^[53]梁氏断言,中国人是爱和平与中庸者,不践行物质至上主义,胡适不敢苟同,并引证了一夫多妻制、卖淫、纵酒与色情文学,来证明相反层面的存在。^[54]

1920年伯特兰·罗素到达北京,并公开发表演说,论及保存中国国粹的重要性,周作人对此如是回应:

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青年所欢迎。……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他的惟一的要求。^[55]

周作人对国民性的否定态度,堪称提倡新文化者普遍立场的代表,他们坚决反对国粹说,并力图讲述一个迥然不同的有关国民性的故事。此处有关罗素的段落,接近于对东西方共同书写的国粹说的批判,注意到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但当周作人赞成那个同样成问题的国民性概念,以取代国粹一词时,这一洞察却又随即迷失了方向。

回想起来,国民性与国粹的概念在发明“中国文学”(Chinese/national literature)的过程中,具有互补的作用,而“中国文学”则被视作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国粹派致力于按照当前的需要,重新发明中国的古典作品,而国民性理论则通过强调现实主义,最终导致了一场文学运动,赋予小说以改良的功能;但是,《学衡》派与提倡新文化者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学乃是其他民族文学中之一种,他们都为在一个日益被非中国的价值观所主宰的世界里对中国文学之地位而感到焦虑,而且他们不得不同样直面通过被译介的现代性来塑造自我身份的矛盾状况。他们共享的终极目标与公开的对抗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时常模糊了合法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本是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有关中国文化与文学之大多数修辞的核心所在。

两个阵营皆力图被认可为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合法性声音,二虎相争时的相互冲撞,遮蔽了一大块未经争辩(undisputed)的知识领域,而这使相互竞争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的相互交战最初成为可能。在我看来,这一悬而未决的“灰色区”,正是合法性问题之所在,亦即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之名义下的中国文学,无论它是儒家的经典还是白话文文学,终于得以合法化之场所。就此意义而言,第二次国粹运动应被视为一场规模更大的民族建设志业,这一志业力图使民族政治与文学实践联合起来。就其本身而论,该运动与它那个摒弃传统的激进对手,其实共享着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然而这又恰恰是两个阵营似乎并未相互结合之处,也是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合法性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合法性问题变得极为有趣)之处。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中国文化?谁代表它?谁又有权威说什么堪称中国性,而什么又算不上中国性?虽然这些早期的争斗现在已然后退到历史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当种种耳熟能详的概念,如文化、民族国家、传统、现代性以及东西

方等继续在“文化”生产的跨国模式中被唤起、重复、翻译、流通,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独特性只有在她与其他地点以及其他历史的深刻关联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本身,仍旧顽固地同今天的我们滞留在一起。

注 释

- [1] 我并不是说英文“culture”一词不具有多义的或是不稳定的涵义；实际上，该词当然具有这些特性（参见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s*），p. 76—82）。我的观点是，翻译能够有选择地介绍某些涵义和等义词，而这些涵义及等义词，以前在两种语言之间，甚至在两种语言之内，是并不存在的。
- [2] 参见我在第一章和附录 D 讨论中日—英的新词语时，所论及的最初源自占汉语的日本“汉字”词组。
- [3] Said, *Orientalism*, p. 325.
- [4]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证法视角对文化主义的批判表明，当文化被用作一个自足的概念时，它“神秘化了进入生产领域的社会政治关系的优先性”（《作为霸权意识形态与解放实践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页 15）。亦见其早期的文章《文化、社会与革命》（*Cultur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 [5] 对中国西方主义的讨论，见陈小眉。
- [6] Schneider, p. 58.
- [7] 参见 Furth, 《变化的局限》（*Limits of Change*）。
- [8] 日本有关国粹的思想，见龟井；以及平冈，尤其是第一章。亦见 White 等。
- [9]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经验的层面，它不能也不应该被贬低成恐外症之类的东西，因为恐外症被说成是一种普遍的状况，甚至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它已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举例说来，盛行于 19 世纪的“黄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西方在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径。倘若以为中国对帝国主义者在自己国家的在场所进行的抵制仅仅是中国恐外症的表达，或是“黄祸”的简单对应物，那么这种观点不是荒谬的，也是非历史的。Frank Dikötter 在其近著《现代中国的种族话语》（*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中指出，中国人有其自身的种族歧视的历史，这不应归咎于西方，而且“白祸”的确是当时盛行于西方的“黄祸”恐惧的明显的中国对应物（页 71）。他在援引伊罗生（Harold Issacs）1967 年发表于 *Daedalus* 的文章时，还进一步指出：“非欧洲人当中的种族歧视早在他们暴露征服白种欧洲人的思想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指斥西方应该对前殖民地（ex-colonies）的种族态度负责，这只是局部有效的。”（p. 1）与此论述相关的我的问题是，就方法论而言，它将恐外症与作

为一种历史话语的种族理论混淆起来。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歧视态度是潜在一致的,这一看法模糊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一些最具暴力性的时刻。举例说来,有些中国人时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仍旧继续撰写他们自身作为“黄祸”的危险,这一事实又当如何解释呢?

- [10] 章炳麟(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1906年7月15日,收录于《章太炎政论选集》,1:276。
- [11] 参见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Schneider; 以及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以及 Furth, “The Sage as Rebel”。亦见 Rosen; 沈松桥; 与乐黛云。
- [12] 批判曼海姆(Mannheim)的模式,提请注意保守主义概念有限的解释力的论述,见史华慈,“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n Furth, *Limits of Change*, pp.3—21。
- [13] 章炳麟,《章太炎政论选集》,1:276。
- [14] 对刘师培生平与著述的讨论,见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 [15] 这两个新词语皆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舶来,而日语原词则是西方词语的翻译。对此语境中“国魂”一词的讨论,见许之衡,页4。
- [16] Schneider, p.66.
- [17] 参见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pp.96—97。
- [18] 黄节,页2。
- [19] 参见 Harootunian; 以及 Najita 与 Schneider。
- [20] 邓实,《国学真论》,页1。
- [21] 明治维新最初几年曾提议在日语中禁止汉字,并转而嗜好与口头表达的言语相关的拉丁化语言。有关日语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见沈迺中。
- [22] 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页6。
- [23] 英语世界讨论章炳麟小学式的语文学探究的,见 Furth, “The Sage as Rebel”。
- [24] Ibid., p.9.
- [25] 邓实,《爱国随笔》。
- [26] Said, *Orientalism*, p.21.
- [27] 对此一时期动荡环境的论述,见 Schneider; 以及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 [28]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 I》,第1期(1922)。

- [29] Schneider, p. 79.
- [30] Irving Babbitt 最为知名的著述为《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文学与美国学院:捍卫人文学科论文集》(*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1908),《新拉奥孔》(*New Laoko*, 1910),以及《法国现代批评大师》(*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1912)。
- [31] 白璧德,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p. 91。胡先骕中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收入《学衡》1922年3月号。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学衡》的页码皆指“通论”部分。
- [32] 梅光迪一直批评提倡新文化者推行的是“伪欧化”。见其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论今日我国学术界之需要》,以及《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亦见胡先骕。
- [33] 此处的引语出于他“真正新文化之建设”的说法(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页8)。
- [34] 鲁迅,《随感录 35》,收入《鲁迅全集》,1:382。
- [35] 周作人(笔名钟密),《思想界的倾向》,收入《周作人代表作》,页60。该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4月23日。
- [36] 关于北京大学内部旧派与新潮之对抗的详尽讨论,见沈松桥,尤其是第1章。
- [37] 吴宓,页2—3。
- [38] 参见沈松桥,以及乐黛云。
- [39] 吴宓,页13—14。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认为,这一文化观念(强调某种可以达到的发展状态)可以回溯到启蒙运动本身。
- [40] 这一概念的深远影响,可以根据随后的“新儒家”运动来估价。见杜维明的《熊十力对本真经验的追求》(*Hsung Shi-li's Quest for Authentic Experience*)¹与张灏的《新儒家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 Firth, *Limits of Change*, pp. 242—302。
- [41] 新儒家思想虽然有种种本质主义主张,但它最初乃从西方舶来。见胡先骕1922年所评的欧文·白璧德的文章,《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页12。
- [42] 柳诒徵,页1—2。
- [43] 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被引介到中国之际,却是由新文化的提倡者进行的。
- [44] 胡先骕,页9。

- [45] 梁启超妙笔生花地描述了他在旅途中与一位美国记者的遭遇：“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的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欧游心影录》第9章，转引自陈崧，页365—366）这些章节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1920年3月6日至8月17日。欧文·白璧德也提及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书（《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页4）。
- [46]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页2。
- [47] 梅光迪，《论今日学术界之需要》，页7。
- [48] 吴宓，页6。
- [49] 同上，页14。
- [50] 同上，页23。引号中的文字在吴宓的原文中即为英文。
- [51] 1785至1985年间欧洲的语文学实践及其对古希腊文明的种族主义利用，对此问题的批判，见 Bernal, *Black Athena*；以及 Paliakov。
- [52] 参见鲁迅，《随感录35》，在第二章有所讨论；周作人，《罗素与国粹》，收入《周作人代表作》；以及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收入《独秀文存》，页545—546。
- [53] 对梁漱溟的研究，见 Alitto。
- [54]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收入《胡适文存》，2:72。
- [55] 周作人，《罗素与国粹》，收入《周作人代表作》，页9—10。该文最初用笔名钟密刊登在《晨报副刊》，1920年10月19日。

附 录

词语和词语之间假设的等值关系的构想 (positing), 是怎样描述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的可理解性 (mutual intelligibility) 或不可理解性的历史状况的? 在常常自然化且具体化 (reified) 的翻译面前, 我们如何将不同语言要素的等同过程历史化? 本书描绘的历史的一跨语际的场景便可说明, 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应该绝对关注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的类型 (我们现在视之为理所当然的), 这些类型是 19 世纪以后, 在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之间建构起来的。不管是福是祸, 外来词与新词已然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汉语以及其他亚洲语言之中, 以致于驱逐这些“外来的”因素等于是削弱主方语言本身的可理解性。后文的附录部分即尝试追溯并诠释近代以来汉语、日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往来“途径”(route); 此处提供的附录, 是为了帮助读者重温对于语言之间建构起来的 (通常是偶然的) 等值关系的基本的历史性 (radical historicity) 的感受, 而这一历史性正是本书审视的内容。

正如我在导言一章提到的, 语言学家们已然耗费心力, 梳理现代汉语的外来词, 尤其孜孜不倦于汉日与汉日欧的新词汇。综合此项工作大部分成果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5),

可能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这一问题最全面的辞书。虽然该词典对过去和现在的汉语外来词作了有益的历史覆盖,但它极其简短的词源说明(正如马思尼已经指出的,许多说明明显有误),却无法解释进入现代汉语的不同类型的外来词所身处的特殊环境。在编纂附录的过程中,我遵循并拓展了高名凯和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采用的分类系统。单独的词条共分七类,每一类分别阐明一种主要的外来词类型或者词源途径,现代时期的外来词与新词就是凭借这些途径驻足于汉语的。高刘二人最初的发现,由王立达、实藤惠秀、谭汝谦、Zdenka Novotná、Guan Choi Wah、马思尼(Federico Masini)等人的研究予以补充。我也查阅了《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词典》、《中文大词典》、《辞源》以及莫里森(Morrison)的《汉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等书。最后一部词典被马思尼之外的其他几位学者所忽略,它出版于汉语和日语之间双程外来词大量兴起之前,而且,倘若与19世纪初的教会汉语(missionary-Chinese)译法一起观察,那么便可发现,这部词典举足轻重地阐明了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翻译欧洲文本时,日语对于“汉字”(kanji)的使用。

附录A主要取自马思尼近期出版的有关19世纪以来教会汉语外来词与新词的专著,其他条目建立在高、刘的著作及其后继者的研究上。在决定哪些外来词该属于哪一个特定的范畴时,特别是在编纂附录B和D的时候,我采用了“表意符合”(ideographic coincidence)的标准,而不是高、刘、马思尼等人采用的“语义等同”(semantic equation)的标准。“表意符合”,我指的是翻译过程中对已有的汉字复合词的使用,而不管在所谓的词义层面发生了什么。而“语义等同”却只能从一个棘

手的问题开始,即,在日语使用古汉语复合词翻译欧洲语言的词语后,该古汉语复合词的词义是否已经改变——就好像不改变也是可能的。举例说来,“经济”(日语的 *keizai*; *economy*) 一词通常被归入“源出现代日语的外来词”的范畴,因为这两个字组成的复合词的词义与其古汉语对应词的词义迥然不同。潜在的假设是,外来词可分为两类,一为“现代日语外来词”,这一类别指示着变化;另一类为“返回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return graphic loans*)”(即某些古代汉语复合词,日语用它们来翻译欧洲词语,后又被汉语重新输入),它展示的却是微乎其微的改变,或者干脆没有变化。

“表意符合”的标准所暗示的,并非这样一种有关意义变化或者非变化状态的武断决定。它关注的焦点乃是表意字通过形形色色的亚洲语言旅行的方式,而不管这些表意字在特定的语言环境是怎样发音或使用的——音位外来词 (*phonemic loans*) 作为一个例外的范畴,则很少(如果有的话)包含语义的翻译。(顺便提一句,这种考虑亦可用于朝鲜语和越南语类似的情境)因此,每当我能识别一个外来词(其他学者将之归入原先的日语外来词的范畴)的古汉语来源时,我便将该词重新放在“返回的书写形式外来词”的范畴,并提供相关的词源说明以及古汉语文本的对比用法。(我并不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一部分此类词语可能逃开了我的注意力。)譬如,请比较一下附录 D 的 224 个词条,以及高刘所列举的最初只有 68 条的古代“汉字”词语范畴。

编纂附录的过程可谓辛苦有加,而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尝试修正以往学者的技术性失误。我起初在编纂附录 D 时使用高、刘提供的古汉语来源,这里面有不少失误

和不当之处。以双字复合词“权利”为例(附录 A)。为说明该词的古汉语用法,高刘二人援引《史记》一段文字,并指出该段文字出自子虚乌有的《灌夫传》的一节。(参见《汉书》的《窦田灌韩传》)《史记》所载灌夫的故事实际上收入《魏其武安侯列传》。高、刘在处理古汉语来源时另一个典型问题是,他们未能充分意识到变化的以及多义的词源发展。试举一例,“封建”一词(附录 D)在其被日语和汉语的翻译者等同于英语的“feudal”并成为现代汉语一个“返回的书写形式外来词”之前,便已经在古汉语文本中具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词源学历史。高刘二人径直提供了该词的一个定义,好像它只是在秦始皇之前使用着;然而,他们未能注意到该词自汉代以来的变化的用法。由于“封建”(“feudal”?)一词恰好是现代跨语际历史中重要的翻译之一,而这些翻译围绕马克思主义对前资本主义亚洲社会的诠释模式已经引发了许多论争,并因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社会认识自己过去的方式,所以该词的词源变化应值得更深的瞩目,而不仅仅是偶然的注意。

识别并证实古汉语来源这一难题,由于最新出版的《汉语大词典》而大大简化。我在编纂附录 A 和 D 时,从这部辞书汲取了许多有用的词源学信息,而在此过程中,我也注意到甚至是这权威本的《汉语大词典》,也未能完全免除偶然的错误。附录 D 说明“专制”一词的古代用法时,在“autocracy”词条下援引《左传》一段文字,有一句“何国之为”,出自《昭公十九年》(同样用法亦见于《左传》其他地方,如《昭公十三年》)。《汉语大词典》误引为“何国为之”。我尽量减少上文所列的错误或不当的信息,虽然读者仍有可能发现我疏忽不查造成的问题。若要充分处理这一迷人的主题,我们还须大耗时日与精力,其

程度大大超出本书论题所提出的要求。

当决定如何增减某些现代外来词词条时,为求稳妥,我宁可采取保守姿态。与高、刘相似,我回避了科技术语,这些术语通常只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如化学或者医学)之内流通。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附录部分只是一个初步的统计,绝非已经穷尽所有。对现代汉语外来词更完整更出色的翔实研究尚付阙如,而有待来者。与本书作者不同的是,未来的学者将不必受缚于高、刘提出的最初的概念模式,而会为我们提供更富想像力的方式,来划分并诠释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我须致歉的是,附录 A 和 D 汉语引文的标点符号有一些非标准用法,这是因为我准备手稿时使用的电脑词库没有适用于古代文本现代标准版的符号。这些符号包括顿号,我只好用普通的逗号或圆点来替代;还有援引的书名与章节题目之间本该使用的中圆点,只好用冒号代替。)

最后,附录部分仅仅为双语读者而准备,而且需要读者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皆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因为我有充足的理由只是援引古汉语文本的原文,而不做翻译,并保留我的原始资料所提供的现代汉语的解释,这些解释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它创造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不将这些段落译成英文,这一决定来自本书的理论冲动,也来自内在于跨文化翻译中的一种困境:在不以另一类词语言说的情况下,翻译是否可能?

附 录 A

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英 语	汉 字	汉语拼音	注释: 出处与双程流传
acoustics	声学	shengxue	
air	空气	kongqi	经由日本的双程流传? 参见古汉语用法: 宋苏轼《龙虎铅汞论》:“方调息时, 则漱而烹之, 须满口而后咽。若未满, 且留口中, 候后次, 仍以空气送至丹田, 常以意养之。”道教谓元气, 清气。 亦作 <i>feiche</i> 飞车。
aerostat	气球飞车	qiqiu feiche	
airplane	飞机	feiji	
algebra	代数	dashu	经由日语 <i>daisu</i> 的双程流传?
auction	拍卖	paimai	
bank	银馆	yinguan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ginkō</i> 银行。
battery	电池	dianchi	经由日语 <i>denchi</i> 的双程流传。
bicycle	自行车	zixingche	亦作 <i>jiatache</i> 脚踏车。
blue book	蓝皮书	lanpishu	
botany	植物学	zhiwuxue	参见可供选择的日文译法 <i>shokugaku</i> 殖学与音译词 <i>botanika</i> 菩多尼词。
botanical garden	植物场	zhiwuchang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hokubu:uen</i> 植物园。
brain	大脑	danao	参见下文的 <i>xaonao</i> 小脑 (the cerebellum)。
bread	面包	mianbao	
briefcase	手箱	shouxuang	
calculus	代微积	daiweiji	通过日语 <i>sekibun</i> 的双程流传, 后来被 <i>weijifen</i> “微积分”取代。请比较古汉语用法: 一、《谷梁传·文公六年》:“闰月者, 附月之余日也, 积分而成于月者也”, 范宁注:“积众月之余分, 以成此月”, 谓积累时差。二、《元史·选举志一》:“秦定三年夏六月, 更积分而为贡举, 并依世祖旧制”, 谓元、明、清三代国子监考核学生成绩, 选拔人才之方法。
carbon content	炭性	tanxing	
carpet	洋毯	yangtan	

cerebellum	小脑	<i>xiaonao</i>	参见 <i>danao</i> 大脑与 <i>quantixue</i> 全体学。
chemical element	原质	<i>yuanzhi</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genso</i> 元素。
chemistry	化学	<i>huaxue</i>	
cold zone	冷带	<i>lengdai</i>	1602 年由利玛窦 (Ricci) 介绍, 1623 年由艾儒略 (Aleni) 使用 (Masini, p. 186)。参见附录 B 的 <i>handai</i> 寒带。
communicati- on device	通信线机	<i>tongxinxuaji</i>	
concrete	水泥	<i>shuani</i>	参见附录 B 日语也有的外来词 <i>konkuriito</i> 混凝土。
Congress	国会	<i>guohui</i>	或 <i>zonghui</i> 总会。“国会”一词也用来翻译英语“Parliament”。经由日语 <i>kokkai</i> 的双程流传? 参见下文的 <i>yiyyuan</i> 议院。
consumption	消流	<i>xiaoliu</i>	正如马礼逊 (Morrison, 1815) 所注释的。参见附录 B 的日语替代词 <i>shohi</i> 消费。
court of law	法院	<i>fayuan</i>	参见附录 D 的 <i>fating</i> 法庭。
daily newspaper	日报	<i>ribao</i>	参见下文的 <i>baozhi</i> 报纸 (newspaper)。使用该词来翻译这个英文短语的第一家报纸大概是 1864 年创办于香港的 <i>Huazimao</i> 《华字日报》(Masini, p. 193)。经由日语 <i>nippo</i> 的双程流传。参见古汉语用法。一、《汉书·食货志下》:“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鲸罪日报,其势不止”,谓每日审判定罪。二、清黄六鸿《福惠全书·钱谷·流水日报簿》:“日报簿与日收簿,同时印发”,谓逐日呈报。
dance	跳舞	<i>tiaowu</i>	
debt	债欠	<i>zhaiqian</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aimu</i> 债务。
democracy (formerly, republican)	民主	<i>minzhu</i>	丁韪良 (W. A. P. Martin) 1864 年在其 <i>Wangguo gongfa</i> 《万国公法》(是 Henry Wheaton 的 <i>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i> 的中译本) 当中,第一个用复合词“民主”将“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翻译成词组 <i>minzhuzhiguo</i> 民主之国,以相对于“monarchie” (form of government) 或 <i>junzhu zhiguo</i> 君主之国 (参见 Masini, p. 189)。对“republican”的这种译法后来被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i>kyowa</i> 共和 (附录 D) 取代。按照实藤惠秀的说法,王芝在其 1872 年版《海客日谭》中,用“民主”一词来翻译“democracy”。而现代汉语中后来相同的译法的广泛流传,可归因于日语的 <i>minshu</i> 。请比较下文的古汉语用法:《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人降昬休命”

			于成汤”，谓民之主宰者，多指帝王或官吏。又见《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昌遂据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
department store	大货铺	<i>dahuopu</i>	参见附录 B 的日语 <i>hyakkaen</i> 百货店。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外部	<i>waibu</i>	
divorce	离婚	<i>lihun</i>	参见 17 世纪的译法 (艾儒略, 1623): <i>xiang-xiuli</i> 相体离 (Masini, p. 186)。
drain pipe (dragon mouth)	龙口	<i>longkou</i>	亦作 <i>longzui</i> 龙嘴。参见下文 “tap” 的译法 <i>longtou</i> 龙头 (dragon head)。
duty, obligation	义务	<i>yiwu</i>	经由日语 <i>gimu</i> 的双程流传。参见汉徐干《中论·贵验》：“《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言朋友之义务，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谓合乎正道的事。后来被 <i>donglixue</i> 动力学取代。
dynamic mechanics	动重学	<i>dongzhongxue</i>	
economy	富国策	<i>fuguoce</i>	亦作 <i>fuguoaxue</i> 富国学， <i>zishengxue</i> 资生学， <i>pingzhunxue</i> 平准学，等。严复在翻译西学文本时，用的是 <i>jixue</i> 计学。参见附录 F 的 <i>aikangnuomi</i> (<i>yikanglaomi</i>) 爱康诺米 (依康老米)，以及附录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i>jingji</i> 经济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keizai</i>)。
elect election	选举	<i>xuanju</i>	亦作 <i>gongju</i> 公举；经由日语 <i>senkyo</i> 的双程流传。参见《文子·上义》：“仁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指选拔举用贤能。又见《后汉书·陈蕃传》：“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执家郎所潜诉，坐免归。”
electric bell	电线铃	<i>diansianling</i>	亦作 <i>dianqiling</i> 电气铃；后来被 <i>dianling</i> 电铃取代。
electric cable	电缆	<i>dianlan</i>	
electric circuit	电路	<i>dianlu</i>	
electric lamp	电气灯	<i>dianqideng</i>	亦作 <i>qideng</i> 气灯？后来被 <i>dian deng</i> 电灯取代。

electric light	电气光	<i>dianqiguang</i>	
electric motor	电机	<i>dianji</i>	亦作 <i>dianqi</i> 电气机。
electric pile?	电堆	<i>diandu</i>	
electric wire	电线	<i>dianxian</i>	亦作 <i>dianqixian</i> 电气线。
electricity (the study of)	电学	<i>dianxue</i>	
electricity	电气	<i>dianqi</i>	亦作 <i>dian</i> 电。
elevator	自行屋	<i>zixingwu</i>	后来被 <i>dianti</i> 电梯取代。
empire	帝国	<i>diguo</i>	严复在翻译“empire”(1901-1902)时,用的是音译词 <i>yingbai'er</i> 英拜儿,并加注解释道:“近人译帝国”。(Masini, p. 168)然而不甚了了的是,“帝国”与“empire”等同起来究竟是最初见于教会汉语的译法,还是经日语而进入汉语。参见宋周邦彦《看花回》词之二:“雪飞帝国,人在云边心暗折”,指京都。
entomology	虫学	<i>chongxue</i>	
entrance	入口	<i>rukou</i>	早在 1844 年,即以“import”的涵义使用;经由日语 <i>iriguchi</i> 的双程流传。参见下文的 <i>jinkou</i> 进口。
equation	方程	<i>fangcheng</i>	参见《九章算术·方程》:白尚恕注释:“‘方’即方形,‘程’即表达相课的意思,或者是表达式……所谓‘方程’即现今的增广矩阵”,今指含未知数的等式。亦见附录 B 的 <i>fangcheng shi</i> 方程式。
equator	赤道	<i>chidao</i>	17 世纪耶稣会新词:利玛窦,1602;艾儒略,1623。
Esperanto	万国新语	<i>wanguoxinyu</i>	参见附录 F 音位外来词 <i>Aisiburandu</i> 爱斯不难读,以及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ekai-go</i> 世界语。
evening newspaper	晚报	<i>wanbao</i>	
exhibition	博物会	<i>bowuhui</i>	亦译作 <i>xuanqihui</i> 炫奇会和 <i>saqihui</i> 赛奇会。参见附录 B 的日语 <i>hakurankai</i> 博览会和 <i>tenrankai</i> 展览会。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试验场	<i>shiyanchang</i>	参见附录 B 的日语 <i>shikensho</i> 试验所。 <i>shiyān</i> “试验”一词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愿重启候,何惜不一试验之?”
export	出口	<i>chukou</i>	参见附录 B“exit”的日语译法 <i>deguchi</i> 。
extractor?	拔机	<i>baji</i>	
foreign language	洋语	<i>yangyu</i>	后作 <i>waiguo yu</i> 外国语和 <i>waiyu</i> 外语。
French	法通线	<i>fatongxian</i>	参见 <i>dianbao</i> 电报(telegraph)。

communi- cation wire				
gas lamp	煤气灯	<i>meiqideng</i>		亦称 <i>zilaihuo</i> 自来火。参见下文的粤语替代词 <i>huochai</i> 火柴(matches)。
Gatling gun	藕心炮	<i>ouxinpao</i>		参见附录 F 的 <i>gelin pao</i> 格林炮, 经由日语 <i>chushitsu</i> 的双程流传。参见《易·坤》:“六二, 直方大”, 三国魏王弼注:“居中得正, 极于地质, 任其自然而物自生”, 孔颖达疏:“质为形质。地之形质, 直方又大, 此六一居中得正是尽极地之体质也。”
geology (the study of)	地质学	<i>dizhixue</i>		亦作 <i>dixue</i> 地学。参见日语 <i>chushitsugaku</i> 。
geometry	几何	<i>jihe</i>		
globe	地球	<i>diqu</i>		17 世纪耶稣会新词: 利玛窦, 1602。
goggles	风镜	<i>fengjing</i>		
governor	正统领	<i>zhengtongling</i>		后被 <i>zhouzhang</i> 州长取代。
guarantee	保障	<i>baozhang</i>		早在 1830 年代用来翻译“to guarantee”; 经由日语 <i>hoshō</i> 的双程流传。参见一、《左传·定公十二年》:“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无成, 是无孟氏也”, 谓特以为保护遮蔽者。二、清昭槎《啸亭杂录·宋金形势》:“然建炎之初, 河北尚为宋守, 河南淮石坚城数十, 自相保障”, 谓保卫, 保护。
handicrafts	手工	<i>shougong</i>		正如马礼逊(1815)所注释的。亦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hukōgyō</i> 手工业。参见《三国志·吴书·孙休传》:“(孙)谓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 谓工匠。
hospital	医院	<i>yi yuan</i>		19 世纪初第一次用来翻译“hospital”。参见古汉语表达法 <i>taiyiyuan</i> 太医院或“Imperial Academy of Medicine”。
hothouse greenhouse	暖房	<i>nuanfang</i>		参见附录 B 日语 <i>onshō</i> 温床 (hatched or breeding ground), 以及附录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i>wenshi</i> 温室 (greenhouse; 日语 <i>onshitsu</i>)。
House of Commons	乡绅房	<i>xiangshen fang</i>		亦见附录 F 音译词 <i>ganwen haosi</i> 甘文好司。
House of Lords	爵房	<i>juelfang</i>		亦见附录 F 的 <i>luhaosi</i> 律好司。
hydrant	水龙	<i>shuolong</i>		亦作 <i>niuhou</i> 牛喉。参见附录 B 日语语义外来词 <i>shōkasen</i> 消火栓。
hydraulics import	水学 进口	<i>shuixue jinkou</i>		参见上文的 <i>rukou</i> 入口 (entrance)。

independence	自主	<i>zizhu</i>	
information, signal	消息	<i>xiaoxi</i>	
international	万国	<i>wanguo</i>	字面义为“ten thousand countries”(一万个国家), 1864年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用之来翻译英语“international”。后来被日语外来词 <i>kokusai</i> 国际(用于 <i>kokusai kōhō</i> 国际公法)所取代(附录 B)。亦见附录 F 的音位外来词 <i>yingtenaxiongna'er</i> 英特那雄那尔。
journalist	记者	<i>jizhe</i>	马礼逊早在 1810 年代即开始使用(Masini, p.184)。后亦作 <i>xinwenguan jizhe</i> 新闻馆记者。
judgment, to judge	判断	<i>panduan</i>	派生词 <i>panduanchu</i> 判断处 1866 年被用来翻译“British law court”(Masini, p.191)。
jurist	公师	<i>gongshi</i>	后来被 <i>falixuejia</i> 法理学家所取代。
kerasene	煤油	<i>meiyou</i>	参见下文的 <i>shiyu</i> 石油。
law	法律	<i>falü</i>	17 世纪被耶稣会传教士用来翻译“law”(艾儒略, 1623); 1815 年马礼逊按此义加注; 经由日语 <i>hōritsu</i> 的双程流传。参见古汉语用法: 一、《庄子·徐无鬼》:“法律之上广治。”又见《管子》:“夫法者, 所以兴功惧暴也, 律者, 所以定分止争也; 令者, 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 吏民规矩绳墨也。”指刑法, 律令。二、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上》:“近体之攻, 务先法律”, 指诗文创作所依据的格式和规律。三、元吴昌龄《张天师》第四折:“岂不知张真人法律精严, 早仗剑都驱在五雷坛内, 一个个供下状吐出真情”, 指道行戒律。
law (the study of)	法学	<i>faxue</i>	经由日语 <i>hōgaku</i> 的双程流传。参见古汉语用法: 一、《南史·范晔传》:“晔性精微, 有思致, 触类多善, 衣裳器服, 莫不增损制度, 世人皆法学之”, 指效法。二、《南齐书·孔稚珪传》:“寻古之名流, 多有法学, 故释之, 定国, 声光汉室, 元常, 文惠, 绩映魏闾”, 古指刑名, 法治之学。
lawyer	律师	<i>lishi</i>	亦作 <i>lushi</i> 律士。参见古汉语用法:《涅槃经·金刚身品》:“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 是名律师”, 指佛教称善解戒律者。参见附录 B 的日语 <i>bengoshi</i> 辩护士。
letter of credence	信凭	<i>xinping</i>	早在 1864 年被用来翻译这一英文词组。
life-belt	保险圈	<i>banxianquan</i>	亦作 <i>jiumingquan</i> 救命圈。

literary subjects	文科	wenke	按照 Masini 的说法 (p. 204), 这一用法出现于 17 世纪耶稣会文本 (艾儒略) 中, 19 世纪经由日语 <i>bunka</i> 的双程流传, 与 <i>like</i> 理科或 <i>shike</i> 实科一起, 重新使用。参见古汉语用法: 唐刘禹锡《苏州谢上表》: “谬以薄伎, 三登文科”, 指科举制时以经学考选文士之科。又见《旧五代史·选举志》: “近代设文科, 选胄子, 所以纲维名教, 崇树邦本也。”
literature	文学	wenxue	<i>wenxue</i> 文学与“literature”(?)的等同过程可回溯到 17 世纪耶稣会的译法 (艾儒略, 1623)。这一复合词后来被 19 世纪的新教传教士使用以翻译现代英文词“literature”, 并经由日语 <i>bungaku</i> 的双程流传而播扬甚广 (参见 Masini, p. 204)。请比较: 一、《论语·先进》: “文学: 子游, 子夏”, 邢昺疏: “若文章博学, 则有子游, 子夏二人也”, 谓孔门四科之一。二、《韩非子·六反》: “学道立方, 离法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指儒家学说。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自献帝播迁, 文学蓬转”, 谓儒生, 亦泛指有学问的人。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 “南岸道东, 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 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 谓学校, 习儒之所。五、官名。汉代于州郡及王国置文学, 或称文学掾, 或称文学史, 为后世教官所由来。
locomotive	汽车	qiche	亦作 <i>xuhuoji</i> 蓄火机。 <i>Qiche</i> 汽车后被用来翻译“motor vehicle”。
lower House	下房	xiafang	亦作 <i>xiatang</i> 下堂; 后被 <i>xiayiyuan</i> 下议院取代。参见 <i>yiyuan</i> 议院 (parliament)。
lunatic asylum	养疯院	yangfeng yuan	亦作 <i>fengrenyuan</i> 疯人院。
magazine	杂志	zazhi	可能首次在《中外杂志》上使用, 1862 年由麦嘉温 (John Macgowan) 在上海出版, 比 1867 年日本的 <i>Seiyō zasshi</i> 《西洋杂志》提前几年 (Masini, p. 216)。经由日语的双程流传。
manage, management	管理	guanli	正如马礼逊 (1815) 所注释的, 经由日语 <i>kanri</i> 的双程流传。在 <i>Shengwuyi</i> 《圣武记》(1842) 中, Wei Yuan 魏源写道“近日西洋英吉利, 自称管理五印度” (England from the West has recently laid claims to the management of India)。 Cf. 明刘兑《娇红记》: “去年听除回来, 为见侄儿申纯在家管理事务, 十分停当。”

master (degree)	硕士	shuoshi	经由日本的双程流传? 参见《五代史·张居翰传》:“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谓品节卓著,学问渊博之士。
matches	火柴	huochai	这一粤语新词成功取代了官话中的 <i>zilaihuo</i> 自来火。
mechanics	力学	lixue	亦作 <i>zhongxue</i> 重学。按照 Masini 的说法 (p. 187), <i>lixue</i> 力学一词可能经由丁韪良的 <i>Gewu rumen</i> 《格物入门》(Introduction to science, 1868) 抵达日本,而且通过双程流传,它最终取代了可供选择的译法“重学”。
mediator	中保者	zhongbaozhe	《万国公法》(1864) 中用来翻译英语 “mediating power”。参见《说岳全传》第一回:“〔师父〕逼他写卖华山文契,却是小青龙柴世荣,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谓居中作保之人。
medicine	医学	yixue	17 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用来翻译 “the study of medicine”; 经由日语 <i>igaku</i> 的双程流传。参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贞观三年)九月癸丑,诸州置医学”,谓古代培养医药人才的机构。亦作 <i>yike</i> (医科)。
meeting, assembly	会议	huiyi	早在 1830 年代就被用作名词,经由日语 <i>kaigi</i> 的双程流传? 参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宋苏轼《东坡志林·勃逊之》:“与勃逊之会议于颖,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又见清孔尚任《桃花扇·辞院》:“这等又会议不成,如何是好”,谓聚会论议。
megaphone?	传声筒	chuansheng tong	亦作 <i>chuansheng zhi qi</i> 传声之器, <i>chuanshengqi</i> 传声器。参见 <i>anxiaoxi</i> 暗消息 (secret informer?); <i>xiaoxi</i> 消息 (information, signal)。
member, deputy	委员	weiyuan	经由日语 <i>in</i> 的双程流传。
meridian of longitude	经线	jingxian	17 世纪新词 (利玛窦, 1620 以及艾儒略, 1623)。亦见下文的 <i>weixian</i> 纬线。
microscope	显微镜	xianweijing	亦作 <i>dianqi guangshi xianweijing</i> 电气光视显微镜。
middle school	中学	zhongxue	亦作 <i>zhongxueguan</i> 中学馆。按照 Masini 的说法 (p. 219), “中学”一词短暂出现于 17 世纪 (艾儒略, 1623), 后被 19 世纪的教会汉语译法重新引入。经由日语 <i>chūgaku</i> 的双程流传。
montgolfier	天船	tianchuan	

museum	博物院	bowuyuan	亦作 <i>bolanyuan</i> 博览院; <i>bowuchang</i> 博物场。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hakuwutsu kan</i> 博物馆。
natural science	博物	bowu	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被用来翻译“natural science”。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自然科学, 以及附录 D。回归的书写形式 外来词与亦请比较《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谓通晓众物。汉桓宽《盐铁论·杂论》:“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上也。”又见宋欧阳修《笔说·博物说》:“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博物尤难。”
news	新闻	xinwen	1828 年付梓于马六甲的最早的教会汉语杂志之 <i>Tianxia xinwen</i> 《天下新闻》,使用该词翻译“news”。请比较:一、唐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诗:“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谓近日听来的事。二、宋苏轼《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新闻妙无多,旧学闲可束”,指新知识。三、宋赵升《朝野类要·文书》:“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诸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指有别于正式朝报的小报。
newspaper	报纸	banzhi	亦作 <i>xinwenzhi</i> 新闻纸。参见《自作孽》:“乡甲人家看报纸,大奇!大奇”,谓邸报,朝报。
North Pole	北极	beiji	17 世纪耶稣会新词:利玛窦,1602;艾儒略,1623。
parallel of latitude	纬线	weixian	17 世纪新词(利玛窦,1602;与艾儒略,1623)。亦见上文的 <i>jingxian</i> 经线。
parliament	议院	yi yuan	经由日语 <i>giin</i> 的双程流传。亦作 <i>yizhengyuan</i> 议政院, <i>gongyitang</i> 公议堂, <i>gongyiting</i> 公议庭, <i>yishiting</i> 议事厅, <i>huitang</i> 会堂, <i>gonghui</i> 公会(后用来翻译 trade union)。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gi-kai</i> 议会以及附录 F 的音译词: <i>baliman/balimen</i> 巴厘满/巴力门。
parliamentary official	绅士	shenshi	被日语外来词 <i>giin</i> 议员(附录 B)取代,后被转而用来翻译“gentleman”(参见附录 F)。

personal property	动物	<i>dongwu</i>	在《万国公法》中被用来翻译英语“personal property”(Masini, p. 170)。后来,出自日语的外来词 <i>dōsan</i> 动产(附录 B)取代了这一译法,以避免与同形异义词“动物”(表示“animal”)混淆。
personal right	人之权利	<i>ren zhi quanli</i>	参见下文的 <i>quanli</i> 权利 or “right”。
people's assembly	民间大会	<i>minjian dahui</i>	在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中亦用来翻译“corporation”。
petroleum	石油	<i>shiyou</i>	亦与 <i>meiyou</i> 煤油换着用来翻译“kerosene”。参见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又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一·石脑油》:“石油所出不一。国朝正德末年,嘉州开监井,偶得泄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近复开出数井,官司主之,此亦石油,但出于井尔。”
photography	照像法	<i>zhuoxiangfa</i>	亦作 <i>yingxiang</i> 影像, <i>riying xiang</i> 日影像。参见附录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i>xieshen</i> 写真。
photographic camera	照像镜	<i>zhuoxiang-jing</i>	亦作 <i>zhuoxiangqi</i> 照相器与 <i>shenjing</i> 神镜(字面义“magicmirror”)。
physics	物理	<i>wuli</i>	早在 1634 年即用来翻译“physics”,见于 Johann Schreck 和王征的《奇器图说》;19 世纪经由日语 <i>butsuri</i> 的双程流传。亦见附录 E 的日语外来词 <i>butsurigaku</i> 物理学。参见古汉语用法:一、《鹖冠子·王铁》:“庞子曰:‘愿闻其人情物理’”,谓事理。二、《周书·明帝纪》:“大地有穷已,互常有推移,人安得常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谓常理,道理。
physiology; anatomy	全体	<i>quanti</i>	后来被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i>seiri</i> 生理(附录 D)取代,其情形一如 <i>quantixue</i> 全体学与其日语外来词替代 <i>seingaku</i> 生理学(附录 E)以及 <i>kaiōgaku</i> 解剖学(附录 D)。参见古汉语用法:一、《释名·释饮食》:“貆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貆之为也”,又见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天上人》:“予亦曾见三人,一人全体,二半坐云”,指整个身体。二、宋刘克庄《郊行》诗:“山暗全体出,树老半身枯”,指事物的全部。
piano	洋琴	<i>yangqin</i>	后来被 <i>gungqin</i> 钢琴取代。
pistol	手枪	<i>shouqiang</i>	
plenipotentiary	全权	<i>quanquan</i>	
pneumatics	气学	<i>qixue</i>	

post office	邮局	<i>youju</i>	来自日语 <i>yūsei</i> 邮政的词语“邮政局”的缩写词。亦作 <i>xinju</i> 信局, <i>gongxinju</i> 公信, <i>diannqiju</i> 电气局。参见日语 <i>yūbinkyoku</i> 郵便局。
post-stamp premier, prime minister	邮票 总理	<i>youpiao</i> <i>zongli</i>	亦作 <i>xiaopiao</i> 小票与 <i>longtou</i> 龙头。经由日语 <i>sōri</i> 的双程流传。在日语中,该词既被用来翻译“prime minister”(<i>Sōri daijin</i> 总理大臣),也被用来翻译“president”。参见古汉语用法:一、宋苏轼《德威堂铭》:“其总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有不如”,指全面管理。二、明刘若愚《酌中志·客魏始末纪略》:“谦于嘉靖四十一年选人,压升内官监总理”,指总管某部门或事务的负责人。
president	统领	<i>longling</i>	亦作 <i>shouling</i> 首领, <i>zongtonglin</i> 总统领, <i>da-zongtong</i> 大总统和 <i>zongtong</i> 总统(最后一个词可能是来自日语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参见附录 F 音译词: <i>bolixitiande</i> 伯力赐天德, <i>bolixidun</i> 伯理喜顿, <i>bolixitiande</i> 伯理玺天德。请比较古汉语:一、《后汉书·何进传》:“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谓统率。二、军官名。宋清两代置。见《宋史·设职官志七》,《清史稿·职官志四》。
printer privilege	印文机 特权	<i>yinwenji</i> <i>tequan</i>	1864年丁韪良用之来翻译“conditional or hypothetical rights”(偶有之特权),相对于“primitive or absolute rights”(自有之原权)(Masini, p. 199)。
propeller railway	荡机 铁路	<i>dongji</i> <i>tielu</i>	见于郭实腊 K. F. A. Gützlaff, <i>Maoyi tongzhi</i> 《贸易通志》(<i>A general account of commerce</i> , 1840)。Masini(p. 200)令人信服地指出该汉语复合词是德语 <i>Eisenbahn</i> 的外来词译法(仿译词)。亦见 <i>tiezhe</i> 铁辙(现已过时)以及 <i>tiedao</i> 铁道;后者可能在19世纪70年代抵达日本(参见 <i>tetsudō</i>)。
real estate	植物	<i>zhiwu</i>	在《万国公法》中被用来翻译英语“real property”,与“personal property”(<i>dongwu</i> 动物)相对(Masini, p. 218)。后来出自日语的外来词 <i>fudōsan</i> 不动产(附录 B)取代了这一译法,以避免与同行异义词“植物”(表示“plant”)混淆。
reasoning	推论道理	<i>tuilun daoli</i>	正如马礼逊(1815)所注释的。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uiron</i> 推论。

residence	住所	<i>zhusuo</i>	正如马礼逊(1815)所注释的;经由日语 <i>jūsho</i> 的双程流传。参见《苏舜钦诗》:“念君住所近不远”,泛言所居之处。
rifle	火枪	<i>huoqiang</i>	参见 <i>dapenpao</i> 大喷炮(air rifle?)。
right	权利	<i>quanli</i>	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被用来翻译“rights”;可能是经由日语 <i>kenri</i> 的双程流传。该译法消除了古汉语中该词与“权力”、“金钱”、“特权”相联系的否定性内涵。参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敞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谓权势货财。
right of property	掌物之权	<i>zhangwu zhi quan</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sanken</i> 产权。
rolling mill	轧机	<i>zhaji</i>	
school	学校	<i>xuexiao</i>	1623 年艾儒略用之描述欧洲的学校体制;是 19 世纪经由日语 <i>gakko</i> 的双程流传, <i>xuetang</i> 学堂, <i>xueshu</i> 学塾以及 <i>xueshe</i> 学舍的替代词。参见《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汉扬雄《官箴·博士箴》:“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宋欧阳修《议学状》:“夫建学校以养贤,论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国之本务。”
school for the mute sciences	养哑院 理科	<i>yangyayuan</i> <i>like</i>	早在 17 世纪便有耶稣会传教士使用。19 世纪经由日语 <i>rika</i> 而重新使用。1896 年,梁启超解释了该词作为 <i>gezhu</i> 格致的含义(Masini, p. 186)。参见附录 D“science”的汉语对应词 <i>kesue</i> 科学。
self-preservation	自护	<i>zihu</i>	
secret informer?	暗消息	<i>an xiaoxi</i>	现已过时。参见 <i>xiaoxi</i> 消息(information, signal); <i>chuan shengtong</i> 传声筒(megaphone)。
semi-sovereign	半主	<i>banzhu</i>	后被 <i>ban zhimindi</i> 半殖民地取代。
sextant	量天尺	<i>liangtianchi</i>	
silvering(?)	银性	<i>yinxing</i>	
social intercourse	交际	<i>jiaoji</i>	起初于 19 世纪 60 年代用来翻译“political relations”(Masini, p. 180);经由双程流传,现在的译法与日语 <i>kōsai</i> 相联系。参见古汉语用法:一、《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也”,朱熹集注:“际,接也。交际,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二、《魏书·尔朱荣传》:“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际,难可齐一”,犹会合。三、《乐府诗集·唐祭太社乐章·肃和》:“九域底平,两仪交际”,谓融合感通。

South Pole	南极	<i>nanji</i>	17 世纪耶稣会新词:利玛窦,1602;艾儒略,1623。
sovereignty	主权	<i>zhuquan</i>	经由日语 <i>shuken</i> 的双程流传。参见古汉语用法:一、《管子·七臣七主》:“藏端则主权丧,法伤则奸门闾”,谓君主的权力。二、《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三年》:“上矜之,尽取弘(韩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指有职权的管吏。
static mechanics	静重学	<i>jingzhongxue</i>	后被 <i>jinglixue</i> 静力学取代。参见 <i>dongzhongxue</i> 动重学与 <i>donglixue</i> 动力学。
station	站	<i>zhan</i>	早在 1866 年用来翻译“railwaystation”。该词最初为来自蒙古语 <i>jam</i> 音译词,意思是军事要站(Masini, p. 216)。
steam boat	轮船	<i>lun chuan</i>	亦作 <i>an lunchuan</i> 暗火轮船, <i>huochuan</i> 火船, <i>huolun chuan</i> 火轮船; <i>huolunzhou</i> 火轮舟, <i>huoyanzhou</i> 火焰舟。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可供选择的 <i>kisen</i> 汽船。
steam engine	火轮机	<i>huolunji</i>	亦作 <i>huoji</i> 火机, <i>lunji</i> 轮机, <i>qiji</i> 汽机, <i>huolunjiqi</i> 火轮机器, <i>huolunqiju</i> 火轮器具。
steam pump	火轮 取水具	<i>huolun qushuaju</i>	
stoker	司火食者	<i>sihuoshizhe</i>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洋学生 业童	<i>yangxue- sheng yetong</i>	亦作 <i>chuyangxuesheng</i> 出洋学生。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ryūgakusei</i> 留学生。
substance	实体	<i>shiti</i>	正如马礼逊(1815)所注释的,经由日语 <i>jūtai</i> 的双程流传。参见一、晋陆机《浮云赋》:“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指真实,具体的东西。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谓要点。
tap(dragon head)	龙头	<i>longtou</i>	参见上文的 <i>longtou</i> 龙头(post-stamp)。
technology?	术学, 艺学	<i>shuxue, yixue</i>	
telegram office	电报局	<i>dianbaoju</i>	参见 <i>dianqiju</i> 电气局(post office)。
telegraph, telegram	电报	<i>dianbao</i>	亦作 <i>dianjixin</i> 电机信; <i>dianliji</i> 电理机; <i>dianqibao</i> 电气报; <i>dianqixin</i> 电气信; <i>tongxianxin</i> 通线信, <i>xintongxian</i> 信通线。经由日语的双程流传。
temperate zone	温带	<i>wendai</i>	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引介,1623 年。
textile machine	织机	<i>zhiji</i>	

thermal level(?)	火性	huoxing	参见“hot temper”的汉语俗语。
thermo-dynamics	火学	huoxue	被 <i>relixue</i> 热力学取代。
tonnage	吨船	dunchuan	参见附录 F 的 <i>dun</i> 疋或吨 in App. F.
tropical zone	热带	redai	1602 年由利玛窦引介, 1623 年由艾儒略使用 (Masini, p. 193)。
trade	交易	jiāoyì	《海国图志》(1844) 中用来翻译 “trade”。Masini (p. 181) 指出, 艾儒略早在 1623 年便采用了该译法。严复将该词解释为参见日语 <i>kōeki</i> 与古汉语用法: 一、《易·系辞下》: “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谓物物交换, 后多指做买卖, 贸易。二、《公羊传·宣公十二年》: “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 犹往来。三、《后汉书·朱浮传》: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 时有纤微之过者, 必见斥罢, 交易纷扰, 百姓不宁”, 指官吏的更换。
train	火车	huoche	早在 1840 年代便已使用; 亦作火轮车。
train ticket	车票	chepiao	
underground	地内 火轮车	dinei huolunche	亦作 <i>dixia huolun chelu</i> 地下火轮车路; 现在被 <i>ditie</i> 地铁取代。
university	大学	daxue	亦作 <i>dashuyuan</i> 大书院, <i>daxue guan</i> 大学馆, <i>daxue gongtang</i> 大学公堂, <i>daxuetang</i> 大学堂, <i>wenxueguan</i> 文学馆等; 经由日语 <i>daigaku</i> 的双程流传。按照 Masini 的说法 (p. 164), <i>daxue</i> 大学乃由耶稣会传教士首次用来翻译 “university” (艾儒略, 1623)。
Upper House	上房	shangfang	亦作 <i>shanghui tang</i> 上会堂与 <i>shang tang</i> 上堂; 后被双程外来词译法 <i>shangyiyuan</i> 上议院取代。参见附录 B 的 <i>gin</i> 议院 (parliament)。
zoological garden	动物园	dongwuyuan	亦作 <i>wanshouyuan</i> 万兽园和 <i>wanshengyuan</i> 万生园。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dōbutsuen</i> 动物园。

附 录 B

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

英语	日语拉丁化	汉字	汉语拼音
abstract	<i>chūshō</i>	抽象	<i>chouxiang</i>
academic association	<i>gakkai</i>	学会	<i>xuehui</i>
active service, duty	<i>gen'eki</i>	现役	<i>xianyi</i>
adjust, adjustment	<i>chōsei</i>	调整	<i>tiaozheng</i>
admission ticket	<i>nyūjōken</i>	入场券	<i>ruchangjuan</i>
advertisement	<i>hōkoku</i>	广告	<i>guangguo</i>
affirmative	<i>kōtei</i>	肯定	<i>kending</i>
agreement, accord	<i>kyōtei</i>	协定	<i>xieding</i>
agricultural product	<i>nōsanbutsu</i>	农产物	<i>nongchan wu</i>
agriculture	<i>nōgaku</i>	农学	<i>nongxue</i>
aim, objective	<i>mokuteki</i>	目的	<i>mudi</i>
air raid alarm	<i>kūshū keihō</i>	空袭警报	<i>kongxi jingbao</i>
air raid drill	<i>bōkū enshū</i>	防空演习	<i>fangkong yanxi</i>
aircraft carrier	<i>kōkū bōkan</i>	航空母舰	<i>hangkong mujian</i>
airspace	<i>ryōkū</i>	领空	<i>lingkong</i>
appear in court	<i>shutte</i>	出庭	<i>chuting</i>
approval, adoption of a resolution	<i>kaketsu</i>	可决	<i>kejue</i>
aqueous rock	<i>suiseigan</i>	水成岩	<i>shuicheng yan</i>
arbitration	<i>chūsai</i>	仲裁	<i>zhongcai</i>
arc light, arc	<i>kōkō</i>	弧光**	<i>huguang</i>
artery	<i>dōmyaku</i>	动脉	<i>dongmai</i>
asphalt	<i>rekisei</i>	沥青	<i>liqing</i>
association	<i>kyōkai</i>	协会	<i>xiehui</i>
association, union	<i>kumiai</i>	组合	<i>zuhe</i>
assumption, supposition	<i>katei</i>	假定	<i>jiading</i>
atom	<i>genshi</i>	原子	<i>yuansi</i>
background	<i>haikai</i>	背景	<i>beijing</i>
bank	<i>ginkō</i>	银行	<i>yinhang</i>
basic criterion	<i>kijun</i>	基准	<i>jizhun</i>

* 该类别相当于高、刘以及其他的语言学家所说的“来自现代日语的外来词”，它由“汉字”词语组成，乃由日语使用汉字来翻译欧洲词语（特别是英语词语）时所创造。

** 参见“arc”，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弧”。

belligerent (party, group)	<i>kōsen dantai</i>	交战团体	<i>jiaozhan tuanti</i>
bicotyledous	<i>sōshuyō</i>	双子叶	<i>shuangzi ye</i>
bill, measure	<i>gian</i>	议案	<i>yi'an</i>
biology	<i>seitnūsugaku</i>	生物学	<i>shengwuxue</i>
blackout	<i>tōka kansei</i>	灯火管制	<i>denghuo guan zhi</i>
book series	<i>bunko</i>	文库	<i>wenku</i>
botanical garden	<i>shokubutsuen</i>	植物园	<i>zhuwuyuan</i>
broad sense	<i>kōgi</i>	广义	<i>guangyi</i>
broadcast	<i>hōsō</i>	放送	<i>fangsong</i>
business trip	<i>shuichō</i>	出張	<i>chuzhang</i>
cadre	<i>kanbu</i>	干部	<i>ganbu</i>
cancer	<i>gan</i>	癌	<i>ai</i>
capitalist	<i>shihonka</i>	资本家	<i>ziben jia</i>
cartoon, comic book	<i>manga</i>	漫画	<i>manhua</i>
case, legal case, measure	<i>hōan</i>	法案	<i>fa'an</i>
cash, specie	<i>genkin</i>	现金*	<i>xianjin</i>
category	<i>hanchū</i>	范畴	<i>fanchou</i>
cell	<i>saibō</i>	细胞	<i>xibao</i>
chamber of commerce	<i>shōkai</i>	商会	<i>shanghui</i>
characteristic	<i>tokuchō</i>	特征	<i>tezhen</i>
circulating assets	<i>ryūtsū shihon</i>	流通资本	<i>liutong ziben</i>
civil code, civil law	<i>minpō</i>	民法	<i>minfa</i>
civil engineering	<i>doboku kōji</i>	土木工程	<i>tumu gongshi</i>
civil rights	<i>minken</i>	民权	<i>minquan</i>
climax, high tide	<i>takashio</i>	高潮	<i>gaochao</i>
club	<i>kurabu</i>	俱乐部	<i>julebu</i>
cold current	<i>kanryū</i>	寒流	<i>hanliu</i>
cold zone	<i>kantai</i>	寒带**	<i>handai</i>
collaboration	<i>bōshō</i>	旁证	<i>bangzheng</i>
collection	<i>kaishū</i>	回收	<i>huishou</i>
commerce, trade	<i>shōgyō</i>	商业	<i>shangye</i>
common sense	<i>jōshiki</i>	常识	<i>changshi</i>
communize	<i>kyōsan</i>	共产	<i>gongchan</i>
company	<i>kaisha</i>	会社***	<i>huishe</i>
compendium	<i>taikei</i>	大系	<i>daxi</i>
complication (medical)	<i>heihatsushō</i>	并发症	<i>bingfa zheng</i>
component, ingredient	<i>seibun</i>	成分	<i>chengfen</i>

* 参见“cash”, 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现银子”。
** 参见附录 A 的 *lengdai* 冷带。
*** 参见附录 A 的 *gongsi* 公司。

concentration	<i>shūchū</i>	集中	<i>jizhong</i>
concept	<i>gainen</i>	概念	<i>gainian</i>
conclusion	<i>ketsuron</i>	结论	<i>jielun</i>
concrete	<i>konkuriito</i>	混凝土	<i>hunníng tǔ</i>
condition, control	<i>seiyaku</i>	制约	<i>zhiyue</i>
conductor	<i>dōtai</i>	导体	<i>daotǐ</i>
conference, deliberation	<i>kyōgi</i>	协议	<i>xieyi</i>
connection, contact	<i>rensei</i>	连系(联系)	<i>lianxi</i>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kensei</i>	宪政	<i>xianzheng</i>
construct, architecture	<i>kenchiku</i>	建筑	<i>jianzhu</i>
consumer	<i>shōhisha</i>	消费者	<i>xiaofei zhe</i>
consumption, spending	<i>shōhi</i>	消费	<i>xiaofei</i>
contract, exclusive arrangement	<i>tokuyaku</i>	特约	<i>teyue</i>
contrast, comparison	<i>taihi</i>	对比*	<i>duibi</i>
control	<i>kansei</i>	管制	<i>guan zhi</i>
conversation	<i>kaudan</i>	会谈	<i>huaitan</i>
copy right	<i>hanken</i>	版权, 版权	<i>banquan</i>
corporation, association	<i>shadan</i>	社团	<i>shetuan</i>
course of lectures	<i>kōza</i>	讲座	<i>jiangzuo</i>
credit	<i>saihen</i>	债权	<i>zhaiquan</i>
creditor	<i>kashikata</i>	贷方**	<i>dai fang</i>
crop, plant	<i>nōsakubutsu</i>	农作物	<i>nongzuowu</i>
cryptogram	<i>inkashokubu - tsu</i>	隐花植物	<i>yinhua zhiwu</i>
cycle	<i>shūha</i>	周期	<i>zhoubo</i>
debt	<i>saimu</i>	债务	<i>zhaiwu</i>
debtor	<i>kankata</i>	借方	<i>jiefang</i>
decision, judgment	<i>dantei</i>	断定	<i>duanding</i>
declaration of war	<i>sensen</i>	宣战	<i>xuanzhan</i>
decorative pattern	<i>zuōga</i>	图案画	<i>tu'an hua</i>
defect, flaw	<i>ketten</i>	欠点	<i>qiandian</i>
definition	<i>teigi</i>	定义	<i>dingyi</i>
deflation	<i>tsūka shūshuku</i>	通货收缩	<i>tonghuo shousuo</i>
degree(academic)	<i>gakui</i>	学位	<i>xuewei</i>
demobilization	<i>fukuin</i>	复员	<i>fuyuan</i>
denial	<i>hinin</i>	否认	<i>fouren</i>
department store	<i>hyakkaten</i>	百货店***	<i>baihuo dian</i>
designation, number	<i>bangō</i>	番号	<i>fanhao</i>
detective, spy	<i>teitan</i>	侦探	<i>zhen tan</i>

* 参见“contrast”, 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放在相对且比较”。

** 参见“creditor”, 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债主”。

*** 附录 A 为 *dahuopu* 大货铺。

	<i>tantei</i>	探偵	<i>tanzen</i>
detector	<i>kempaki</i>	检波器	<i>jianbo qi</i>
development, progress	<i>shinten</i>	进展	<i>jinzhun</i>
dialectics	<i>benshō</i>	辩证	<i>bianzheng</i>
direct	<i>chokusetsu</i>	直接	<i>zhíjiē</i>
direct current (DC)	<i>chokuryū</i>	直流	<i>zhíliú</i>
disinfection, sterilization	<i>shōdoku</i>	消毒	<i>xiāodu</i>
dispatch, send	<i>haken</i>	派遣	<i>paìqiān</i>
distillation	<i>jōryū</i>	蒸馏	<i>zhēngliú</i>
duet	<i>nijūso</i>	二重奏	<i>èrchóng zòu</i>
economic panic	<i>keizai kyōkō</i>	经济恐慌	<i>jīngjì kōnghuāng</i>
efficiency	<i>kōritsu</i>	效率	<i>xiàolǜ</i>
electric industry	<i>dengyō</i>	电业	<i>diànyè</i>
electrical conductor	<i>dendōtai</i>	电导体	<i>diàndǎotǐ</i>
electrical current	<i>denryū</i>	电流	<i>diànliú</i>
electrical switch	<i>haidenban</i>	配电盘	<i>peidian pán</i>
electromagnetic wave	<i>dempa</i>	电波	<i>diànbo</i>
electron, electronics	<i>denshi</i>	电子	<i>diànzi</i>
element	<i>genso</i>	元素	<i>yuánsù</i>
employee	<i>koin</i>	雇员	<i>gùyuán</i>
endocrine	<i>naibunpitsu</i>	内分泌	<i>nèifēnmì</i>
engineering (the study of)	<i>kōka</i>	工科*	<i>gōngkē</i>
ensure, guarantee	<i>kakuho</i>	确保	<i>quèbǎo</i>
enterprise	<i>kigyō</i>	企业	<i>qǐyè</i>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	<i>densenbyō</i>	传染病	<i>chuānrǎn bìng</i>
equality	<i>heiken</i>	平权	<i>píngquán</i>
equation	<i>hōteishiki</i>	方程式**	<i>fāngchéngshì</i>
Esperanto	<i>sekaigo</i>	世界语	<i>shìjièyǔ</i>
estimate	<i>gaisan</i>	概算	<i>gāisuan</i>
evaporation	<i>jōhatu</i>	蒸发	<i>zhēngfā</i>
evolution	<i>shūka</i>	进化	<i>jìnhuà</i>
exchange value	<i>kōkan kachi</i>	交换价值	<i>jiāohuàn jiàzhí</i>
exemplar	<i>tenkei</i>	典型	<i>diǎnxíng</i>
exemption, remission	<i>menyo</i>	免除	<i>miǎnchú</i>
exercise, gymnastics	<i>taisō</i>	体操	<i>tǐcāo</i>
exhibition	<i>tenrankai</i>	展览会	<i>zhǎnlǎnhuì</i>
exit	<i>deguchi</i>	出口	<i>chūkǒu</i>
exocrine	<i>gaihunpitsu</i>	外分泌	<i>wàifēnmì</i>

* 参见附录 A 的 *wenke* 文科与 *like* 理科。

** 参见附录 A 的 *fungcheng* 方程。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i>shikensho</i>	试验所 [*]	<i>shiyansuo</i>
explanation	<i>setsumei</i>	说明	<i>shuoming</i>
externality	<i>gaizai</i>	外在	<i>wazai</i>
extra (of a newspaper)	<i>gōgai</i>	号外	<i>haowai</i>
extradite	<i>hikkuatashi</i>	引渡	<i>yindu</i>
extraterritoriality	<i>chiguhōken</i>	治外法权	<i>zhiwai faquan</i>
extreme	<i>kyokutan</i>	极端	<i>jiduan</i>
facilitate	<i>sokusei</i>	促成	<i>cucheng</i>
factory	<i>kōshō</i>	工厂	<i>gongchang</i>
fair, exposition	<i>hakurankai</i>	博览会 ^{**}	<i>bolan hui</i>
farm	<i>nōjō</i>	农场	<i>nongchang</i>
fiber, staple	<i>sen'i</i>	纤维	<i>xianwei</i>
field, domain	<i>ryōiki</i>	领域	<i>lingyu</i>
finance	<i>zaisei</i>	财政	<i>caizheng</i>
finances	<i>zaimu</i>	财务	<i>caiwu</i>
fine arts	<i>bijutsu</i>	美术 ^{***}	<i>meishu</i>
fire extinguisher	<i>shōkaki</i>	灭火器	<i>xiaohuo qi</i>
fire hydrant	<i>shōkasen</i>	消火栓	<i>xiaohuo shuan</i>
firefighting	<i>shōbō</i>	消防	<i>xiaofang</i>
fixed assets	<i>fuhen shihon,</i> <i>kotei shihon</i>	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	<i>bubian ziben,</i> <i>guding ziben</i>
flu (influenza)	<i>ryūkan</i>	流感	<i>liugan</i>
fluid	<i>ryūtai</i>	流体	<i>liuti</i>
foot (measure)	<i>shaku</i>	呎 ^{****}	<i>chi</i>
forum, criticism	<i>rondan</i>	论坛	<i>luntan</i>
fossil	<i>kaseki</i>	化石 ^{*****}	<i>huashi</i>
foundation (organization)	<i>zaidan</i>	财团	<i>caituan</i>
function, property	<i>seindō</i>	性能	<i>xingneng</i>
fuse	<i>dōkasen</i>	导火线	<i>daohuoxian</i>
gas	<i>gasu</i> <i>kitai</i>	瓦斯 ^{*****} 气体	<i>wasi</i> <i>qiti</i>
general mobilization	<i>sōdōin</i>	总动员	<i>zongdong yuan</i>
glossy (paper)	<i>katasuya</i>	片艳 (纸)	<i>pianyan</i>
goods, merchandise	<i>shōhin</i>	商品	<i>shangpin</i>
groundwater	<i>chikasu</i>	地下水	<i>dixia shui</i>

* 参见附录 A 的 *shiyanchang* 试验场。

** 参见附录 A 的 *bowuhui* 博览会, *xuanqihui* 炫奇会, *saiqihui* 赛奇会等。

*** 参见附录 D 的 *yushu* 艺术。

**** 参见附录 F 的 *futuo* 福脱。

*****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1866)中用 *hua wei shi* 化为石一词,表示他曾在瑞典一家博物馆看到的化石(Masini, p. 177)。

***** 日语甲面,“瓦斯”是 1822 年开始使用的来自荷兰语的音译词。亦见附录 F 的汉语音译词 *jiashi* 加斯。

guarantee, assurance	<i>hashō</i>	保证	<i>baozheng</i>
guerrilla group	<i>yūgekítai</i>	游击队*	<i>youjidui</i>
guerrilla warfare	<i>yūgekisen</i>	游击战	<i>youjizhan</i>
hand grenade	<i>shuryūdan</i> (<i>teryūdan</i>)	手榴弹	<i>shouliu dan</i>
handicrafts	<i>shukōgyō</i>	手工业**	<i>shougongye</i>
hardening of arteries	<i>dōmyakukōka</i>	动脉硬化	<i>dongmai yinghua</i>
head, chief	<i>shunin</i>	主任	<i>zhuren</i>
heavy industry	<i>jūkōgyō</i>	重工业	<i>zhonggongye</i>
hemoglobin	<i>kesshikiso</i>	血色素	<i>xuese su</i>
high pressure/ voltage	<i>kōatsu</i>	高压	<i>gaoya</i>
high temperature	<i>kōon</i>	高温	<i>gaowen</i>
high - frequency	<i>kōshūha</i>	高周波	<i>gaozhou bo</i>
hothed, breeding ground	<i>onshō</i>	温床	<i>wenchuang</i>
huge sum	<i>kyogaku</i>	巨额	<i>ju'e</i>
hygiene, sanitation	<i>eisei</i>	卫生	<i>weisheng</i>
hypnotism	<i>sainunryutsu</i>	催眠术	<i>cuimian shu</i>
idea, doctrine	<i>rinen</i>	理念	<i>linian</i>
ideal	<i>risō</i>	理想	<i>lixiang</i>
ideology	<i>ishiki keitai</i>	意识形态	<i>yishi xingtai</i>
igneous	<i>kaseigan</i>	火成岩	<i>huocheng yan</i>
imaginary, hypothetical	<i>kasō</i>	假想	<i>jiaxiang</i>
immanence, inherence	<i>naizai</i>	内在	<i>neizai</i>
immediate decision	<i>sokketsu</i>	即决	<i>jijue</i>
imported goods	<i>hakurainhin</i>	舶来品	<i>bolai pin</i>
improvement	<i>kaishin</i>	改进	<i>gaijin</i>
inch	<i>sun</i>	吋	<i>cun</i>
income tax	<i>shotakuzei</i>	所得税	<i>suode shui</i>
incorporated foundation	<i>zaidan hōjin</i>	财团法人	<i>caituan faren</i>
index number	<i>shisū</i>	指数	<i>zhishu</i>
indirect	<i>kansetsu</i>	间接	<i>jianjie</i>
individual	<i>kotai</i>	个体***	<i>geti</i>
induction	<i>kinō</i>	归纳	<i>guina</i>
industry	<i>kōgyō</i>	工业	<i>gongye</i>
inferiority	<i>ressei</i>	劣势	<i>lieshi</i>
inflation	<i>tsūka bōchō</i>	通货膨胀	<i>tonghuo pengzhang</i>
information, intelli- gence	<i>jōhō</i>	情报	<i>qingbao</i>

* 参见附录 D 的 *youji* 游击。

** 参见附录 A 的 *shougong* 手工。

*** 参见附录 D 的 *genren* 个人与附录 C 的 *gebie* 个别。

initiative, leadership	<i>shudō</i>	主动	<i>zhudong</i>
inorganic	<i>muki</i>	无机	<i>wuji</i>
inspect, inspection	<i>kensa</i>	检查	<i>jiancha</i>
instructor	<i>kyōin</i>	教员	<i>jiàoyuán</i>
intellectual trend	<i>shichō</i>	思潮	<i>sichao</i>
international	<i>kokusai</i>	国际	<i>guoji</i>
international law	<i>kokusai kōhō</i>	国际公法*	<i>guoji gongfa</i>
intuition	<i>chokkaku</i>	直觉	<i>zhijue</i>
investment	<i>tōshi</i>	投资	<i>touzi</i>
journalist, reporter	<i>shūbun kisha</i>	新闻记者**	<i>xinwen jizhe</i>
judgment, expert opinion	<i>kantei</i>	鉴定	<i>jiàndìng</i>
judicial officer	<i>hōjin</i>	法人	<i>faren</i>
key point	<i>yōshō</i>	要冲	<i>yaochong</i>
kindergarten	<i>yōchien</i>	幼稚园	<i>youzhiyuan</i>
labor organization	<i>rōdō kumiai</i>	劳动组合	<i>laodong zuhe</i>
law department	<i>hōka</i>	法科	<i>fake</i>
lawyer	<i>bengoshi</i>	辩护士***	<i>bianhu shi</i>
lecture, address	<i>kōen</i>	讲演	<i>jiangyan</i>
left wing	<i>sayoku</i>	左翼	<i>zuoyi</i>
legal, statutory	<i>hōtei</i>	法定	<i>fading</i>
library	<i>toshokan</i>	图书馆****	<i>tushuguan</i>
license, permit	<i>menkyo</i>	免許	<i>mianxu</i>
light industry	<i>keikōgyō</i>	轻工业	<i>qing gongye</i>
limitation	<i>kyokugen</i>	局限	<i>juxian</i>
liquid	<i>ekitai</i>	液体	<i>yeti</i>
liquid assets	<i>kahen shihon</i>	可变资本	<i>kebian ziben</i>
long-wave	<i>chōha</i>	长波	<i>changbo</i>
look forward, long	<i>akogare</i>	憧憬	<i>chongjing</i>
low frequency	<i>teishūha</i>	低周波	<i>dizhou bo</i>
low pressure/ voltage	<i>teiatu</i>	低压	<i>diya</i>
low temperature	<i>teion</i>	低温	<i>diwen</i>
low tide, nadir	<i>teichō</i>	低潮	<i>dichao</i>
lymph	<i>rinpa</i>	淋巴	<i>linba</i>
magnate, tycoon	<i>kyōō</i>	巨头	<i>jutou</i>
maritime affairs	<i>kaiji</i>	海事	<i>haishi</i>
match	<i>taidō</i>	对应	<i>duiying</i>
means of production	<i>seisan shudan</i>	生产手段	<i>shengchan - shouduan</i>
means, material, data	<i>shiryō</i>	资料	<i>zilian</i>
meeting, gathering	<i>shūgō</i>	集合	<i>jihe</i>

* 参见附录 A 的 *wanguo gongfa* 万国公法。

** 参见附录 A 的 *jizhe* 记者's *xinwenguan jizhe* 新闻馆记者。

*** 参见附录 A 的 *lishi* 律师和 *lushi* 律士。

**** 按照 Masini 的说法 (P. 201), 传教士李提摩太 (T. Richard) 在其《新学八卷》(1889) 一文中使用了 *tushuguan* 图书馆一词, 该文付梓于他旅日之后。

member, membership	<i>kaiin</i>	会员	<i>huìyuán</i>
meter	<i>metoru</i>	米	<i>mǐ</i>
microbe	<i>hiseibutsu</i>	微生物	<i>weishengwù</i>
military affairs	<i>heiji</i>	兵事*	<i>bīngshì</i>
military alliance	<i>kōshu dōmei</i>	攻守同盟	<i>gōngshǒu tóngméng</i>
military supplies	<i>gunyuhin</i>	军需品	<i>jūnxū pǐn</i>
miniature	<i>hogata</i>	小型	<i>xiǎoxíng</i>
mobilization	<i>dōin</i>	动员	<i>dòngyuán</i>
modern	<i>gendai</i>	现代**	<i>xiàndài</i>
molecule	<i>bunshi</i>	分子	<i>fēnzǐ</i>
monocotyledous	<i>tanshiyō</i>	单子叶	<i>dānzǐ yè</i>
monopoly	<i>senbai</i>	专卖	<i>zhuānmài</i>
monosodium glutamate	<i>aji no moto</i>	味之素	<i>wèi zhī sù</i>
most-favored nation	<i>saikaikoku</i>	最惠国	<i>zuìhuì guó</i>
motion	<i>dōgi</i>	动议	<i>dòngyì</i>
motive	<i>dōki</i>	动机	<i>dòngjī</i>
movement	<i>dōtai</i>	动态	<i>dòngtài</i>
moving body	<i>dōtai</i>	动体	<i>dòngtǐ</i>
museum	<i>hakubutsukan</i>	博物馆***	<i>bówùguǎn</i>
narrow sense	<i>kyōgi</i>	狭义	<i>xiáyì</i>
nation, race	<i>minzoku</i>	民族	<i>mínzú</i>
national character	<i>kokuminsei</i>	国民性	<i>guómín xìng</i>
national essence	<i>kokusui</i>	国粹	<i>guocuì</i>
national soul	<i>kuridamashii</i>	国魂	<i>guóhún</i>
natural science	<i>shizen kagaku</i>	自然科学	<i>zìrán kēxué</i>
natural selection	<i>shizen tōta</i>	自然淘汰	<i>zìrán taǎotài</i>
naval cruiser	<i>jun'yōkan</i>	巡洋舰	<i>xúnyángjiàn</i>
naval destroyer	<i>kuchikukan</i>	驱逐舰	<i>qūzhújiàn</i>
negate, negation	<i>hitei</i>	否定	<i>fǒudìng</i>
negative pole, cathode	<i>inkyoku</i>	阴极	<i>yīnjí</i>
negative, negativity	<i>shōkyoku</i>	消极	<i>xiāoji</i>
negotiation	<i>danpan</i>	谈判	<i>tānpán</i>
nervous	<i>kinchō</i>	紧张	<i>jǐnzhāng</i>
neurasthenia	<i>shinkei suijaku</i>	神经衰弱	<i>shénjīng shuāiruò</i>
neuroticism	<i>shinkei kabin</i>	神经过敏	<i>shénjīng guòmǐn</i>
noncombatant	<i>hisendōin</i>	非战斗员	<i>fēizhàn dòng yuán</i>
nonmetallic	<i>hikanzoku</i>	非金属	<i>fēi jīnshǔ</i>
notary	<i>kōshōnin</i>	公证人	<i>gōngzhèng rén</i>
nutrition	<i>eiyo</i>	营养	<i>yíngyǎng</i>
object	<i>kakutai</i>	客体	<i>kètǐ</i>

* 参见附录 D 的 *junshi* '军事(日语:gunji)。

** 参见附录 E 的首译词 *mondō* 摩登。

*** 参见附录 A 的 *bowuyuan* 博物院, *bowuchang* 博物场, *bolanyuan* 博览院。

object	<i>mokutekabutsu</i>	目的物	<i>mudi wu</i>
object	<i>taishō</i>	对象	<i>duixiang</i>
objectivity	<i>kyakkan</i>	客观	<i>keguan</i>
offer, proffer	<i>teikyō</i>	提供	<i>tigong</i>
oligarchy	<i>katōseiji</i>	寡头政治	<i>guatou zhengzhi</i>
ordinary	<i>fūsū</i>	普通	<i>putong</i>
organic	<i>yūki</i>	有机	<i>youji</i>
organization	<i>dantai</i>	团体	<i>tuanti</i>
outline	<i>gairon</i>	概论	<i>gailun</i>
ownership	<i>shoyūken</i>	所有权	<i>suoyou quan</i>
parliament	<i>gikai</i>	议会*	<i>yihui</i>
parliamentary official	<i>giin</i>	议员	<i>yiyuan</i>
parole	<i>karishaku</i>	假释	<i>jiashi</i>
passenger	<i>jōkyaku</i>	乘客	<i>chengke</i>
passive	<i>hidō</i>	被动	<i>beidong</i>
peasant-worker government	<i>rōnō seifu</i>	劳农政府	<i>laonong zhengfu</i>
pedagogy	<i>kyōikugaku</i>	教育学	<i>jiàoyùxué</i>
period, periodic time	<i>shūki</i>	周期	<i>zhouqi</i>
period of effect(ive- ness)	<i>jikō</i>	时效	<i>shixiao</i>
persecution	<i>hakugai</i>	迫害	<i>pohai</i>
personal property	<i>dōsan</i>	动产**	<i>dongchan</i>
personality	<i>jinkaku</i>	人格	<i>rengē</i>
petition	<i>seigan</i>	请愿	<i>qingyuan</i>
phanerogam (flower- ing plant)	<i>kenkashokubutsu</i>	显花植物	<i>xianhua zhiwu</i>
philosophy	<i>tetsugaku</i>	哲学	<i>zhexue</i>
plan, program	<i>hōan</i>	方案	<i>fang'an</i>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byōchūgai</i>	病虫害	<i>bìngchong hai</i>
play an instrument	<i>ensō</i>	演奏	<i>yanzou</i>
playing fields	<i>undōjō</i>	运动场	<i>yundong chang</i>
plutocracy,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i>zaibatsu</i>	财阀	<i>cáifá</i>
polemic	<i>ronsen</i>	论战	<i>lunzhan</i>
policy	<i>seisaku</i>	政策	<i>zhengce</i>
political party	<i>seitō</i>	政党	<i>zhengdang</i>
politics (the study of)	<i>seijigaku</i>	政治学***	<i>zhengzhixue</i>
positive	<i>sekkyoku</i>	积极	<i>ji</i>
positive pole, anode	<i>yōkyoku</i>	阳极	<i>yangji</i>
potato	<i>baishō</i>	马铃薯	<i>malingshu</i>

* 参见附录 A 的 *yiyuan* 议院, 以及附录 F 的 *batiman* 巴厘满等。
** 参见附录 A 的 *dongwu* 动物。
*** 参见附录 D 的 *zhengzhi* 政治。

premise	<i>zentei</i>	前提	<i>quantu</i>
preparatory school	<i>yobikō</i>	预备校	<i>yubei xiao</i>
principle	<i>gensoku</i>	原则	<i>yuanze</i>
principle, theory	<i>genri</i>	原理	<i>yuanti</i>
printed matter	<i>insatsuhin</i> <i>insatsubutsu</i>	印刷品 印刷物	<i>yinshua pin</i> <i>yinshua wu</i>
proletarian	<i>rōdōsha</i>	劳动者	<i>laodongzhe</i>
promotion	<i>sokushin</i>	促进	<i>cujin</i>
proposal, proposition	<i>teian</i>	提案	<i>tì'an</i>
prostate gland	<i>setsugosen</i>	摄护腺	<i>shehu mai</i>
psychology	<i>shinreigaku</i> <i>shinrigaku</i>	心灵学 心理学*	<i>xinlingxue</i> <i>xinlixue</i>
public debt	<i>kōsai</i>	公债	<i>gongzhai</i>
public, open	<i>kōkai</i>	公开	<i>gongkai</i>
publish, issue	<i>shuppan</i>	出版	<i>chuban</i>
published material	<i>shuppanbutsu</i>	出版物	<i>chuban wu</i>
quality, mass (physics)	<i>shutsuryō</i>	质量	<i>zhiliang</i>
quantity	<i>suruyō</i>	数量	<i>shuliang</i>
quantum	<i>ryōshi</i>	量子	<i>liangzi</i>
quota	<i>teigaku</i>	定额	<i>ding'e</i>
race	<i>shuzoku</i>	种族	<i>zhongzu</i>
radiation	<i>hōsha</i>	放射	<i>fangshe</i>
rambling chat	<i>mandan</i>	漫谈	<i>mantan</i>
random notes	<i>manpitsu</i>	漫笔	<i>manbi</i>
rate of progress	<i>shindo</i>	进度	<i>jindu</i>
rationing, distribution	<i>haikyū</i>	配给	<i>peiji</i>
real estate	<i>fudōsan</i>	不动产**	<i>budong chan</i>
reality	<i>genjitsu</i>	现实	<i>xianshi</i>
reasoning	<i>suiron</i>	推论***	<i>tuilun</i>
reciprocity	<i>gokei</i>	互惠	<i>huhui</i>
recognition, admission	<i>shōnin</i>	承认	<i>chengren</i>
reconnaissance, reconnoiter, scouting	<i>teisatsu</i>	侦察	<i>zhencha</i>
reduce, retrench	<i>kinshuku</i>	紧缩	<i>jinsuo</i>
reference book	<i>sankōsho</i>	参考书	<i>cankao shu</i>
reflection	<i>hansha</i>	反射	<i>fanshe</i>
reflection	<i>han'ei</i>	反映****	<i>fanying</i>
reform	<i>hairyō</i>	改良	<i>gailiang</i>
refrigeration	<i>reizōko</i>	冷藏库	<i>lengcang ku</i>
regular army	<i>jobi-hei</i>	常备兵	<i>changbeibing</i>
regulate, regulation	<i>chōsetsu</i>	调节	<i>tiaojie</i>

* 参见附录 D 的 *xinli* 心理。

** 参见附录 A 的 *shisui* 植物。

*** 参见附录 A 的传教士汉语语义译法 *tuilun daoli* 推论道理。

**** 参见“reflection”，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反照”。

rejection	<i>hiketsu</i>	否决	<i>foujue</i>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eisan kankei</i>	生产关系	<i>shengchan guanxi</i>
report	<i>hōkoku</i>	报告	<i>baogao</i>
representative	<i>daigenjin</i>	代言人	<i>daiyan ren</i>
retarded child	<i>teinōji</i>	低能儿	<i>dineng'er</i>
right wing	<i>uyoku</i>	右翼	<i>youyi</i>
rupture	<i>dankō</i>	断交	<i>duanjiao</i>
safe, depository	<i>kinko</i>	金库	<i>jinku</i>
school age	<i>gakurei</i>	学龄	<i>xueling</i>
school master	<i>kōchō</i>	校长	<i>xiaozhang</i>
script	<i>kyakuhon</i>	脚本	<i>jiaben</i>
secession	<i>dattō</i>	脱党	<i>tuodang</i>
second supporting troops	<i>kōbi - hei</i>	后备兵	<i>houbeibing</i>
securities (financial), fixed assets	<i>kotei shihon</i>	固定资本	<i>guding ziben</i>
securitie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i>yūcashōken</i>	有价证券	<i>youjia zhengquan</i>
see off	<i>kansō</i>	欢送	<i>huansong</i>
semester	<i>gakki</i>	学期	<i>xueqi</i>
sewer	<i>gesuidō</i>	下水道	<i>xia shuidao</i>
shortwave	<i>tanpa</i>	短波	<i>duanbo</i>
signal	<i>shingō</i>	信号	<i>xinhao</i>
silencer, muffler	<i>shōonki</i>	消音器	<i>xiaoyin qi</i>
slide	<i>gentō</i>	幻灯	<i>huandeng</i>
soda	<i>sōda</i>	曹达*	<i>caoda</i>
solid	<i>kotai</i>	固体	<i>guti</i>
solution (to a mathematical problem), quotient	<i>tokusū</i>	得数	<i>deshu</i>
space, room	<i>kūkan</i>	空间	<i>kongjian</i>
special agent	<i>tokumu</i>	特务	<i>tewu</i>
special permission	<i>tokkyo</i>	特许	<i>texu</i>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i>tai'iku</i>	体育	<i>tiyu</i>
spy	<i>kanchō</i>	间谍	<i>jiandie</i>
staff, personnel	<i>shokuin</i>	职员	<i>zhiyuan</i>
standard, criterion	<i>kihān</i>	规范	<i>guifan</i>
standard-bearer	<i>kishu</i>	旗手	<i>qishou</i>
standing army	<i>jōbihei</i>	常备兵	<i>changbei bing</i>
standpoint	<i>tachiba</i>	立场	<i>lichang</i>
static, stationary	<i>seitai</i>	静态	<i>jingtai</i>

* 参见附录 F 的 *suda* 苏打与苏达。Soda 曹达是来自荷兰语的日语音译词 (Masui, p. 162)。

steamboat	<i>kusen</i>	汽船	<i>qichuan</i>
stencil, mimeograph	<i>isshuban</i>	誊写版	<i>tengxie ban</i>
storage battery	<i>chikudenchū</i>	蓄电池	<i>xu dianchi</i>
store	<i>shūten</i>	商店	<i>shangdian</i>
storm troops	<i>totsuyekitai</i>	突击队	<i>tujidui</i>
strike, walkout	<i>dōmei hikō</i>	同盟罢工	<i>tongmeng bagong</i>
struggle	<i>tōsō</i>	斗争	<i>douzhen</i>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ryūgakusei</i>	留学生 [*]	<i>liuxuesheng</i>
subjectivity	<i>shukan</i>	主观	<i>zhuguan</i>
sublation(aufheben)	<i>yōki</i>	扬弃 ^{**}	<i>yangqi</i>
sue, bring a case to court	<i>shusso</i>	出诉	<i>chusu</i>
sum, amount	<i>kin'gaku</i>	金额	<i>jin'e</i>
summary	<i>gaikatsu</i>	概括	<i>gaikuo</i>
summons, voucher	<i>denpyō</i>	传票	<i>chuanpiao</i>
sunlamp	<i>taiyō tō</i>	太阳灯	<i>taiyang dong</i>
superiority	<i>yūsei</i>	优势	<i>youshi</i>
supporting troops	<i>yobieki</i>	预备役	<i>yubeiy</i>
surface water	<i>chijōsui</i>	地上水	<i>dishang shui</i>
symbol	<i>shōchō</i>	象征	<i>xiangzheng</i>
symmetry	<i>taishō</i>	对称	<i>duicheng</i>
sympathetic nerve	<i>kōkan shunkei</i>	交感神经	<i>jiagang shenjing</i>
symphony	<i>kōkyōgaku</i>	交响乐	<i>jiaoxiang yue</i>
syncope, suspended animation	<i>kashi</i>	假死	<i>jiasi</i>
synthesis	<i>sōgō</i>	综合	<i>zonghe</i>
system	<i>keitō</i>	系统	<i>xitong</i>
tear gas shell	<i>sairudan</i>	催泪弹	<i>cuilei dan</i>
technician	<i>gishi</i>	技师	<i>jishi</i>
telegraph, cable	<i>dōshun</i>	电信 ^{***}	<i>dianxin</i>
telegraph machine	<i>denshinki</i>	电信机	<i>dianxinji</i>
telephone	<i>denwa</i>	电话 ^{****}	<i>dianhua</i>
telephone set	<i>denwaki</i>	电话机	<i>dianhuaji</i>
temperature	<i>ondo</i>	温度	<i>wendu</i>
territorial water	<i>ryūkai</i>	领海	<i>linghai</i>
territory	<i>ryōdo</i>	领土	<i>lingtu</i>
theater	<i>gekijō</i>	剧场	<i>juchang</i>

* 参见附录 A 的 *yanguaeye shengtong* 洋学业生童, 以及 *chuyang xuesheng* 出洋学生。

** 参见附录 F 的音译词 *oufubebian* 奥伏赫变。

*** 参见附录 A 的 *dianbao* 电报; *dianxin* 电机信; *dianqixin* 电气信; *tongxianxin* 通线信; *xintongxian* 信通线等。

**** 参见附录 F 的 *delifeng* 得利风与 *delifeng* 得律风。

thermometer	<i>kunshohari</i>	寒暑针*	<i>hanshuzhen</i>
thyroid gland	<i>kōjōsen</i>	甲状腺	<i>jiashuang xian</i>
tractor, tractor truck	<i>ken'insha</i>	牵引车	<i>qianyin che</i>
trade deficit	<i>nyūchō</i>	入超	<i>ruchao</i>
trade law	<i>shōhō</i>	商法	<i>shangfa</i>
trade surplus	<i>shūchō</i>	出超	<i>chuchao</i>
train	<i>ressha</i>	列车**	<i>lieche</i>
tram	<i>densha</i>	电车	<i>dianche</i>
transformer	<i>hen'atsuki</i>	变压器	<i>bianya qi</i>
treatise, dissertation	<i>ronbun</i>	论文	<i>lunwen</i>
trench mortar	<i>hakugekihō</i>	迫击炮	<i>pojipao</i>
trend, tendency	<i>dōkō</i>	动向	<i>dongxiang</i>
truce, armistice	<i>kyūsen</i>	休战	<i>xiuzhan</i>
trust	<i>shintaku</i>	信託***	<i>xintuo</i>
tuberculosis	<i>kekaku</i>	结核	<i>jihe</i>
tutor, teacher	<i>dōshi</i>	导师	<i>daoshi</i>
type	<i>ruikei</i>	类型	<i>leixing</i>
ulcer	<i>kuiyō</i>	溃瘍	<i>kuiyang</i>
ultimatum	<i>saihotsūchō</i>	最后通牒	<i>zuihou tongdie</i>
ultrashortwave	<i>chōtanpa</i>	超短波	<i>chao duanbo</i>
unknown quantity	<i>michisū</i>	未知数	<i>weizhi shu</i>
Ursa major	<i>ōkumaza</i>	大熊座	<i>daxiong zuo</i>
Ursa minor	<i>kogumaza</i>	小熊座	<i>xiaoxiong zuo</i>
use value	<i>shiyō kachi</i>	使用价值	<i>shiyong jiazhi</i>
usury	<i>kōrigashi</i>	高利贷	<i>gaoli dai</i>
uvula	<i>kan'yōsui</i>	悬雍垂	<i>xuanyongchui</i>
vacuum	<i>shūnkū</i>	真空	<i>zhenkong</i>
vacuum tube	<i>shūnkūkan</i>	真空管	<i>zhenkong guan</i>
vapor, steam	<i>jōku</i>	蒸气	<i>zhengqi</i>
vein	<i>jōmyaku</i>	静脉	<i>jingmai</i>
ventilator, fan	<i>senpūki</i>	扇风机	<i>shanfengji</i>
view, prospect	<i>tenbō</i>	展望	<i>zhanwang</i>
viewpoint	<i>kanten</i>	观点	<i>guandian</i>
vocation	<i>gyōmu</i>	业务	<i>yewu</i>
volume	<i>taiseki</i>	体积	<i>tiji</i>
vote, decision	<i>hyōketsu</i>	表决	<i>biaojue</i>
voting, polling	<i>tōhyō</i>	投票	<i>toupiao</i>
vow, oath	<i>sensei</i>	宣誓	<i>xuanshi</i>
warm current	<i>danryū</i>	暖流	<i>nuanliu</i>
water-supply line	<i>jōsuidō</i>	上水道	<i>shang shuidao</i>
whole	<i>sōtai</i>	总体	<i>zongti</i>

* 参见附录 A 的 *hanshubiao* 寒暑表。

** 参见附录 A 的 *huoche* 火车。

*** 参见附录 D 的 *xinyong* 信用。

woodcut	<i>hanga</i>	版画	<i>banhua</i>
workers, staff	<i>shokkō</i>	职工	<i>zhigong</i>
works (writings, artwork)	<i>sakuhin</i>	作品	<i>zuopin</i>
workshop	<i>kōyō</i>	工场	<i>gongchang</i>
year, annual	<i>nendo</i>	年度	<i>niandu</i>
zoological garden	<i>dōbutsujō</i>	动物场*	<i>dongwuchang</i>
	<i>dōbutsuen</i>	动物园	<i>dongwuyuan</i>
zoology	<i>dōbutsugaku</i>	动物学	<i>dongwuxue</i>

* 参见附录 A 的 *dongwuyuan* 动物园。

附 录 C

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

日语拉丁化	汉字	汉语拼音	英语
<i>baai</i>	场合	<i>changhe</i>	case, occasion
<i>bamen</i>	场面	<i>changmian</i>	scene
<i>basho</i>	场所	<i>changsuo</i>	place, scene, setting
<i>benjo</i>	便所	<i>biensuo</i>	toilet, lavatory
<i>bihin</i>	备品	<i>beipin</i>	equipment, parts, fixtures
<i>bushidō</i>	武士道	<i>wushi dao</i>	bushido
<i>chōsei</i>	调制	<i>taozhi</i>	preparation, modulation
<i>daihon'ei</i>	大本营	<i>dabenyīng</i>	headquarters
<i>fukeiki</i>	不景气**	<i>bu jingqi</i>	recession, slump, gloom
<i>fukumu</i>	服务	<i>fuwu</i>	service
<i>fukushokubutsu</i>	副食物	<i>fushi wu</i>	supplementary food, groceries
<i>fukushū</i>	复习	<i>fuxi</i>	review, practice
<i>geta</i>	吉地	<i>jidi</i>	wooden clogs
<i>hamon</i>	破门	<i>pomen</i>	expulsion, excommunication
<i>hashutsujo</i>	派出所	<i>paichusuo</i>	police station, branch office
<i>hoken</i>	保健	<i>baojian</i>	health, hygiene
<i>hōshin</i>	方针	<i>fangzhen</i>	policy, direction, guiding principle
<i>hyōgen</i>	表现	<i>biaoxian</i>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ichiranhyō</i>	一览表	<i>yilanhao</i>	table, list
<i>jūrikisha</i>	人力车***	<i>renliche</i>	rickshaw
<i>keishō</i>	化妆	<i>huazhuang</i>	makeup
<i>keishōhin</i>	化妆品	<i>huazhuangpin</i>	cosmetics

* 若干词条被确认为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并被重新放在附录 D, 除此以外, 本词汇表严格遵循高、刘二人的发现(第 82—83 页), 这些发现所属的范畴乃由高、刘命名为“前现代的日语创造的新词”, 即, 抵达现代汉语而不必直接相关于欧洲语言的“汉字”外来词。

** 参见附录 D 的 *jingqi* 景气。亦请参见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对该词的讨论, 第 222 页。

*** 参见附录 A 的 *dangyangche* 东洋车, 或者 *yangche* 洋车。第四章解读老舍小说《骆驼样子》时, 相关地论及后一个词。

<i>kobetsu</i>	个别*	<i>gebie</i>	individual, singular
<i>kokufuku</i>	克服	<i>kefu</i>	overcome
<i>koshō</i>	故障	<i>guzhang</i>	obstacle, hitch
<i>kyori</i>	距离	<i>juli</i>	distance, interval
<i>minarai</i>	见习	<i>jianxi</i>	apprenticeship, probation
<i>minogami</i>	美浓纸	<i>meinongzhi</i>	<i>Gifu</i> paper (decorative)
<i>mokuhyō</i>	目标	<i>mubiao</i>	goal
<i>monogo-tari</i>	物语	<i>wuyu</i>	story, tale
<i>naifuku</i>	内服	<i>neifu</i>	oral ingestion (of medicine)
<i>naiyō</i>	内容	<i>neirong</i>	content
<i>naiyō</i>	内用	<i>neiyong</i>	internal use, private, classified
<i>ninka</i>	认可	<i>renke</i>	recognition, approval
<i>rōnin</i>	浪人	<i>langren</i>	masterless samurai, wanderer
<i>rensō</i>	联想	<i>lianxiang</i>	association (of ideas)
<i>sanzūsha</i>	三轮车	<i>sanzunche</i>	three-wheeled cart, trishaw
<i>shibu</i>	支部	<i>zhibu</i>	branch office, local chapter, party branch
<i>shiten</i>	支店	<i>zhidian</i>	branch store
<i>shoho</i>	初步	<i>chubu</i>	beginning, rudimentary
<i>shōjō</i>	症状	<i>zhengzhuang</i>	symptoms
<i>shōjosaku</i>	处女作	<i>chunü zuo</i>	literary debut
<i>shokei</i>	处刑	<i>chuxing</i>	execute, punishment
<i>shūdan</i>	集团	<i>jítuan</i>	group, corporation
<i>shūkyō</i>	宗教	<i>zongjiao</i>	religion
<i>tadashi-gaki</i>	但书	<i>danshu</i>	proviso
<i>tetsuzuki</i>	手续	<i>shouxu</i>	procedures
<i>torishimari</i>	取缔	<i>qudi</i>	outlaw
<i>uchikeshi</i>	打消	<i>daxiao</i>	cancel
<i>yōso</i>	要素	<i>yaosu</i>	element, factor
<i>yōten</i>	要点	<i>yaodian</i>	point, gist

* 参见附录 B 的 *kotai* 个体, 以及附录 D 的 *kojin* 个人。

附 录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英语	日语 拉丁化	汉字	汉语拼音	古汉语用法对照
absolute	zettai	绝对	juedui	一、《镜花缘》第七七回:“春辉道,长春对半夏,字字工稳,竟是绝对”,谓绝妙的对仗。二、清李渔《奈何天·闹对》:“天生绝对,佳人才子”,谓最佳配偶。三、唐张翥《游仙窟》:“比目绝对,双凫失伴,日日衣宽,朝朝带缓”,谓不能成双。
accounting, accountant	kaikai	会计*	kuaiji	一、《周礼·地官·舍人》:“岁终则会计其政”,谓核计,计算。二、《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日会计当而已矣”,谓管理财物及出纳等事。三、《史记·夏本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谓古天子大会诸侯,计功行赏。
activity	katsudo	活动	huodong	一、宋文祥《和萧秋屋韵》:“星辰活动惊歌笑,风露轻寒敌拍浮”,指物体运动。二、《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谓灵活,不固定。三、《红楼梦》第九五回:“见妙玉略有活动,便起身拜了几拜”,谓动摇。四、元刘坝《隐居通议·骈俪三》:“所病者,层砌堆叠而乏疏畅活动之工”,指言语生动活泼。五、《醒世恒言·一文钱隙造奇冤》:“那杨氏三十六岁,貌颇不丑,也肯与人活动,只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却不敢明当做事”,谓与人偷情。

*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指的是这样一些古汉语复合词,它们被日语用来翻译欧洲的现代词语,又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根据我在附录前言部分所解释的“表意符合”原则,以及我在鉴别外来词词条时所使用的新的资料来源,本部分词条的总数是高,刘二人原来提供的词汇表(以星号为标记)的四倍。

adminis- tration	gyōsei	行政	xing zheng	《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谓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现代汉语使用的“行政”的名词形式可能来自日语 <i>gyōsei</i> ）
agency	dairi	代理	daili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义与天之道有 出·入·休·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指日月更替为治。（参见“agent”，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代理事的”。）
alliance	dōmei	同盟	tong meng	《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指古代侯国歃血为誓，缔结盟约。后泛指国与国共缔盟约，亦指人与人成密友，结伴。
allotment	bunpai	分配	fenpei	一、《左传·昭公二十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唐孔颖达疏：“声之清浊，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圣人配于五方，官居其中，商，角，徵，羽，分配四方”，谓分别相配，配合。二、《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谓按一定标准分给。（参见“allot”，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分派”。）
analysis	bunseki	分析*	fenxi	一、《汉书·孔安国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谓分开，区分。二、《后汉书·马援传》：“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悉曲折，昭然可晓”，谓分解辨析。三、《旧唐书·刘君良传》：“大业末，天下饥谨，君良妻劝其分析”，谓分家。四、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谓分割，离析。五、《宋书·谢灵运传》：“于时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谓离别，分离。六、《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张千、李万被这妇人一哭一诉，就要分析几句，没处插嘴”，谓申辩，辩白。
apply, application	shunsei	申请	shenqing	《晋书·刘毅传》：“前已口白，谨复申请”，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说明理由，提出请求。又见《新唐书·张洎传》：“朝廷震动，即日下诏罢洎为武昌军节度使，三贬绣州司户参军。全忠为申请，诏听使便。”
appoint- ment	yoyaku	预约	yuyue	唐李商隐《忆雪》诗：“预约延枚酒，虚乘访戴船”，谓事先约定。又见，宋侯寘《风入松》词：“锦笺预约西湖上，共幽深，竹院松庄。”

approach	sekkin	接近	jiejin	一、《吕氏春秋·知接》：“智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谓所见不远。二、《后汉书·西域传·车师》：“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谓关系亲近。
arithmetic	sanyutsu	算术	suanshu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恢）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谓数学的一个分科，论数的性质，关系及其计算方法。
army	rikugun	陆军	luyun	《晋书·宣帝纪》：“若为陆军以句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谓陆地作战的军队。
art	geiyutsu	艺术	yishu	《后汉书·孝安帝记》：“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泛指各种技术技能。
artistic conception	ishō	意匠	yijiang	唐杨炯《〈王勃集〉序》：“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气于文枢”，又见宋陆游《题严州王秀才山水枕屏》诗：“杜君落笔写岷嶓，意匠自到非身过。伟哉千仞天相摩，谷裏人家藏绿萝”，谓作文、绘画的精心构思。
aspect	hōmen	方面	fangmian	一、《后汉书·冯异传》：“（异）受任方面，以立微功。”李贤注：“谓西方一面专以委之”，指一个地方的军政要职或其长官。二、《后汉书·逢萌传》：“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谓使者曰，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谓方向。
authority	ken' i	权威	quanwei	《吕氏春秋·审分》：“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指权力，威势。又见《北史·周纪上论》：“昔者水运将终，群凶放命，或权威震上，或衅逆滔天。”
autocracy	sensei	专制	zhuanzhi	一、《左传·昭公十九年》：“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指控制，掌管。二、《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赛，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又见《韩非子·亡征》：“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谓独断专行。
autonomy	jichi	自治	zizhi	一、《史记·陈涉世家》：“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谓自行管理或处理。二、《淮南子·说言训》：“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谓修养自身的德性。三、《尹文子·大道上》：“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谓自然安治。四、《汉书·张禹传》：“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犹自肯。（在丁题良年的《万国公法》中用来翻译英语“self-government”[Masini, p. 222].）

bachelor	<i>gakushi</i>	学士*	<i>xueshi</i>	一、《周礼·春官·乐师》：“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注“学士，国子也”，谓在学的贵族子弟。二、《庄子·盗跖》：“摇唇鼓舌，搬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上，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做孝弟，而傲享于封侯富贵者也”，指文士。三、官名，始于魏晋六朝，主掌典礼，编纂，撰述诸事。其后各朝代皆置有学士之官。
bail, bond	<i>hoshaku</i>	保释	<i>baoshi</i>	清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下：“天成见盗妇色美，力为保释”，谓请求释放被拘押者，并担保其随时接受传训或不再犯罪。
bankruptcy	<i>hasan</i>	破产	<i>pochan</i>	《史记·孔子世家》：“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谓丧失全部财产。
base	<i>kichi</i>	基地	<i>jidi</i>	《北史·魏临淮王谭传》：“(端)位大行台尚书，华州刺史。性疏佷，颇以基地骄物，时论鄙之”，犹门第，地位。
battle, make war	<i>sakusen</i>	作战	<i>zuozhan</i>	《孙子》有《作战》篇。指军队之间的敌对行动。
budget	<i>yusan</i>	预算*	<i>yusuan</i>	宋叶适《上宁宗皇帝札子》：“今陛下申令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已就强矣”，谓预先计算，事先估计。
business	<i>igyō</i>	营业	<i>yingye</i>	一、《三国志·吴志·骆统传》：“百姓虚竭，嗷然愁忧，愁忧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谓营谋生计。二、《儒林外史》第二四回：“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业”，谓职业。
capital	<i>shihon</i>	资本	<i>ziben</i>	宋何适《春渚纪闻·苏刘互谏》：“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谓经营工商业的本钱。(参见“母财”，严复用之翻译“capital”，见于《原富》，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 <i>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 1901—1902年的中译本)
cease-fire	<i>teisen</i>	停战	<i>tingzhan</i>	清平步青《震外摺眉·时事·彭尚书奏折》：“三月十一日停战，华兵拔队齐回”，指交战双方停止作战。
century	<i>seiki</i>	世纪	<i>shiji</i>	记录帝王世系之书，如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chairman	<i>shuseki</i>	主席*	<i>zhuxi</i>	一、《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箴，无切肉，又不置箸。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应劭注：“尚席，主席者”，谓主持宴席者。二、《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自己主席相陪”，指宴席中的主人座位。三、《金史·食货志一》：“寺观主席亦量其费而鬻之”，指寺观的主持。
chance	<i>gūzen</i>	偶然	<i>ouran</i>	一、《后汉书·儒林传刘昆》：“诘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谓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生的。二、唐元稹《刘氏馆集隐客》诗：“偶然沽市酒，不越四五升”，谓问或，有时候。(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偶然的”。)

China	shuna	支那	zhina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师资道》：“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又见：《宋史·外国传六·天竺》：“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徒囊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
circulation	ryūtsū	流通	liutong	一、《尸子》卷上：“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流通万物，仁也”，又见《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三郡清静，边路流通”，谓流传通行，不停滞。二、汉桓宽《盐铁论·通有》：“山居泽处，蓬蒿烧埽，财物流通，有以均之”，特指商品，货币流传。
citizen	kokumin	国民	guomin	《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谓一国或藩封所辖百姓。
civilization	bummei	文明*	wenming	一、《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指文采光明。二、《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谓文德辉耀。三、前蜀杜光庭《贺黄云表》：“柔远俗以文明，偃凶奴以武略”，谓文治教化。四、汉焦贛《易林·节之颐》：“文明之世，错锋铸镞”，谓文教昌明。五、《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犹明察。
class (social)	kaikyū	阶级*	jieji	一、唐陆龟蒙《野庙碑》：“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指台阶。二、汉王符《潜夫论·班禄》：“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指尊卑上下的等级。三、《旧唐书·高宗纪上》：“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指官的品位，等级。四、《朱子语类》卷一〇三：“然为学自有许多阶级，不可不知也”，谓阶段，段落。
classics, classical	koten	古典	gudian	一、《汉书·王莽传》：“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又见《隋书·地理志上》：“（汉高祖）扫清祸乱，矫奏身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谓古代典章制度。二、《后汉书·樊准传》：“（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于古典，游意经艺”，谓典籍。
common, together	kyōdō	共同	gongtong	一、《孟子·梁惠王上》：“古之人，与民偕乐，故乐也”，汉赵岐注：“古言之贤君，与民共同其所乐，故能乐之”，犹言一同。二、《前汉书平话》卷上：“刘武受诏牌金帛了，即请宋公达、李德、程彦雄共同商议”，指大家一起（做）。

comprehension	ryōkai	领会*	ryōkai	一、晋向秀《思旧赋》：“托运过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李善注引司马彪曰：“领会，言人运命，如衣领之相交会，或合或开。”谓遭遇。二、《广弘明集二十·南朝梁简文帝庾严旻法师成实论义疏序》：“于是标撮领会，商榷异端，删夷浮诡，搜聚贞实，造百有二品，以为斯论”，谓体会。
concrete	guta	具体*	guta	《孟子·公孙丑》：“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谓大体具备。
condition	jōken	条件	jōken	一、《北史·郎基传》：“遂条件申台省，仍以情量事科处，自非极刑，一皆决放”，谓逐条逐件。二、唐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内外官有冗员及百司有不急之费，委中书门下即商量条件，停减闻奏”，谓为某事而提出的要求或标准。
confession	jihaku	自白	jihaku	《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指自我表白。
consciousness	ishiki	意识	ishiki	一、汉王充《论衡·实知》：“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又见《北齐书·文宣帝纪》：“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袖刀斩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谓见识。二、宋王明清《挥尘后录》卷二：“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指先人之见。
constitution	kenpō	宪法	kenpō	一、《集韵·去愿》：“《周礼》：县法示人曰宪法。后人因谓宪为法”，谓公布法令。二、《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谓法典，法度。
construct, construction	kōzō	构造*	kōzō	一、《后汉书·徐璆传》：“张忠怨璆，与诸阉官构造无端，璆遂以罪征”，又见《宋书·恩幸传序》：“构造同异，兴树祸隙”，犹捏造。二、《三国志·魏书·陈留王奂传》：“癸巳，诏曰：前逆臣钟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逼胁众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惶”，谓人为地造成某种气氛或局面。三、明何景明《略阳县迁建庙学记》：“今兹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构造维新，地复其旧”，谓结构。
contact	renraku	连络	renraku	《旧唐书·朱敬则传》：“分山裂河，设磐石之固，内守外御，有堆城之基。连络遍于域中，胶葛尽于封内”，犹组织联系。又见《红楼梦》第四回：“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conversation	kaiwa	会话	kaiwa	唐无名氏《玉泉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寺僧，属其匆遽不暇留连’”，又见宋欧阳修《与吴正肃公书》：“前约临行少留会话，终不克遂，至今为恨”，谓聚谈。
copy, duplicate	fukusha	复写	fukusha	清叶廷珩《吹网录·石林家训》：“跋语论士大夫作小说云云，与《避暑录话》中一条全文无异……是《录话》复写此书跋语，非此书跋语删取《录话》之文也”，谓重复抄录。

countless	<i>musū</i>	无数	<i>washu</i>	一、《东观汉记·张堪》：“珍宝珠玉委积无数”，言无法计算。二、《周礼·春官·宗作》：“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又见《礼记·礼器》：“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上三，食力无数”，指没有限定的数量或规定的次数。
course, curriculum	<i>katei</i>	课程 ¹	<i>kecheng</i>	一、《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唐孔颖达疏：“以教护课程，必君子临之，乃得依法制也”，谓做事、学习须遵循的规定进程。二、《旧唐书·职官志二》：“（刑部比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白僚俸料，公廩，贍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指交纳税物的限期。三、《金史·孙铎传》：“铎上言：‘民间钞多，宜收斂。院务课程及诸窠名钱须要全收交钞’”，指按税率缴纳的赋税。四、宋刘昌诗《芦浦笔记·白玉楼赋》：“惟五城一睹之珍，三献不逢之宝，盖于此山积而云骈。然后大匠课程，群工谨度，琢磨薏瑛，斗珪叠璐”，指规划工程。五、清曹寅《真州述怀奉答徐道积编修玩月见寄原韵》：“课吏不课程，百里半九十。读书不读律，知一二乃失”，指考核工作进程。
court of law	<i>hōtei</i>	法庭	<i>futing</i>	唐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柄，乃正法庭”，指孔庙正殿。（参见附录 A 的 <i>fayuan</i> 法院）
criminal law	<i>keishō</i>	刑法	<i>xingfa</i>	《国语·鲁语上》：“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对刑罚规范的总称。又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贯汝鬼神，慢弃刑法。”
criticism	<i>hukan</i>	批判	<i>pipan</i>	一、宋司马光《进呈上官均奏乞尚书省札子》：“所有都省常程文字，并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挥施行”，谓批示判断。二、《朱子语类》卷一：“而今说大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谓评论，评断。
critique	<i>hihyō</i>	批评	<i>piping</i>	明李贽《寄答留都书》：“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谓评论，评判。（“Critics of books”在马礼逊那里 [1815] 被注释为“善批评书+”）
crop	<i>saku</i> <i>motsu</i>	作物	<i>zuowu</i>	南朝梁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笺》：“明公道冠二仪，勋超邃古，将使伊周奉饗，桓文扶毂，神功无纪，作物何称”，指造物，主宰万物之神。
culture	<i>bunka</i>	文化 ¹	<i>wenhua</i>	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见晋束晰《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谓文治教化。
deduction	<i>en'eki</i>	演绎	<i>yanyi</i>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谓推演铺陈。

delusion	mōsō	妄想	wangxiang	一、《楞严经》：“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佛家指幻念。二、唐白居易《饮后夜醒》诗：“直至晓来犹妄想，耳中如有管弦声”，谓胡思乱想。三、宋陆游《山园草木四绝句》之一：“少年妄想今除尽，但爱清樽浸晚霞”，谓不切实际或非分的想法。
detention	kōryū	拘留	juliu	《汉书·匈奴传赞》：“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谓扣留。
dictatorship	dokusan	独裁	ducai	《晋书·李绩载记》：“慕容恪欲以绩为尚书右仆射，玮憾绩往言，不许。恪屡请，乃谓恪曰，‘万机之事委之叔父，伯阳（李绩）一人，玮请独裁。’绩遂忧死”，谓独自裁断，独自决定。
digest	shōka	消化	xiaohua	一、《释名·释天》：“火，化也，消化物也”，谓熔化。二、晋王羲之《杂帖》：“前却食小差，数数便得疾，政由不消化故”，谓消化食物。（参见“Digest food in the stomach”，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胃中消化”。）
directur	riji	理事	lishi	一、《管子·问》：“官承吏之无田饷而徒理事者几何人”，谓治事，处理事务。二、官名。清宗人府设有理事官，掌宗室事。
disappear	shissō	失踪	shizong	唐裴铏《传奇·崔炜》：“炜因迷道失足，堕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谓寻不到踪迹。
dissection	kaibō	解剖	jiēpōu	《灵枢经·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谓把人或动植物体剖开。在19世纪，该词与 <i>jiēpōu</i> 解剖学或 <i>kaibōgaku</i> 一道，被从日语重新引入。
doctor, Ph.D.	hakase hakushi	博士*	boshi	一、《战国策·赵策二》：“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指博通古今的人。二、《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两汉太常属官，皆有博士。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掌以五经教子弟。晋又置国子博士，历代因之。唐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和律学博士及算学博士等，并为教授之官。明清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而以五经博士为圣贤后裔的世袭官。三、《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学音乐，屈博士，弄板调弦浑舍喜”，犹师傅。四、自唐以来，江南俗称卖茶者曰博士，见《封氏见闻记》。
doctrine	shugi	主义	zhuyi	一、《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谓谨守仁义。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谓对事情的主张。（参见附录E的后缀“-ism”）
dominate	shihai	支配	zhipei	《北齐书·唐邕传》：“及世宗崩，事出仓卒，显祖部分将士，镇压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显祖甚重之”，谓调派，安排。

dormitory	shukū sha	宿舍	sushe	《史记·张仪列传》：“(苏秦)乃言赵王，发金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谓住宿停留。
duty (military service)	kinmu	勤务	qinwu	《广韵·去御》：“刷，勤务也”，谓勤于事务，对事务用力多。
economy	keizai	经济*	jingji	一、《晋书·殷浩传》：“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又见唐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谓经世济民。二、清孔尚任《桃花扇·修札》：“写的激切婉转，有情有理，叫他不好不依，又不敢不依，足见世兄经济”，指治国的才干。(参见附录 A 的“富国策”与附录 F 的“爱康诺米”)
editor-in- chief	shuhitsu	主笔	zhubi	明沈德符《野获编史部大司狱内閣》：“每年初冬，朝审罪犯，俱太宰主笔，相仍已久”，谓主持判案。
education	kyōiku	教育*	jiàoyù	《孟子·尽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谓教诲培育。
effect	sayō	作用	zuoyong	一、《魏书·孙绍传》：“治乖人理，虽合必难，作用失机，虽成必败”，谓作为，行为。二、唐白居易《赠杨使君》：“时命到来须作用，功名未立莫思量”，谓努力。三、唐皎然《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谓着意加工刻画。四、《水浒传》第五十四回：“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口中念念有词”，谓施行法术。
encroach- ment, in- fringe- ment	shingai	侵害	qinhai	《韩非子·难三》：“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谓侵犯损害。又见《后汉书·李固传》：“白垩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
environ- ment	kankyō	环境*	huánying	一、《新唐书·土凝传》：“时江南环境为盗区，凝以疆弩据采石，张疑帜，遣别将弓颖，解和州之围”，指周围的地方。二、《元史·余闳传》：“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捍，而耕稼其中”，指环绕所管辖之区域。
erosion	shinshoku	侵蚀	qinshi	宋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至宝不侵蚀，终亦老侍从”，谓逐渐侵害使之毁坏。又见明王鏊《震泽长语·国猷》：“魏本都安邑，为秦侵蚀，不得已东徙大梁。”
ethics	riari	伦理	lunli	一、《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谓事物的条理。二、汉贾谊《新书·时变》：“商君违礼义，弃伦理”，谓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

examination, self-criticism	kenō	检讨*	jiǎntāo	一、唐白居易《与元九书》：“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谓查核，整理。二、官名。宋有史馆检讨。明时始属翰林院，仅次于编修，与修撰编修同谓之史官。
exception (to a rule)	reigai	例外	lìwài	宋沈作哲《寓简》卷五：“大臣例外受赐不辟，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指在规定、常规之外。
exchange, communicate	kōryū	交流	jiāoliú	汉班昭《东征赋》：“望河路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谓江河之水汇合而流。
exchange trade	kōkan	交换	jiāohuàn	《通典·兵十》：“其虞侯军职掌准初发交换”，指各自把已有之物交给对方。
experience	keiken	经验	jiāngyān	一、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二：“高平祁超……得重病。庐江杜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谓效验，验证。二、《红楼梦》第四二回：“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指亲身经历过。
experience	taiken	体验	tǐyàn	一、《朱子语类》卷一·九：“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说一段过又一段，何补！……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谓亲身领会。二、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二：“或斫倒人头，或伤中重，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验”，谓查核，考察。
expression (of emotion)	hyōjō	表情*	biàoqing	汉班固《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见意，屈节卑体尊事之者也”，谓表达感情，情意。
feudal	hōken	封建*	fēngjiàn	一、《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谓大立。二、《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谓封邦建国。又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蕃篱，屏立周室。”三、《史记·三王世家》：“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按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立郡县。但汉自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虽行封王侯建邦国之制，实集权于中央。
freedom	jīyǒu	自由*	zìyóu	《十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谓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早在1868年被用来翻译“freedom”[Masini, p.221]。该词经由来自日语的双程流传而在中国播扬甚广。）

frugal, frugality	setsu yaku 节约	jieyue	一、《汉书·辛庆忌传》：“庆忌居处恭俭，食欲被服尤节约”，谓节省，俭约。二、《墨子·节葬下》：“金玉珠玕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圻”，孙诒让间诂：“《淮南子·齐俗训》云：‘古者非不能竭国靡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竭束迫送死也。’许注云：‘纶，累也。束，缚也’，案，‘节约’与《淮南》书‘节束’义同。”三、《朱子语类》卷五二：“今学者要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此便是养气之道也”，谓节制约束。四、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傅武仲有《舞赋》，所少十分之七……岂武仲衍玉赋以为己作耶？抑后人节约武仲之赋，因序语而误以为玉作也”，犹节录。
government	seifu 政府	zhengfu	《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二年》：“前凤翔节度使石雄诣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求一镇以终老”，胡三省注：“政府，即谓政事堂”，唐宋时称宰相治理政务的处所为政府。
grammar	bungō 文法	wenfa	一、《史记·李将军列传》：“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原意为法律规则之属。二、元刘埙《隐居通议·文章四》：“公为文斩截峻刻，得左氏文法”，指文章的作法。（“文法”与“grammar”[?]的等同过程可以回溯到17世纪，当时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傅泛济(François Furtado)与李之藻合作从事一项译事，题为《名理探》。经由日语bungō—在黄遵宪1878年的作品有稽可查[Masini, p. 203]—“grammar”的现代含义开始替代其古汉语内涵。参见附录F的gelungma葛郎玛)
guerrilla warfare	yūgeki 游击	youji (游击)	一、官名，汉置游击将军，历代皆有之，为武散官，元废，明复置，为军之将官，后省称游击，清因之，位次参军，与今之中校相等。二、唐沈亚之《万胜冈新城记》：“是时李时亮为先锋将，使百骑游击左右”，谓或东或西，流动袭击。
guidance	shidō 指导	zhidao	汉荀悦《汉纪·宣帝记》：“囚人不胜痛，则饰安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谓指示教导，指点引导。
history	rekishi 历史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宋裴松之注：“（吴王）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hope	<i>kibō</i>	希望	<i>xiwang</i>	一、《周髀算经》：“立八尺表，以绳系表颠，希望北极中人景”，谓仰望，瞻望。二、《后汉书·李固传》：“初，顺帝时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谓揣测别人的意图而加以迎合。三、《后汉书·班固传》：“（匈奴）徒以畏汉威灵，逼悼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谓盼着出现某种情况或达到某种目的。四、《宋书·殷孝祖传》：“国乱朝危，宜立长中……而群小相煽，构造无端，贪利幼弱，竞怀希望”，谓欲望。
hothouse	<i>onshitsu</i>	温室	<i>wenshu</i>	《汉书·孔光传》：“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谓暖和的房舍。（参见附录 A 的教会汉语译法“暖房”，以及附录 B 的现代日语新词 <i>onshō</i> 温床 [hotbed or breeding ground]）
humanity	<i>jindō</i>	人道	<i>rendao</i>	一、《易经·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谓为人之道。二、《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谓人伦。三、《诗经·大雅·生民》：“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汉郑玄笺：“心体敬敬然，其左右所止化，如有人道感己者也”，谓男女交合。四、明冯梦龙《智囊补·明智·唐六如》：“唐六如知其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谓男性生殖器。五、佛教用语，犹言人界。
hypothesis	<i>kasetsu</i>	假说	<i>jiashuo</i>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大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谓虚构的事。
idealism	<i>yuishin</i>	唯心	<i>weixin</i>	《楞伽经》：“由自心执著，心似外境传，彼见所非有，是故说唯心”，佛教语，谓一切诸法（指万事万物），惟有内心，无心外之法。
image (portrait)	<i>shashin</i>	写真	<i>xiezhen</i>	一、北齐严之推《严氏家训·杂艺》：“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同童孺，皆知姓名也”，谓画人的真容。二、宋王安石《胡笳十八拍》之八：“死生难有却回身，不忍重看旧写真”，指肖像画。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浮丽而烦滥”，指如实描绘事物。（王韬 1879 年用之翻译“photography”：“写真即西法影像”[Masini, p. 208]。源出自这一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的其他相关的日语“汉字”词语包括镜写真，写真镜，写真器。参见附录 A “photography”的汉语对应词日影像，照像法，神镜等）

imagine	sōzō	想像	xiangxiang	一、《楚辞·远游》：“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谓缅怀，回忆。二、《列子·汤问》：“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像犹吾心也’”，犹设想。
implement, carry out	shikkō	执行	zhixing	一、汉刘向《列女传·黎庄夫人》：“黎庄夫人，执行不衰，庄公不遇，行节反乖”，谓坚守情操。二、唐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迫得所没庄宅，奴婢文案，及执行案典耿据，马元亮等检勘得实”，谓承办，经办。
improvement	kazen	改善	gaishan	《后汉书·独行列传·王烈》：“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谓改正过失或错误，回心向善。
incident	jihen	事变	shibian	《荀子·富国》：“万物得宜，事变得应”，泛指事物的变化。又见《诗序》：“吟咏情性，以及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index	sakuin	索引	suoyin	宋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赢赍兼负，以致其贖者，惟恐不及”，指用绳索牵引。
individual	kojin	个人	geren	宋陈亮《念奴娇·至金陵》词：“因念旧日山城，个人如画，已作中州想”，谓彼人，那人，多指所爱的人。又见清曹垂璩《忆秦娥·蟋蟀》词“个人今夜秋肠千结”。（参见附录 B 的 <i>kotai</i> 个体以及附录 C 的 <i>kobetsu</i> 个别）
inheritance	iden	遗传	yichuan	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犹留传。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易水》：“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钱此也”，指遗留下来的传闻。
injection	chūsha	注射	zhushu	《新唐书·陆贽传》：“上属辞，敏速若注射然”，谓倾泻，流射。
intentional, koi purposeful		故意	guyi	《杜甫诗》：“千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谓故人之情意。（参见“intentional”，在《马礼逊那里 [1815]》被注释为“固意做的”。）
intention, purpose	ito	意图	yitu	《元典章·刑部三·不义》：“（刘世英）意图升迁，强将李丑驴执缚，亲手用力割去囊肾，欲作行求之物。以人为货，重爵轻生”，谓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计划。
invasion, invade	shin ryaku	侵略	qinlüe	《史记·五帝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张守节正义：“韩非子‘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让畔’也”，谓侵犯掠夺。
judgment, judge	hanketsu	判决	panjuce	一、《南史·孔觊传》：“醒时判决，未尝有差”，谓裁断，确定。二、《元典章·台制·内台》：“诸官府见回未决之事，监察御史不得辄凭告人饰词取人追卷，候判决了毕，果有违错，依例纠弹其罪”，指官府断案。

judiciary	shihō	司法	sifa	一、官名。两汉有决曹,臧曹掾,主刑法。历代皆有。如唐制在府曰法曹参军,在州曰司法参军。二、星官名。清恽敬《文昌宫碑阴录》:“《晋书·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与《天官书》‘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不同。《星经》又曰‘六曰司法’。”
knowledge	chishiki	知识	zhishi	一、《墨子·号令》:“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人里巷中”,谓相识之人。二、《南史·虞惊传》:“惊性敦实,与人知识,必相存访,亲疏皆有终始,世以此称之”,谓结识,交游。二、汉刘向《列女传·齐管妾媵》:“人已语君矣,君不知识邪”,谓了解,辨识。四、《坛经》:“能人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佛教文献中常把道德学问素养高的僧人或居士称为善知识,有时泛称听讲佛经的听众。
labor	rodō	劳动	laodong	一、《庄子·让王》:“春耕种,形足以劳动”,谓操作,活动。二、《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诸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氏羌”,谓使之不安宁。三、三国魏曹植《陈审举表》:“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劳动蛮驾暴露于边境哉”,谓烦劳。四、《红楼梦》第四二回:“贾母笑道:‘劳动了。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犹言劳驾,多谢。
landlord	jinushi	地主	dizhu	一、唐郎士元《春宴王补阙城东别业》诗:“山下占松当绮席,檐前片雨滴春苔,地主同声复同舍,留欢不畏夕阳催”,谓当地的主人,对客而言。二、《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神名。三、《元典章·刑部十八·宿藏》:“十拜驴等于贺二地内掘得埋藏之物,于所得物内,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于地内得者,依上令,得物之人与地主停分”,谓田地的主人。
law, rule	hosoku	法则	faze	一、《周礼·天官·大宰》:“二曰法则,以驭其官”,郑玄注:“法则,其官之制度”,谓制度,法度。二、《荀子·劝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谓准则,规则(参见附录 A 的 <i>guize</i> 规则)。三、《尉繚子·治本》:“帝王之君,谁为法则”,谓榜样,表率。四、《史记·周本记》:“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谓效法。五、《西游记》第十回:“盖因猴原是弼马温,在天上看养龙马的,有些法则,故此凡马见他害怕”,谓法术。

lecture	kōgi	讲义*	jiangyi	一、宋梅尧臣《闻临淄公薨》诗：“官为喉舌勋爵一品兮，经筵讲义尊兼匡”，谓讲说经义。二、讲说经义之书，为经筵进讲而作，亦有师儒讲学、汇录其说以成书者。如宋汤义《周义讲义》。
liberation	kaihō	解放	jiefang	一、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蒲裹而缠之，二月初乃解放”，谓解开，放松。二、《三国志·魏书·赵俨传》：“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感恩并著”，谓除罪释放。三、元贯云石《青江引·惜别》曲：“闲来唱会‘青江引’，解放愁和闷”，谓消释，融化。
machinery	kikai	机械*	jixie	一、《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器之巧者曰机械。二、《淮南子·原道训》：“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高诱注：“机械，巧诈也”。三、金蔡松年《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额上对新月独酌》：“自要生网中，低眉受机械”，谓桎梏，束缚。
manager	keiri	经理*	jingli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谓治理。二、《荀子·正名》：“心也者，道之主宰，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谓常理。
maneuver, drill	enshū	演习	yunxi	一、《新唐书·南诏传》：“大府上将曰演习，副曰演览”，官名。二、元汪元亨《沈醉东风·归田》曲之二：“薰陶成野叟情，铲削去时官样，演习会牧歌樵唱”，谓练习，温习使熟悉。
market	shijō	市场	shìchāng	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每阅市场，登酒肆，逢人即与相喜”，商品买卖的场所。
material	shuryō	材料	cailiao	一、宋苏轼《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一面置场和买材料烧造砖瓦”，谓用来造成品之物。二、元张可久《庆东原·次马致远先辈韵》曲：“山容瘦，木叶凋。对西窗尽是诗材料”，谓写作素材。
matter	bushitsu	物质	wuzhi	金刁白《物质》诗：“物质方固定，营营止自疲”，谓物的形体。
meaning, signify	imi	意味*	yiwèi	《敦煌变文集·欢喜国王缘》：“无限难思意味长，速须觉悟礼空王”，谓意境，趣味。又见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大抵句子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
means	shudan	手段*	shouduan	宋苏轼《与循守周文之书》之二：“郑君知其俊敏，笃同学，观所为诗文，非止科场手段也”，谓本领，技巧。
memory	kioku	记忆	jiyi	《隋书·儒林传何妥》：“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谓记得，不忘。
metaphysical	keijijō	形而上	xing'ershang	《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谓无形，抽象。

method	hōhō	方法	fangfa	一、《墨子·天志中》：“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谓测定方形之法。二、《朱子语类》卷一一七：“伯丰有才气，为学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谓办法，门径。三、唐张籍《书怀》诗：“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谓方术，法术。
military affairs	gunji	军事	junshi	《史记·律书》：“会高祖庆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羸靡不备”，谓有关军旅或战争之事。（参见附录 B 的日语外来词 <i>heiji</i> 兵事）
military official	shikan	上官	shiguan	《书·立政》：“准人”，孔传：“准人，平法，谓上官”，即士师，掌刑狱之官。
monograph	tankō hon	单行本	danzhang ben	清叶廷珪《吹网录·胡注失收考异》：“散入时实有遗漏数条，幸有单行本在，尚可勘对而知”，谓单独印行之书籍，以别于丛书或散附它书而流行者。
monopoly	dokusen	独占	duzhan	唐方干《赠郑仁规》诗：“一石雄才独占难，应分二斗借人寰”，谓单独占有。
move, movement	undō	运动*	yundong	一、汉董仲舒《雨雹对》：“运动仰扬，更相动薄”，谓运行移动。二、汉陆贾《新语·慎微》：“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犹行动。三、《隋书·天文志上》：“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谓转动。四、《太平广记》卷二二六引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水饰图经》：“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谓人或动物在空间的移动。五、《朱子语类》卷一一五：“又如人作商，亦须先安排许多财本，方可运动。若财本不贖，则运动未得”，指为达到目的地而奔走活动。六、《英烈传》第三十回：“刘基便登将台，把五方旗号，按方运动，发出了三声号炮，击了三声鼓，诸将都台下听令”，谓挥动，舞动。七、《西游记》第三二回：“只看你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谓施展。
national learning	kokugaku	国学	guoxue	《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古代指国家设立学校。
nationwide	zengekoku	全国	quanguo	一、《孙子·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谓使敌国不战而降。二、三国魏曹植《又赠丁仪王粲》：“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谓保全国家。

nature, natural	shizen	自然*	ziran	《老子》：“人法地，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见《淮南子》：“因天地之自然”，谓宇宙万物之存在。二、《陈绎会诗谱》：“谢灵运以险为上，以自然为工”，谓浑成，诗不加雕琢。三、《晋书·裴秀传》：“生而岐嶷，长蹈自然”，谓无所勉强。（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将英语“natural right”翻译为“自然之权”时，“自然”一词被用作形容词[Masini, p. 221].）
navy	kaigun	海军	haijun	《资治通鉴·后梁均王龙德二年》：“人上工射义，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号，复称高丽王”，指在海上作战的军队。
necessity	hitsuyō	必要	biyao	《一刻拍案惊奇》卷二一：“即差快手李彪随著王爵跟捕贼人，必要擒获，方准销牌”，谓非此不行，不可缺少的。
negotiate, negotia- tion	kōshō	交涉*	jiāoshe	一、前蜀贯休《闻无相道人顺世》诗之五：“百千万亿偈，共他勿交涉”，又见宋范成大《病中闻西园新花已茂及竹径皆成而海棠亦未过》诗：“春虽与病无交涉，雨莫将花使破除”，谓关系，牵涉。二、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熙皞但言平生不喜与福建子交涉”，谓接触。
nerve	shinkei	神经	shenjing	《后汉书·方术列传》：“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对臆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窺也”，谓神秘奥妙之典籍。
normal (school)	shihan	师范	shifan	一、《北史·杨播传》：“恭德慎行，为世师范”，谓模范。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谓效法。三、元乔吉《金钱记》第二折：“若宋玉为师范，巫娥做生员”，指师傅，老师。
obey	fulaiji	服从	fucong	《礼记·内则》：“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孙希旦集解：“服从，谓服其事而从君也”，后以顺服，遵从为服从。
office, organ	hikan	机关*	jiguān	一、《汉书·艺文志》：“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谓机所以发，关所以闭，凡设有机件而能制动的机械。二、元戴善夫《风光好》第三折：“不想陶学士被某识破十二字隐语，用些机关，果中其计”，谓计谋。三、《素问·厥论》：“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指人体的关节。
only, sole	yuiitsu	惟 - * (唯一)	weiyi	《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见李邕《春赋》：“迈惟一之德”，专一之意。
opinion	iken	意见	yijian	一、《后汉书·王允王府仲长统列传》：“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谓见解。二、明李贽《与焦漪园人史书》：“盖意见太多，察白遂定，虽真师真友将如之何哉”，指不满的想法。三、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序：“虽然人之气质意见终有限，惟学问义理为无穷”，谓识见。

opportunity	kikai	机会*	jihui	唐韩愈《与柳中丞书》：“动皆中于机会”，又见《苏轼诗》：“东邻小儿识机会，半年外舍无不知”，谓可借以行事之时机。（在马礼逊那里[1815]被注释为“机会”。）
oppose	hantai	反对	fandui	一、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谓对偶一法。二、《明史·天文志一》：“东方见日早，西方见日迟……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时刻俱反对矣”，谓相反，对立。
optimistic	rakkan	乐观	leguan	一、《史记·货殖列传》：“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谓善于观察。二、唐韩愈《送王秀才序》：“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軻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谓喜欢观看。
order	meirei	命令	mingling	一、《后汉书·皇后纪上》：“时后前母妹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谓发令以使之。二、《楚辞·天问》：“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汉王逸注：“当此之时，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叹而美之也”，指帝王的诏命，朝廷的文书。
organize, organization	soshiku	组织	zuzhi	一、《吕氏春秋·先己》：“《诗》曰：‘执轡如组’”，汉高诱注：“组读组织之组。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犹良御执轡于手而调马口，以效万里也”，谓经纬相交，织作布帛。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谓织成的织物。三、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指诗文的造句构辞。四、元姜个翁《霓裳中序第一·春晚旅寓》：“园林罢组织，树树东风翠云滴”，谓安排，整顿。五、唐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谓机陷，犹罗织。
park	kōen	公园	gong yuan	《魏书·任城王传》：“（元澄）又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谓古代官家的园林。
peasant, farmer	nōmin	农民	nongmin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指务农的人。又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
pencil	enpitsu	铅笔*	qianbi	《东观汉记·曹褒传》：“寝则怀铅笔，行则诵文书”，指蘸铅粉涂改错字之笔。

perform	enshutsu	演出	yanchu	一、唐黄滔《谩笔牛赋》：“于是逐于搞成，随官演出，斯须于堕落之所，顷刻见下来之质”，谓演变而出，演变而来。二、《好逑传》第二回：“（铁公了）骑了一匹白马，只叫一人跟随，竟暗暗演出齐化门来，并不使一人知觉”，偷偷地出行。
period, era	jūda	时代	shidas	一、《宋书·礼志一》：“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指改朝易代中的某个时期。二、唐高适《酬马八效古见赠》诗：“时代种桃李，无人顾此君”，犹世代。
pessimism	hikun	悲观	beiguan	《法华经·八音门品》：“悲观及慈观，常愿常胆仰”，佛教语，五观之一。谓以慈悲之心观察众生，救人苦难。
phenomena	genshō	现象	xianxiang	《宝行经》：“观世音现象二十有九，文殊现象七十”，谓神，佛，菩萨等现身于人间。
physiology	seiri	生理	shengli	一、《百喻经·种熬胡麻子喻》：“昔有愚人，生食胡麻子，以为不美，熬而食之为美。便生念言，不如熬而种之，后得美者。便熬而种之。永无牛理”，谓生长繁殖之理。二、宋苏轼《问养生》：“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谓养生之理。三、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谓为人之道。（参见附录 E 的 seirigaku 生理学）
plan, project	keikaku	计划*	jihua	元无名氏《符金锭》第二折：“我忙回住宅，自有个计划，便着你花烛筵会宾客”，谓计策，打算。
poetry	shika	诗歌	shige	《汉书·礼乐志》：“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弦”，古代不合乐的为诗，合乐的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
police	keisatsu	警察	jingcha	一、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笈摩国》：“野象群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无间替”，谓警戒，监察。二、《金史·百官志》：“诸京警巡院使，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谓监督，检察。三、明陈敬宗《题晦庵先生书简墨迹卷后》：“乃知先生虽已造大贤之境，亦有资于警察涵养之功也”，谓警惕，省察。
politics	seiji	政治*	zhengzhi	一、《书·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谓政事得以治理，政事清明。二、《周礼·地官·遂人》：“掌其政治禁令”，指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三、《宋书·沈攸之传》：“至荆州，政治如在夏口，营造舟甲，常如敌至”，谓政事的治理。
popular	ryūhō	流行*	luxing	《孟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谓如水之流行，所及者远之意。
preach	sekkyō	说教	shuojiao	《汉书·儒林传·梁丘贺》：“待诏黄门数人说教侍中，以召贺”，谓讲解和教授。

prejudice	henken	偏见	pianjian	一、《汉书·杜邳传》：“疏戡独偏见，疑内亦有此类”，颜师古注：“邳自谓傍观而见之也”，谓从侧面看到。二、《庄子·齐物论》：“与物相刃相靡……不亦悲乎”，晋郭象注：“各信其偏见，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谓片面的见解。（参见“prejudice”，在《马礼逊那甲》[1815]被注释为“偏私之见”。）
present, attend a meeting	shusseki	出席	chuxi	《金瓶梅词话》第四九回：“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谓离开席位。
presentation, symbol	hyōshō	表象*	biaoxiang	一、《史记·龟策列传》：“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谓显露在外的征象。二、《后汉书·天文志》：“言其事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谓征兆。
production	seisan	生产	shengchan	一、《史记·货殖列传》：“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谓生计。二、明陶宗仪《辍耕录·传国玺》：“大师国王之孙曰拾得者，尝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产散失，家计窘极”，谓财产，产业。三、《三国志·吴书·骆统传》：“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民，亦多弃子”，谓生育。
professor	kyōju	教授*	jiàoshou	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谓以道艺传授生徒。二、学官名，宋代除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置教授传授学业外，各路的州、县学均置教授，掌管学校课试等事，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三、《京本通俗小说·西山窟鬼》：“吴教授看那人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对私塾先生的尊称。
progress	shinpo	进步*	jinbu	《传灯录》：“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谓逐次前进，如行步之不已。
propagation	denpa	传播	chuanbo	《北史·突厥传》：“官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又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高适》：“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为传播吟玩”。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一砚一镜，主人俱绘形作册，传播艺林”，谓广泛散布。（Masini [p. 162] 将现代汉语“传播”一词的名词用法归因于经由日本的双程流传）
proposition	meida	命题	mingti	宋王禹偁《赠别鲍秀才序》：“公出文数十章，即进士鲍生之作也。命题立意，殆非常人”，指所确定的诗义等的主旨。
props	dōgu	道具	daoju	唐严维《送桃岩成上人归本寺》诗：“道具门人捧，斋量谷鸟衔”，佛教语。指修行者用的衣物器具。又见宋惠洪《冷斋夜话·石岸僧》：“师寄此山如今几年矣，道具何在？伴侣为谁？”

prosperity, <i>keiki</i> economic boom	景气	<i>jingqi</i>	晋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景色，景象之意。（参见附录 C 的日语 <i>fukeiki</i> 不景气）
protest <i>kōgi</i>	抗议*	<i>kangyi</i>	一、《后汉书·卢植传》：“（董卓）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谓持论正直。二、《旧唐书·裴耀卿传》：“李怀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为意，佞抗议请讨。上深器之，前席慰勉”，指进言，献议。
psyche, <i>shinri</i> psychology	心理	<i>xinli</i>	一、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谓心中包含的情理。二、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中：“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者，正在于是”，理学名词，谓情与理。
reaction, <i>handō</i> reactionary	反动	<i>fandong</i>	《北齐书·杨愔传》：“高归彦初虽同德，后寻反动，以疏忽之迹尽告两王”，谓与原来的行动相反。
reaction, <i>hannō</i> response	反应	<i>fanying</i>	《后汉书·刘焉传》：“（赵贇）还共系璋（刘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谓响应反叛。
record <i>kiroku</i>	记录	<i>jilu</i>	一、《后汉书·班彪传》：“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一篇”，谓载录，记载。二、宋曾巩《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惟陈氏，其先虞舜之后，封于陈。春秋时，陈灭入楚，其子孙以国为氏，世为显姓，见于记录”，谓史册，记载的材料。三、唐崔致远《谢生料启》：“岂料司空相公俯念海人久为尘吏，特垂记录，继赐沾濡”，指记名在册，以备录用或治罪。
reform <i>kaizō</i>	改造*	<i>gaizao</i>	一、《通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改造则不易同也”，谓更选择也。二、《宋史·律历志》：“请改造新历”，谓重行制造。
registration <i>tōki</i>	登记	<i>dengji</i>	明李颐《条陈海防疏》：“兵部量发马价，于密，蓟，永三道，每道二万两，听专备前项买马造器及海防杂办一应必需之物，详为登记”，指记载在册籍上。
relation, <i>kankei</i> connection	关系	<i>guanxi</i>	《宣和遗事》前集：“这个阴阳，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谓关联，牵涉。又见《金瓶梅词话》第五六回：“哥教唱此词，关系心间之事，莫非想起过世的嫂子来。”
relativity <i>sōtai</i>	相对	<i>xiangdui</i>	一、《仪礼·士昏礼》：“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谓面对面，相向。二、唐韩愈《朝归》诗：“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谓相符，相称。三、宋张载《正蒙·太和》：“反者，屈伸聚散相对之谓”，指两相对应。四、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指依条件而存在或变化。

represent, delegate	daihyō	代表	daihiaō	明吴承恩《寿苏山陈公章词》：“郢中寡和，凤高《白雪》之篇，日下无双，代表青云之业”，谓显耀于一代。
republic	kyōwa	共和*	gonghe	一、《史记·周本纪第四》：“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韦昭注：“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二、《竹书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虢，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三、《汉书·古今人表》注：“师古曰‘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迁史》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
request	seikyū	请求	qingqiu	一、《史记·游侠列传》：“解（郭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以私事相求。二、《汉书·宣帝记》：“虚闻权谋单于请求和亲”，说明要求，希望得到满足。
resolution	giketsu	议决*	yijue	《汉书·酷吏传》：“延年按剑廷叱群臣，即日议决”，谓议论并作出决定。
retreat	taikyaku	退却	tuique	《后汉书·皇甫规传》：“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谓倒退，多用于军队在作战中向后撤退。
revolution	kakumei	革命*	geming	《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故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亡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谓天子受命于天，王者易姓。
romantic	rōman	浪漫	langman	宋苏轼《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诗之一：“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谓纵情、任意。（参见附录F的音译词“浪漫蒂克”）
rule, method	hōshiki	法式*	fashi	《史记·秦始皇本纪》：“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又见《管子·明法解》：“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
rule, regulation	kisoku	规则*	guize	一、唐李群玉《湘中别成威阍黎》诗：“全哉彼上人，冰雪凛规则”，指仪范。二、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九：“在京各衙门，仍照军民粮运见行规则，刊刷易知单册，给与纳户，以便交纳扣除”，谓规章，法则。
sanction	seisai	制裁	zhicai	《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及安重海用事，稍以法制裁之”，谓惩处，管束。
satire	fūshi	讽刺*	fengci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谓以婉言隐语相讥刺。
savings	chochūka	贮蓄	zhuxu	唐白居易《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大丈夫贮蓄材术，树置功利，畿基富贵，焯耀家邦”，谓储存，积聚。

science	kagaku	科学	kexue	宋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通”，谓科举之学。
secretary	kanji	干事	ganshi	《易·乾》：“贞固足以干事”，谓办事。又见宋朱熹《答黄子耕书》：“今日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现代汉语中 shi“事”的名词形式以及轻声用法，使得同形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干事”有别于其动词形式。实际上，这两个复合词应被视为类似的表意词[homo-ideographs]，而不是同音词。）
self	jigo	自我	zìwǒ	一、《文选·陆机〈象上赋〉序》：“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指自己肯定自己。二、宋苏轼《戏书乐天身心问答后》诗：“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犹相，谓相偶。
society	shakai	社会	shehui	《东京梦华录》：“八月秋舍，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是”，又见《梦粱录》：“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下道”。《二程全书》亦有“乡民为社会”之语，谓里社之民，逢节日举行集会行赛之活动。（参见附录E的 shehuixue 社会学）
solve, solution	kaiketsu	解决	jiějué	一、汉王充《论衡·案书》：“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谓梳理清楚，作出决断。二、唐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年六十，尽明六经书，解决微隐，苏融雪释，郑玄至于孔颖达辈凡所为疏注，皆能短长其得失”，谓解释，疏通。
special	toku betsu	特别	tebie	《三国志平话》卷上：“吕布东北而进。数口，见桑麻地上特别”，谓不一般，与众不同。
speculation	tōki	投机	tōji	一、唐司空图《复安南碑》：“投机掘险，委劲符时”，谓设置有机件而能制动的器械。二、《新唐书·屈突通张公谨等传赞》：“投机之会，间不容穉”，谓切中时机。三、宋陈师道《和黄预病起》：“似闻药病已投机，半斗蛇妖顿觉非”，指两相契合。四、清徐大椿《洄溪道情·行医叹》：“要人世投机，只打听近日时医，贯用的是何方何味，试一·试偶然得效，倒觉得希奇”，指乘机牟利。五、《续传灯录·法光禅师》：“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机”，佛家语。谓契合佛祖心机，喻彻底大悟。

speech	enzetsu	演说*	yanshuo	一、《书·洪范》：“初一曰五行……威用六极”，(疏)：“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极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叙之，下文更将此九类而演说之”，谓引申其说。二、《莲社高贤传·慧远法师》：“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往上下，演说空苦无常无我之音”，谓阐述。三、清李渔《麴中楼·献寿》：“待兄弟手舞足蹈，演说一番，只当作一出戏文”，谓表演叙说。
square, plaza	hiroba	广场	guangchang	一、汉张衡《西京赋》：“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谓广阔的场地。二、宋王禹偁《看别鲍秀才序》：“其为学也，依道而据德，其为才也，通古而达变，其为识也，利物而务成。求之广场，未易多得”，谓人多的场合。
stage	butai	舞台	wutai	唐颜师古《隋遗录》：“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指供演出的台。又见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二：“泪脸补痕劳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
staple food	shushoku	主食*	zhushi	《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元年》：“使十食中黄门胡定自列”，胡三省注：“主食，主御食者也”，指主管君主膳食的官。
statistics	tokei	统计	tongji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古今书籍，统计一代，前后之藏，往往不过十万。统计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万”，谓总括的计算。
status, personal background	minbun	身份	shenfen	一、《宋书·王僧达传》：“固宜退省身份，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指出身，地位。二、明陶宗仪《辍耕录·写山水诀》：“树要有身份，画家谓之纽子，要折搭得中，树身各要有发生”，指模样，姿态。三、《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份来”，指手段，本领。四、《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那婆子)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些不伶俐的身份”，指行为，勾当。五、《金瓶梅词话》第二五回：“比杭州织来的花样身份更强十倍”，谓质地，质量。
stop, cease	teishi	停止	tingzhi	一、《梁书·武帝纪中》：“属车之间，免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指不再进行，不再实行。二、《周书·柳庆传》：“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谓住宿。三、元吴昌龄《张天师》第一折：“仙子，您直恁般慌速，便再停止一会儿也好”，指停留。
subject	shutai	主体	zhuti	《汉书·东方朔传》：“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指君主的统治地位。

sum total	sōkei	总计	zongji	一、《三国志·魏书·刘廙传》：“可以死效，难用笔陈”，裴松之注引《刘廙别传》：“岁课之能，二年总计，乃加黜陟”，谓总共计算。二、《宋史·外国传五·阇婆》：“有文吏三百余员，目为秀才，掌文本，总计货财”，犹统计。
supply	kyōkyū	供给	gonggi	一、《管子·地图》：“论功劳，行赏罚，不取蔽贤有私，供给军之求索”，谓以物资、钱财等给人而供其所需。二、唐杜甫《有客》诗：“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谓生活所需之钱物。
support	shiji	支持*	zhuchi	一、《淮南子·本经训》：“标林橛，以相支持”，谓支撑。二、《元典章·圣政二·均赋役》：“中书省官人每奏国家应办，支持浩大”，谓开支，供应。三、元萧德祥《杀狗劝夫》第二折：“他觉来我自支持他，包你无事”，谓对付，应付。四、《英烈传》第六五回：“徐达传令水陆三军一齐进战，以防贼众彼此支持”，指支援。五、元孟汉卿《魔合罗》：“不要你狂言诈语，花唇巧舌，信口支持”，谓说话不老实。六、元郑廷玉《后庭花》第四折：“好教我不解其中之意，起初道眼迷冀。他如今则把手支持，真个是哑子做梦说不的”，谓做出姿势。
teaching assistant	jokyō assistant	助教	zhujian	古代学官名。晋咸宁时设置，协助国子祭酒，博士教授生徒。其后除个别朝代外，国学中都设经学助教，称国子助教、太学助教、四门助教，广义助教等。
theory	riron	理论	lilun	一、晋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李宓》：“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谓说理立论。二、《水浒传》二十四回：“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谓据理辩论。
thought	shisō	思想*	sixiang	一、《公羊传·桓公二年》：“纳于大庙”，汉何休注：“庙之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谓想念，怀念。二、《素问·上古天真论》：“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谓思忖，考虑。
time	jikan	时间	shijian	一、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犹眼下，一时。二、《西游记》第四回：“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犹立即，马上。
topic(of conversation)	wadai	话题	huati	明无名氏《白兔记·团圆》：“贫者休要相轻弃，否极终有泰时，留与人间作话题”，谈话的題目。

toy	omocha	玩具	wanyu	明唐顺之《重修泾县儒学记》：“周衰，王道废缺……《易》象，《春秋》，十六国之乐，徒以夸于诸侯宾客，为古物玩具，而未尝以教诸弟了”，指供玩耍游戏的器物。
tradition	dentō	传统	chuantong	《后汉书·东夷传》：“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又见南朝梁沈约《立太子恩诏》：“守器传统，于斯为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序论上》：“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土名贤之训附之”，谓帝业、学说等世代相传。
traffic	kōtsū	交通	jiatong	一、《管子·度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谓交相通达。二、《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谓感通，感应。三、《韩诗外传》卷十：“渊恩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谓交往，往来。四、《汉书·江充传》：“（允）谄附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指勾结，串通。五、《百喻经·摩尼水瓮喻》：“昔有一人与他如通，交通未竟，夫从外来，即便觉之”，指交媾。
transition, interim	kato	过渡	guodu	宋苏轼《荆州十首》：“野市分漳闹，官帆过渡迟”，谓横越江河。
trust, credit	shin'yō	信用	xinyong	一、《左传·宣公十二年》：“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谓以诚信使用人。二、《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裴松之注引晋司马彪《续汉书》：“《石苞室讖》，妖邪之书，岂可信用？”谓相信，采用。
truth	shinri	真理	zhenli	南朝梁萧统《令旨解二谛义》：“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防解俗”，谓最纯真的道理，亦指佛法。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gosei	悟性	wuxing	宋赵师秀《送汤干》诗：“能文兼悟性，前是惠休身”，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诗固有定体，人各有悟性”，谓领会事物的能力。
unfold	tenkai	展开	zhankai	《朱子语类》卷十八：“欲致其知者，须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这个道理是如何，又推之于身，又推之于物，只管一层展开一层，又见得许多道理”，谓铺开，张开。
unique, special	tokuushu	特殊	teshu	晋夏侯湛《芙蓉赋》：“固陂池之丽观，尊终世之特殊”，谓不同一般。又见宋苏辙《谢改善作佐郎启》：“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进退之亦异。”
unit	tan'i	单位	danwei	《敕修清规日用规范》：“昏钟鸣，须先归单位坐禅”，谓禅位。

view, outlook	<i>kannen</i>	观念	<i>guannian</i>	唐魏静《禅宗永嘉集序》：“物物斯安，观念相续，心心靡间，始终抗节”，佛教用语，对特定对象或义理的思维和记忆。
violate, violation	<i>shinpan</i>	侵犯	<i>qinfan</i>	一、《史记·律书》：“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谓侵袭触犯。二、《朱子语类》卷九四：“只是那一个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谓抵触。
warehouse	<i>sōko</i>	仓库	<i>cangku</i>	《国语·晋语九》：“从者曰：‘邠郟之仓库实’”，贮藏粮食之处为仓，贮藏兵车之处为库。后即以仓库泛指贮存保管大宗物品的建筑物或场所。又见《史记·万石张敖列传》：“城郭仓库空虚。”
will	<i>ishi</i>	意志	<i>yuzhi</i>	《商君书·定分》：“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内心状态，常以语言或行动表现出来。
world	<i>sekai</i>	世界	<i>shijie</i>	一、《楞严经》卷四：“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教语。世犹指时间，界指空间。二、唐孟浩然《腊月八日子刺岳石城寺礼拜》诗：“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谓人间。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谓天下，江山。（请注意，“世界”与英文词“world”的等同过程，乃以日语 <i>sekai</i> 为中介，而且重要的是，“世界”一词的这一世界化过程，成功地取代了早期汉语对于时空界限的概念性命名过程，如 <i>tianxia</i> “天下”。参见附录 A 教会汉语将“international”译为 <i>wanguo</i> 万国，以及附录 B 后来出现的日语外来词替代词 <i>kokusei</i> 国际。）

附 录 E

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英语	日语拉丁化	汉字	汉语拼音
1. "anti-"	<i>han-</i>	反	<i>fan-</i>
anti-party	<i>hantō</i>	反党	<i>fandang</i>
counterrevolution	<i>hankakumei</i>	反革命	<i>fan geming</i>
oppose, counter	<i>hantai</i>	反对	<i>fandui</i>
reaction	<i>handō</i>	反动	<i>fandong</i>
2. "as"	<i>to-</i>	为	<i>-wei</i>
become	<i>to nuru</i>	成为	<i>chengwei</i>
believe, consider as	<i>to mitomeru</i>	认为	<i>renwei</i>
view as	<i>to minasu</i>	视为	<i>shuwei</i>
3. "class"	<i>kaikyū</i>	阶级	<i>jieji</i>
bourgeoisie	<i>shisan kaikyū</i>	资产阶级	<i>zichan jieji</i>
landlord class	<i>jinushi kaikyū</i>	地主阶级	<i>dizhu jieji</i>
peasant class	<i>nōmin kaikyū</i>	农民阶级	<i>nongmin jieji</i>
proletariat	<i>musan kaikyū</i>	无产阶级	<i>wuchan jieji</i>
propertied class	<i>yūsan kaikyū</i>	有产阶级	<i>youchan jieji</i>
<i>youchan jieji</i>			
4. "effect", "function"	<i>-sayō</i>	作用	<i>-zuoyong</i>
alienation	<i>ika sayō</i>	异化作用	<i>yihua zuoyong</i>
assimilation	<i>dōka sayō</i>	同化作用	<i>tonghua zuoyong</i>
psychological function	<i>shinri sayō</i>	心理作用	<i>xinli zuoyong</i>
spiritual effect	<i>seishin sayō</i>	精神作用	<i>jingshen zuoyong</i>
5. "era", "age"	<i>-jidai</i>	时代	<i>-shidai</i>
Atomic Age	<i>genshu jidai</i>	原子时代	<i>yuanzi shidai</i>
Bronze Age	<i>dōki jidai</i>	铜器时代	<i>tongqi shidai</i>
Iron Age	<i>tekki jidai</i>	铁器时代	<i>tieqi shidai</i>
Neolithic	<i>shin sekki jidai</i>	新石器时代	<i>xinshiqi shidai</i>
Paleolithic	<i>kyū sekki jidai</i>	旧石器时代	<i>jiushiqi shidai</i>
6. "-feeling"	<i>-kan</i>	感	<i>-gan</i>
aesthetic	<i>bikan</i>	美感	<i>meigan</i>

feeling			
anxiety	<i>kinchōkan</i>	紧张感	<i>jinzhang gan</i>
bad impression	<i>akkun</i>	恶感	<i>egan</i>
favorable impression	<i>kōkan</i>	好感	<i>haogan</i>
feeling, emotion	<i>jōkan</i>	情感	<i>qinggan</i>
impression of a literary work	<i>dokugokan</i>	读后感	<i>duhou gan</i>
sensitivity	<i>binkan</i>	敏感	<i>mingan</i>
sex appeal	<i>seikan</i>	性感	<i>xinggan</i>
superiority complex	<i>vāesukan</i>	优越感	<i>youyue gan</i>
7. "-ism"	<i>-shugi</i>	主义	-zhuyi
anarchism	<i>museifu shugi</i>	无政府主义	<i>wuzhengfu zhuyi</i>
capitalism	<i>shihon shugi</i>	资本主义	<i>ziben zhuyi</i>
communism	<i>kyōsan shugi</i>	共产主义	<i>gongchan zhuyi</i>
feudalism	<i>hōken shugi</i>	封建主义	<i>fengjian zhuyi</i>
humanism	<i>jinbun shugi</i>	人文主义	<i>renwen zhuyi</i>
imperialism	<i>teikoku shugi</i>	帝国主义	<i>diguo zhuyi</i>
individualism	<i>kojin shugi</i>	个人主义	<i>geren zhuyi</i>
militarism	<i>gunkoku shugi</i>	军国主义	<i>junguo zhuyi</i>
nationalism	<i>minzoku shugi</i>	民族主义	<i>minzoku zhuyi</i>
naturalism	<i>shizen shugi</i>	自然主义	<i>ziran zhuyi</i>
realism	<i>genjitsu shugi</i>	现实主义	<i>xianshi zhuyi</i>
romanticism	<i>rōman shugi</i>	浪漫主义	<i>langman zhuyi</i>
socialism	<i>shakai shugi</i>	社会主义	<i>shehui zhuyi</i>
state socialism	<i>kokka shakai shugi</i>	国家社会主义	<i>guojia shehui zhuyi</i>
national essentialism	<i>kokusui shugi</i>	国粹主义	<i>guocui zhuyi</i>
8. "-itis"	<i>-en</i>	炎	-yan
arthritis	<i>kansetsuen</i>	关节炎	<i>guanjie yan</i>
coronary inflammation	<i>shinzō-naimaku'en</i>	心脏内膜炎	<i>xinzang neimo yan</i>
encephalitis	<i>nōen</i>	脑炎	<i>nao yan</i>
enteritis	<i>chōen</i>	肠炎	<i>chang yan</i>
gastritis	<i>ien</i>	胃炎	<i>wei yan</i>
pleurisy	<i>rokumakuen</i>	肋膜炎	<i>lemo yan</i>
pneumonia	<i>haien</i>	肺炎	<i>fei yan</i>
tracheitis	<i>kikan'en</i>	气管炎	<i>qiguan yan</i>
9. "-ization"	<i>-ka</i>	化	-hua

arterial- sclerosis	<i>dōmyaku kōka</i>	动脉硬化	<i>dongmai yinghua</i>
automation	<i>jidōka</i>	自动化	<i>zidong hua</i>
beautification	<i>bika</i>	美化	<i>meihua</i>
centralization	<i>ichigenka</i>	一元化	<i>yi yuan hua</i>
colloquialization	<i>kōgoka</i>	口语化	<i>kouyu hua</i>
degeneration	<i>taika</i>	退化	<i>tuaihua</i>
electrification	<i>denki ka</i>	电气化	<i>dianqi hua</i>
formulism, formulaic	<i>kāshiki ka</i>	公式化	<i>gongshi hua</i>
generalization	<i>ippunka</i>	一般化	<i>yiban hua</i>
idealization	<i>risō ka</i>	理想化	<i>lixiang hua</i>
industrialization	<i>kagyō ka</i>	工业化	<i>gongye hua</i>
modernization	<i>gendai ka</i>	现代化	<i>xiandai hua</i>
nationalized	<i>minzoku ka</i>	民族化	<i>minzu hua</i>
pluralization	<i>tagenka</i>	多元化	<i>duoyuan hua</i>
popularization	<i>taishūka</i>	大众化	<i>dazhong hua</i>
protracted	<i>chōki ka</i>	长期化	<i>changqi hua</i>
scientific, scientized	<i>kagakuka</i>	科学化	<i>kexue hua</i>
softening	<i>naoka</i>	软化	<i>ruanhua</i>
specialization	<i>tokushuka</i>	特殊化	<i>teshu hua</i>
strengthening	<i>kyōka</i>	强化	<i>qianghua</i>
tree planting, greening	<i>ryōka</i>	绿化	<i>luhua</i>
weakening	<i>jakuka</i>	弱化	<i>ruohua</i>
10. "-line," "ray"	<i>-sen</i>	线	<i>-xian</i>
battleline	<i>sensen</i>	战线	<i>zhanxian</i>
branch line, feeder line	<i>shisen</i>	支线	<i>zhixian</i>
high-voltage power lines	<i>hō'atsusen</i>	高压线	<i>gaoya xian</i>
hunger line	<i>higasen</i>	饥饿线	<i>ji'e xian</i>
lifeline, lifeblood	<i>seimeisen</i>	生命线	<i>shengming xian</i>
radiation rays	<i>hōshasen</i>	放射线	<i>fangshe xian</i>
traffic corridor	<i>kōtsūsen</i>	交通线	<i>jiatong xian</i>
trunk line, main line, artery	<i>kansen</i>	干线	<i>ganxian</i>
ultraviolet ray	<i>shigaisen</i>	紫外线	<i>ziwai xian</i>

11. "method", "law"	-hō	法	-fa
analytic method	<i>bunsekihō</i>	分析法	<i>fenxi fa</i>
deductive method	<i>enekihō</i>	演绎法	<i>yanyi fa</i>
dialectics	<i>benshōhō</i>	辩证法	<i>bianzheng fa</i>
expressive mode	<i>hyōgenhō</i>	表现法	<i>biaoxian fa</i>
inductive method	<i>hunōhō</i>	归纳法	<i>guina fa</i>
synthesis	<i>sōgōhō</i>	综合法	<i>zonghe fa</i>
trigonometry	<i>sankakuhō</i>	三角法	<i>sanjiao fa</i>
12. "of"	-teki	的*	-de
artificial	<i>jin'iteki</i>	人为的	<i>renwei de</i>
fundamental	<i>konponteki</i>	根本的	<i>genben de</i>
historical	<i>rekishūteki</i>	历史的	<i>lishi de</i>
national	<i>minzokuteki</i>	民族的	<i>minzu de</i>
natural	<i>shizenteki</i>	自然的	<i>ziran de</i>
necessary	<i>hīszuzenteki</i>	必然的	<i>biran de</i>
of social intercourse	<i>shakōteki</i>	社交的	<i>shejiao de</i>
of the masses	<i>taishūteki</i>	大众的	<i>dazhong de</i>
open, overt	<i>hōkaiuteki</i>	公开的	<i>gongkai de</i>
scientific	<i>kagakuteki</i>	科学的	<i>hexuede</i>
secretive, covert	<i>himitsuuteki</i>	秘密的	<i>mimi de</i>
spontaneous	<i>jihutsuteki</i>	自发的	<i>zifa de</i>
13. "-on"	<i>ni-shite</i>	于**	-yu
about, relating to	<i>ni kanshite</i>	关于	<i>guanyu</i>
as for, about	<i>ni taishite</i>	对于	<i>duiyu</i>
based on	<i>ni motoshite</i>	基于	<i>jiyu</i>
owing to	<i>ni yotte</i>	由于	<i>youyu</i>
14. "-point"	-ten	点	-dian
focal point	<i>shōten</i>	焦点	<i>jiaodian</i>
important point, emphasis	<i>jūtem</i>	重点	<i>zhongdian</i>

* 近期对该冠词的讨论, 参见耿德华, *Rewriting Chinese*, p. 89, p. 305n24; 以及 Fogel, "Recen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 Borrowing," pp. 30-31.

** 对此后缀的讨论, 参见耿德华, *Rewriting Chinese*, pp. 217-218.

main point, gist	<i>yōten</i>	要点	<i>yaodian</i>
main point,	<i>chūiten</i>	注意点	<i>zhuyi dian</i>
purpose			
point of	<i>shuppatsuten</i>	出发点	<i>chufa dian</i>
departure			
viewpoint	<i>kantēn</i>	观点	<i>guandian</i>
15. "power"			
consumer	<i>-ryoku</i>	力	<i>-li</i>
buying power	<i>shōhiryoku</i>	消费力	<i>xiaofei li</i>
electric power	<i>denryoku</i>	电力	<i>dianli</i>
imagination,	<i>sōzōryoku</i>	想像力	<i>xiangxiang li</i>
imaginative			
power			
impetus	<i>dōryoku</i>	动力	<i>dongli</i>
labor,	<i>rōdōryoku</i>	劳动力	<i>laodong li</i>
manpower,			
workforce			
memory	<i>kiokuryoku</i>	记忆力	<i>jiyi li</i>
power, control	<i>shihai ryoku</i>	支配力	<i>zhipei li</i>
powers of	<i>hyōgenryoku</i>	表现力	<i>biaoxian li</i>
expression			
productivity	<i>seisan ryoku</i>	生产力	<i>shengchan li</i>
static	<i>seiriki</i>	静力	<i>jingli</i>
16. "problem",	<i>-mondai</i>	问题	<i>-wenti</i>
"question"			
international	<i>kokusai mondai</i>	国际问题	<i>guoji weni</i>
problem			
land problem	<i>tochi mondai</i>	土地问题	<i>tudi weni</i>
nationality	<i>minzokumondai</i>	民族问题	<i>minzu weni</i>
problem			
population	<i>jinkō mondai</i>	人口问题	<i>renkou weni</i>
problem			
social problem	<i>shakai mondai</i>	社会问题	<i>shehui weni</i>
17. "quality"	<i>-sei</i>	性	<i>-xing</i>
actuality	<i>genjitsusei</i>	现实性	<i>xianshi xing</i>
class character	<i>kaikyūsei</i>	阶级性	<i>jieji xing</i>
contingency,	<i>gūzensei</i>	偶然性	<i>ouran xing</i>
chance			
creativity,	<i>kōzōsei</i>	创造性	<i>chuangzao xing</i>
creativity			
distinctive	<i>tokusei</i>	特性	<i>texing</i>
quality			

extensiveness, wide-ranging	<i>kōhansei</i>	广泛性	<i>guāngfān xìng</i>
habituality	<i>shūkansei</i>	习惯性	<i>xíguàn xìng</i>
impenetrability	<i>fuku'nyūsei</i>	不可人性	<i>bùkěrén xìng</i>
importance	<i>jūyōsei</i>	重要性	<i>zhòngyào xìng</i>
inevitability	<i>hitsuzensai</i>	必然性	<i>bìrán xìng</i>
in principle	<i>gensoku sei</i>	原则性	<i>yuánzé xìng</i>
necessity	<i>hitsuuyōsei</i>	必要性	<i>bìyào xìng</i>
periodicity	<i>shūkisei</i>	周期性	<i>zhōuqī xìng</i>
possibility	<i>kanōsei</i>	可能性	<i>kěnéng xìng</i>
radioactivity	<i>hōshasei</i>	放射性	<i>fāngshè xìng</i>
reason	<i>risei</i>	理性	<i>lǐxìng</i>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i>kakumeisei</i>	革命性	<i>gémìng xìng</i>
seductiveness	<i>yūwakusei</i>	诱感性	<i>yòuhuò xìng</i>
sensibility, sensitivity	<i>kanjusei</i>	感受性	<i>gǎnshòu xìng</i>
sensitivity	<i>kansei</i>	感性	<i>gǎnxìng</i>
social nature	<i>shakaisei</i>	社会性	<i>shèhuì xìng</i>
traditional character	<i>dentōsei</i>	传统性	<i>chuántǒng xìng</i>
truth, authenticity, credibility	<i>shiriyōsei</i>	真实性	<i>zhēnshí xìng</i>
18. "rate"	<i>-ritsu</i>	率	<i>-lǜ</i>
efficiency	<i>hōritsu</i>	效率	<i>xiàolǜ</i>
	<i>nōritsu</i>	能率	<i>nénglǜ</i>
rate of production	<i>seisanritsu</i>	生产率	<i>shēngchǎn lǜ</i>
utilization ratio	<i>shiyōritsu</i>	使用率	<i>shíyòng lǜ</i>
19. "-scale", "type"	<i>-kei, -kata,</i>	型	<i>-xíng</i>
	<i>-gata</i>		
large-scale	<i>ōgata</i>	大型	<i>dàxíng</i>
medium-scale	<i>chūgata</i>	中型	<i>zhōngxíng</i>
model, typical example	<i>tenkei</i>	典型	<i>diǎnxíng</i>
new type	<i>shingata</i>	新型	<i>xīnxíng</i>
small-scale	<i>kogata</i>	小型	<i>xiǎoxíng</i>
standard type	<i>hyōjungata</i>	标准型	<i>biāozhǔn xìng</i>
streamlined type	<i>ryūsenkei</i>	流线型	<i>liúxiàn xìng</i>
	<i>ruikei</i>	类型	<i>lèixíng</i>
20. "society"	<i>-shakai</i>	社会	<i>-shèhuì</i>

capitalist society	<i>shuhon shakai</i>	资本社会	<i>ziben shehui</i>
communist society	<i>kyōsan shakai</i>	共产社会	<i>gongchan shehui</i>
feudal society	<i>hōken shakai</i>	封建社会	<i>fengjian shehui</i>
primitive communist society	<i>genshu kyōsan-shaku</i>	原始共产社会	<i>yuanshi gongchan shehui</i>
slave society	<i>dorei shakai</i>	奴隶社会	<i>nuli shehui</i>
21. "studies", "-ology"	<i>-gaku</i>	学*	<i>-xue</i>
accounting	<i>bokugaku</i>	簿记学	<i>buji xue</i>
aesthetics	<i>bigaku</i>	美学	<i>meixue</i>
anatomy	<i>kaibōgaku</i>	解剖学	<i>jiēpou xue</i>
applied fine arts	<i>kōgei- bijutsugaku</i>	工艺美术学	<i>gongyi meishu xue</i>
architecture	<i>kenchūkugaku</i>	建筑学	<i>jiànzhū xue</i>
biology	<i>seibutsugaku</i>	生物学	<i>shēngwù xue</i>
chemistry	<i>kagaku</i>	化学	<i>huàxue</i>
civil engineering	<i>dōboku kōtē- gaku</i>	土木工程学	<i>tūmù gōngchéng xue</i>
economics	<i>keizai gaku</i>	经济学	<i>jīngjī xue</i>
ethics	<i>rinrigaku</i>	伦理学	<i>lúnlǐ xue</i>
ethnology	<i>minzokugaku</i>	民族学	<i>mínzú xue</i>
geography	<i>chirigaku</i>	地理学	<i>dìlǐxue</i>
harmonics	<i>waseigaku</i>	和声学	<i>hēshēng xue</i>
horticulture, garden design	<i>engeigaku</i>	园艺学	<i>yuányì xue</i>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uiryoku- kōgaku</i>	水力工学	<i>shuǐlì gōngxue</i>
hygienics	<i>eseigaku</i>	卫生学	<i>wēishēng xue</i>
law, jurisprudence	<i>hōgaku</i>	法学	<i>fǎxue</i>
logic	<i>ronrigaku</i>	论理学	<i>lúnlǐ xue</i>
mathematics	<i>sūgaku</i>	数学	<i>shùxue</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kikai kōgaku</i>	机械工学	<i>jīxié gōngxue</i>
medical jurisprudence	<i>hōigaku</i>	法医学	<i>fǎyī xue</i>
medicine	<i>igaku</i>	医学	<i>yīxue</i>

* “学”作为后缀的用法，可见于早期教会汉语文本（参见附录 A），因此，它应当被视为汉语的新词用法，而不是日语的输入。我将其收录本类别，是为了强调其广受承认的经由现代日语的流传途径。

metallurgy	<i>yakūgaku</i>	冶金学	<i>yejin xue</i>
metaphysics	<i>keiryōgaku</i>	形而上学	<i>xing'er shang xue</i>
natural science	<i>shizen kagaku</i>	自然科学	<i>ziran kexue</i>
pathology	<i>byōrigaku</i>	病理学	<i>bingli xue</i>
philosophy	<i>tetsugaku</i>	哲学	<i>zhexue</i>
physics	<i>hutsūgaku</i>	物理学	<i>wuli xue</i>
physiology	<i>seirigaku</i>	生理学	<i>shenglixue</i>
psychology	<i>shinrigaku</i>	心理学	<i>xinli xue</i>
sociology	<i>shakaigaku</i>	社会学	<i>shehua xue</i>
statics	<i>seurikagaku</i>	静力学	<i>jingli xue</i>
study of finance	<i>zaiseigaku</i>	财政学	<i>caizheng xue</i>
study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byōchūgaku</i>	病虫害学	<i>bingchong xue</i>
telecommunications	<i>denki tsūshingaku</i>	电气通信学	<i>dianqi tongxin xue</i>
trigonometry	<i>sankakugaku</i>	三角学	<i>sanyiao xue</i>
22. "-style", "form"	<i>-shiki</i>	式	<i>-shi</i>
accelerated equation	<i>sokuseushiki</i>	速成式	<i>sucheng shi</i>
identical equation	<i>hōteishiki</i> <i>kōtōshiki</i>	方程式 恒等式	<i>fangcheng shi</i> <i>hengdeng shi</i>
Japanese-style	<i>nihonshiki</i>	日本式	<i>niben shi</i>
mobile form	<i>ryūdōshiki</i>	流动式	<i>liudong shi</i>
rhetorical form	<i>mondōshiki</i>	问答式	<i>wenda shi</i>
simple form	<i>kun'ishiki</i>	简易式	<i>jianyi shi</i>
Western-style	<i>yōshiki</i>	洋式	<i>yang shi</i>
23. "super-", "sur-"	<i>chō</i>	超	<i>chao</i>
superman	<i>chōnin</i>	超人	<i>chaoren</i>
supernatural	<i>chō shizen</i>	超自然	<i>chao ziran</i>
surreal	<i>chōgeriyūsu</i>	超现实	<i>chao xianshi</i>
ultra shortwave	<i>chōtanha</i>	超短波	<i>chao duanbo</i>
24. "theory", "-ism"	<i>-ron</i>	论	<i>-lun</i>
atheism	<i>mushinron</i>	无神论	<i>wushen lun</i>
conclusion (of a syllogism), verdict	<i>ketsuron</i>	结论	<i>jielun</i>
dualism	<i>nigenron</i>	二元论	<i>eryuan lun</i>
epistemology	<i>nanshikuron</i>	认识论	<i>renshi lun</i>
fatalism	<i>shukumeiron</i>	宿命论	<i>suming lun</i>

idealism	<i>yuishinron</i>	唯心论	<i>weixin lun</i>
inference	<i>suiron</i>	推论	<i>tuilun</i>
materialism	<i>yuibutsuron</i>	唯物论	<i>weiwu lun</i>
methodology	<i>hōhōron</i>	方法论	<i>fangfa lun</i>
monism	<i>ichigenron</i>	一元论	<i>yi yuan lun</i>
pantheism	<i>hanshinron</i>	泛神论	<i>fanshen lun</i>
pluralism	<i>tagenron</i>	多元论	<i>duoyuan lun</i>
rationalism	<i>yuirron</i>	唯理论	<i>weili lun</i>
solipsism	<i>yuigaron</i>	唯我论	<i>weiwu lun</i>
spiritualism	<i>yushinron</i>	唯神论	<i>weishen lun</i>
theory of evolution	<i>shinkaron</i>	进化论	<i>jinhua lun</i>
25. "view"	<i>-kan</i>	观	<i>-guan</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yuibutsushikan</i>	唯物史观	<i>weiwu shiguan</i>
life outlook	<i>jinseikan</i>	人生观	<i>rensheng guan</i>
objective	<i>kyakkan</i>	客观	<i>keguan</i>
scientific outlook	<i>kagakukan</i>	科学观	<i>kexue guan</i>
subjective	<i>shukan</i>	主观	<i>zhuguan</i>
universal view	<i>uchūkan</i>	宇宙观	<i>yuzhou guan</i>
world view	<i>sekaikan</i>	世界观	<i>shijie guan</i>
26. "world", "circles"	<i>-kai</i>	界	<i>-jie</i>
artistic circles	<i>geijutsukai</i>	艺术界	<i>yishu jie</i>
educational circles	<i>kyō, ikaikai</i>	教育界	<i>jiāoyu jie</i>
financial world	<i>kin'yūkai</i>	金融界	<i>jīnróng jie</i>
intellectual world	<i>shisōkai</i>	思想界	<i>sīxiǎng jie</i>
journalistic circles	<i>shinbunkai</i>	新闻界	<i>xīnwén jie</i>
judicial world	<i>shihōkai</i>	司法界	<i>sīfǎ jie</i>
literary circles	<i>bungakukai</i>	文学界	<i>wénxué jie</i>
publishing circles	<i>shuppankai</i>	出版界	<i>chūbān jie</i>

附 录 F

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本源语言	汉字	汉语拼音	注释
academy	阿加的米	<i>ajudemi</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学院
acetylene	阿西台林	<i>axitailin</i>	
acre	爱克	<i>aike</i>	
adieu	业丢	<i>vadiu</i>	
albite	阿勒倍得	<i>alebride</i>	
alcohol	阿尔科尔	<i>ierhe'er</i>	
alizarine	阿里杀林	<i>alishahn</i>	
alkali	阿尔加单	<i>ierjiati</i>	
Allah	阿拉	<i>Ala</i>	
alpha waves	阿尔法射线	<i>d'erfa shexian</i>	
alto	耳朵	<i>erduo</i>	
amateur	爱美的	<i>aimeide</i>	
amen	阿们	<i>amen</i>	
ammonia	阿摩尼亚	<i>amoniya</i>	
amoeba	阿米巴	<i>amba</i>	
ampère	安培	<i>anpei</i>	
ampère mètre	安培表	<i>anpei biao</i>	
ampoule	安浦耳	<i>anpu'er</i>	
anabaptist	安那巴达派	<i>anabada pai</i>	
anarchism	安那其主义	<i>anaqi zhuyi</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无政府主义
angel	安琪儿	<i>anqi'er</i>	
angora	安格拉	<i>angela</i>	
aniline	阿尼林	<i>anilin</i>	
anonym	阿囊	<i>anang</i>	
anthracene	安特拉生	<i>antelasheng</i>	
Anti-dumping Party	反屯并党	<i>fan tunbing dang</i>	
antimony	安的摩尼	<i>andimonu</i>	
antipyrine	安提比林	<i>antibilin</i>	
apomorphine	阿朴吗啡	<i>apumafei</i>	
apple pie	苹果排	<i>pingguo pai</i>	
are	阿尔	<i>ier</i>	
armored troops	坦克兵	<i>tanke bing</i>	

arnica Arrow shirt	亚尼架 鸭佬恤	yanijia yalao xu	粤语独有: alou seut
aspirin	阿上匹林	ashipilin	可供选择的词: asipiling 阿司匹灵
Atlas atropine aufheben	亚脱拉斯 阿托品 奥伏赫变	yatuolasi atuopin aofuhebian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扬弃
autarkie	亚太基	yataij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自治运动
baby	啤仔 啤啤	pizai papa	粤语来源: biyai 粤语独有: bihbi
bacon bacteria ball ballet band bandage bank	培根 拨克替里亚 波 芭蕾舞 扮 绷带 版克	peigen boketilya bo balei xu ban bengdai banke	闽方言来源 粤语来源: baan
bar	酒吧	jiuba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银行 可供选择的词: jiuba jian 酒吧间
Barbary ape barbitol baritone baroque	巴巴利 巴比妥 巴利东 巴洛哥 巴罗克	babali babituo balidong baluoge boluoke	
barrel barricade barroom bass bass guitar bassoon Bastille beer	把列而 巴列卡台 酒排间 巴斯 贝司 巴松 巴士的狱 啤酒	balie'er baliekatai jiupaijian basi beisi basong Bushidi yu pijiu	粤语来源: bejiu
benzene benzol bergamot blec boron boss	遍西尼 遍蔬尔 巴机密油 布洛克 硼 波士	bianxani biansuer bajimi you buhuoke peng hoshu	粤语独有: bosu

bourgeois	布尔乔亚	<i>bù'ěrqiāoyā</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bourgeoisie	布尔乔亚派	<i>bù'ěrqiāoyāpài</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资产阶级
bowling	保龄球	<i>bǎolíng qiú</i>	粤语来源: <i>bouihng kauh</i>
boxing	扑克胜	<i>būkeshèng</i>	粤语: 卜成 <i>boksing</i>
boy (servant)	仆欧	<i>pū'ōu</i>	
boycott	杯葛	<i>bēigē</i>	粤语来源: <i>buigot</i>
boycotters	杯葛派	<i>bēigē pài</i>	
Brahman	婆罗门	<i>póluómén</i>	
brandy	白兰地	<i>báilándì</i>	
Browning	布朗宁	<i>Bolángníng</i>	
bund	崩得	<i>bēngde</i>	
Bunsen burner	本生灯	<i>bēshēng dēng</i>	
bus	巴士	<i>bāshì</i>	粤语来源: <i>busi</i>
bushel	蒲式耳	<i>pūshì'ěr</i>	
bust	半身	<i>bānshēn</i>	
butter	白脱	<i>báituō</i>	
bye-bye	拜拜	<i>bàibài</i>	粤语: <i>baaihai</i>
cable	开勃儿	<i>kāibō'ěr</i>	
cacao	卡高	<i>kǎgāo</i>	
café (coffee)	架非, 架非	<i>jiāfēi</i>	在马礼逊那里 (1815) 被注释为 <i>kāfēi</i> 咖啡
café	咖啡	<i>kāfēi</i>	
(coffeehouse)	咖啡馆	<i>kāfēiguǎn</i>	
caffeine	咖啡因	<i>kāfēiyīn</i>	
cake	极仔	<i>jízǐ</i>	闽方言来源
caliph	哈利发	<i>hālìfā</i>	
calorie	卡路里	<i>kǎlùlǐ</i>	
Calvinism	加尔文教	<i>jiǎ'ěrwén jiào</i>	
Cambrian Period	寒武记	<i>Hánwǔ jì</i>	
Cambrian system	寒武系	<i>Hánwǔ xì</i>	
camera	开麦拉	<i>kāimǎilā</i>	
cancer	n/a	<i>n/a</i>	粤语独有: <i>kensa</i> 。参见癌
cannon	加农炮	<i>jiānóngpào</i>	
caoutchouc (Indian rubber)	羔求	<i>gāoqiú</i>	
captain	甲必丹	<i>jiǎbìdān</i>	

car	卡车	<i>kache</i>	
carat	卡刚特	<i>kalate</i>	
carbine	卡宾枪	<i>kabin qiang</i>	
carbolic acid	加波力克酸	<i>jiabolike suan</i>	
carborandum	卞波兰登	<i>kabolandeng</i>	
card	卡片	<i>kapian</i>	粤语: <i>kaat</i> 卡
carpet-bag	急必袋	<i>jibidai</i>	粤语来源: <i>gapbit doi</i>
carré	街害	<i>jiehui</i>	粤语: <i>gaaihoih</i>
car tire	车胎	<i>chetai</i>	可供选择的形式: <i>luntai</i> 轮胎, <i>lundai</i> 轮带 粤语来源: <i>chetaxi</i>
cartoon	卡通	<i>katong</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漫画
cash	n/a	<i>n/a</i>	粤语独有: <i>hesyuh</i> 。参见附录 B <i>xianjin</i> 现金
cashmere	开四米	<i>kaisimi</i>	粤语等义词: <i>hesihme</i> 茄士米
caste	喀士德	<i>keshide</i>	
catarrh	加答儿	<i>jiada'er</i>	
Catholic mass	玛斯	<i>masi</i>	可供选择的形式 <i>misa</i> 弥撒
catsup	茄汁	<i>jiazhi</i>	粤语独有: <i>kejap</i>
cavatina	卡弗铁茄	<i>kafutieqie</i>	
cello	塞洛	<i>sailuo</i>	
cellophane	塞璐吩	<i>sailufen</i>	
celluloid	写留路以德	<i>xieluluyide</i>	
cellulose	写留路斯	<i>xielulusi</i>	
Celtic Revival	克勒特复兴运动	<i>Kelete fuxing yundong</i>	
cement	士敏土	<i>shiminshi</i>	
cent (Dutch and Swedish currency)	生式	<i>shengshi</i>	
cent (U. S. penny)	生脱	<i>shengtuo</i>	粤语等义词: 仙 <i>sin</i>
cental	生脱尔	<i>shengtuo'er</i>	
centiare	生的阿尔	<i>shengdi'er</i>	
centigramme	生的克兰姆	<i>shengdike lanmu</i>	
centiliter	生的立脱尔	<i>shengdilisu'er</i>	

centime	牛丁	<i>shengding</i>	
centimètre	生的米突	<i>shengdimitu</i>	
certificate	沙纸	<i>shazhi</i>	粤语独有: <i>saji</i>
chain	奔因	<i>sheyin</i>	
chaldron	巧特仑	<i>qiaotelun</i>	
champagne	三鞭 香根酒	<i>sanbian</i> <i>xiangbenjiu</i>	
champion	香宾	<i>xiangbin</i>	
Charlie Chaplin	差利	<i>Chali</i>	粤语独有: <i>chulei</i>
chauvinism	沙义主义	<i>shawen zhuyi</i>	亦见附录 C
check	乞克	<i>qike</i>	粤语等义词: <i>chek</i> 人
cheese	占十	<i>jisih</i>	粤语: 芝士 <i>jin</i> , 在官话中被“奶酪” 取代
chef d'oeuvre	赛的物儿	<i>saidewunier</i>	
chloroform	哥罗仿	<i>geluofang</i>	
chocolate	炒扣米 巧克力	<i>chaokoumai</i> <i>qiaokeli</i>	粤语等义词: 朱 古力 <i>zyugulik</i>
cholera	虎列拉	<i>huliefa</i>	
Christianity	基督教	<i>Jidu jiao</i>	
chrome	克罗米	<i>keluomi</i>	
cigar	雪茄	<i>xuejia</i>	
clarinet	克拉管	<i>kelu guan</i>	
clarinetti	卡拉理纳提	<i>kalalinar</i>	
coal tar	可尔脱	<i>ke'er tuo</i>	
coca	可加	<i>kejia</i>	
Coca-cola	可口可乐	<i>kekou kele</i>	
cocaine	可加因	<i>kejia yin</i>	粤语等义词: 高加因 <i>gouguyan</i>
cocktail	鸡尾酒	<i>jiwei jiu</i>	粤语来源: <i>gaumeihjau</i>
cocoa	可可	<i>keke</i>	粤语等义词: 谷咕 <i>gukgu</i>
codeine	可提因	<i>keti yin</i>	可供选择的词: <i>kedai yin</i> 可待因
colotype	珂罗版	<i>keluoban</i>	
combination	康拜因维雄	<i>kangbaiyinweixiong</i>	
commendam	康门达	<i>kangmenda</i>	
commission	孔米兄	<i>kongmixon</i>	

communism	康门尼斯姆	<i>kangmen nisimu</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共产主义
communist	康门尼斯特	<i>kangmenniste</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员
compania	康班尼亚	<i>kangbanniya</i>	
comprador	康白度	<i>kangbaidu</i>	
condor	公度儿	<i>gongdu'er</i>	
conga	康茄	<i>kangjia</i>	
consul	公修尔	<i>gongxiu'er</i>	
cookie	曲奇	<i>quqi</i>	粤语来源: <i>kukkeh</i>
coolie	咕哩 苦力	<i>guli</i> <i>kuli</i>	粤语独有: <i>guleih</i>
copai	古派尔	<i>gupai'er</i>	
copy	拷贝	<i>kaobei</i>	
cornet (musical instrument)	柯尔纳提	<i>kelernati</i>	
corset	哥塞脱	<i>gesaituo</i>	
cortisone	可的松	<i>kedesong</i>	
coulomb	库仑	<i>kulun</i>	
coup d'etat	苦迭达	<i>kuhieda</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政变
coupling	靠背轮	<i>kaobeilun</i>	
crayon	占丽谷	<i>gulirong</i>	
cray-pas	占丽巴斯	<i>gulibasi</i>	
cream soda	忌廉梳打	<i>jilian shuda</i>	粤语独有: <i>geihlimsoda</i>
creosote	儿阿蔬油	<i>jiasu you</i>	
Crookes glasses	克罗克眼镜	<i>Keluoke yanjing</i>	
crown	克伦	<i>kelun</i>	
cruzeiro (currency)	克鲁塞罗	<i>ketusaiduo</i>	
cube	朱勃	<i>zhubo</i>	
curry	加/咖喱	<i>jiali/ kali</i>	粤语来源: <i>galei</i>
cushion	籐巨	<i>guchen</i>	粤语来源: <i>guchahn</i>
cut	卡脱	<i>katuo</i>	
cyanide	山埃	<i>shan'ai</i>	粤语来源: <i>saanngaa</i>
cymbal	省摆尔	<i>shengbai'er</i>	
cynicism	昔匿克学派	<i>xinike xuepai</i>	
dadaism	达达主义	<i>dada zhuyi</i>	
daddy	爹地	<i>diedi</i>	粤语独有: <i>dedih</i>
dahlia	大理花	<i>dalihua</i>	
dancing girl	弹性女郎	<i>tanxing nulang</i>	
darling	达尔玲	<i>da'erling</i>	粤语: 打玲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	<i>da'erwen zhuyi</i>	

Davis cup	台维斯杯	<i>Tawersi bei</i>	
DDT	滴滴涕	<i>dididi</i>	
déca-dent	颜加汤	<i>tuijiatang</i>	
décagramme	特卡克兰姆	<i>tekakelanmu</i>	
décalitre	特卡立脱尔	<i>takalitu'er</i>	
décamètre	特卡米突	<i>takamutu</i>	
décigramme	特西克兰姆	<i>texikelanmu</i>	
décilitre	特西立脱尔	<i>texilituo'er</i>	
décimètre	特西米突	<i>teximutu</i>	
democracy	德谟克拉西	<i>demoketaxi</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民主主义
dermitol	代马妥儿	<i>daimatuo'er</i>	
deutschmark	马克	<i>make</i>	
dialectic	第亚纳蒂克	<i>diyanadike</i>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辩证法
diastase	对阿斯打斯	<i>duiasidasi</i>	
dictator	狄克推多	<i>diketuiduo</i>	来自日语的可供 选择的词独裁, 专政
dictatorship	狄克推多制	<i>diketuiduo zhi</i>	
diesel engine	狄塞尔机	<i>disai'er ji</i>	
diphtheria	实扶的里亚	<i>shifudiliya</i>	
doctor, Ph. D.	多看透	<i>duokantou</i>	双程外来替代词博士
dollar	他拉	<i>tala</i>	
Don Quixote type	唐吉词德型	<i>Tang jicide xing</i>	
Dowling paper	道林纸	<i>Daolin zhi</i>	
Downing Street	唐宁街	<i>Tangning jie</i>	
dozen	打	<i>da</i>	粤语等义词: 打臣 <i>dashahn</i>
drachma	德拉马	<i>delama</i>	
dram	打兰	<i>dalan</i>	
duce	刁时	<i>diaoshi</i>	粤语独有: <i>diush</i>
dumdum bullet	达姆达姆弹	<i>damu damu dan</i>	
dumping	屯并	<i>tunbing</i>	
duralumin	杜拉铝	<i>dulalu</i>	
dynamism	代纳密斯	<i>dainamisi</i>	
dynamite	代那美脱	<i>dainameituo</i>	
dynamo	代那模	<i>dainamo</i>	
dyne	达因	<i>dayin</i>	
economy	爱康诺米 (依康老米)	<i>aikangnuomi</i> (<i>yikanglaomu</i>)	参见附录 A 的 <i>fuguoce</i> 富国策以及附录 D 同归 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Eden	伊甸	<i>Yidian</i>	
Eleatic School	埃理亚学派	<i>Ailiya xuepai</i>	
emir	阿米尔	<i>ami'er</i>	

empire	英拜儿	<i>yīngbāi' er</i>	严复的音译词。参见附录 A 的 <i>diguó</i> 帝国
energy	爱纳尔基	<i>àina' erjī</i>	
engine	引击	<i>yǐnjī</i>	
English horn	英国杭	<i>Yīngguó hāng</i>	
entelechy	隐德来希	<i>yǐndéláixī</i>	
erg	厄格	<i>egē</i>	
Esperanto	爱斯不难读	<i>Àisībunándú</i>	参见附录 A 的 <i>wanguóxīnyǔ</i> 万国新语以及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世界语”
essay	爱说	<i>àishuō</i>	
Essene	曷生派	<i>hèshēng pài</i>	
ester	爱斯他	<i>àisīta</i>	
Etagone	爱泰冈	<i>Àutàigāng</i>	
ether	以太(伊太)	<i>yítài</i>	
ethyl	以脱	<i>yǐtuō</i>	
ethylene	以脱林	<i>yǐtuōlín</i>	
exarch	埃塞克	<i>àisāikē</i>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i>Fèibiān shè</i>	
fail	肥佬	<i>fēilǎo</i>	粤语独有: <i>feihlǎu</i>
fair play	费厄泼赖	<i>fèi' ē pōlái</i>	
farad	法拉特	<i>fālātē</i>	
farthing	法新	<i>fǎxīn</i>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i>fǎxīsī zhǔyì</i>	
fascists	法西斯分子	<i>fǎxīsī fēnzǐ</i>	
fashion	花臣	<i>huāchén</i>	粤语来源: <i>fachahn</i>
fathom	花当	<i>huādāng</i>	粤语来源: <i>faadang</i>
feminism	弗弥涅士姆	<i>Fèimínièshímǔ</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女权主义
feuilleton	阜利通	<i>fùlìtōng</i>	
file, holder	快劳	<i>kuàilāo</i>	粤语独有: <i>faailǎu</i>
film	非林	<i>fēilín</i>	粤语来源: <i>feilam</i>
flannel	法兰绒	<i>fālán róng</i>	
florin	福禄林	<i>fúlùlín</i>	
flute	弗柳特	<i>fúliùtè</i>	
foot(measure)	幅脱	<i>fútuō</i>	
formalin	福尔马林	<i>fú' èrmǎlín</i>	
franc	法郎	<i>fǎláng</i>	
Franciscans	法兰西斯党	<i>Fǎlǎnxīsī dǎng</i>	
fugue	赋格曲	<i>fùgē qū</i>	
funt	风脱	<i>fēngtuō</i>	
furlong	富呵浪	<i>fú' ā lǎng</i>	
gabardine	戈别丁	<i>gēbiédīng</i>	
gallon	加仑	<i>jiālún</i>	粤语来源: <i>galeun</i>

gallop	加罗普	<i>jialuopu</i>	
gas	加斯	<i>jas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gasu</i> 瓦斯(附录 B)
gasoline	格士林	<i>geshilin</i>	
Gatling gun	格林炮	<i>gelin pao</i>	参见附录 A 的 <i>ouxin pao</i> 藕心炮
Gauss	高斯	<i>Gaosi</i>	
gene	基因	<i>jiyin</i>	
gentleman	竟得尔曼	<i>jingde' erman</i>	双程外来替代词组十
geometry	几合学	<i>jhe xue</i>	
Gestapo	盖世太保	<i>Gaishutaibao</i>	
gill	及耳	<i>ji' er</i>	
gin	毡酒	<i>zhangiu</i>	粤语来源: <i>jinjau</i>
giraffe	其拉大	<i>qilafu</i>	
	支列胡	<i>zhiliehu</i>	
gluten	格路登	<i>geludeng</i>	
glycerin	各里司林	<i>gelisilin</i>	
golf	高尔夫	<i>gaoerfu</i>	
gothic	峨特式	<i>gete shi</i>	可供选择的词: 哥特, 哥 德
grain (measure)	克冷	<i>keling</i>	
grammar	葛郎玛	<i>gelangma</i>	双程外来替代词文法 (附录 D)
gramme	克 ^三 姆	<i>kelanmu</i>	
Groschen	克罗钦	<i>Keluoqin</i>	
gross	哥罗	<i>geluo</i>	
grotesque	格洛特斯克	<i>geluotesike</i>	
Grub Street	格刺布街	<i>Getabu jie</i>	
guild	基尔德	<i>ji' erde</i>	
guilder	克尔德	<i>ke' erde</i>	
guillotine	吉罗丁	<i>jiluoding</i>	
guitar	吉他	<i>jita</i>	
gulash	古拉士	<i>gulashi</i>	
gypsy	吉普赛	<i>jipusai</i>	
haemoglobin	希玛格洛宾	<i>ximageluo bin</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血色素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i>halihuya</i>	
Halley's Comet	哈雷彗星	<i>haleixue xing</i>	
Hamlet type	哈蒙雷特型	<i>Hamengleite xing</i>	
handsome maid	咸水妹	<i>xianshuimei</i>	粤语来源: <i>hauhmseui</i> <i>muih</i>
hectare	海克脱阿尔	<i>haiketuo' a' er</i>	
hectogramme	海克脱克兰姆	<i>haiketuo kelanmu</i>	
hectolitre	海克脱立脱尔	<i>haiketuo lituo' er</i>	
hectomètre	海克脱米突	<i>haiketuo mitu</i>	

Helicon	海利空	<i>Hailikong</i>	
Hellenism	希腊主义	<i>Xila zhuyi</i>	粤语来源: <i>hwiluah</i>
Hellenistic period	希腊时代	<i>Xila shidai</i>	
Heller	海来	<i>Huilai</i>	
hello	哈啰	<i>haluo</i>	
henry(physics)	亨利	<i>hengli</i>	
hernia	赫尼亚	<i>heniya</i>	
heroin	海洛因	<i>hailuoyin</i>	
hertz	赫芝	<i>hezhi</i>	
homespun	霍姆斯本	<i>huomusiben</i>	
hormone	荷尔蒙	<i>he' ermeng</i>	
hops	忽布	<i>hubu</i>	
horse power	马力	<i>mali</i>	
hot dog	热狗	<i>regou</i>	
House of Commons	甘文好司	<i>ganwen haosi</i>	粤语来源: <i>gemmen housi</i> , 参见 <i>juefang</i> 乡绅房(附录 A)
House of Lords	律好司	<i>li haosi</i>	参见 <i>juefang</i> 爵房(附录 A)
(I')humanité	虞芒尼德	<i>tumangude</i>	来自口语的可供选择的 词:人类,人道,人性
humor	幽默	<i>youmo</i>	
humorist	幽默家	<i>youmo jia</i>	
hundred-weight	汉厥怀特	<i>hanjue huait</i>	
husband	黑漆板凳	<i>heiqibandeng</i>	
hyena	海乙那	<i>haiyina</i>	
hypo	海波	<i>haibo</i>	
hystérie	歇斯的里	<i>xiesidili</i>	
ice cream	冰积凌	<i>bingjiling</i>	
	冰琪林	<i>bingqilin</i>	
idea	依提亚	<i>yitiya</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意 见,概念,观念
idéologie	意德沃罗基	<i>yidewoluoji</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意识形态
inch	因制	<i>yinzhi</i>	
indanthrene	隐丹上林	<i>yindanshilin</i>	
index	引得	<i>yinde</i>	
inflation	因发热凶	<i>yinfarexi凶</i>	参见附录 B 来自日语的 替代词通货膨胀
ink	因克	<i>yinke</i>	
inspiration	烟士披和纯	<i>yanshipihechun</i>	
insulin	因素林	<i>yinsulin</i>	
insure	燕梳	<i>yanshu</i>	粤语来源: <i>yinsu</i>

international	英特那雄那尔	<i>yingtenaxiong-na'er</i>	参见附录 A 的 <i>wanguo</i> 万国以及附录 B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国际”
iodine	碘	<i>dian</i>	
iodine tincture	碘酒	<i>dianjiu</i>	
ion	伊洪	<i>yihong</i>	
jacket	甲克	<i>jiake</i>	可供选择的词: 夹克
jam	占	<i>zhan</i>	粤语来源: <i>jim</i>
James Bond	占上邦	<i>Zhanshi Bang</i>	粤语来源: <i>jimsihong</i>
Janissary	惹尼恰利	<i>reniqiali</i>	
jasmine	耶悉茗	<i>yeximing</i>	
jazz	爵士乐	<i>jueshi yue</i>	
jeep	吉普车	<i>jipu che</i>	
Jehovah	耶和華	<i>Yekehua</i>	
jelly	这喱冻	<i>zheli dong</i>	粤语来源: <i>jeli: dung</i>
jelly	者哩	<i>zheli</i>	粤语来源: <i>jeli:</i>
John Bull	约翰勃尔	<i>Yuehan Bo'er</i>	
joule	朱尔	<i>zhu'er</i>	
journal	集纳	<i>jina</i>	
journalism	集纳主义	<i>jina zhuy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新闻事业
Judaism	犹太教	<i>yutai jiao</i>	
Junker	凶哥儿	<i>xiongge'er</i>	
Jurassic period	侏罗纪	<i>Zhuluo ji</i>	
Jurassic system	侏罗系	<i>Zhuluo xi</i>	
kaiser	恺撒	<i>kaisa</i>	
kangaroo	更格卢	<i>genggelu</i>	
kapron	卡布龙	<i>kabulong</i>	
Kartell	卜忒尔	<i>katei'er</i>	
katarrh	卡他	<i>kata</i>	
kettle drum	克脱鼓	<i>ketuo gu</i>	
khaki	卡叽	<i>kaji</i>	
kilo	基罗	<i>jiluo</i>	
kilogramme	基罗克兰姆	<i>jiluokelanmu</i>	
kilolitre	基罗立脱尔	<i>jiluolitu'er</i>	
kilomètre	基罗米突	<i>jiluomitu</i>	可供选择的词: <i>qiankemu</i> 千克米
kilowatt	基罗瓦特	<i>jiluowate</i>	可供选择的词: <i>qianwa</i> 千瓦
kiss	开司	<i>kusi</i>	
knot (nautical)	诺脱	<i>nuote</i>	
Kodak	柯达	<i>kedu</i>	
konzern	康采恩	<i>kangcai'en</i>	
Koran	可兰经	<i>Kelan jing</i>	
Kremlin	克里姆林宫	<i>Kelimulin gong</i>	

krona	克罗纳	<i>keluona</i>	
Krupp	克卢炮	<i>Kelupao</i>	
kvaass	可瓦上	<i>kevasi</i>	
L'école de l'hermitage	欧尔密太西学 校	<i>ou'ermitaxi xuexiao</i>	
laine	冷	<i>leng</i>	粤语来源: <i>luahng</i>
Lamarckism	拉马克学说	<i>lamake xueshuo</i>	闽方言来源
lamp	渣斧	<i>lanfu</i>	
last	拉司	<i>lasi</i>	
last car	拉斯卡	<i>lasi ka</i>	沪语来源
lemon	柠檬	<i>ningmeng</i>	粤语来源: <i>lihngmung</i>
lemonade	柠檬水	<i>ningmeng shui</i>	
lemon time	柠檬时间	<i>ningmeng shijian</i>	
lepton	雷波顿	<i>leibodun</i>	
Leveler (political party)	尼微拉党	<i>niveila dang</i>	
liaison	连咏	<i>lianyong</i>	
libido	来比多	<i>laibiduo</i>	
lift(elevator)	n/a	<i>n/a</i>	粤语独有: <i>lip</i> 。 参见附录 A 的“自行屋” 及其后来的替代词 <i>shengjiangji</i> 升降机与 <i>di-anti</i> 电梯
linen	连仁	<i>lianren</i>	粤语来源 <i>lihnyahn</i>
link	令克	<i>lingke</i>	
lira	里拉	<i>lila</i>	
litmus	立低莫斯	<i>lidimosi</i>	
litre	立脱尔	<i>lituo'er</i>	
logic	逻辑	<i>luoji</i>	来自日语的等义词论理
logic(the study of)	逻辑学	<i>luoji xue</i>	
logos	逻辑司	<i>luogesi</i>	粤语来源: <i>lohleth</i>
lorry	罗厘	<i>luoli</i>	
lumen	流明	<i>liuming</i>	
luminol	鲁来那	<i>lumina</i>	
lux	勒克斯	<i>lekesi</i>	
Lysol	来沙而	<i>laisha'er</i>	
malina	马林	<i>malin</i>	
Malthusianism	马尔萨斯主义	<i>Ma'ersasi zhuyi</i>	
mandolin	曼独林	<i>mandulin</i>	
manganese	曼淹	<i>manyan</i>	
mango	芒果	<i>mangguo</i>	
manorial system	马纳制度	<i>mana zhidu</i>	
mantle	幔陀	<i>mantuo</i>	

marathon	马拉松赛	<i>malasong sai</i>	
mark	哩, 麦	<i>mo, mai</i>	粤语来源: <i>mok, maak</i>
Marseillaise	马赛曲	<i>Masai qu</i>	
martini	马天尼	<i>matanni</i>	粤语独有: <i>mahunnch</i>
Marx-boy	马克思少年	<i>makesi shaonian</i>	
Marx-girl	马克思少女	<i>makesi shaontu</i>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i>makesi zhuyi</i>	亦见附录 G
Marxism- Leninism	马克思列宁主义	<i>makesi lieung zhuyi</i>	亦见附录 G
mauser	毛瑟枪	<i>maose qiang</i>	
maxwell	与克斯维尔	<i>makesiwei er</i>	
meat pie	肉批	<i>roupi</i>	粤语来源: <i>yuhkpai</i>
Mendelism	孟德尔主义	<i>mengde'er zhuyi</i>	
mentholatum	面速力达姆	<i>miansulidamu</i>	
merchant	孛毡, 马占	<i>mazhan</i>	粤语来源: <i>majin</i>
messiah	弥赛亚	<i>misaiya</i>	
meter	咪表	<i>mibiao</i>	粤语独有: <i>maibu</i>
methane	灭坦	<i>metan</i>	
mètre	米突	<i>nutu</i>	
micron	密仑	<i>mitun</i>	
microphone	麦克风	<i>maikefeng</i>	粤语可供选择的词: <i>mai</i> 咪。参见附录 A 的 <i>chuansheng qi</i> 传声器 粤语等义词: 咪 <i>mai</i> 粤语独有: <i>maaih sik</i>
mile	迈尔 咪	<i>mai'er mi</i>	可供选择的词: <i>haom</i> 毫米
milkshake	奶昔	<i>naixi</i>	
milliampere	毫安	<i>hao'an</i>	
milligramme	密理克兰姆	<i>milikelanmu</i>	
millilitre	密理立脱尔	<i>mililituo'er</i>	
millimètre	密理米突	<i>milimitu</i>	
milreis	密而斯	<i>mi'ersi</i>	
(currency)			
mince	免治	<i>mianchi</i>	粤语独有: <i>mihnjih</i>
miniskirt	迷你	<i>mini</i>	
ministerialism	米勒兰主义	<i>milelan zhuyi</i>	
minotaur	梅拿尔	<i>meina'er</i>	
misanthrope	蜜桑素罗普	<i>misangsuluopu</i>	
miss	密斯	<i>missi</i>	
missal	弥撒书	<i>misashu</i>	
mister	密斯特	<i>misite</i>	
mistress	密昔司	<i>mixist</i>	
mocha	磨加咖啡	<i>mojia kafei</i>	
model	模特儿	<i>mote'er</i>	
modern	摩登	<i>modeng</i>	来自日语可供选择的词 现代(附录 B)

modern girl	摩登钩儿	<i>modeng gou'er</i>	
molecule	磨勒	<i>mole</i>	
mommy	妈咪	<i>mami</i>	粤语独有: <i>mamsh</i>
montage	蒙太奇	<i>mengtaiqi</i>	
Moorish	摩尔式	<i>Mo'er shi</i>	
morphine	吗啡	<i>mafei</i>	
mosaic	马赛克	<i>masaike</i>	
motor	摩托	<i>motuo</i>	粤语等义词: <i>modu</i> 摩打
motorboat	摩托船	<i>motuo chuan</i>	
motorcar	摩托卡	<i>motuo ka</i>	
motorcycle	摩托车	<i>motuo che</i>	
mummy	木乃伊	<i>munaizi</i>	
muslim	穆斯林	<i>mushilin</i>	
muslin	毛丝纶	<i>maosilun</i>	
myriagramme	迈里格兰姆	<i>mailigelanmu</i>	
naphthalene	纳他连	<i>natalian</i>	
narcissism	腊西雪兹姆	<i>laxixuezimu</i>	
nautical mile	诺脱埋尔	<i>nuotuo mai'er</i>	
Nazi party	纳粹党	<i>Nacui dang</i>	
Nazism	纳粹主义	<i>nacui zhuyi</i>	
neck tie	呔	<i>dai</i>	粤语来源: <i>taai</i> ; 官话等 义词领带
neon light	霓虹灯	<i>nihong deng</i>	
neuter	扭脱	<i>nittuo</i>	
nicotine	尼古丁	<i>niguding</i>	
nip	夹镊	<i>jianie</i>	
novocaine	奴佛卡因	<i>nufokayin</i>	
number	林巴	<i>linba</i>	粤语来源: <i>lahmba</i>
number one	那么温	<i>name wen</i>	沪语来源
nylon	尼龙	<i>nilong</i>	粤语来源: <i>naihlung</i>
oboe	欧勃	<i>oubo</i>	
Oedipus Complex	耶的卜斯错综	<i>Yedibusi cuozong</i>	
office	奥非斯	<i>aofeisi</i>	
ohm	欧姆	<i>oumu</i>	
oil pump	油泵	<i>youbeng</i>	
old man	阿尔迈	<i>a'er mai</i>	
oleic acid	哇勒因酸	<i>waleyin suan</i>	
olive oil	俄列夫油	<i>eliefu you</i>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运动会	<i>Aolinpike</i>	
opium	鸦片	<i>yundong hui</i>	
orein	俄尔幸	<i>yapian</i>	
ounce	盎司	<i>e'erxing</i>	
Ovaltine	阿华田	<i>angsi</i>	粤语等义词: <i>onsi</i> 安士
		<i>Ahuatian</i>	粤语独有: <i>owahitun</i>

oxygen	沃克顺更气	<i>wokeshungeng qi</i>	
ozone	阿兴	<i>axun</i>	
pair	啤(派)	<i>pi (pai)</i>	粤语来源: <i>pe</i>
palmitic acid	拍尔味忒酸	<i>pai'erweitian suan</i>	
pan-European	泛欧	<i>fan'ou</i>	
pan-Germanism	泛日耳曼主义	<i>fan ri'erman zhuyi</i>	
pancake	班戟	<i>banji</i>	粤语独有: <i>baankik</i>
paradoxical	伯拉多客思的	<i>palatluokeside</i>	
paraffin	巴拉芬	<i>balafen</i>	
pariah	巴利亚	<i>baliya</i>	
Parker pen	派克笔	<i>paikē bǐ</i>	
parliament	巴厘满 巴厘满衙门 巴力门 巴力门会	<i>baliman</i> <i>baliman yamen</i> <i>balimen</i> <i>balimen hui</i>	参见附录 A 的 <i>gongyitang</i> 公议堂, <i>gongyiting</i> 公议庭, <i>huitang</i> 会堂, <i>guohui</i> 国会等; 以及附录 B 的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i>yihui</i> 议会和 <i>yiyuan</i> 议院
partner	<i>n/a</i>	<i>n/a</i>	粤语独有: <i>paatnah</i>
pass	派司	<i>paisi</i>	
pass	<i>n/a</i>	<i>n/a</i>	粤语独有: <i>pasih</i>
passport	<i>n/a</i>	<i>n/a</i>	粤语独有: <i>pasihpot</i>
pastel	巴斯推尔	<i>basitui'er</i>	
pastorale	派斯秃莱尔	<i>paisitulaier</i>	
pear	啤梨	<i>pili</i>	粤语独有: <i>belei</i>
peck	配克	<i>peike</i>	
pence	辨十	<i>bianshi</i>	
penicillin	盘尼西林	<i>pannixilin</i>	
pennyweight	本尼怀脱	<i>benni huaituo</i>	
pepsin	百布圣	<i>baibusheng</i>	
peptone	百布顿	<i>baibudun</i>	
percent	配生	<i>peisheng</i>	
pest	百斯笃	<i>baisidu</i>	
petite	小布尔乔亚	<i>xiao buerqiaoya</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小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阶级	<i>jieji</i>	
pfennig	分尼	<i>fenni</i>	
phalanx	法郎其	<i>falangqi</i>	
phenazone	非纳宗	<i>feinazong</i>	
phenobarbital	苯巴比妥	<i>benbabituo</i>	
philosophy	菲洛索菲 (非罗沙非)	<i>feiluosufei</i> (<i>feiluoshafe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哲学
piano	披亚诺	<i>piyanuo</i>	
piastre	披亚斯特	<i>piyaste</i>	
piccolo	皮可罗	<i>pikeluo</i>	
pickles	必克尔	<i>bike'er</i>	
picnic	辟克涅克	<i>bikenieke</i>	

pin	边扣	<i>biankou</i>	粤语来源: <i>binkau</i>
ping-pong	乒乓球	<i>pingpang qiu</i>	
pint	品脱	<i>pinuo</i>	
platije	布拉及	<i>hulaji</i>	
platonic(love)	柏拉图式(恋爱)	<i>bolatu shi lian'ai</i>	
plug	扑落	<i>puluo</i>	
point	磅音	<i>pangyin</i>	
poker	扑克	<i>puke</i>	
pole	布尔	<i>bu'er</i>	
polka	坡尔卡	<i>po'erka</i>	
porter	波打	<i>boda</i>	
port wine	菩提万酒	<i>putiwan jiu</i>	粤语等义词: 砵 <i>but</i>
postcard	甫士咭	<i>pushiji</i>	粤语独有: <i>pouhsikau</i>
pound	磅	<i>bang</i>	粤语来源: <i>bang</i>
pound sterling	镑	<i>bang</i>	
powder	泡打粉	<i>paoda fen</i>	粤语来源: <i>paada fan</i>
president	伯力赐天德	<i>bolicitiande</i>	参见附录 A 的 <i>tongling</i>
	伯理天德	<i>bolitiande</i>	统领, <i>shouling</i> 首领, 和
	伯理喜顿	<i>bolixidun</i>	<i>zongtongling</i> 总统, 以及
	伯理玺天德	<i>bolixitande</i>	双程外来(?)替代词: 总统
procaine	普鲁卡因	<i>pulukayin</i>	
proletarian	普罗列太林	<i>puoluotailin</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无产者, 无产阶级
proletarian literature	普罗文学	<i>puwo wenxue</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无产阶级文学
proletariat	普罗列塔利亚	<i>puoluotailieya</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无产阶级
property	伯劳伯的	<i>bolaobodi</i>	
ptyalin	普起阿林	<i>puqi'alin</i>	
pud	普特	<i>pute</i>	
pudding	布丁	<i>buding</i>	粤语等义词: 布甸 <i>boudin</i>
pump	帮浦	<i>bangpu</i>	
pyramidon	匹拉米洞	<i>pilamidong</i>	
quart	夸尔	<i>kua'er</i>	
quarter	块雅特尔	<i>kuaiyate'er</i>	粤语等义词: 骨 <i>gwai</i>
Quartier Latin	拉丁区	<i>Lading qu</i>	
quinine	奎宁	<i>kuining</i>	
quinquina	贵林那	<i>guilina</i>	
quintal	贵里特	<i>guilite</i>	
quixotism	吉珂德主义	<i>jicide zhuyi</i>	
radar	雷达	<i>leida</i>	
ramfon	雷米封	<i>leimifeng</i>	
resorcin	利锁耳金	<i>lisuoerjin</i>	
rhetoric	勒托列克	<i>letuolieke</i>	

rheumatism	馒头质斯	<i>loumazhis</i>	
rial	里尔	<i>li'er</i>	
ribbon	礼凤	<i>lifeng</i>	
rifle	来福	<i>laifu</i>	参见 <i>huoqiang</i> 火枪
	来复枪	<i>laifu qiang</i>	
romanesque	罗马式	<i>luoma shi</i>	
romantic	浪漫蒂克	<i>langmandike</i>	双程外来替代词浪漫
rood	路得	<i>lude</i>	
rugby football	辣古皮式足球	<i>lagupishi zuqu</i>	
rum	林酒	<i>lingju</i>	粤语来源: <i>lahmyau</i>
rumba	伦巴舞	<i>tunba wu</i>	
rupee (currency)	卢比	<i>lubi</i>	
rye	拉爱	<i>la'ai</i>	
safety valve	安全阀	<i>anquan fa</i>	
saled	沙辣	<i>shala</i>	粤语等义词: 沙律 <i>saleut</i>
salmon	萨门鱼	<i>samen yu</i>	粤语等义词: 三文 <i>sacammahn</i>
salon	沙龙	<i>shalong</i>	
salpa	萨尔帕	<i>sa'erpa</i>	
Salvarsan	沙尔法尔散	<i>Sha'erfa'ersan</i>	
sandwich	三明治	<i>sanmingzhi</i>	
santonin	珊笃宁	<i>shanduning</i>	
Sapphism	沙菲式恋爱	<i>shafushi lian'ai</i>	
sardine	沙汀鱼	<i>shating yu</i>	
Satan	撒但	<i>Sadan</i>	
saxhorn	萨克斯喇叭	<i>saken laba</i>	
saxophone	沙士风	<i>shashifeng</i>	粤语可供选择的词: 色士风 <i>siksifung</i>
schilling (currency)	先令	<i>xianling</i>	
science	塞因斯	<i>saiyinsi</i>	来自口语的替代词科学
screen	斯库林	<i>sikulin</i>	
scruple	斯克路步	<i>sikeluhu</i>	
sentimental	生的网特	<i>shengdemente</i>	
sequin	西袞	<i>xigun</i>	
serge	哗叽	<i>hiji</i>	
servant	沙文	<i>shawen</i>	粤语来源: <i>samen</i>
	西崽	<i>xizui</i>	
shaft	车湿	<i>cheshu</i>	粤语来源: <i>chesap</i>
shellac	舍来克	<i>shelaike</i>	
sherry	舍利	<i>sheli</i>	
sherry cobbler	沙士水	<i>shashi shui</i>	
shilling	先令	<i>xianling</i>	
shirt	恤衫	<i>xushan</i>	粤语来源: <i>seutsam</i>
shock	休克	<i>xiuke</i>	
sidewalk	衍(该)娃克	<i>jiewake</i>	粤语来源: <i>gaa mahthaak</i>

silon	西龙	<i>xilong</i>	
sir	阿蛇	<i>a she</i>	粤语独有: <i>aseuh</i>
siren	塞连	<i>sailian</i>	
sister	雪丝黛	<i>xuesidai</i>	
size	西十	<i>sheishi</i>	粤语独有: <i>saaisi</i>
Slavic studies	斯拉夫学	<i>silafu xue</i>	
snuff	上拿	<i>shina</i>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i>shehui da'erwen zhuyi</i>	
soda	蔬打, 苏达	<i>suda</i>	参见附录 B 的 <i>soda</i> 曹达
sofa	沙发	<i>shafa</i>	粤语等义词: <i>sofa</i> 梳化
sofabed	沙发床	<i>shafa chuang</i>	
solo	n/a	<i>n/a</i>	粤语独有: <i>soulouh</i>
sonata	朔拿大	<i>shuonada</i>	
sonnet	商籁式	<i>shanglai shi</i>	
sophist	蔬斐斯特	<i>safesite</i>	
sovereign (currency)	素佛令	<i>sufaling</i>	
sovereignty	萨威梭帖 (梭威梭帖)	<i>saweilingte</i> (<i>suoweilingte</i>)	双程外来替代词主权
soviet	苏维埃	<i>suswei'ai</i>	亦见附录 C
spanner	士巴拿	<i>shibana</i>	粤语来源: <i>sibanah</i>
spare	士啤	<i>shipi</i>	粤语独有: <i>sihbe</i>
Spartakus Grupe	斯巴特卡斯团	<i>Sibatekasi tuan</i>	
spermine	赐保命	<i>cibaoming</i>	
sphinx	斯芬克士	<i>sifenkeshi</i>	
sportax	司泡汀	<i>sipaoting</i>	
spring	司必令	<i>sibiling</i>	
stamp	士桓	<i>shidan</i>	粤语来源: <i>sidaan</i>
steam	水汀	<i>shuaiting</i>	Shanghainese origin; Cantonese <i>sidhn</i> 士店; 官话中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蒸气
stearin	司替阿林	<i>siti'alín</i>	
stick	士的克	<i>sidike</i>	
store	士多	<i>shiduo</i>	粤语来源: <i>sihdo</i>
strawberry	士多啤梨	<i>shiduopili</i>	粤语独有 <i>shdobelei</i>
streptomycin	史他杜迈仙	<i>shitadumaxian</i>	粤语来源: <i>sitadomaisin</i>
strychnine	士的宁	<i>shidening</i>	
sultan	蔬丹	<i>sudan</i>	
Sunkist	新奇士	<i>Xinqishi</i>	粤语独有: <i>sankrish</i>
sweater	司卫脱	<i>siweituo</i>	沪语来源
symphony	牛风尼	<i>shengfengn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交响乐

syndicalism	幸狄开主义	<i>xingdikai zhuy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工团主义
syndicate	幸狄开	<i>xingdika</i>	
syrup	舍利别	<i>shelibie</i>	
taboo	达波	<i>dabo</i>	
talkie (movie)	托刷	<i>tuaju</i>	
tambourine	汤薄铃	<i>tangboling</i>	
tango	探戈舞	<i>tange wu</i>	
tank	坦克车	<i>tanke che</i>	
tannic acid	单宁酸	<i>danning suan</i>	
tarantella	塔兰台拉舞曲	<i>calantaila wuyu</i>	
tart	蛋挞	<i>danda</i>	粤语来源: <i>daan dant</i>
taxi	的士	<i>dishi</i>	粤语来源: <i>diki</i>
teheka	切卡	<i>qeka</i>	
technocracy	推克诺克拉西	<i>tuikenuokelaxi</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技术统治
telephone	得利风 德律风	<i>delifeng</i> <i>delufeng</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电话(附录 B)
television	德律维雄	<i>deltweixiong</i>	
tempo	停破	<i>tingpo</i>	
tenant	佃农	<i>diannong</i>	
terylene	特丽令	<i>teliling</i>	
Thames River	泰晤士河	<i>taiwushi he</i>	粤语来源: <i>taimhsi</i>
Thermidor	齐密图	<i>qimitu</i>	
thymol	替摩耳	<i>timo'er</i>	
Times (newspaper)	泰晤士	<i>taiwushi</i>	粤语来源: <i>taimhsi</i>
tin	听	<i>ting</i>	
tincture	丁几	<i>dingji</i>	
tip (gratuity)	贴士	<i>tieshi</i>	粤语来源: <i>tips</i>
tissue	体素	<i>tisu</i>	
title	抬头	<i>tautou</i>	
tittip	踢踏舞	<i>titanou</i>	
toast	吐斯	<i>tusi</i>	粤语等义词: 多士 <i>dosi</i>
tobacco	旦把孤 淡巴菰	<i>danbagu</i> <i>danbagu</i>	
toffee	太妃糖	<i>taifei tang</i>	粤语等义词: 拖肥糖 <i>tofeitong</i>
tommy gun	汤姆式枪	<i>tangmu shi qiang</i>	
ton	吨, 豆	<i>dun</i>	粤语来源: <i>den</i>
tonne	脱因	<i>tuoyin</i>	
topology	拓扑学	<i>tuopu xue</i>	
Tory party	托利党	<i>Tuoli dang</i>	
total	拓都	<i>tadu</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 总体
totem	图腾	<i>tuteng</i>	
trachoma	托拉火姆	<i>tuolahuomu</i>	
tractor	拖拉机	<i>tuolaji</i>	

troubadour	特鲁巴多尔	<i>telubaduo'er</i>	
trumpet	屈郎拍	<i>qulangpai</i>	
trust	托辣斯	<i>tuolasi</i>	亦见附录 D 的 <i>shin'yo</i> 信用
tsar	沙尔	<i>sha'er</i>	亦见附录 G
tuba	提优把	<i>nyouba</i>	
turbine	透平机	<i>toupingji</i>	
Turkic studies	突厥学	<i>tujue xue</i>	
typhus	窄扶斯	<i>zhifusi</i>	
tyrant	代兰得	<i>dailande</i>	
ultimatum	爱的美顿	<i>aidimeidun</i>	来自日语的替代词最后通牒
Uncle Sam	山姆叔叔	<i>Shanmu shushu</i>	
union	由仁	<i>youren</i>	沪语来源
unit	么匿	<i>yaoni</i>	双程外来替代词单位
United	联合收割机	<i>lianhe shouge ji</i>	
Harvester			
combine			
utopia	乌托邦	<i>wutuobang</i>	
	乌有帮	<i>wuyoubang</i>	
varnish	凡立司	<i>fanlisi</i>	
Vaseline	凡士林	<i>Fanshilin</i>	
vermouth	维尔木	<i>wei'ermu</i>	
vernier	佛逆	<i>fo ni</i>	
Veronal	肥罗那	<i>Feiluona</i>	
vicar	维克尔	<i>weike'er</i>	
viedro	浮驼罗	<i>futuoluo</i>	
viersta	阜斯特	<i>fusite</i>	
violin	梵哑铃	<i>fanyaling</i>	
violoncello	费屋龙	<i>feiwulong</i>	
vitamin	维他命	<i>weitaming</i>	
volt	伏特	<i>fute</i>	
voltmeter	伏特机	<i>fute ji</i>	
waffle	威化	<i>weihua</i>	粤语来源: <i>wai fa</i>
Wall Street	华尔街	<i>Hua'er jie</i>	
waltz	华尔兹舞	<i>hua'erzi wu</i>	
waste	威士	<i>weishi</i>	粤语来源: <i>wai si</i>
water pump	水泵	<i>shuibeng</i>	
watt	瓦特	<i>wate</i>	
Werthersieber	维特热	<i>Weite re</i>	
Whig party	辉格党	<i>Huige dang</i>	
whiskey	威士忌	<i>weishiji</i>	粤语来源: <i>wai si hgei</i>
wire	威也	<i>weiy e</i>	粤语来源: <i>wai yeh</i>
x-ray	爱克司光	<i>aikesi guang</i>	粤语等义词: <i>iksihgwong</i> X光
Yankeeism	洋鬼风	<i>yanggui feng</i>	

yard (measure)	依亚	<i>yiya</i>	
yelling	夜冷	<i>yeleng</i>	粤语来源: <i>yehlaahng</i>
yes	也司	<i>yesi</i>	
zinc	锌	<i>xin</i>	
Zionism	西雄主义	<i>xixiong zhuyi</i>	粤语: <i>Saihung</i>

附录 G

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俄语	汉字	汉语拼音	解释性注释
Большвик	布尔什维克(鲍尔扎维克)	bu'ershiveike (bao'-erzhaweike)	Bolshevik
БУза	布乍	buzha	一种发酵过的俄国饮料
Бунд	崩得	bengde	Bu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社会民主总联盟)
ведро	浮陀罗	futuoluo	bucket(桶), dustbin(垃圾桶); 表度量的词
верста	阜斯得	fuside	verst(俄里)
вершок	胃索	weisuo	俄寸
водка	伏特加	futejia	vodka
госплан	高士泼林	gaoshipolin	gosplan(国家计划委员会)
Г. П. У.	戒白伍(葛杯吴, 葛柏乌)	giebaiwu (gebeiwu, gebaiwu)	CPU(国家政治保卫局)
дума	杜马	duma	duma(沙皇时代的议会)
Иванович	伊凡诺维基	Yifannuoweiji	Ivanovich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印贴列根迨亚	yintieliegen zhuiya	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 知识界)
катуша	喀秋沙(卡秋霞)	kaqusha (kaqixia)	katiusha(rocket)(火箭筒, 火箭发射器)
квас	可瓦斯(葛瓦斯, 喀瓦士, 喀瓦斯)	kwasi (gewasi, kawashi, kawasi)	kvass(用面包、面粉加麦芽经发酵制成的低度饮料)
колхоз	科尔火支	ke'erhuozhi	collectivized farm(集体化农场)
комбайн	康拜因	kangbaiyin	combine(联合收割机)
Коминтерн	康民团	Kangmintuan	Comintern(共产国际)
комиссар	康密沙	kangmusha	commissar(政委)
комсомол	康沙模尔(共莎莫勒)	kangsha mo'er (gongshamole)	Komsomol(共青团), (Communist Youth League)
комсомолка	康沙模尔卡	kangshamo'erka	Komsomolka(女共青团员)
копейка	戈比(哥比)	gebi (gebi)	kopek(前苏联辅币名)
Крестинтерн	克雷斯汀团	Kelesiding tuan	Krestintern(红色农民国际)
Лэпш	拉普	Lapu	LAPP(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ленинец	列宁主义者	Liening zhuyizhe	Leninist
ленинизм	列宁主义	Liening zhuyi	Leninism
ленинист	列宁主义者	Liening zhuyizhe	Leninist

Ленинский	列宁纪念室	<i>Liening jinianshi</i>	Lenin memorial
уголок			
малина	马林果	<i>malinguo</i>	raspberry
марксизм	马克思主义	<i>Makesi zhuyi</i>	Marxism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马克思列宁主义	<i>Makesi Liening zhuyi</i>	Marxism-Leninism
марксист	马克思主义者	<i>Makesi zhuyizhe</i>	Marxist
машина	马神(中国东北方言)	<i>mashen</i>	机器, 机器化犁具(东北方言)
меньшевик	孟什维克(门塞维克)	<i>Mengshi weike (Mensheike)</i>	Menshevik
мир	米尔	<i>mi'er</i>	农民集体, 村社
Москов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художников станковистов	莫斯科劳动者艺术家协会	<i>Moskva laodongzhe yishujia xiehui</i>	Moscow Society of Worker-Artists
нэлп	纳普	<i>Napu</i>	NEP(前苏联在1921—1936年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нэлпман	耐普曼(耐泼曼)	<i>Naipuman (Nai-poman)</i>	Nepman(用来表示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
пайк	排雅克	<i>paiyake</i>	ration(配给量)
печь	壁里砌(壁里气—东北方言)	<i>biliqi (biliqi)</i>	壁炉(东北方言)
платье	布拉吉(不拉及)	<i>bulaji (bulaji)</i>	dress(服装)
пуд	普特(波特, 铺德)	<i>pute (bote, pude)</i>	pood(前苏联重量单位, 相当于16.38公斤)
рубль	卢布	<i>lubu</i>	ruble(前苏联货币单位)
самовар	沙莫瓦	<i>shamowa</i>	samovar(俄国式茶炊)
семинар	习明纳尔	<i>ximingna'er</i>	seminar(研讨班)
совет	苏维埃	<i>Suwei'ai</i>	Soviet
союз	沙油子(东北方言)	<i>shayouzi</i>	工会(东北方言)
стахановец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i>Sidahanuofu gongzuozhe</i>	Stakhanovite
товариш	杜瓦里希	<i>duwalixi</i>	comrade(同志)
трактор	拖拉机	<i>tuolaji</i>	tractor
троцкизм	托洛斯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i>Tuoluosiji zhuyi (Tuo luociji zhuyi)</i>	Trotskyism
троцкист	托派	<i>Tuopai</i>	Trotskyite
ура	乌拉	<i>wula</i>	hurrah, viva(万岁)
фунт	讽脱	<i>fengtuo</i>	俄磅(重量单位)
халат	哈喇呢	<i>halani</i>	“东方式”上等罗纱
хлеба	裂把(东北方言)	<i>lieba</i>	一种黑面包(东北方言)
царь	沙皇(沙尔)	<i>shahuang (sha'er)</i>	Tsar
Чека	切卡(乞卡, 杰克)	<i>qieka (qika, jieke)</i>	Cheka(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

червонец	丘峰尼支(次尔伏 尼雀)	<i>qiufengnizhi (ci'e- rfunique)</i>	chervonets (1922---1947 年间 苏联流通的一种银行券,相 当于10卢布)
шовенизм	沙文主义	<i>Shawen zhuyi</i>	Chauvinism
шовенист	沙文主义者	<i>Shawen zhuyizhe</i>	Chauvinist

文献目录

- Adorno, Theodor W. *Notes to Literatur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Ahmad, Aijaz.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1992.
- .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Spring 1987): 3 – 25.
- . “‘Third-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Journal of Arts & Ideas* 17 – 18, (June 1989): 117 – 135.
- Alitto, Guy S.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Allinson, Robert E.,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 Anderson, Marst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 “Lu Xun’s Facetious Muse: The Creative Impe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9 – 268.
- Arakawa Sōbē 荒川惣兵卫. *Gairaigo jiten 外来语辞典*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Tokyo: Fukuyamabō, 1941.
- . *Gairaigo ni manabu 外来语に学ぶ* (Learning from loanwords). Tokyo: Shin-

- sensha, 1980.
- . *Japanized English*. Rev. 4th ed. Tokyo: Kenkyūsha, 1931.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Babbitt, Lrving. "Bai Bide Zhongxi renwen jiaoyu tan"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 (Irving Babbitt's discussion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 Hu Xiansu 胡先骕. *Xueheng* 3 (Mar. 1922): 1 – 12.
- .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2 (1921): 85 – 91.
-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Michael Holquist and Caryl Emers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 Iswolsk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 Bao Jing 鲍晶, ed. *Lu Xun "guomin xing sixiang" taolun ji* 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 (Collected discussions of Lu Xun's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1982.
- Barlow, Tani E.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ositions* 1 (Spring 1993): 224 – 267.
- . "Theorizing Woman: *Funi*, *Guojia*, *Jiating* [Chinese wome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Genders* 10 (Spring 1991): 132 – 160.
- Barnard, F. M., ed. *J. G.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arnett, Suzanne W. "Silent Evangelism: Presbyterians an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07 – 1860."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49 (Winter 1971): 287 – 302.
- Barnett, Suzanne W.,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arshay, Andrew F. *State and Intellectual in Imperial Japan: The Public Man in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Barthes, Roland. *S / Z*. Paris: Seuil, 1970.
- Befu, Harumi. "Nationalism and *Nihonjinron*." In idem,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107 - 135.
- Befu, Harumi,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 Benveniste, Emil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 Berlin, Isaiah. *Vico and Herder*. London: Hogarth, 1976.
-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 S. Heyvaert.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92.
- Bernal, Martin.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90 - 112.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 Birch, Cyril,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2.
- Blumenberg, Hans. "The Concept of Rea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ovel." In Richard E. Amacher and Victor Lange,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German Literary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 - 48.

- Bond, Michael Harris,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ooth, Wayne.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Borges, Jorge Luis. *Twenty-four Conversations with Borges, Including a Selection of Poems; Interviews by Roberto Alifano, 1981 - 1983*. Trans. Nicomedes Suárez Araúz, Willis Barnstone, and Noemí Escandell. Housatonic, Mass.: Lascaux Publishers, 1984.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Homo Academicus*. Paris: Minuit, 1984.
- .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John B. Thompson;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reton, André.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Trans. Richard Seaver and Helen R. Lan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 Brower, Reuben, ed.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Brown, Arthur.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An Unwelcome but Inevitable Awakening*.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4.
- Brown, Carolyn T., ed. *Psycho-Sinology: The Universe of Dreams in Chinese Culture*. A conference report. Asian Progr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87.
- Burke, Peter, and Roy Porter,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Cai Yuanpei 蔡元培 et al.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daolun ji*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Collected introductions to the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Liangyou fuxing tushu yinshua gongsi, 1940.
- Cao Xueqin 曹雪芹. *Honglou meng* 红楼梦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or The story of the stone). 3 vols.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57.
-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David Hawkes. 5 vol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 .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Ein Roman aus der Fröhen*. Trans. Franz Kuhn. Wiesbaden: Insel-Verlag, 1959.
- Carrithers, Michael, Steven Collins, and Steven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Cascardi, Anthony J. *The Subject of Modernity*.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erteau Michel de.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Certeau, Michel de, D. Juba, and J. 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Paris: Gallimard, 1975.
-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 – 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Chatterjee, Partha.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Tokyo and London: Zed Books, 1986.
- Chen Bingkun 陈炳坤. *Zuijin sanshi nian Zhongguo wenxue shi*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Shanghai: Taiping yang shudian, 1930.

- Chen Duxiu 陈独秀 . "Dong xi minzu genben sixiang zhi chayi"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eoples). *Xin qingnian* 1.4(1915):283 - 287.
- . *Duxiu wencun* 独秀文存 (Collected works of Duxiu). Hefei: Anhui renminchubanshe, 1987.
- . "Wo zhi aiguo zhuyi" 我之爱国主义 (My kind of patriotism). *Xin qingnian* 2.2(1916):107 - 112.
- . "Xuwu de geren zhuyi ji ren ziran zhuyi"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Nihilistic individualism and laissez-faire theory). *Xin chao* 8.4(1920):637 - 638.
- Chen Huangmei 陈荒煤, ed. *Zhongguo xin wenyi daxi* 中国新文艺大系 (A compendium of new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20 vols. Beijing: 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 1989.
- Chen Jia'ai 陈家蔼 . "Xin" 新 (The new). *Xin chao* 1.1(1919):35 - 44.
- Chen Pingyuan 陈平原 . *Zhongguo xiaoshuo xushi moshi de zhuanbian*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mode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8.
- Chen Shanlong 陈山龙 . *Ri-Hua wailaiyu cidian* 日华外来语辞典 (Dictionary of Chinese-Japanese loanwords). Taipei: Hongrutang chubanshe, 1989.
- Chen Song 陈崧, ed. *Wusi qianhou dongxi wenhua wenti lunzhan wenxuan*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Debates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round the May Fourth period).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9.
- Chen Xiaomei 陈小肩 .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 - Mao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eng Fangwu 成仿吾 . "Cong wenxue geming dao geming wenxue"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Rao Hongjing 饶鸿竟 et al., eds., *Chuangzao she ziliao* 创造社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Creation Society), vol. 1.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85, 164 - 170.
- Cheyfitz, Eric.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 Tempest* to "Tarz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inweizu, Onwuchekwa Jemie, and Ihechukwu Madubuike. *Toward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hmielewski, J. "Yi putao yici weili lun gudai hanyu de jieci wenti" 以葡萄一词为例论古代汉语的借词问题 (A study of loanword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case of the word "grape"). *Beijing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1 (1957): 71 - 81.
-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Chow, Tse-tsung. "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Arthur F.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88 - 312.
- .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iyuan* 辞源 (A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Rev. ed. 4 vol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88.
- Clifford, James. "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 *Inscriptions* 5 (1989): 177 - 188.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Cohen, Paul A.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 - 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ohen, Paul A.,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Cohn, Dorrit.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ooke, George Wingrov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 China in the Years 1857 – 1858*. London: G. Routledge & Co., 1858.
- Cooley, James. "British Quaker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West China: Its Devolution Problem."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5.4 (Summer 1992): 65 – 82.
- Cooper, R.L., ed. *Language Spread: Studies in Diffusion and Social Chan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ale, Peter.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Dallenbach, Lucien. *Le Récit spéculaire: essai sur la mise en abyme*. Paris: Seuil, 1977.
- Debon, Günther, and Adrian Hsia, eds. *Goethe und China—China und Goethe*. Bern: Peter Lang, 1985.
- de Lauretis, Teresa.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de Man, Paul.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eng Feihuang 邓飞黄. "Geren zhuyi de youlai jiqi yingxiang" 个人主义的由来及其影响 (The origin and impact of individualism). *Dongfang zazhi* 19.7 (1922): 35 – 46.
- Deng Shi 邓实. "Aiguo suibi" 爱国随笔 (Patriotic miscellany). *Guocui xuebao* 33 (1909): 3 – 4.
- . "Aiguo suibi" 爱国随笔 (Patriotic miscellany). *Guocui xuebao* 38 (1909): 6.
- . "Guoxue wuyong bian" 国学无用辩 (A rebuttal to the view that national learning is useless). *Guocui xuebao* 30 (1908): 1 – 3.
- . "Guoxue zhenlun" 国学真论 (On authentic national learning). *Guocui xue-*

- ao27(1908):1-4.
- Derrida, Jacques. "Des Tours de Babel." Trans. Joseph F. Graham. In J. F.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5-208.
- .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 *Positions*.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The Post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Dhareshwar, Vivek. "Toward a Narrative Epistemology of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Inscriptions* 5(1989):135-157.
-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ing Jingtang 丁景唐. "Cong Lao She *Luotuo xiangzi* yuangao de chongxin faxian tanqi" 从老舍《骆驼祥子》原稿的重新发现谈起 (The rediscovery of Lao She's *Camel Xiangzi* and related matters). *Xin wenxue shiliao* 4 (Nov. 1983): 120-128.
- Ding Jintang,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1927-1937*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1937). 20 vols.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84.
- Ding Ling 丁玲. *Ding Ling xiaoshuo xuan* 丁玲小说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Ding Ling). 2 vols. Beijing: 1981.
- .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Ed. Tani E. Barlow and Gary J. Bjorg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 "Wangliang shijie: Nanjing qiuju huiyi" 魍魉世界: 南京囚居回忆 (A world of demons and devils: recollections of my confinement in Nanjing). *Xin wenxue*

- shiliao* 1 (Feb. 1987): 4 – 75.
-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 “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 *Cultural Critique* 6 (Winter 1987): 13 – 50.
- . “Cultur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Ame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Thought.” *Working Papers in Asian/Pacific Studies*, 1. Durham, N. C.: 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Duke University, 1985.
- .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u Yaquan 杜亚泉 [Cang Fu 伦父, Gao Lao 高劳]. “Geren yu guojia zhi jieshuo”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Dongfang zazhi* 14.3 (1917): 1 – 5.
- . “Geren zhi gaige” 个人之改革 (Reforming the individual). *Dongfang zazhi* 10.12 (1914): 1 – 4.
- . “Jing de wenming yu dong de wenming”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Lethargic versus dynamic civilization). *Dongfang zazhi* 3.10 (1916): 1 – 8.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 “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In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9 – 35.
-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Editors of *Xueheng* (Critical Review). “*Xueheng zazhi jianzhang*” 学衡杂志简章 (The *Critical Review*: a statement of purpose). *Xueheng* 1 (Jan. 1922): i.
- Egan, Michael. “Yu Dafu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09 – 238.
- Eoyang, Eugene.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Esherick, Joseph W.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Fabian, Johannes. *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The Appropriation of Swahili in the Former Belgian Congo, 1880 - 1938*.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Fairbank, John,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Fan Jun 樊骏. "Lun Luotuo xiangzi de xianshi zhuyi: jinian Lao She xiansheng bashi danchen" 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 (On realism in *Camel Xiangzi*: commemorating Lao She's eightieth birthday). *Wenzue pinglun* 1 (1979): 26 - 39.
- Fang, Achill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ifficulty of Translation." In Reuben Brower, ed.,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11 - 133.
- Fanon, Fran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eng Xuefeng 冯雪峰. "Lu Xun shengping jiqi sixiang fazhan de genggai" 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 (An outline of Lu Xun's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Wenyi bao* 4 (Oct. 1951): 11 - 12.
- Feuerwerker, Albert.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 Feuerwerker, Yi-tsi Mei.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Text, Intertex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riting Self in Lu Xun, Yu Dafu, and Wang Meng."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7 - 193.
- Fodor, István. *Pallas und andere afrikanische Vokabularien vor dem 19. Jahrhundert*.

- Hamburg: H. Buske, 1975.
- Fogel, Joshua.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 .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uce Seminar "Wartim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 . "Recen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 Borrowing in the Modern Sino -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Bloomington, Ind., 1993.
- Forsythe, Samuel.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 - 1905*.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43.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 Freud, Sigmund. *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s. 4 - 5.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
- . "The Uncanny." Standard Edition, Vol. 17.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218 - 253.
- Fu Sinian 傅斯年. "Rensheng wenti faduan" 人生问题发端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Xin chao* 1.1 (1919): 5 - 17.
- Fujii, James. *Complicit Fictions: The Subject in the Modern Japanese Prose Narra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Furth, Charlotte. "The Sage as Rebel: 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 In idem,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3 - 150.
- 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

- 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New York: Crossroad, 1982.
- Gálik, Marián. *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 - 1930)*. London: Curzon Press, 1980.
- Gan Yang 甘阳. "Ziyou de linian: wusi chuantong zhi qieshi mian" 自由的理念: 五四传统之阙失面 (The ideal of freedom: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In Liu Qingfeng 刘青峰, ed., *Lishi de fanxiang* 历史的反响 (Reverberations of history).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0, 62 - 81.
- Gao Mingkai 高名凯. *Hanyu yufa lun* 汉语语法论 (On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Kaiming shudian, 1948.
- Gao Mingkai 高名凯 and Liu Zhengtan 刘正琰. *Xiandai hanyu wailai ci yanjiu*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Studies of loan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1958.
- Gao Yihan 高一涵. "Guojia fei rensheng zhi guisu lun"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The state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of human life). *Xin qingnian* 1.4 (1915): 287 - 294.
- . "Zizhi yu ziyou" 自治与自由 (Autonomy and freedom). *Xin qingnian* 1.5 (1916): 381 - 384.
- Gates, Henry Louis, Jr. "Critical Fanonism." *Critical Inquiry* 17.3 (Spring 1991): 457 - 470.
- Gates, Henry Loui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Ge Baoquan 戈宝权. "Lu Xun shengqian 'Ah Q zhengzhuan' de waiwen yiben" 鲁迅生前《阿 Q 正传》的外文译本 (Translations of Lu Xun's "True Story of Ah Q" in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ed before his death). In *Lu Xun yanjiu jikan* 鲁迅研究集刊 (Collected studies of Lu Xun),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79: 371 - 398.
- 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Trans. John Oxenford.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4.
- Goldblatt, Howard. *Hsiao Hong*.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6.
- Goldman, Merle,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ong Mingde 龚明德. *Ba Jin yanjiu lunji* 巴金研究论集 (Studies of Ba Jin). Chongqing: Chongqing chubanshe, 1988.
- Goody, Jack.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raham, Joseph F.,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rewal, Inderp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 Guan, Choi Wah. *The Right Word in Cantonese*.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89.
- Guang Sheng 光升. "Zhongguo guomin xing jiqi ruodian" 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and its weaknesses). *Xin qingnian* 2.6 (1917): 495 - 505.
- Guha, Ranajit,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Gunn, Edward. *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uo Moruo 郭沫若. *Moruo wenji* 沫若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Moruo) 17 vols. Beijing: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57.
- Hammami, Reza, and Martina Rieker.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70 (July/Aug. 1988): 93 - 106.
- Han Bing 寒冰. "Bo 'Ta zi de yanjiu'" 驳她字的研究 (A rebuttal to "On feminine ta"). *Xue deng*, Apr. 20, 1920.

- Hanan, Patrick. "The Technique of Lu Hsün's Fi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4(1974): 53 – 96.
- Harootunian, H. D. *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Hayford, Charles. "Chinese and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Arthur Smith and His China Book." In Susan Barnett and John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3 – 174.
- He Yubo 贺玉波. *Zhongguo xiandai nüzuojia* 中国现代女作家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Shanghai: Fuxing shuju, 1936.
- Hegel, Robert, and Richard C. Hessney, eds. *Expressions of the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eidegger, Martin. *Unterwegs zur Sprache*. Verlag Günther Neskar, 1959. Trans. Peter D. Hertz. *On the Way to Languag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1.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Trans. T. Churchill. New York: Bergman, 1966.
- Hershatter, Gail.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 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1(1993): 103 – 130.
- Hevia, James. "Leaving a Brand i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3(July 1992): 304 – 332.
- Hiraoka Toshio 平冈敏夫. *Meiji bungakushi shūhen* 明治文学史周边 (The background of Meiji literary history). Tokyo: Yuseido, 1976.
- Hobsbawn,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 – 195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i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 Hu Jieqing, 胡絮青, ed. *Lao She shenghuo yu chuanguozuo zishu*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An account of Lao She's life and creative work in his own words).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1980.

- Hu Shi 胡适 “Bu xiu” 不朽 (Immortality). *Xin qingnian* 6.2 (1919): 113 - 122.
- . “Dao yan” 导言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Zhao Jiabi 赵家璧,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Shanghai: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1 - 32.
- . *Hu Shi wenxun* 胡适文存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4 vols. Shanghai: Yandong tushuguan, 1924.
- . “Jianshe de wenxue geming lun”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Toward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literary revolution). In Zhao Jiabi 赵家璧,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Shanghai: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127 - 140.
- . “Wenxue gailiang chuyi” 文学改良刍议 (Suggestions for literary reform). In Zhao Jiabi 赵家璧,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Shanghai: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34 - 43.
- . “Wenxue jinhua guannian yu xiju gailiang”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evolution and theater reform). In Zhao Jiabi,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Shanghai: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376 - 386.
- Hu Xiansu 胡先骕. “Shuo jinri jiaoyu zhi weiji”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The crisis of today's education). *Xueheng* 4 (1922): 1 - 10.
- Huang Jie 黄节. “Guocui xuebao xu” 国粹学报序 (Preface to *National Essence Journal*). *Guocui xuebao* 1 (1905): 1 - 5.
- Huang Shengzhang 黄盛璋. “Gu hanyu de renshen daici yanjiu” 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 (A study of pronouns in classical Chinese). *Zhongguo yuwen* 127 (June 1963): 443 - 472.
- Huang Yaomian 黄药眠. “Fei geren zhuyi de wenxue” 非个人主义的文学 (A nonindividualistic literature). In Li Helin 李何林, ed., *Zhongguo wenyi lunzhan* 中国文艺论战 (Deba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hanghai: Zhongguo we-

nyi she, 1932, 298 - 302.

Huang Ying 黄英, ed. *Xiandai Zhongguo nü zuojia* 现代中国女作家 (Modern women writers in China). Shanghai: Beixin shuju, 1931.

Huters, Theodore. "Blossoms in the Snow: Lu Xun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a* 10.1 (Jan. 1984): 49 - 77.

———. "Ideologies of Realism in Modern China: The Hard Imperatives of Imported Theory." In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eds.,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7 - 173.

Iggers, Georg G.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Isaacs, Harold R., ed. *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 - 193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4.

Jakobson, Roma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Ed.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on, Fredric. "Third -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Fall 1986): 65 - 88.

JanMohamed, Abdul R. *Manichean Aesthetics: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Colonial Africa*.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3.

Jay, Martin.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Jia Yi 家义 "Geweizhuyi" 个位主义 (Individualism). *Dongfang zazhi* 13.2 (1916): 6 - 10.

Jia Zhifang 贾植芳 et al., eds. *Wenxue yanjiu hui ziliao* 文学研究会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Research). 3 vols. Zhengzhou: Henan renmin chubanshe, 1985.

Jiang Guangci 蒋光慈. *Jiang Guangci wenji* 蒋光慈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iang Guangci).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82

- Jin Hongda 金宏达 . *Lu Xun wenhua sixiang tansuo* 鲁迅文化思想探索 (An inquiry into Lu Xun's thoughts on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86.
- John, Mary E. "Postcolonial Feminists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Field: Anthropologists and Native Informants?" *Inscriptions* 5 (1989): 49 - 53.
- Johnson, Barbara. "Taking Fidelity Philosophically." In Joseph F.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2 - 148.
- Johnson, David,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Jones, Andrew F. "The Violence of the Text: Reading Yu Hua and Shi Zhecu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3 (Winter 1994): 570 - 602.
- Jusdanis, Gregory. *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 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Kahler, Erich. *The Inward Turn of Narrative*.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Kamei, Shunsuke 龟井俊介 . *Nihon nashonarizumu no bungaku: Meiji no seishin no tankyū* 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文学: 明治の精神の探求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alism: an inquiry into the Meiji spirit). Tokyo: Kenkyūsha, 1971.
- Kang Baiqing 康白情 . "Lun Zhongguo zhi minzu qizhi" 论中国之民族气质 (On the national mentality of China). *Xin chao* 1.2 (1919): 197 - 244.
- Kang Youwei 康有为 . *Wuxu bianfa* 戊戌变法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vol. 2. Ed.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hanghai, 1953.
- Kinkley, Jeffrey C.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Koizumi, Yuzuru 小泉让 . *Ro Jin to Uchiyama Kanzō* 鲁迅と内山完造 (Lu Xun and Uchiyama Kanzō). Tokyo: Toshō shuppan, 1989.
- Kowallis, Jon. "On the Power of *Mara* Poetry and Other Early Wenyan Essays by Lu Xu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4.
- Lao She 老舍 . *Lao She wenji* 老舍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Lao She), 16 vols. Be-

- 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0.
- . *Luotuo Xiangzi* 骆驼祥子 (Camel Xiangzi). Shanghai: Wenhua shenghuo chubanshe, 1949.
- . *Mr. Ma and Son: A Sojourn in London*. Trans. Julie Jimmerson. Beijing: Phoenix Books, 1991.
- . *Rickshaw*. Trans. Jean M. Jam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9.
- Laroui, Abdullah. *The Crisis of the Arab Intellectuals: Traditionalism or Historicism?* Trans. Diarmid Camm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Larson, Wendy. "The End of 'Funii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 In Tami E.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8 – 73.
- .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 In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eds.,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4 – 143.
- Lau, Joseph, C. T. Hsia, and Leo Ou – fan Lee, eds.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 – 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each, Edmund R. "Ourselves and Other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ly 6, 1973, 772.
- Leary, Charles. "Sexual Modernism in China: Zhang Jingsheng and 1920's Urban Culture."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 Lae, Leo Ou – fan 李欧梵.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09 – 135.
- .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vers-

- ity Press, 1987.
- Lee, Leo Ou-fan, ed. *Xin ganjue pai xiaoshuo xuan* 新感觉派小说选 (A selection of Neo-perceptionist fiction). Taipei: Yongchen wenhua shiye, 1988.
- Lee, Leo Ou-fan, and Andrew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60-395.
- Lethcoe, R. J. "Narrated Speech and Consciousnes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9.
- Levenson, Joseph.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Li Dazhao 李大钊 [Shou Chang 守常]. *Li Dazhao wenji* 李大钊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f Li Dazhao).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84.
- . "Qingchun Zhongguo zhi chuanguang" 青春中国之创造 (Creating a youthful China). *Chenzhong bao*, Aug. 15, 1916.
- Li Helin 李何林. *Lu Xun lun* 鲁迅论 (On Lu Xun). Shanghai: Beixin shuju, 1930.
- Li Helin, ed. *Zhongguo wenyi lunzhan* 中国文艺论战 (Deba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hanghai: Zhongguo wenyi she, 1932.
- Li Tuo: 李陀. "Xuebcng hechu?" 雪崩何处 (Where does the avalanche fall?). Preface to Yu Hua 余华, *Shiba sui chumen yuanxing* 十八岁出门远行 (Leaving home at the age of eighteen). Taipei: Yuanliu, 1990, 5-14.
- Li Xifan 李希凡. "*Honglou meng*" pinglun ji 红楼梦评论集 (Critical essays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eijing: Zuojia chubanshe, 1957.
- Li Yishi 李亦氏. "Rensheng wei yi zhi mudi" 人生惟一之目的 (The sole purpose of life). *Xin qingnian* 1.2 (1915): 125-132.
- Li Yiyuan 李亦园 and Yang Guoshu 杨国枢, eds. *Zhongguo ren de xingge* 中国人的性格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2.
- Li Zehou 李泽厚. "Luelun Lu Xun sixiang de fazhan"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An

- outlin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Lu Xun's thought). In *Lu Xun yanjiu jikan* 鲁迅研究集刊 (Collected studies of Lu Xun),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79, 31 - 61.
- . *Zhongguo xiandai sixiang shi lun*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1987.
- Liang Qichao 梁启超. *Yinbing shi heji* 饮冰室合集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 drinker's studio).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1936.
- Lin Jicheng 林基成. "Fuluoyide de xueshuo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1914 - 1925" 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The dissemination of Freudian theory in China, 1914 - 1925). *Ershiyi shiji* 4 (Apr. 1991): 20 - 31.
- Lin, Yu - sheng 林毓生.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 - 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 . "Lu Xun geren zhuyi de xingzhi yu hanyi: jianlun 'guomin xing' wenti." 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涵义—兼论“国民性”问题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Lu Xun's individualism: also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Ershiyi shiji* 12 (Aug. 1992): 83 - 91.
-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 Link,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Lips, Marguerite. *Le Style indirect libre*. Paris: Payot, 1926.
- Liu Fu 刘复 (Liu Bannong 刘半农). *Bannong zuwen erji* 半农杂文二集 (Random essays by Bannong), vol. 2. Shanghai: Liangyou tushu gongsi, 1935.
- . "Fang Liu Bannong" 访刘半农 (Interview with Liu Bannong). *Shijie ribao*, Apr. 1, 1931.
- . "Ta zi wenti" 她字问题 (The problem of feminine *ta*). *Xue deng*, Aug. 9, 1920.
- Liu Kang 刘康. "Politics and Critical Paradigm: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a* 19.1 (Jan. 1993): 13 - 40.
-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唐小兵, eds.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iu, Lydia H. 刘禾. "Bu touming de neixin xushi: youguan fanyiti he xiandai hanyu xushi moshi de ruogan wenti"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 有关翻译体和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若干问题 (Narrating the inner world: problems in translational style and modern Chinese narrative modes). *Jintian* 3 (Fall 1994): 174 - 192.
- . "The Female Body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37 - 62.
- . "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Making of a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4 - 220.
- . "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Liu Qingfeng 刘青峰. *Lishi de fanxiang* 历史的反响 (Reverberations of history).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0.
- Liu Xianbiao 刘献彪 and Lin Zhiguang 林治广, eds. *Lu Xun yu Zhong Ri wenhua jiaoliu* 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Lu Xun i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1981.
- Liu Yizheng 柳诒征. "Lun Zhongguo jinshi zhi bingyuan" 论中国近世之病源 (On the root of China's illness today). *Xueheng* 3 (Mar. 1922): 1 - 11.
- Liu, Yu - 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iu Zaifu 刘再复. "Lun wenxue de zhuti xing" 论文学的主体性 (On subjectivity in literature). In *Liu Zaifu ji* 刘再复集 (Works of Liu Zaifu). Ha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88, 72 - 125.
- Liu Zaifu and Lin Gang 林岗. *Chuantong yu Zhongguo ren* 传统与中国人 (Tradition and the Chines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88.

- Liu Zhengtan 刘正琰 et al., eds. *Hanyu wailai ci cidian* 汉语外来词词典 (A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in Chinese).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85.
- Lowe, Lisa.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u Shuxiang 吕叔湘. *Zhongguo wenfa yaolie* 中国文法要略 (An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42.
- Lo Xun 鲁迅. *Lu Hsin: Complete Poems*. Trans. David Y. Ch'eh. Temp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 . *Lu Xun quanji* 鲁迅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16 vols.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81.
- . *Lu Xun shuxin ji* 鲁迅书信集 (Collected letters of Lu Xun). 2 vols.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76.
- .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in*. Trans.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New York: Norton, 1977.
- Lu Xun yanjiu jikan* 鲁迅研究集刊 (Collected studies of Lu Xun),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79.
- Lu Yongheng 陆永恒. *Zhongguo xin wenxue gailun* 中国新文学概论 (A brief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zhou: Kewen yinshuju, 1932.
- Luká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3.
- “Lun Zhongguo renmin zhi yilai xing zhi qi yuan” 论中国人民之依赖性之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dependent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Dongfang zazhi* 1.5 (1905): 91–94.
- “Lun Zhongguo zhi guomin xing” 论中国之国民性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Dongfang zazhi* 5.6 (1908): 93–99.
- Luo Changpei 罗常培. *Yuyan yu wenhua* 语言与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Guoli Beijing daxue, 1950.
- Luo Zhufeng 罗竹风, ed. *Hanyu da cidian* 汉语大词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12 vols. Shanghai: Hanyu da cidian chubanshe, 1986–1994.

- Ma Zuyi 马祖义. *Zhongguo fanyi jianshi; wusi yiqian bufen*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prior to the May Fourth period). Beijing: Zhongguo duiwai fanyi chubanshe, 1984.
- 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air, Victor H. "Anthologizing and Anthropologizing: The Place of Non-Elite and Non-Standard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Duk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in Asian Pacific Studies*, 2. Durham, N. C.: Asian 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1992.
- .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3(1994): 707 - 751.
- . "East Asian Round-Trip Words." *Sino-Platonic Papers*, 34.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2, 5 - 13.
- Mani, Lata. "Multiple Mediations: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Multinational Reception." *Inscriptions* 5(1989): 1 - 23.
- Mao Dun 茅盾 [Shen Yanbing 沈雁冰]. "Du *Nahan*" 读《呐喊》 (Reading *Call to Arms*). In Le Helin, ed., *Lu Xun lun* 鲁迅论 (On Lu Xun). Shanghai: Beixin shuju, 1930, 182 - 189.
- . *Mao Dun quanji* 茅盾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Mao Dun). 22 vols.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91.
- . "Yijiusansi nian de wenhua 'weijiao' he 'fan weijiao'" 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The cultural “siege” and the “anti-siege” in 1934). *Xin wenxue shiliao* 4 (Nov. 1982): 1 - 26.
- . "Yijiusanwu nian jishi: huiyilu shiba" 一九三五年记事: 回忆录十八 (Remembered events in 1935; memoir no. 18). *Xin wenxue shiliao* 1 (Feb. 1983): 1 - 23.
- Mao Zedong 毛泽东. *Mao Zedong xuanji* 毛泽东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64.
- Marcus, Steven. *Representation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Marsella, Anthony J., George DeVos,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1993.
- Mazrui, Ali.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The Hague: Mouton, 1975.
- McDougall, Bonnie.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to Modern China, 1919 - 1925*. 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 McHale, Brian.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A Survey of Recent Accounts."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3.2 (Apr. 1978): 249 - 276.
- McKinnon, Janice R.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Mei Guangdi 梅光迪. "Lun jinri wuguo xueshu jie zhi xuyao"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On what is needed in today's national scholarship). *Xueheng* 4 (Apr. 1922): 1 - 7.
- . "Ping jin ren tichang xueshu zhi fangfa"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On the methodology promoted in today's scholarship). *Xueheng* 2 (Feb. 1922): 1 - 9.
- . "Ping tichang xin wenhua zhe" 评提倡新文化者 (A critique of the advocates of new culture). *Xueheng* 1 (Jan. 1922): 1 - 8.
- . "Xianjin xiyang renwen zhuyi"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Huma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Xueheng* 8 (Aug. 1922): 1 - 7.
- Meng Shen 梦沈. "Bo 'Ta zi de yanjiu'" 驳《她字的研究》 (A rebuttal to "On Feminine ta"). *Xue deng*, Apr. 25, 1920.
- Meng Yue 孟悦 and Dai Jinhua 戴锦华. *Fuchu lishi dibiao* 浮出历史地表 (Emerging from the horizon of history). Zhengzhou: Henan renmin chubanshe, 1989.

- Meng Zhen 孟真. "Xinqi boruo de guoren" 心气薄弱的国人 (The demoralized Chinese). *Xin chao* 1.2(1919):342 - 343.
- Metzger, Thomas.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ller, Andrew. *The Japanese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Min Zhi 民质. "Wo" 我(1). *Dongfang zazhi* 13.1(1916):13 - 16.
- Miyoshi, Masao. *Accomplices of Silence: The Modern Japanese Nov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Morohashi Tetsuji 诸桥辙次. *Dai Kan-Wa jiten* 大汉和辞典 (Morohashi's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13 vols. Tokyo: Taishukan shoten, 1955 - 1960.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15.
- Mounin, Georges.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 Munro, Donald,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5.
- Nader, Laura. "Orientalism, Occidentalism, and the Control of Women." *Cultural Dynamics* 2.3(1989):323 - 355.
- Najita, Tetsuo, and Irwin Scheiner, eds. *Japanese Thought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00 - 1868: Methods and Metapho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Ng, Mau-sang. *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Ed. Oscar Levy. 18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 .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rans. Adrian Colli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7.
- Niranjana, Teja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Novotná, Zdenka.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 Modern Chinese." 3 pts. *Archiv Orientalni* 35.3(1967):613 - 648;36.1(1968):295 - 325;37.1(1969):48 - 75.
- O'Hanlon, Rosalind. "Recovering the Subject: *Subaltern Studies* and Histories of Resistance in Colonial South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22.1(1988):189 - 224.
-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 - 1950*. Ed. and trans. Joshua A. F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Ōta Susumu 太田进. "Shiryō issoku" 资料一束 (A piece of historical data). *Yasō* 31(June 1983):61 - 62.
- Otani Kōtarō 大谷孝太郎. *Zhongguo ren jingshen jiegou yanjiu* 中国人精神结构研究 (A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Trans. Yuan Fang 袁方. Shanghai: Dongya tongwen shuyuan, 1935.
- Ozawa Masamoto 小沢正元. *Uchiyama Kanzō den: Nitchū yūkō ni tsukushita idai na shomin* 内山完造伝: 日中友好につくした偉大な庶民 (Biography of Uchiyama Kanzō: A great commone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Tokyo: Banchō shobō, 1972.
- Paliakov, Léon. *The Aryan Myth: 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 Trans. Edmund Howard. London: Sussex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an Guangdan 潘光旦. *Feng Xiaoqing xing xinli biantai jie mi* 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 (The secret of the abnormal sexual psychology of Feng Xiaoqing). Ed. Zhen Xiang 禛祥 and Bo Shi 柏石. Beijing: Wenhua yishu chubanshe, 1990.
- . *Feng Xiaoqing: yijian yinghan zhi yanjiu* 冯小青: 一件影恋之研究 (Feng Xiaoqing: studies of a case of narcissism). Shanghai: Xinyue shudian, 1929.
- . *Minzu texing yu minzu weisheng*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hygiene).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7.
- Park, Graham,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 Parry, Benita.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9(1987):27 - 58.
- Peng Xiaoyan 彭小妍. *Chaoyue xieshi* 超越写实 (Beyond realism). Taipei: Lian-

- jing chuban, 1993.
- Plaks, Andrew,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opovič, Anton. *A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6.
- Prakash, Gyan. "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2 (1990): 383 – 408.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Průšek, Jaroslav.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Qian Jibo 钱基博.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shi* 现代中国文学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hijie shuju, 1933.
- Qian Xingcun 钱杏邨 [A Ying 阿英, Zhang Ruoying 张若英]. *Wanqing wenyi baokan shultie*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 (An account of late Qing literary periodicals). Shanghai: Gudian wenxue chubanshe, 1959.
- . *Wanqing xiaoshuo shi* 晚清小说史 (A history of late Qing fiction). Taipei: Renren wenku, 1968.
- .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zuojia* 现代中国文学作家 (Modern Chinese writers of literature). Shanghai: Taidong shuju, 1929.
- . *Zhongguo xin wenxue yundong shi ziliao*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 Shanghai: Guangming shuju, 1934.
- Qian Zhixiu 钱智修. "Duoxing zhi guomin" 堕性之国民 (The lethargic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Dongfang zazhi* 13.11 (1916): 1 – 6.
- Qiu Jin 秋瑾. *Qiu jin ji* 秋瑾集 (Collected works of Qiu Ji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0.

Rafael, Vicente L.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kin, Mary Backus.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e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The Case of Ch'iu Chi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9 - 66.

Rao Hongjing 饶鸿竞 et al., eds. *Chuangzao she ziliao* 创造社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Creation Society). 2 vols.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85.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rty, Richard.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Rosen, Richard Barry.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in China in the 1920'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69.

Rosenberg, Justine.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Verso, 1994.

Rushdie, Salman.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1922.

———. "Some Trait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Atlantic Monthly* 128.6 (Dec. 1921): 771 - 777.

———. "Zhongguo guomin xing de jige tedian" 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 (Some trait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Trans. Yuzhi 恣之. *Dongfang zazhi* 19.1 (1922): 21 - 33.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

- ess, 1983.
- Sanetō Keishū 実藤惠秀. *Kindai Nitchū kōshō shiwa* 近代日中交渉史话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Japanese contact). Tokyo: Shunjusha, 1973.
- . *Zhongguoren liuxue Riben shi*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rans. Tan Ruqian (Tan Yue-him) 谭汝谦 and Lin Qiyān 林启彦. Hong Ko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1982.
- Saussy, Haun.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chneider, Laurence A.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7–89.
- Schoenhals, Michael.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Five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Schwartz, Benjamin,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cott, David. "Locating the Anthropological Subject: Postcolonial Anthropologists in Other Places." *Inscriptions* 5 (1989): 75–84.
- Scott, Paal. "Uchiyama Kanzō: A Case Study in Sino-Japanese Interac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2.1 (May 1990): 47–56.
- Sha Lianxiang 沙莲香, ed. *Zhongguo minzu xing* 中国民族性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2 vol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1989.
- Shan Shi 山石. "Ta, ta, ta, bushi hanyu xingtai" 他, 她, 它, 不是汉语形态 (Masculine ta, feminine ta, and neuter ta are not Chinese forms). *Zhongguo yuwen* 31 (Jan. 1955): 40.
- Shen Congwen 沈从文. *Ji Ding Ling* 记丁玲 (A memoir of Ding Ling). Shanghai:

Liangyou, 1934.

——. *Shen Congwen xiaoshuo xuan* 沈从文小说选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Ed. Ling Yu 凌宇.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2.

Shen Dizhong 沈迪中. "Qiaohé shì zěnyàng chǎnshēng de: Zhōngguó bǎihuà wēn yùndòng hé Rìběn yǎnwēn yìzhì yùndòng" 巧合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 (How the coincidence occurred: the Chinese vernacular movement and the Japa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movement). *Liaoning daxue xuebao* 5 (1985): 68 - 70.

Shen Songqiao 沈松桥. *Xueheng pai yu wusi shiqi de fan xin wenhua yundong* 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 (The *Critical Review* group: a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era). Taipei: Taiwan daxue chubanshe, 1984.

Shi Chengjun 史承均. "Shilun jiefang hou Lao She dui *Luotuo xiangzi* de xiugai" 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样子》的修改 (Lao She's revisions of *Camel Xiangzi* since Liberatio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4 (1980): 278 - 288.

Shi Heng 诗桁. "Ceren zhuyi de wenxue ji qita" 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 (Individualistic literature and other concerns). In Li Helin 李何林, ed., *Zhongguo wenyi lunzhan* 中国文艺论战 (Deba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hanghai: Zhongguo wenyi she, 1932, 118 - 124.

Shi Qun 史群. *Xinbian Riyu wailaiyu cidian* 新篇日语外来语词典 (A new dictionary of loanwords in Japanes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84.

Shi Zhecun 施蜚存. *Meiyu zhi xi* 梅雨之夕 (An evening in the plum rain). Shanghai: Xin Zhongguo shuju, 1933.

Silverman, Kaja.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mith, Anthony D.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Smith, Arthur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Spence, Jonathan D.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 1980*. New York: Viking, 1981.

Sperber, Dan. *O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

- sity Press, 1985.
- Spitzer, Leo. *Stilstudien II*. Munich; M. Hueber, 1922.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17 – 313.
- .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Stirner, Max. *The Ego and His Own*. Trans. Steven T. Byington. London: A. C. Fifield, 1912.
-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Strich, Fritz.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 Trans. C. A. M. S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 Suleiman, Susan Robin. "Nadja, Dora, Lol V. Stein: Women, Madness, Narrative." In Shlomith Rimmon-Kenan, ed., *Discourse in 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1987, 124 – 151.
- . *Subversive Intent: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Avant-Gard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un Yushi 孙玉石. "Lu Xun gaizao guomin xing sixiang wenti de kaocha"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查 (A study of Lu Xun's thinking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Lu Xun yanjiu jikan* 鲁迅研究集刊 (Collected studies of Lu Xun).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79, 86 – 117.
- Sun Zhongshan 孙中山. *Sun Zhongshan xuanji* 孙中山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Sun Yat-sen).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56.
- Sun Zuji 孙祖基. "Ta zi de yanjiu" 她字的研究 (On feminine ta). *Xue deng*, Apr. 18, 1920.
- . "Fei bo 'Ta zi de yanjiu'" 非驳《她字的研究》 (Not a rebuttal to "On Feminine ta"). *Xue deng*, Apr. 24, 1920.

- Tam, Yue-him (Tan Ruqian) 谭汝谦. *Jindai Zhong-Ri wenhua guanxi yanjiu* 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Studies in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s). Hong Kong: Xianggang Riben yanjiusuo, 1986.
- . "Meiji Japa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Language Reforms in Late Ch'ing China." In James W. White, Michio Umegaki, and Thomas R. H. Havens, eds.,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ism: Modern Jap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61 – 78.
- Tang Xianzu 汤显祖. *Mudan ting* 牡丹亭 (Peony pavilion).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63.
- . *Peony Pavilion*. Trans. Cyril Bi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Taylor, Charles. "The Person." In Michael Carrithers, Steven Collins, and Steven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57 – 281.
- .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ibaudet, Albert. *Gustave Flaubert*. Paris: Gallimard, 1982.
- Todorov, Tzvetan.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Trans. Richard Howard. Cleveland: Press of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1973.
- 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 .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Berkeley, Calif.: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 Uchiyama kanzō 内山完造. *Ro Jin no omoide* 鲁迅の思い出 (Memories of Lu Xun). Tokyo: Shakai shisōsha, 1979.
- . *Yige Riben ren de Zhongguo guan*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China). Trans. You Bingqi 尤炳圻. Shanghai: Kaiming shudian, 1936.
- Ullman, Stephen. *Style in the French Novel*.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Viswanathan, Gauri. *Masks of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akeman, Frederic,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Wang, David Der-wei 王德威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ang Hui 汪晖 “‘Sai xiansheng’ zai Zhongguo de mingyun: Zhongguo jinxiandai sixiang zhong de ‘kexue’ gainian jiqi shiyong” “赛先生” 在中国的命运 - 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 (The fate of “Mr. Science”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kexue* and its use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Xueren* 1 (1991): 49 - 123.
- Wang Li 王力. *Zhongguo Yufa lilun* 中国语法理论 (A theory of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47.
- Wang Lida 王立达. *Xiandai hanyu zhong cong Riyu jielai de cihui* 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Loanwords from Japanese in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2 (1958): 90 - 94.
- Wang Liwei 王力卫. “Zaoqi de Ying Hua cidian yu Riben de yangxue” 早期的英华词典与日本的洋学 (Early English -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foreign studies in Japan). *Yuanxue* 1 (Feb. 1994): 277 - 294.
- Wang Xinggong 王星拱. “Wu he wo” 物和我 (Matter and self). *Xin chao* 3.1 (1921): 1 - 11.
- Wang Xiyan 王西彦. *Lun Ah Q he tade beiju* 论阿 Q 和他的悲剧 (On Ah Q and his tragedy). Shanghai: Xin wenyi chubanshe, 1957.
- Wang Yao 王瑶. *Zhongguo xin wenxue shigao* 中国新文学史稿 (A 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Kaiming shudian, 1951.
- Wang Zhefu 王哲甫. *Zhengguo xin wenxue yundong shi*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 Hong Kong: Yuandong, 1965.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 Wei Shaochang 魏绍昌. *Yuanyang hudie pai yanjiu ziliao*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y fiction). Hong Kong: Joint

- Publishing, 1980.
- Werner, Edward T. C. *Autumn Leaves: An Autobiography with a Sheaf of Papers, Soci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8.
- White, James W., Michio Umegaki, and Thomas R. H. Havens, eds.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ism: Modern Jap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 Whorf, Benjamin Lee.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Ed. John B. Carrol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Widmer, Ellen. "Xiao 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e 1992): 111 - 155.
- Widmer, Ellen,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Witke, Roxane. "Woman as Politician in China of the 1920's."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33-45.
- Wolf, Margery,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Wright, Arthur F.,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Wu Huaibin 吴怀斌 and Zeng Guangcan 曾广灿, eds. *Lao She yanjiu ziliao* 老舍研究资料 (Research material on Lao She). 2 vols. Beijing: Shiyue wenyi chubanshe, 1983.
- Wu Mi 吴宓. "Lun xin wenhua yundong" 论新文化运动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Xueheng* 4 (Apr. 1922): 1 - 23.

- Wu, Pei-yi.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Xiao Hong 萧红.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Trans.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Hulan he zhuan* 呼兰河传 (Tales of Hulan river). Harbin: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79.
- . *Sheng si chang* 生死场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Shanghai: Xinwenyi chubanshe, 1935.
- . *Xiao Hong daibiao zuo* 萧红代表作 (Major works of Xiao Hong). Ed. Xing Fujun 邢富君. Zhengzhou: Henan renmin chubanshe, 1987.
- Xiao Hong yanjiu* 萧红研究 (Studies of Xiao Hong). Harbin: Beifang luncong, 1983. Xiao Jun 萧军. *Bayue de xiangcun* 八月的乡村 (Village in August).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0.
- Xu Lin 徐麟. "Luotuo Xiangzi de jiewei ji qita" 《骆驼祥子》的结尾及其他 (Reflections on the endings of *Camel Xiangzi* and other matters).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1 (1984): 255 - 269.
- Xu Shouhang 许寿裳. *Wang you Lu Xun yinxiang ji* 亡友鲁迅印象记 (Reminiscences of my late friend Lu Xun).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47; reprinted 1977.
- . *Wo suo renshi de Lu Xun* 我所认识的鲁迅 (Lu Xun as I knew him).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78.
- Xu Shouwei 许守微. "Lun guocui wu zu yu ouhua" 论国粹无碍于欧化 (On national essence not being a roadblock to Europeanization). *Guocui xuebao* 7 (1905): 1 - 5.
- Xu Zhiheng 许之衡. "Du Guocui xuebao ganyan" 读国粹学报感言 (Thoughts on reading *National Essence* journal). *Guocui xuebao* 6 (1905): 1 - 6.
- Xu Zidong 许子东. *Yu Dafu xinlun* 郁达夫新论 (A new study of Yu Dafu).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4.

- Yan Jiayan 严家炎. *Xin ganjue pai xiaoshuo xuan* 新感觉派小说选 (Selected Neoperceptionist fiction). Beijing: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85.
- .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 liupai shi*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Diverse strands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89.
-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Yoshino, Kosaku.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Young, Marilyn B.,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Yu Dafu 郁达夫. “Wo du nimen que meiyou shiwang” 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 (I am not disappointed with you). *Xingzhou ribao*, Jan. 23, 1939.
- . “Yishu yu guojia” 艺术与国家 (Art and the state). In Rao Hongjing 饶鸿竞 et al., eds., *Chuangzao she ziliao* 创造社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Creation Society).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85, 1:55 - 59.
- . *Yu Dafu quanji* 郁达夫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Yu Dafu). 4 vols. Shanghai: Beixin shuju, 1930.
- Yu Guangzhong 余光中, ed. *Zhongguo xiandai wenzue daxi*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Taipei: Juren chubanshe, 1972.
- Yu Liming 俞理明. *Fojing wenxian yuyan* 佛经文献语言 (The language of Buddhist texts). Chengdu: Bashu Shushe, 1993.
- Yue Daiyun 乐黛云. “Shijie wenhua duihua zhong de Zhongguo xiandai baozhu zhuyi” 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alogue). *Zhongguo wenhua* 1 (Dec. 1989): 132 - 136.
- Yuan Liangjun 袁良骏. *Ding Ling yanjiu wushi nian* 丁玲研究五十年 (Studies of Ding Ling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Tianjin: Tianjin jiaoyu chubanshe, 1982.
- Yuan Liangjun, ed. *Ding Ling yanjiu ziliao* 丁玲研究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Ding Ling).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1982.

- Zeitlin, Judith.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Zhang Binglin 章炳麟 [Zhang Taiyan 章太炎]. "Bo Zhongguo yong wanguo xinyu shuo"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A rebuttal to the proposal for the adoption of Esperanto in China). 2 pts. *Guocui xuebao* 41(1909):6-10; 42(1909):1-10.
- . *Zhang Taiyan zheng lun xuanji* 章太炎政论选集 (The political views of Zhang Taiyan). Ed. Tang Zhijun 汤志钧.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7.
- Zhang Jinglu 张静庐. *Zai chubanjie ershinian* 在出版界二十年 (My twenty years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Shanghai: Shanghai zazhi gongsi, 1938.
- Zhang Jinglu, ed.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bubian*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Supplement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ublishing in China).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7.
- . *Zhongguo jindai chuban shiliao*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ublishing in the recent history of China). 2 vol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7.
- . *Zhongguo xiandai chuban shiliao*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ublishing in modern China). 4 vol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7.
- Zhang, Jingyuan.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igmund Freud." *Chinese Comparative* 3.1 (July 1989): 33-35.
- .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Literary Transformations, 1919-1949*.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n Series, 1992.
- Zhang Mengyang 张梦阳. "Lu Xun yu Shi Misi de Zhongguo ren qizhi" 鲁迅与史密士的中国人气质 (Lu Xun and Smith'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u Xun yanjiu niankan* 2(1980): 208-217.
- Zhang Weifu 张维夫, ed. *Guanyu Ding Ling niushi* 关于丁玲女士 (On Ding Ling). Shanghai: Lida shuju, 1933.
- Zhang Xichen 章锡琛. "Zhongguo minzu xing lun" 中国民族性论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 from the Japanese. *Dongfang zazhi* 14.1(1917): 1-2.
- Zhang Yingjin 张英进.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Gender Ideology, and the Public Sphere." Unpublished paper, 1994.
- .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1922-1980."

Modern China 20.3 (July 1994): 347 - 377.

Zhao Jiabi 赵家璧. *Bianji shengya yi Lu Xun* 编辑生涯忆鲁迅 (An editor's reminiscences of Lu Xun).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1.

——. “Bianji yijiu” 编辑忆旧 (An editor's recollections). 2 pts. *Xin wenxue shiliao* 1 (Mar. 1978): 61 - 63; 3 (May 1979): 172 - 175.

——. “He Jin Yi zai yiqi de rizi”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The days Jin Yi and I worked together). *Xin wenxue shiliao* 2 (May 1988): 110 - 133, 151.

——. “Hua shuo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Speaking of the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in wenxue shiliao* 1 (Feb. 1984): 162 - 188.

——. “Huiyi Lu Xun gei ‘Liangyou’ chuban de diyibu shu” 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 (Recollecting Lu Xun's first book for “Liangyou”). *Xin wenxue shiliao* 2 (May 1981): 172 - 179.

——. “Huiyi wo bian de diyibu chengtao shu: yijiao congshu” 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 (Recollecting the first series of books I edited: the “ten-cent book series”). *Xin wenxue shiliao* 3 (Aug. 1983): 227 - 237.

——. “Huiyi Yu Dafu yu wo youguan de shijianabi” 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十件事 (Recollections of ten incidents relating to myself and Yu Dafu). *Xin wenxue shiliao* 3 (Aug. 1985): 32 - 44.

——. “Huiyi Zheng Boqi tongzhi zai Liangyou” 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 (Recollections of comrade Zheng Boqi at Liangyou). *Xin wenxue shiliao* 5 (Nov. 1979): 224 - 232.

——. “Huiyi Zheng Zhenduo he tade Zhongguo banhua shi” 回忆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 (Recollection of Zheng Zhenduo and his *History of Chinese Woodcuts*). *Xin wenxue shiliao* 2 (May 1983): 183 - 194.

——. “Lao She he wo” 老舍和我 (Lao She and I). 2 pts. *Xin wenxue shiliao* 2 (May 1986): 116 - 137; 3 (Aug. 1986): 93 - 112.

——. *Shu bi ren changshou* 书比人长寿 (Books last longer than peop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88.

- . *Xin chuanton* 新传统 (New tradition). Shanghai: Liangyou, 1936.
- Zhao Jiabi,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0 vols. Shanghai: Liangyou, 1935 - 1936.
- Zheng Boqi 郑伯奇. "Guomin wenxue lun" 国民文学论 (On national literature). In Rao Hongjing 饶鸿竟 et al., eds., *Chuangzao she ziliao* 创造社资料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Creation Society).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85, 1: 72 - 95.
- Zheng Hailin 郑海麟. *Huang Zunxian yu jindai Zhongguo* 黄遵宪与近代中国 (Huang Zunxian and modern China).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1988.
- Zheng Xinmiao 郑新苗. *Wenhua pipan yu guomin xing gaizao* 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reform of national character). Xi'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1988.
- Zheng Zhenduo 郑振铎. *Chatuben Zhongguo wenxue shi*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Shangwu yinshuguan, 1961.
- Zhongwen da cidian* 中文大辞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40 vols. Taipei: Zhongguo wenhua yanjiu suo, 1962 - 1968.
- Zhou Zuoren 周作人. "Ren de wenxue" 人的文学 (A humane literature). In Zhao Jiabi 赵家璧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Liangyou, 1935, 1: 193 - 199.
- . *Zhou Zuoren daibiao zuo* 周作人代表作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Zhou Zuoren). Ed. Zhang Juxiang 张菊香. Zhengzhou: Huanghe wenyi chubanshe, 1987.
- Zhu Ziqing 朱自清. "Xuanshi zaji" 选诗杂记 (Miscellaneous notes on the poetry selection). In Zhao Jiabi 赵家璧, ed., *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中国新文学大系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Liangyou, 1935, 8: 5 - 19.
- "Zuoyi zuojia lianzheng disi ci quanti dahui buzhi" 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补志 (Supplement to the minutes of the 4th conven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Hongqi ribao*, Nov. 22, 1930.

编后记

本书由多人合译而成,其中序、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由宋伟杰译;第二章由桑梓兰译;第三章由孟悦译;第五章由连展译;第八章由张林杰译。陈燕谷校阅了部分章节,刘禾本人也参与了全书部分章节的审订。特此说明。

三联书店编辑部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日